

亞太研究通訊

原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第十六期 二 二 年四月

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

台北・南港

目 錄



亞太研究通訊第十六期

主持人的話 / 蕭新煌	1
-------------------	---

研究論文





「國族 - 國家」、共同體、及其解構	
- 評泰國與中國少數族群的人類學研究 / 謝世忠	3
大馬檳城、台灣鹿港、越南會安傳統店屋生活空間配置之比較 / 黃蘭翔	40
文獻中的砂勞越早期華人（客家）移民與馬來統治者和 Brooke 的關係	
以及他們跟 Bidayuh 文化社會互動的初探 / 林開忠	52
台灣和東南亞研究 / 田中則雄 著 陳碧純 譯	70

會議論文

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應該合二為一？以東南亞研究為例 / 廖建裕	74
全球化對社會科學和區域（亞洲）研究的挑戰 / 蘇耀昌	81

研究報導

「亞太研究」觸動的回憶 / 張存武	90
「呂宋島北岸考古調查、發掘資料的整理和分析計畫」計畫簡介 / 臧振華 ...	92
「越南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過程的考古學調查」計畫簡介	
/ 陳維鈞	96
「『大東亞共榮圈』前後：日治時期台灣人在東亞地區的投資型移民」	
計畫簡介 / 林滿紅	98
「近世環中國海域的海難救助制度研究	
以中國、日本、朝鮮、琉球為中心」計畫簡介 / 劉序楓	101

「Forging a Colonial Bureaucracy: Examining Japan's Colonial Legacy in Taiwan」 計畫簡介 / 蔡慧玉	105
「民國初年上海的美術與文化 - 以展覽會藝評為中心的研究」計畫簡介 / 顏娟英	111
「巫者的面貌：以韓國、臺灣與中國之巫者為主的比較研究」計畫簡介 / 林富士	116
「戰後海峽兩岸的名分秩序交涉 - 1959 年至 1981 年的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籍之爭」計畫簡介 / 張啟雄	120
「中國大陸憲法學的發展的理論評析」計畫簡介 / 陳新民	123
「人力短缺與外籍勞工：台灣、日本及南韓之比較分析」計畫簡介 / 蔡青龍	129
「經濟衰退與社會變遷對女性職業流動的影響：以日本為例」計畫簡介 / 喻維欣	131
  東南亞政經大事記系列（1900-2000）	
菲律賓	134
東帝汶	166
  亞太研究機構簡介	
泰國・總理府漢文泰史研究委員會	179
  國內亞太研究機構動態報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181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183
  亞太研究計畫辦公室報導	184

會議報導

九十年度東南亞暨東北亞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	188
「近二十年來的海外華人」學術研討會	190
2002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192
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的對話：對亞太研究未來方向的啟示國際研討會	196
2002 年 5 - 8 月亞太研究相關會議時間表	199

Contents



Newsletter of the Asia-Pacific Research No.16



Letter from the Director

By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1
-----------------------------------	---



Research Papers

<i>Nation-State, Community and Its De-construction: O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Minority Peoples in Thailand and China</i> By Shih-Chung Hsieh.....	3
<i>A Comparison of Living Spatial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Shophouses in Penang, Malaysia; Lu-Gang, Taiwan and Hoi-An, Vietnam</i> By Lan-Shiang Huang	40
<i>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Early Chinese (Hakka) Migrants and Malay Rulers and the Brookes in Sarawak, also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Socio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and the Bidayuh: From Some Written Sources</i> By Khay-Thiong Lim.....	52
<i>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Studies</i> By Tanaka Norio / Tran. Bi-Chun Chen.....	70



Conference Papers

<i>Should Area Studies Be Combined with Social Sciences? The Case of Southeast Asia</i> By Suryadinata Leo.....	74
<i>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East Asia and Their Challenges to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i> By Alvin So.....	81



Report of Researchers

<i>Reflection on "Asia-Pacific Research"</i> By Tsun-Wu Chang	90
<i>The Research Project for Processing and Analyzing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the Northern Coast of the Luzon Island</i> By Cheng-Hwa Tsang	92
<i>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 Development of Northern Vietnam</i> By Wei-chun Chen	96

<i>Taiwanese Investment Migration in East Asia under the Slogan of "Great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i>	
By Man-Houng Lin	98
<i>Premodern Maritime Rescue Systems of the China Seas- The Case of China, Japan, Korea, and Ryukyu</i>	
By Shih-Feng Liu	101
<i>Forging a Colonial Bureaucracy: Examining Japan's Colonial Legacy in Taiwan</i>	
By Hui-Yu Ts'ai	105
<i>Art and Public Culture in Modern Shanghai: Views from the Art Exhibition</i>	
By Chuan-Ying Yen	111
<i>Facets of Shaman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hamans in Korea, Taiwan and China</i>	
By Fu-Shih Lin	116
<i>The Post-war Tug of War between the Two Sides on Taiwan Strait: The Status-and-Order Competit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Membership from 1959 to 1981</i>	
By Chi-Hsiung Chang	120
<i>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P.R.C. Constitutional Law</i>	
By Shin-Min Chen	123
<i>Labour Shortage and Foreign Workers: A Study of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i>	
By Ching-Lung Tsay	129
<i>Economic Recession, Social Changes, and Women's Job Mobility in Japan</i>	
By Wei-Hsin Yu	131



Chronology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1900-2000)

<i>The Philippines</i>	134
<i>East Timor</i>	166



Introduction to Overseas Institutes of Asia Pacific Research

<i>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cords Relating to Thai Histor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CSCR</i>	179
---	-----



News from the Local Institutes of Asia-Pacific Research

<i>Graduate Schoo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i>	181
<i>Graduat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i>	183



News from APARP Office	184
-------------------------------------	-----



Conference Calendar

<i>Conference on Southeast and Northeast Asian Research, 2001</i>	188
<i>Conference on Overseas Chinese since 1980s</i>	190
<i>Annual Conference of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in Taiwan, 2002</i>	192
<i>When Area Studies Meet Social Sciences:</i>	
<i>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Asian Studies.....</i>	196
<i>May ~ Aug. 2002 Calendar of Conferences and Meetings on Asia-Pacific</i>	199

主持人的話

主持人的話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主持人

壬午馬年中央研究院展現大氣魄，將「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與「東北亞區域研究計畫」合併為一，自一月一日起成立「亞太研究計畫」(Asia-Pacific Research Program, APARP)。奉院長裁示，由本人擔任計畫主持人，希望本計畫在近期內提升為本院的研究中心之一。而原「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也從今年起改名為「亞太研究通訊」。

目前規劃的長程研究方向除涵蓋亞太地區本土政治經濟文化面向，亞太地區華人社群發展也是研究重點。研究方向分為四類：1) 亞太區域之歷史與考古；2) 亞太區域之語言、宗教、族群及本土文化；3) 戰後亞太區域各國之政治、經濟、社會轉型與發展；4) 亞太區域的華人與當地各族群及社會的互動關係。本年度由本院學諮會審查通過補助的十一項分支計畫分屬上述研究方向，本期則刊載各分支計畫研究大綱。

此外，從本期開始，也將陸續刊載「東南亞政經大事記(1900-2000)」此一系列，先登的是菲律賓和東帝汶兩國。本計畫希望藉此新系列的推出能為東南亞區域研究提供基礎資料，盼國內區域研究專家學者多加使用。

新春初始本計畫即快馬加鞭於三月十三日舉行「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九十年度東南亞暨東北亞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由原東南亞與東北亞區域研究計畫補助之分支計畫與博士後計畫主持人報告研究成果。在最後綜合討論時，兩位本計畫的諮詢委員章英華教授與徐正光教授均在座，且提出寶貴意見，更為本計畫升級為中心打氣。

本計畫四月份學術活動頻繁。四月八日我們邀請瑞典亞太研究高等學院(The Swedish School of Advanced Asia Pacific Studies, SSAAPS) 主任 Jon Sigurdson 博士以「全球化與亞太高科技革命」(Globalization and High-tech Revolution in Asia Pacific)為題發表演講。本計畫緊接著於四月十九日與中華民國

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辦「近二十年來的海外華人」學術研討會，回顧與檢討過去本地海外華人研究。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與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合辦「2002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一日和美國杜克大學亞太研究所共同主辦「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的對話：對亞太研究未來方向的啟示」(When Area Studies Meet Social Science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Asia-Pacific Research) 國際研討會，這場研討會主旨在探討如何整合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理論，以期建立具有社會科學理論意涵之區域研究。

原「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成立於一九九四年，原「東北亞區域研究計畫」於一九九八年成立，今兩計畫在院方大政策下，合併為「亞太研究計畫」應是肯定原來兩計畫過去的努力和成果，其願景是更進一步升格為實力堅強的研究中心，培養亞太區域研究人才，以儘早實現李遠哲院長在一九九四年所許成為區域研究重鎮之諾言。

「國族—國家」、共同體、及其解構 ——評泰國與中國少數族群的人類學研究*

謝世忠

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主任

一、前言

人類學關於族群性/族群意識 (ethnicity) 研究的興起，主要係受到兩大近現代人類社會變動潮流的影響。其一是，在北美和西歐白人世界中之非白人裔（如華人、日本人、韓國人、東南亞各國住民、南亞人、土耳其人、及牙買加人等等）移民永不中止的遷入。其二是，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形成和後殖民時期特定社群關係的發展。學界中或有橫跨兩大潮流研究旨趣的研究者，但基本上由於分析場域一在高度工業化或「已開發」國家之中，另一則在初步工業化或「開發中」國家之內，故各自發展出了壁壘頗為分明的研究傳統。例如，北美洲各大學的「族群研究」(ethnic studies) 機構，即多為處理前一潮流的各項議題，而其中又以生活適應、律法、社會不均等、文化變遷、及祖國與美國或加拿大認同的矛盾等問題最為熱門。另外，各大學人類學系的族群分析專家，則較多偏向後一潮流的知識建構傳統。換句話說，研究者均以非白人國家或地區的相關問題進行探索。本文的主要立論背景，即是該後項知識發展的範疇。

* 本文撰寫過程承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三年級蘇裕玲同學和筆者專任研究助理李甫薇小姐鼎力相助，謹此致上最大的謝意。另外，文章初稿曾於2000年11月4日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之「『社群』研究的省思—跨世紀台灣人類學的展望之一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承評論人王明珂教授和多位學者先進指正，筆者同表謝忱。

第三世界和後殖民國家運作過程中的族群性/族群意識研究議題包羅萬象，其中除了對該特定概念所指涉對象的本質進行長期性的辯論（即強調族群認同係建立於共祖想像基礎的根本賦與論（primordialism）與強調政治經濟環境具操控族群意識生成或變遷關鍵位置的環境/情境決定論或工具論（circumstantialism /situationalism /instrumentalism）間的討論（cf. Keyes 1976；Moerman 1965；Geertz 1973(1963)；Issacs 1974；Van den Berghe 1978；Nagata 1974 & 1981；Barth 1969；Berreman 1982）之外，與國族—國家（nation-state）相關的問題，如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興起及其性質與時空類型的理論（cf. Anderson 1990；Eriksen 1993；Gellner 1987；Hobsbawm 1991；Heiberg 1979；Trosper 1981；謝世忠 1993b）國族（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的建構過程（cf. Obeyesekere 1982；Banks 1996；Keyes 1987b & 1992；謝世忠 1995）以及非主體族群與主體族群主導之國家政策間的關係（cf. Kammerer 1988；Keyes 1971, 1973；謝世忠 1992a, 1992b, 1993a, 1994a, 1994b, 1997a）等，亦是主要的研究焦點。

國族或國族—國家的議題既如此顯性，勢有其必然的道理存在。換句話說，第三世界多數為新興國家，而她們又多係模仿或被訓練或要求（按，在殖民時期受到的教育或薰陶）建立一類似百年甚至更早之前，西歐所形成之國族—國家型態的政體。但，亞非地區的景況畢竟大不同於相對性較為「同質」的歐洲，各新建成的國家中，存在著許多複雜之反當下國族或國家組成內容或權力分配方式的要素。這些要素可能是意識形態（如共產主義的勢力），也可能是因經濟破產（如中南美洲的社會）使然，但最大的問題來源，恐怕就是那些永難消隱的少數族群（minority peoples）了。

國家正努力建立一個「同質性」的國族，而各少數族群是否追隨主政者之意，主動加入同化行列，是否在自我認同上有所變化，是否認同國族的架構，是否為政權所信任，以及國族政策是否推行無效等等問題，卻可能同時困擾著族群本身和國家政體主事者。雙方有無對話的機制？其間可有或顯或隱的矛盾與衝突？這些「學術」問題吸引許多對族群性/族群意識議題感興趣，而欲求其答案的人類學和相關學科研究者。有的開放性國家如泰國，早已由連續湧入的學者建構出一個以族群關係為主要研究方向的泰學（Thai studies）學術系統（按，自1981年始起，每三年舉辦一次的「泰學研究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是當今世界上唯一可與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會一較規模的亞洲人文社會科學會議，其中少數族群與泰國國族—國家的關係，都是每次討論的要題）。有的原封閉性國家（如中國）在加入國際社會後，亦立即有大批外來學者投入「少數民族」（社會主義中國的官定用詞）與龐大國族—國家互動現象與過程的研究。

國族是否為一共同體（community）？若是，它的內容為何？若否？它又是什麼？這些正是上述學者們所欲尋求得知的問題。而少數族群或民族的現實存

在，即成了他們覓得證據的主要依據。在本文中，筆者擬以泰中兩國為例，藉由比較的過程，探討人類學對第三世界國族—國家或國族共同體研究的內在動機。我們的初步假設是，來自「非虛構性」想像之國族地區（即西歐）的西方學者（按，西方人多半認為傳統西歐係由「法蘭西國族」所建的法國、「日耳曼族」所建的德、奧、「盎格魯—薩克遜國族」所建的英國、及拉丁國族所建的西、葡共同構成），基本上係在進行對所研究對象之「虛構性」國族共同體的解構工作，只要這項學術事業持續下去，包括泰、中在內的第三世界各個國族；將永遠被界定是虛構性的（按，這種虛構性被認為係由主政者主導所發展而出，而非為 Anderson（1990）所指的彼此未曾謀面之居民共同想像出的國族共同體），而國家的「整合」（integrate）政策，依筆者的認知，基本上就是一為包裝虛構共同體而必須常常進行的工作。同樣地，受西方訓練出身而有特定成長背景的學者（如來自台灣和內蒙古（詳見後文）），更不忘不斷強化虛構中國國族的「事實」。他們正與泰、中國家的主導力量，同演一共同體否認與維護的長期「鬥爭」劇目。

二、泰人國家、諸泰關係、與非泰部落族群

對於泰國在近代形成國族—國家的過程，不同的西方人類學或歷史學者或有些許重點（如特定人物、事件、法令、及時間等）強調上的差異，但大致上一個接近公認的年代學版本已然為多數人所傳信著。

19 世紀後半葉，Siam（暹羅）受英法殖民等國勢力在印度支那半島（即大陸東南亞地區）擴張的極度威脅，國王 Rama V Chulalongkorn（r.1868-1910）於是開始積極實踐在其父王 Rama IV Mongkut（r.1851-1868）時期已著手進行的強國政策。兩位國王欲使國家成為西式國族—國家的模型。Chulalongkorn 國王仔細勘查國界，按步取消位於北部各地原係向曼谷朝貢稱臣之泰語系各小王國的政權，同時進行人口普查並建立戶口，徵取人頭稅，且規制層層轄屬的行政單元（即區域（monthon）省（cangwat）郡縣（tambon）及村寨（bann））。此外，政府以曼谷佛寺為中心，成立國家僧團教會，試圖統一全境不同南傳佛教（Theravada Buddhism）的教派，主政者更曾規劃全面以佛教同化山區非泰系非佛教信仰的部落居民。

在 1932 年之時，正值 Rama VII Prajadhipok（r.1925-1935）在位，一群曾留學西方國家的「進步」人士迫使皇室交出政權，Siam 自此變成君主立憲的政體。不久，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國家主義大盛，Siam 的政治領袖受其影響者不少，於是主張泰人應建立一大泰帝國的泛泰主義（pan-Thaism），自此主導了政府的施政方向。1939 年 6 月 24 日，首相 Phibun Songkram 將國號改成 Thailand，即

是一極端國族主義激進發展的明證。「泰人之國」(Thailand)既然成立了,一方面原 Siam 內部的各個泰語系和非泰語系群體均被加強要求迅速同化,另一方面所有被認定為「泰人」者(如中國西南邊境的 Tai-Lue(或稱傣泐或擺夷)僮人(壯族),及今寮國(老撾)與泰國沿邊各地(主要為泰國東北名為 Isan 而居民多數操用寮語的廣大地方)),均是國家冀望奪回的「失落的同胞」或「失土」(cf. Keyes 1971, 1993b; Pongsapich et' al. 1993; Renard 1993; Mulder 1997; 謝世忠 1993b)。

泰國國族 - 國家有被證明了的建構事實,而她的國族主義作用與實踐過程,亦已為學術界一一地勾勒成文。不過,這項近現代史考證的成績,卻在今日被人類學研究者「反向解證」。什麼是「反向解證」?簡單地說,就是致力找尋並認可任何與國族文化相左的對立性文化單元,或全力鮮明化與單一國族共同體難以兩立的多族群存在事實。這些研究成了解構政治性國族的一大力量,也直接宣告國族共同體的虛構性本質。

剖析 Charles F. Keyes

2001 年甫接任美國亞洲學會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會長的西雅圖華盛頓人類學系教授 Charles F. Keyes, 是公認最權威的泰國、泰文化、及廣泛東南亞研究的專家之一。在他多項泰國研究的論著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所有被 Tai (泰語系各群體的總稱) 和 Thai (專指泰國人) 界定的人群、社區、和共同體進行解構。1971 年 Keyes 發表「Buddh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一文,陳述以曼谷為統治中心的 Siam, 在歷經改國號為 Thailand 過程中的幾項重要政策。他認為, Chulalongkorn 國王根本就刻意忽略各境內群體原有的「根本賦與連結」(primordial attachments), 而一心只為創建出一個單一的國族(家)社會結構 (p.551)。其中佛教是為政府最倚重的國族化工具。原本獨立於曼谷僧團之外而以清邁為中心的 Yuan 宗派最高領袖, 曾因不服被要求採用曼谷教法而遭逮捕入獄。另外, 在全國僧團系統建成之後, 原 Yuan 一派的僧侶全被降排在階層體系的最底層。到了二十世紀中葉, 政府接連制定或修定《僧侶法》, 以加強中央宗教官員統轄地方佛寺的合法力量。1960 年代甚至執行「教義僧使」(thammathut) 與「入山傳教」(thammacarik) 兩項策略。前者係派僧侶至各平地城鎮村落, 尤其是 Yuan 的教區進行訪視, 一方面宣導每日生活中信念國家佛教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則協助建學校、修路、造橋, 企圖展現世俗功德的貢獻。至於後者 (即 thammacarik), 則為三、五僧人一組, 前往西邊和北部山區非泰語系族群分佈地, 傳佈佛理, 冀望以之同化仍信仰傳統泛靈宗教或已然接受基督宗派的部落居民。Keyes 認為, 這兩個同化工作最後均告失敗, 因 Yuan 系僧侶是否願與中央配合仍在未定之天, 而佛教入山之舉, 更使部份山區住民因增加對國

家的疑懼而揭舉反抗行動。一統性之合法佛僧威權的樹立，並不代表全國文化即已統一，因為各「根本賦與連結」的地域或族群文化傳統仍存在著。

對 Keyes 而言，Thailand 的泰人之國，雖有政治上單一國家的地位，然她其實是很不真實的。國家有一表面上的國家文化，但它卻難以促成人民對其產生深度情感。不過，雖然如此，由於國家事實上的強大政經力量，對人民包括內在思想、情緒感覺、及身份認知在內的各個生活層面，均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使得 Keyes 一直在調整他在族群研究方面的理論。Keyes 於 1976 年發表的「Towards a New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一文，是一經典之作，也是開啟前述根本賦與論和環境決定論間論戰的關鍵文獻。他在文中試圖以泰語語意學合於西文 ethnic group 的 *chat* (*chat* Thai 即為 Thai People 之意) 一字，來釐清族群構成的本質。*Chat* 原意即指出生的事實。換句話說，有共同血液源起的人群才可界定為族群。Keyes 從土著自我的人群分類原則，建構出了有共同出生事實想像的根本賦與族群形成論點。他在進行這項說明時，係把 *chat* Thai 的言說者設定在泰國人民身上，亦即他們即如前論 1971 年該文中述及的清邁住民或山地部落一樣，是具根本賦與連結的類「自然性」群體（即使有「非自然性」之文化指標的認定（如在無充足根據的景況下即相信「Thai」的原意為「自由」。因此，Thailand 是為「自由之土」），也多在自己群內產生或作用）但，愈到晚近，Keyes 就愈注意到國族 - 國家、國族主義主導者、及國家文化建構者的操控力量（按，Keyes (1990) 表示接受一些學者如 (Williams 1989) 對他過去未注意到國家、公民社會、國族主義等要素對族群識別過程影響力的批評）。

Keyes 在不少介紹東南亞文化的著作中 (e.g. Keyes 1995 (1977) :1-64 ; 1987a:512-519 ; 1987b:126-135)，始終不忘提醒該區域族群分佈的多樣性，以及自 Chulalongkorn 國王以來的國族建構運動所造成的各種緊張關係（如北泰、東北泰（按，該地居民多採用寮國語，並稱東北全區名為 *Isan*。*Isan* 一稱成為認同的標誌，而住民們愈與曼谷往來密切，愈因受另類眼光待遇而增強 *isan* 人被歧視的同族感知。可參 Keyes 1973）的地域族群主義 (ethnoregionalism)，山區部落如 Hmong 人（即中國移來的苗族）加入共產黨以抗政府，佛教引入山區反而加速對立與分裂，以及國家視山民為境內環境、政治、林產、水源等「問題」之源所產生的問題等）。強調族群的多樣性，其實就注定整體觀察可能往互動論 (interactionalism) 中的衝突模式 (conflict model) 或調融論 (accommodationism) 發展。的確，在 Thailand: Buddhism Kingdom as Modern Nation-State (1987a) 一書中，Keyes 即指出了泰國各地雖有族群主義、地域族群主義、族群宗教主義 (ethnoreligionism) 的風潮，但他們多只是要展現自我的特定性，而絕非是要反對泰人主體群體，繼而準備成為獨立的國族團體 (p.135)。但這樣的結論和多處可見的衝突敘述，顯然是不協調的。筆者甚至認為 Keyes 其實不時在提示泰國人民和政府，只要承認各群體的「自我特定性」，那麼調融的可能性必遠大於衝突

的發生。

1990 年代時的 Keyes 對國族 - 國家的解構興趣益為明顯。他認為不少非主體族群對自己加入國族共同體並不熱衷，因為對本族或個人並未有好處。Keyes 指出，族群性/族群意識有極高程度的當代現象意義。而它毫無疑問是被創構出來的。族群意識的強度，往往即端賴各族成員對自我社會文化內容與想像的國族共同體之關係遠近而定。換句話說，各族群的自主性應是強而有效的，他們有決定自己與國族關係的機會與能力。既然族群（即有限想像或非想像的共同體）力量被肯定，相對地，國族 - 國家（即想像的共同體）則基本上至少在精神上是無力的。

對 Keyes 而言，國族或國家的力量似乎是亦大亦小。它的「大」，表現於共同體鞏固之操控性論述的未曾休止。而它的「小」，則又證明於己身僅為一想像的共同體，境內的團體或個人，可以不依你的想像安排自己的心理、文化或社會歸屬（即使該共同體在形式上是一巨大的壓力來源）。1992 與 1993 兩年，Keyes 接連發表的「Who are the Lue? Revisited: Ethnic Identity within the Nations of Laos, Thailand, and China」和「Who are the Tai? Reflections on the Invention of Local,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1993a）兩文，亦再次揭示此「亦大亦小」的國族特質。

一方面 Keyes 重提前述 1976 年文中所以為立論基礎的 *chat Thai* 一詞，惟認識語意的方式有了大轉變。過去 Keyes 以 *ethnic* 來譯 *chat*，而直接認為 *chat Thai* 係指泰國民間遍存之以共有出生來源的想像或認定，來界定泰族（*ethnic Thai*）同胞的稱謂。而今他則表示 *chat Thai* 應是 *Thai nation* 的意思。*Nation*（國族）與 *ethnic*（族裔）只在群體內部進行文化象徵（如神話、信仰、英雄、語言、歷史事件、或美學傳統）之選用的意義大不相同，因為前者具有強烈地從外部強壓下來的建構性和操控性事實存在。換句話說，泰國國族在泰國國族 - 國家形成過程中，被塑造出來。它想像出一個泰人之國，而所有國境內的住民，甚至國境外的同祖後裔（1940 年代盛行的大泰主義即持此一看法（cf. Keyes 1993a, 1993b；謝世忠 1993a, 1993b）），均應向泰人國族效忠。總之，*ethnic* 為人民所控，它是民間生活的群體建構，並且多半不是絕對想像的；反之，*nation* 為國家所控，它是政權造出來的，同時也是絕對想像性的。

從今雲南南部 Sipsong Panna（即為中國的西雙版納）南遷至泰國和寮國的 Lue（泐）人，今日分屬中、泰、寮三個國族 - 國家的國民。若以過去只從族內同源認同的角度來看，他們不論遷至何處仍是同一族群。但由於國家操控境內各族群之族群性的現象已被充分證實了，各 Lue 群體面臨各國的國族建構壓力，卻也已有各自展現特定族群性的景況出現。他們在觀光情境上販售服飾、儀式、物品等文化項目，而這些均是國家強力介入的結果。如此，族群成員對自己文化遺

產和祖先追溯的基礎，均與中、泰、寮三國的國家文化緊密配合，既而造成 Chinese-Lue, Thai-Lue 及 Lao-Lue 各有不同的族群認同根據，因此也形成三個不同的族群了。

Lue 的例子，顯示 Keyes 對國族 - 國家力量的承認。不過，在 1993b 該文中，他卻再次系統性地強調泰國的「Thai」和泛指所有泰語系各族群的「Tai」，均為近一百年才被國族 - 國家的主權權威（hegemonic authority）所創構來的。泰國國族建構者依西方殖民者以「種族的邏輯」（logic of race）來劃分國界的原則，直接認定在 Siam 境內的人民全屬於一個 *chat*（nation），而所有操用為語言學家和殖民官員認定的 Tai 語各群體，亦均為 *chat* Thai 的一部分。主事者刻意忘卻 Tai 範疇之內的極大差異性，而只在人工性地塑造一個 Thai 的國族系譜（national genealogy）。各 Tai 群體即如 Lue 或前文提及之清邁一帶的 Yuan（或自稱 *kong muang*（城鎮之人））一樣，均處於各國族—國家（按，泰、緬、中、寮甚至北美、歐洲、澳洲均有 Tai 人）架構下，不斷地進行內在（族內）和外在（大社會、大環境）想像與建構的協調或選擇的工作。亦即，大多數人均在重思（rethink）反思（counter-think）自己的群體系譜，以求得合於自己在社會、文化、政治甚至觀光情境下的位置。

誠如上述，族群的多樣性已是學術上公認之東南亞社會歷史上的一大特質。因此，有的學者（如 Winzeles 1976；Bentley 1986）就致力於找到歷史上平原邦國與多族群共存的道理，其中生態性的共生（即高地和低地社群的和平共存機制）關係，最常為學者們所提及（參見 Lehmen 1963；Renard 1993；Rambo et al. 1988；Keyes 1995（1977））。學者們一方面多認為這份共生傳統已因當代國族 - 國家的建構而被破壞殆盡，另一方面亦急於發現那些非主體族群今日的景況。和 Keyes 文字訊息所透露者幾無二致，大家多似「預期」會有某種衝突的出現，因此找出國族 - 國家「整合」（integrate）境內人群過程中的「失效」或「失敗」，或確認非主體族群（如 Lue（Tai-Lue）和北方與西北部的山區部落）對國族的冷漠、排斥、甚或挑戰（包括意識上的（即如仍極力揭示自我認同）和行動上的（即如與軍警衝突））實例，即常成為研究上的重點。

Lue 的例子

早在 60 年代中葉，Michael Moerman 即對 Lue 的族群認同性質進行了分析（1965:1215-1230）。他雖未對 Lue 與泰國國家的關係作太多的敘述，但文中強調居處於泰北的 Lue 人，依是以前對歷史王國（即 Sipsong Panna 或今官定的西雙版納）的記憶或緬懷，來作為自我族群認同的憑藉。換句話說，依 Moerman 的看法（p.1224），Lue 人雖也在 Thai 的範疇之內，但其最根本的認同基礎是在

歷史、在「外部」(即泰國之外)而非在當下,在「內部」(即泰國國族-國家)之內。因此,泰國國家的實質整合顯然是令人懷疑的。

尤有甚者, Gehan Wijeyewardene (1990b:48-73) 更直接認為,事實上 Lue (Lü) 在泰國並未如 Moerman 所構架出之「自然地」即屬 Thai 範疇之內的情景。因為, Lue 對泰國人來說,一直是在身分認定上最為兩難的群體。Lue 是否為 Thai, 往往取決於政治策略的方向 (p.68)。Wijeyewardene 指出,較晚近遷移至泰北 Mae Sai 一地的 Lue 人,只能從政府方面拿到俗稱「粉紅卡」(pink card) 的居留難民證,他們不能自由離開該地,也未享有泰國公民權 (p.52)。然而,當國共戰爭於 40、50 年代之交延燒至 Sipsong Panna 之時,王國末代國王 Chao Hmoam Gham Le 之九叔,原 Meeng Ghan (按王國計統轄三十幾個 meeng 郡鎮)) 首長 Chao Hmoam Ma-Rni Gham 和多位王族成員如王弟刀世明和原 Meeng Long 首長,均逃至泰國。當時,泰政府贈送一大片土地給他們,並給予相當禮遇 (謝世忠 1993a:71-92)。前後不同時期的 Lue 人,顯然果如 Wijeyewardene 所言的,所獲得的待遇差別甚大。不過,或許即如 Moerman 所建議的,對歷史王國的難以忘卻,使得 Lue 人不可能做到令泰國政府滿意的國族認同程度。所以,像稍晚才移進 Mae Sai 的 Lue 人會遭此境遇,其實也不難理解。

不過,並不是所有 Thai-Lue 平民均和在 Mai Sai 族人一樣的不幸。有些研究顯示,在幾個特定地區,Lue 人群體與泰國國族-國家有著相當完好的搭配。在泰寮邊境從今寮國北部移住泰國的 Bann Lue Te (Lue Te 村) 居民,就是一例 (Yoshikawa 1999)。Lue Te 村民一直係以獨有的織品服裝來做為自我認同最重要的文化標記。泰國政府為維持邊境的安寧,以便發展觀光事業,對該地的 Lue 人很早即發給身份證。在國家的介入下,研究傳統服裝的組織成立了,介紹性或分析性的專書也紛紛出版,Lue Te 的織品生產愈來愈有名,不少泰國人更從各方湧進購買。Yoshikawa 認為,村民雖以服裝強韌地維繫著認同,但它與泰國國族認同是併置不駁的 (pp. 16-19)。畢竟,這些商品已成了所謂的「正確的物品」(appropriate goods),它們為國家文化的大架構所吸收涵蓋了。更何況早先 Lue 居民們即是因喜歡泰國之故,才會自寮國遷來,所以,能當成泰國國民或身為國族成員之一,實是一件喜悅的事。

Yuji Baba 的另項研究是關及北泰 Nan 省幾個由 Meeng La (今西雙版納自治州孟臘縣) 遷來的 Lue 人社區 (1999)。這些 Lue 人一直維繫著對 Meeng La 地方神祇的祭祀儀式,但不同的社區因與泰國國家區域發展的規劃地點距離有差,導致近距者有的祭儀愈來愈「國家化」(nationalized),而遠距者則有的仍維持傳統社區運作模式。「國家化」了的社區在祭典中常會加入外來的制式民族舞蹈比賽或球類活動。它們一起進入了國家文化的架構。至於未被國家化的社區,居民們仍依老一輩族人之指揮而行事,他們距國族文化仍有一段距離,與泰國主流社會的鴻溝也相對地大的多。

我們可以看到，在歷史過程和當下社會景況中，泰北或東北的 Lue 人，與泰國國族 - 國家的關係，有著不同的發展模式。不過，研究者所關心的議題，簡單來說，即是：「Lue 人如何於泰國國族內生活？他們認同的存在機制為何？泰國國族 - 國家在 Lue 的範疇上成敗又如何？」或許就如不同學者的發現一樣，有的 Lue 人社區與國族 - 國家完全整合，有的被強力轉化成國家心儀的樣子，有的處於被半隔離狀態，有的則仍未被國家注意到。但基本上，Lue 認同的常續性維繫，卻為所有研究者共同承認。換句話說，泰國傳統同化哲學的國族 - 國家架構（如 Chulalongkorn 國王所實踐者），顯然不易維持。因此，國族文化的內容亦從曼谷暹羅文化為唯一中心的模式，轉變成可涵蓋 Lue 人服飾和祭典等異質要素的多元文化類型（另參謝世忠 2000）。學者們「證實」了 Lue 的存在事實，即已直接告示了國族建構的虛幻性本質，而筆者認為，它其實正是人類學者對泰國國族 - 國家與各少數族群關係研究的共同「內在」結論。

山區部落的例子

在泰國西部和西北部與緬甸交界邊境山區分佈著一廣稱為 Karen 的群體。在西部的各村寨，歷史時期即與曼谷王朝維持高地山田燒墾生態適應文化和低地水田定耕邦國文化的共生關係。當泰國開始進行國族 - 國家建構運動之時，這些村寨相當配合，不僅按行政架構選舉地方首長，進學校接受國民教育，也按規繳納國稅。然而，位處北方的 Karen 群體景況卻不大相同。在過去，他們與清邁王朝維持一和諧的高低地生態社會關係，而今清邁王室權力已為曼谷王室剝奪，山區部落直接與泰國國族 - 國家遭逢。由於雙方無接觸經驗，缺乏互信基礎，因此造成了緊張的關係。國家方面一直以強力的方式設法重組地方行政，建立國家統治的合法性權威，更無端地徵收重稅。Karen 族人在不堪壓力的情形下，終有激烈的反抗行動出現。過去山田燒墾與水田耕作的合作模式，如今變成了「頑劣」的「異族」（aliens）與鎮壓成性之警察國家間的敵視關係。

Renald D. Renard 在「The Differential Integration of Hill People into the Thai State」（1993）一文中，將上述的兩種「整合」類型，描述的相當清楚。他指出，泰國國族 - 國家由於對歷史認知的不足與施政的錯誤，根本未能達到全國一統為單一國族的目標，北方山地的例子，基本上就是在「泰人之國」中，製造他類「異族」的明證。Renard 對過去高低地的和諧關係，有某種知識建構上的緬懷之情，他批評泰國人只一味在建構 *chat Thai*（Thai Nation），而完全忘卻了傳統上生態共生的美好日子。據此，若只是主觀地想像著存有具同一認同的泰國國族，其本質無疑是虛幻的。

Nicholas Tapp 長期以來，一直以 Hmong（即中國所稱的苗族）的集體加入

基督教現象、傳統 Hmong 文化內化耶穌信仰的過程、救世主運動(messianism)以及改宗和族群認同間的關係等議題，為其研究的重點。在泰國，Hmong 人以信基督教為一具有提昇到較高層次之文明的意義，因為從信仰過程中，可以獲得文字(以羅馬字創製的教會 Hmong 文)力量的想像，亦可以據之和泰人佛教勢力抗衡，並形成自我認同的象徵。不過，相對地，信教使 Hmong 人無形中強化了本身少數族群的角色位置，同時，在某一程度上，更顯現自己的邊緣化地位(Tapp 1989)。畢竟，他們的族群文化特徵遠離了國族文化的要求，更導致後者隨現的政治性敏感。果然，Hmong 大概是山區各族中在政府印象裏排名最差者，他們往往被與鴉片、共產黨及叛亂劃上等號(謝世忠 1994a:24)。不過，Tapp(1993)也提醒我們，泰國國族文化的內容一直在變動，Hmong 的認同或族群界域(ethnic boundary)並不會一成不變，因為它總是在國族認同的作用過程中，才能顯現出特定的意義來。換句話說，Hmong 不必然一直有足以公開與國家對抗的理由，因為就如前述將 Lue 的服飾納入國族文化範圍之內一樣，為了跨國往來的需要(如觀光工業的推展(參見 Michaud 1993))，Hmong 的樂舞工藝顯形文化，也可能成為國家與部落間的諧和橋樑。此外，謝世忠(1994b)則曾以 Hmong 等待苗王降世的社會運動，和外移人口中一方面仍維繫傳統，另一方面又加上當代素材的織物，來證明該族認同在舊新整組下的強韌程度。

不論如何，Hmong 人大量改宗、等待救世主或苗王降臨、叛亂紀錄第一、以及美學物質文化的永續展現等，都代表他們自我認同的強固存在。學者們多不會忽略去注意到此一論題。大抵上，各個學術研究主題，在 Hmong 的例子中，均證明了「理想性國族」的無力。因此，國家應不斷要調整國族內容，以「修正版國族」的面貌接受 Hmong 的文化特性。由此可知，就和筆者一直在文中所強調者，人類學者正是區辨國族(泰/Thai)與族群(Hmong)分存事實的當事人，同時，亦是反證國族虛構的主角。

在泰國，像前述西面國境之 Karen 人與政府關係良好之例的非泰山區部落，並不多見。一般的看法是，因泰政府和人民多視 Karen 為當地土著，又長期與曼谷王朝和平共存，所以國族—國家對之頗為禮遇。反之，北方各族(主要為 Hmong、Akha、Mien、Lisu、Lahu 等五族)多被認為是近來才遷入的「異族」，因此，在直覺上即以之為國族—國家的頭痛問題(Kammerer 1988 ; 謝世忠 1994a)。以集體轉宗出名的 Hmong 已如前述，而傾向堅持風習傳統，對祖裔傳遞歷史又長念不忘的 Akha (在中國稱為哈尼族)，是另一在部落與國族—國家互動議題上，為學者們注意的對象。

Cornelia Ann Kammerer (1988:272-273)認為，即使 Akha 人以村寨領域為範圍而生成小宇宙(microcosm)認同的現象，已被公認為係該族一大文化特色，該族在超越村寨以確認大家有同一共祖的大宇宙(macrocosm)堅強祖裔(descent)觀念，亦實可直接稱廣大的 Akha 族，就是一個氏族(clan)。該族強勁的文化根，

造成其變遷的速率和範圍總是有所限度。泰國國族—國家在北部山區的策略行動，一直是急切焦慮的。政府主事者始終認定，Akha 係在近二、三十年才非法移入泰國，但事實上，可靠的證據顯示，他們在此已住了約 70 年。Akha 人常常被籠統地歸入部份已加入共產黨的 Hmong 抗爭團隊之內。政府軟硬兼施，有鎮壓，有遷村，也有對部落予以醫療、農業、教育協助者。不過，Kammerer 指出，Akha 人並未如西面的 Karen 為配合國族—國家而生成「政治化的族群認同」(politicized ethnic identity)(即以自己為 Thai)。無論如何，他們的 Akha 自我族群界域仍相當地穩固。

Mika Toyota 在最近發表的「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Urban Akha in Chiang Mai, Thailand」(1999) 一文中，提出了與 Kammerer 不同的看法。他認為 Akha 並非是一單質的人群團體。今天，除了國家的影響之外，特定區域、跨國或全球性要素的衝擊，亦絕不能忽略。遷到城鎮地區的 Akha 人也與其他對外開放的部落一樣，不僅積極地與國家教育、經濟、政治及社會進行互動，更在觀光場域上爭得自我展現的機會。為了因應外來「文化求真」(searching cultural authenticity) 的需要，Akha 人致力於創造一他人易懂易解的「族群文化」，而該文化內容反過來亦形塑當今族人的認同。在該前提之下，認同的意義，以及認同與文化的關係，顯然與 Kammerer 認為 Akha 始終堅定維繫傳統文化生活的說法不同。Toyota 指出，60 年代由 Peter Kunstadter 編的 Southeast Asian Tribes, Minorities, and Nations (1967) 一書，迄今仍是東南亞文化研讀的入門書。由於該書的影響，包括泰國政府在內的大多數人，均據此固化了部落 (tribe) 和少數族群 (minority) 的概念 (Kammerer 之論或許就是 Kunstadter 該書展現影響力的一個例子)。然而，今天的非泰山區族群已大不同於前，他們的認同必須以多樣性的角度來理解，才合於事實。例如，遷至城區的 Akha 人，可能有依情境而定的「中國人」(因親族住在雲南，而自己也曾前往訪問)、「泰」、「基督徒」(部份已改宗)，及「Akha」等四個認同。Toyota 的論點，與前述 Tapp 論及 Hmong 的景況是類似的，亦即，文化本質論 (即單一、難變、堅持) 的說法，是難以成立的。

Akha 的例子，基本上亦是泰國國族—國家共同體被加以否定或鬆軟的論述。依 Kammerer 之說，國族—國家根本是失敗的，因為 Akha 認同愈來愈強固，而同化或整合政策也未能有效改變部落。Kammerer 對 Akha 祖裔傳續之文化根的強調，以及對官方觀點的種種誤解 (如以為 Akha 只遷來二、三十年) 誤判 (如以為山民很容易教化) 之事直陳不諱，其所反映的內在事實，基本上與上文多位人類學者並無二致，那就是，他們都在解構虛構的國族。至於 Toyota 的觀點似乎較具後現代的多元性精神，但他主張的情境性或多層次認同，一方面在人類學族群理論的意義上並無新意 (cf. Keyes 1976 ; Moerman 1965 ; Doming 1990 ; Flinn 1990 ; Poyer 1990 ; 蘇裕玲 1995 ; 楊鈴慧 1996 ; 翟振孝 1996)，另一方面遷往城區密集接觸泰國主流文化，同時又承受國際要素 (如基督教和現代觀光)

的衝擊，而卻仍維持 Akha 認同，則直接告示了 Kammerer 所發現之該族堅固的祖裔承傳族群性，基本上是存在的。而國族—國家表面上雖強而有力，但從中生成出的同化效果顯然仍是受限的（它甚至在「魅力」上，還抵不過跨國性的觀光誘因）。

最後，在 Mien（Iu Mien 或 Yao，即中國所稱的瑤族）方面，則以 Peter K. Kandre 的研究最著（1967，1976）。他一直在試圖找出 Mien 原我的文化與接受中國道教之後的宇宙觀建構過程。Kandre 指出，與中國的接觸使該族在宗教信仰上，接受了對方的體系。但這項經驗卻讓 Mien 形成了兩大文化特性。其一，族人清楚地區分祭祖與敬天的儀式，前者的祭典必須用 Mien 語，所有收養進來的外族小孩也在此時為祖先接受認可，因此它儼然是 Mien 人族群認同最主要象徵儀式。至於敬天儀式則全係以漢字經典為主之道教傳統，中國語文在此為宗教專職人員充分使用。Mien 人第二項文化特性即為在與中國和諧關係的經驗中，養成了該族一種易與帝國或統治王國共處的文化制度。在中國如此，遷至泰國之後亦復如是。Kandre 檢測，Mien 的原有類似半封建似的酋長政治制度（即各村有頭人，而數村又共有一大頭人），可能會漸漸為泰國國家行政取代（1967:615），但事實上族人一方面仍堅持傳統，另一方面亦可隨機與皇家政府建立起類似同一 *fing*（氏族）的友好擬親關係（1967:629）。

Mien 是泰北山區五族中，被認為「問題」最小者。它的文化是形成這種印象的主要關鍵。不過，部落能與國家有效配合，並不表示後者就是完全的優勢。Mien 的祖裔認同機制因其儀式和語言的維繫而常續存在，泰國的加入只是歡迎一個新文化要素進來罷了。Mien 的族群位置終究並不因國族文化和國家行政的推展而動搖。國族—國家組成結構不具深度文化的特性，實際上又被 Kandre 再次的證實了。總之，泰北山地部落人類學研究所述說者，正是一項學術的共同結論。這項結論提昇了少數族群在學術論述上的文化位階，也系統性地瓦解了國族—國家操縱族群文化變遷的單向政治性結論。

「國族」反撲

面對來自國際人類學明顯地識證少數族群文化或自我認同有效存在，以及國族—國家事實上形同假象的論述壓力，泰國官方之「部落研究中心」（Tribal Research Institute）（屬內政部公共福利司管轄）的研究人員也不忘揭舉官方觀點，以期反撲學術結論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Wanat Bhruksasri 一向與西方人類學者往來密切，他於 1983 年與 John Mckinnon 合編的 Highlanders of Thailand 一書，更是繼上述 Kunstadter 1967 年該書之後，成為研究泰國山地部落最佳的參考文本。不過，Bhruksasri 在參加 1987 年於澳洲 Canberra 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舉行的第三屆「泰學研究國際會議」時，所提交的「Minorities and Politics:Hill-Trib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Strategies」一文，卻全力為國家護航，頗有反思過去人類學研究的「偏頗」之勢。

Bhruksasri 指出，泰國國族—國家絕不容許分裂，一切整合的措施均為鞏固國家完整。國家亟願發給合法居住之山地部落居民身分證，雖然核准的速度的確稍慢了些。另外，政策上禁止山民跨越國境與居於他國的親友往來，也是為國家安全著想。而輔導種植鴉片的農民轉種一般作物，以及強制遷村以保護山林資源，亦是兼顧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作法。Bhruksasri 強調，泰國為一自由開放的社會，人們有自主選擇的權利，政府絕不是採行文化同化主義，而他相信山民們最終都會自然地整合入泰國社會。總之，為了國族—國家的發展，以及不可動搖之國家完整的真理性前提下，改變部落社會經濟和推行國語文，實有其必要性。

Bhruksasri 的同事 Chupinit Kesmanese 更在第五次泰學會議（1993 年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主辦）上，發表「Being Hmong and Being Thai:An Interplay of Identities」一文，強力批判 Keyes、Tapp 等人。Kesmanese 認為，Keyes 於 1970、1980 年代所主張的族群性/族群意識係建立在共享祖裔（shared descent）之說，犯了根本上的錯誤，因為認同的本質是相對性的，亦即它不是固化不動的。若依 Keyes 的理論，那包括 Hmong 在內的所有山地部落就可能永遠堅持祖裔的傳承血脈，而不願進入國族—國家的架構。這對 Kesmanese 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另外，Tapp 一直強調 Hmong 人的全村集體改宗一事，也被 Kesmanese 斥為以偏概全，因為在他的材料中，Hmong 人部落多只是一些邊緣人才會改信基督教，並無舉寨受洗之事。更何況從過去到今天，山地居民有問題一定先向泰人國家的皇族或政府求援，可見向心力頗強。至於有與國家意見相左者存在，Kesmanese 也認為沒什麼大不了，因為各國各時空均可能出現類似景況。總之，政府的政策是仁心良苦的，除了教導山民放棄鴉片改行定耕農業之外，更會全力保護族民的身家安全。同樣地，人們所求的是和平，而國家即為唯一有力量實踐該目標的共同體組織。Hmong 人之中即使有人參加共產黨，也不應大書特書，因他們有更多族民早成為泰國的好公民。

泰國 Chulalongkorn 大學三位教授，Amara Pongsapich、Suriya Veeravongse 及 Phinit Lapthananon(1993)在為參與上述倫敦會議所提交的論文中，也論及少數族群政策的問題。他們承認有些山地官警貪污腐化，造成民怨。不過，國家資源管理和國家安全是兩大緊要的施政考量，而在推動政策計畫時，應也會使山民生活方式受到波及，但國家基本上是很具誠意地想協助維繫部落傳統，同時更願儘早全部發與公民證。

泰國官員和學者共同出擊，呈現出國族—國家仍有強大支撐力量的事實，因此，它即使是「虛構的」，也不易在被解構後就行瓦解。畢竟，反撲力量背後的

政經軍警和文化教育基石，仍是國族—國家即使處於理實論虛狀態下，卻可長久屹立不搖的道理。

三、中華國族、少數民族、與認同論述

泰國長久以來一直是東南亞大陸地區中，與西方世界接觸最密切，關係最穩固的國家。她開放給國際學界的時間和範圍，也遠比其他如越、寮、高、緬等國家來得長和廣。在人類學方面，對泰國的研究，半個世紀以來已累積相當的成績。今天，「泰國人類學」幾乎已然和「印度人類學」一起成為亞洲南部人類學成熟發展的典範（按，前述規模頗大的「泰學研究國際會議」即在此良好基礎下，才得以順利舉辦）。至於位在泰印之北的中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在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一直未引起國際人類學的興趣，到了 50 年代，又因鎖國之故，致使無人可至該地進行田野研究，直到 70 年代結束之時，情況才因政策開放而有所改善。當前往中國成為可能之際，包括人類學者在內的許多西方社會科學家，在短短十年內，即全數湧入大陸。縱使阻礙之要素仍多，研究者均能「逆來順受」，完成一份份的調查報告或分析性論著（cf. Pasternak 1983,1988；Thurstun 1983；Whyte 1983；謝世忠 1991；Guldin 1994）。在各項人類學的題目中，「少數民族」（按，社會主義中國官方識別確認出 55 個少數民族，再加上漢族，全國共計 56 個民族）是為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

一方面由於受到東南亞族群性/族群意識研究傳統的影響，再加上可能存在之對國族—國家的原始敵意，研究者多將探討主題設定在國族解構、族群（ethnic group）與民族的性質對異、以及少數民族被製造之過程的範圍內。一項基本的共識即是，中國國族—國家標榜「中華民族」的完整一統性，但它其實是一禁不起挑戰的脆弱論述，因為幾乎所有「少數民族」均不像中國所言之與漢族構成友好「兄弟民族」的歷史政治關係，而民族內部異質多元的組成內容，更被學者視為一大理解上的難題。位於美國西雅圖（Seattle）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人類學系，就是解構中國民族之虛構性架構的學院重鎮，因此吾人必須從她說起。

剖析「泛西雅圖學派」

在 Charles F. Keyes 的領導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自 70 年代以來一直有學生以族群性/族群意識的議題作為畢業論文的題目。到 80 年代前半期，隨著中國的開放，該系學生即開始前往大陸進行少數民族族群性/族群意識的田野研究。

而由於原在漢人宗教和社會組織研究方面頗負名聲的 Steven Harrell, 也在該系教書, 經由他的協助, 陸續有多位大陸學生至華大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若再加上香港、台灣的學生, 最高記錄的時候, Harrell 共指導 18 名中國研究的研究生。這些學生中的絕大部分很巧合地均認同 Keyes 的理論方向, 也多對中國少數民族感興趣, 因此, 80 年代後期至 90 年代中葉, 華大形成了一支中國少數民族族群性/族群意識研究的團隊。她(他)們以 Keyes 的學理為基礎, 配合 Harrell 中國區域研究的經驗, 分別對回、傣、蒙古、瑤及苗等族, 進行族裔型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Gladney 的用詞, 詳參後文)對國族—國家的適應機制、教育與認同、族群圖像的建構、民族歷史文本的生產、及千禧年運動與族群意識之關係等議題的研究。在學生的研究風潮催動之下, 不僅 Keyes 開始關注南中國境內泰語系群體的景況(參見上文), 原本對族群性/族群意識未曾表示過興趣的 Harrell, 也加入對彝族的研究。師生共同的話題自此更趨一致, 而這股顯性論題, 也吸引了部份他校學者的參與, 終而, 筆者所謂的「泛西雅圖學派」也焉然形成。

Harrell 自 1988 年開始, 即赴四川涼山地區進行彝族的研究。他先是選擇了三個彝村和一個漢村作人口經濟學上的比較分析(1988, 1989, 1990, 1993)。不過, 在田野中, 他發現被認為是彝族的三個聚落, 有一村自以是「白彝」, 或自稱 Lipuo。他們與漢人往來密切, 也認為祖先來自南京。該村村民於家中講自己的 Libie 語, 在外則用漢語。另一村為典型的彝族社區。村民知悉或仍正實行的傳統文化項目相當多, 他們自稱為 Nuosu, 而與其他同被歸為彝, 但卻不屬 Nuosu 系統者很少往來。總之, 該族族群界域的範圍相當明確。至於最後一個村落, 則幾無任何非漢的文化要素存在。不過, 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彝族或漢族。「水田族」是該社群認同的族稱, 村民們也希望國家能予以承認。這三個群體的例子, 使 Harrell 認為, 中國在識別民族時, 基本上是以文化(而非自我認同)為主要標準。例如, 「水田族」若想申請成一獨立民族, 就必須提出完整的文化特徵以為證明。對 Harrell 而言, 國家創出「彝族」之後, 所有被劃歸於此一民族範圍內的人群, 就必須去合於國家的標準。Nuosu 與 Lipuo 兩者雖無任何社會關係, 但在接受「彝族」一事上, 即無太大異議。畢竟, 它對自己的生活並無害, 甚至還因具少數民族身份而獲有某些教育、生育、及稅責上的殊利。至於「水田族」人, 則可能注定長期須處於認同矛盾的情況之下了。

解構現生彝族之後, Harrell 接著對過去彝族史的研究進行剖析(1995)。他發現早期西方學者係以種族觀點尋找所謂「純」或「混種」彝族(或僳僳)的來源, 而民國學者較重視一脈相傳之彝族歷史的考證, 至於社會主義民族學家則多致力於與 Morgan 社會發展五分期(原始公社、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的匹對。這些歷史撰述法, 即使如 Harrell 所指的, 若一定要擇一參考, 第三者應是較好的考量(不過, 他並未說明為什麼, 筆者認為或許與考慮現仍須與中國合作, 故應獲對方好感有關)。筆者以為, 對他來說, 該文主要想表達的

是，各地彝族的歷史非常歧異，各種一統或以「彝族」為單一體系書寫的歷史，均有很大的問題。總之，單一的彝族民族範疇和單一的彝族歷史，均不合於田野觀察的事實，因此，解構了單一的權威政策或論述，即反映了 Harrell 本人對於社會主義中國民族理論與實踐的根本否定。

Harrell 的這項學術認知，繼續延用至他後來擴展到四川、雲南西緣 Prmi 人的研究之上（1996）。他發現，原本自稱 Prmi 的人，近西藏的一方，均被劃屬藏族，而近雲南、四川的群體，則獨立成一「普米族」。一般在民族身份確定之後，即必須開始找出屬於自己的歷史文化，方能獲得身份認同上的信心。不過，普米族在客觀文化上，與附近被劃歸為納西族的 Mosuo 人（詳見後文對 Mckhann 研究的討論）幾乎無二致，因此，該族自我文化的找尋工作迄今仍在進行之中。Prim 的例子和彝族的情況，均是一種學術上的「民族問題」（nationalities question），而它也是「泛西雅圖學派」學者們共同的興趣。

華大第一位至大陸進行少數民族調查的博士生是現職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的 Dru Gladney 教授。Gladney 的研究對象，從最先入手的回族（分佈於全國各地），一直到包括維吾爾族（分佈於新疆）在內的伊斯蘭信眾，以及中亞、小亞細亞的外國伊斯蘭群體。他在回族的例子上（1989, 1991a, 1998）發現，被歸類為回族的人群，有的是因仍在作用的宗教，有的是祖先曾是伊斯蘭信徒而今卻不再進清真寺，但仍維持不食豬肉習慣的後裔，有的則只存有祭祖時不用豬肉的簡單習俗。國家統歸這些實際社會生活上互不相關的人民為回族，反映了中國為一以一統性制度進行論述和理論操控的威權國家，而各地方的人群和「民族」，則以實際經驗景況與之不斷地對話。如此，國家堅持著界定民族的 Stalin 四個標準（同地域、同經濟、同語言、同心理素質），而民族成員一方面情境式地的接受歸劃，另一方面卻也不會去挑戰理論。Gladney 的研究旨趣，直接導引他對維吾爾族源建構或民族源生（ethnogenesis）過程探索（1990）。他發現，中譯維吾爾的「Uighur」一詞，原是 15 世紀之前吐魯蕃王國信奉佛教之人群的族名，後係為對抗西進的中國勢力方改信伊斯蘭教，而原 Uighur 之稱也不再使用了。新疆一地原存有極為多樣性的族群或綠洲社群，在 1940 年代之時，當地首次為國族—國家（即社會主義中國）所統治，Uighur 一名即可能因有其歷史同源想像而被重新使用來一統新疆地區的人群。維吾爾族的創造和回族情況相當類似，它也是多樣人群被國家一統化、單一化的例證。民族構成的過程，經 Gladney 的描述之後已經相當清楚，一般讀者的心得大抵即是認清了「民族」本身的製造或虛構本質。而再往上推想，涵蓋包括回族和維吾爾族在內的「中華民族」，其所被認定的歷史、文化、或認同構成基礎，就更形虛弱了。

Gladney 承認自己的大社群、大區域（民族、跨族、國族、跨國）研究取向，必然會失去傳統人類學小社群、小區域（部落、村寨、百千人社區）調查的可能樂趣（1991b）。然而，對他而言，後現代式的論述（discourse）生產（making）

塑造 (shaping) 及操控 (manipulation) 現象, 則更為重要。因此, 談完了少數民族, Gladney 認為多數 (即漢族) 的建構過程, 也不能忽略。他指出, 當漢族在想像少數民族時, 其實是一種二元的對立思考, 亦即漢族是純正同質的, 而相對的少數民族則是異國情調 (exotic) 色彩繽紛、及情色本性的 (erotic)。少數民族是落後、古老、及舊時代的「活化石」, 而漢族則是文明的代表 (1994:92-123)。我們可以看出來, Gladney 和前述 Harrell 的研究, 係以解構「民族」為生, 而其中亦說明了國家所給予之民族構成的「內容」, 以及民族本身表現出的部份自處之道。Gladney 認為漢族也是近現代創出的概念範疇, 不過, 此一說法仍有待他進一步地「解構」, 方能使自己所秉持的研究傳統更具擴大說服的力量。

筆者是接在 Gladney 之後, 第二位華大人類學系研究生對中國少數民族族群性/族群意識議題感興趣者。迄今除了博士論文 (Hsieh 1989) 之外, 筆者還有九種關於少數民族的論著發表 (謝世忠 1989, 1992a, 1992b, 1993a, 1993b, 1995, 1996, 1997a, 1997b)。主要關切的重點是, 雲南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傣族 (即上文討論東南亞區域時所提到的 Sipsong Panna Tai-Lue 人) 與中國政權和漢人間的關係。討論了 Tai-Lue 人 (或稱為傣泐人) 從一維繫了數百年的「半獨立王國」, 演變至今成為社會主義中國 55 個少數民族之一的傣族之支系 (按, 傣族還包括德宏、金平、新平、孟連等地的成員) 的過程。換句話說, 傣泐人自被納入社會主義中國國族—國家體制內之後, 族人的認同機制、文化生活、及歷史意識, 均面臨不斷必須自我調節或改變的壓力。強調今傣泐人仍維繫堅定認同的因素, 並非宗教 (山區布朗族人亦信佛教) 或語言 (在當地不少民族會講傣語) 特性使然, 而是其王國的末代 Chao Phaendin (國王) Chao Hmoam Gham Le 仍然健在 (在雲南省民族研究所任研究員), 大家仍認定自己為 Chao (王) 的子民。

在《傣泐：西雙版納的族群變遷》(1993a) 一書中, 筆者分章敘述傣泐人與北東南亞區域各群體、與暹羅 (泰國) 與中國帝國、與民國政權、及與社會主義中國的近代歷史和當下互動景況。筆者認定傣泐人的故事, 「事實上就是轉述讀者們一個非工業化族群, 在面對比原始瘴厲毒獸 (按, Sipsong Panna 一地以瘴疾流行為名, 過去旅人視為畏途) 千百倍危險之『科技 工業 軍事 意識形態教條 多數霸勢』複體之統治政權時的求生精神」(頁 177)。很顯然地, 筆者的「責難」與「同情」意識, 似比前述幾位明顯了些, 不過, 既出身自華大, 其對民族解構及證明社會主義國族 - 國家教條性族群政治過程的興趣, 與同校多位學者仍頗為一致。

在論及中泰兩國國族主義競爭過程的文章中 (1993b), 筆者明確地指出兩國操控歷史上曾存在雲南的南詔王國民族成份, 裨以創造「中華民族史」或「泰族史」的權威版本。不過, 歷史的爭奪只是表象, 兩國實際上具有爭取建立傣族屬於自己的合法性。國族對中國而言, 有歷史政權一統記錄的承續肩擔, 而對泰國來說, 則代表記憶不復之泰人之邦的再整合。認為兩方的論述性交鋒會再延續下

去。

筆者認為，中國控制少數民族的策略，一直是嚴密而有效的。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少數民族多已獲得國家給與的「形式資源」(如民族區域自治的實施，「當家作主」的宣傳口號等)(1992a)，因此，各民族也必須要去習得自己已獲自主的「事實」。筆者的一篇關及漢語穆斯林(即指祖先或當下自己信仰伊斯蘭教而操用漢語的中國人)成為國家化之民族過程(即成為官方識別的回族)的文章(1992b)也指出，今天回族對國族-國家的適應策略，在較為「原真」的群體(如居住在寧夏地區堅定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方面，即是以整合可蘭經教義和馬列思想的教條為主，而在幾已被完全同化的族人(如福建東南沿海地區的陳棟丁姓社區)方面，則刻正努力建立自己的回族意識。民族單元的實質內容，對筆者而言，似就是一種「拼湊」而成的人工性人群組合。

筆者的同儕之中，有兩位來自中國內蒙古的蒙古學者，一為 Wurlig Borchigud，另一為 Almaz Khan。他們均以自己的民族為博士論文及日後長期研究的對象。Borchigud 以都市地區蒙古族人的認同為主要的探索方向。她認為(1995:278-300)，自中共統治大陸以來，蒙古人的自我認同一直很堅定，只是造成族群意識穩固的機制或基礎，對不同時空的族人而言，卻有很大的差異。在 60 年代中葉之前，城市生活的蒙族青年由於國家大力推行漢語普通話教育，因此即使學校也設有蒙語教學的課程，但大環境並不具鼓勵氣氛，所以多數人沒有使用母語的機會或動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少青年不是母語能力不足，就是根本都不會講。不過，語言並不是決定認同的最重要依據。即使仍有些成員仍很努力設法學好母語，但對這群蒙古學子而言，共享的族裔系譜、長輩們對內蒙古地區革命事業的貢獻、60 年代被國家指控意圖組織「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準備造反而遭慘烈整肅的痛苦記憶、以及當時清楚地將蒙族與當地漢族劃分成不同階段的經驗等，才是最關鍵的認同標誌。Borchigud 強調，政府為求尊重少數民族文化而設置的母語學習課程，雖流於形式化，但卻也因此造成蒙族學生同儕團體的聚合機會，再加上前述幾項非語言因素，終使蒙古認同能常續存在於劇烈變動的政經環境之中。

自 1970、1980 年代始起以迄今日，內蒙古的社會生態起了很大的變化。由於政策的開放，大批漢人從內地遷至內蒙古各城市，他們覬覦原居於該地的居民，而早期即定居於內蒙的漢人面臨此種壓力，遂形成新的「內蒙古人」意識。他們要抗衡新移進的漢人對資源的掠取。此時，同被類歸為「內蒙古人」範疇的都市蒙古族人，原本即如前段所述始終有清楚明確的認同意識，如今因新來的壓力，使他們更堅定主張「蒙古應是蒙古人的」！Borchigud 指出(1996:160-182)，由於其中交織著族群認同(蒙古族對漢族)、地域認同(內蒙古人對內地人)以及存於蒙族內心之對外蒙古的共祖想像，因此，吾人應以「認同網」(web of identities)的概念，去理解內蒙古社群關係現象才較為妥適。Borchigud 與前述

Harrell、Gladney，和筆者顯然不盡相同，她重在陳述蒙古族的認同獨立性，並以此弱化中華國族「精神質同」的強度，反之，後者三人則以解構「民族」為工作方向。不過，不論從何角度入手，國族 - 國家的架構在學術論述之下，都難以逃脫它文化深度意涵淺層性的批判。

Khan 的研究較側重在廣泛蒙古族認同機制之變遷和該族族群圖像 (ethnic image or representation) 之建構與作用的問題。他首先指出 (1995:248-277)，成吉思汗 (Chinggis Khan) 在歷史時期只被統治者以握有其印璽與否來證明自己的合法地位，一般人民或各地部落並無以之為「蒙古」認同的標誌。到了二十世紀早期，外蒙古獨立，該國為國族 - 國家建構之需，才推出以成吉思汗為共祖之論，並舉行祭祖活動，但後因蘇聯的反對而停止儀式。而在中國方面，中共對成吉思汗的態度始終是矛盾的，他們一方面企圖塑造其為中華國族的英雄，但又擔心助長蒙古意識，因此，過去的 50 年間，至少有因政爭或改革運動理念的變動，而三次推舉成吉思汗「上台」及三次推落其「下台」的記錄。不過，自 80 年代以來，在內蒙古已多次定期舉行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禮 (Chinggis Tahilga)。據 Khan 的說法，該典禮使得不少蒙族成員突然發現大家是共有祖裔譜系的一份子，每個人的內心底層均深深地彼此觸動。祭祀典禮是當代傳統創造 (invention of tradition) 的一項事實。不過，它卻直接為社會文化變動已然劇烈的蒙古社群，奠下了族群界域堅屹難動的基礎。

我們可以看到，Borchigud 與 Khan 均指證了自我族群在困境之中其「精神世界」(即認同)的生存之道。蒙古族人在內蒙古全區漢人已佔 7/8 之超高比率 (按，蒙族在城鎮區只佔 5 % 人口) 的環境下，仍有效地發掘掌握並積極運用認同機制。此外，Khan 的另一項研究 (1996)，則敘述了中國漢人對蒙族的刻板印象，以及蒙古知識份子對此一情況的反向操用，以期合於自我認同之需和國族 - 國家的架構。

雖然，在內蒙古地區多數蒙族居民已行農耕或半農半牧生活，但漢人均想像著蒙古人仍住蒙古包，並天天騎馬趕羊。換句話說，「草原放牧」、「塞外荒原」是對蒙族所建構的典型民族圖像，而漢人也據此認定蒙古人是落後的。不過，蒙族知識份子一方面鑑於自己母語和傳統文化的快速失落，另一方面對祖先的功績有愈來愈強的憧憬，他們因此對草原奔馳、牧羊萬群的廣闊世界，亦賦與積極的意義，並以之為我族的驕傲遺產。這項認同象徵的建立，不僅與漢人的印象不謀而合，也和國家宣傳地方或民族文化傳統，以期發展異族觀光 (ethnic tourism) 的政策相互配合。蒙古族人在該景況中，一方面以「草原」形象來認同自我，而同時也以之來與漢人進行區辨。反之，將蒙古族固化在草原行牧的特性上，也使得漢人方面相對地得以據此確定自己的較高位階。Khan 認為，「放牧的蒙古人」可說是策略性建構出的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它滿足了各方的意念、論述、或政向。不過，最重要的仍是蒙古族除了前述 Borchigud 和

Khan 列舉出的多項認同標誌（如共享祖裔、地方革命成就、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事件、漢蒙階級二分、成吉思汗等）之外，又增加了「草原」的要項。蒙古族認同的強度因此更為明顯，而國族 - 國家的結構基礎也就難以如政權主事者自己所渲染的穩固了。

華大還有 Ralph A. Litzinger 和 Siu-woo Cheung 兩位分別研究瑤與苗的博士生。Litzinger (1994:127) 和 Cheung (1994) 均認為兩族的認同係建立在過去長期抵抗中國帝國侵略的歷史記憶上。事實上，民國時期述及瑤族歷史的論著或地方志，即多以該族「叛亂」或與政權的衝突為主要內容。到了中共統治大陸之後，官方主導的少數民族歷史編纂，對瑤族的反封建剝削「起義」，也從不會忘卻予以強調。Litzinger 以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統籌編著之少數民族簡史中的《瑤族簡史》為例，說明了原本互不相干之各個被劃定為「瑤」的群體，如今共同擁有一部大家的歷史。在書中，Morgan 的社會演進五大階段成為置放史料的主要背景。瑤族的宗教生活，被認為係該族「原始」信仰和「封建」宗教（即指信奉道教）混存的證據。不過，Litzinger 也指出，官方的歷史版本對大多數瑤族農民而言，根本不具任何意義。這本書不過是國族、黨、國家政體等力量介入操控「民族」文化的證據而已。Litzinger 提醒讀者注意到了社會主義中國國族 - 國家製造「民族」的過程。

Cheung 對貴州東南苗族的研究之例(1996,1997)，亦顯示了「民族」、「生產」的問題重重。他在田野地發現，有一群居民自稱為 Ge，他們非常不滿被劃歸為苗族的一個分支。因為在記憶中，過去苗族凡與國家進行抗爭，「叛亂者」必會大肆屠殺、強暴、或掠奪 Ge 人社區。所以，對 Ge 人而言，苗族根本就是世仇。Ge 人的領袖過去 50 年來，就和 Harrell 所舉的「水田族」一樣，從未放棄向政府爭取成一獨立民族的努力。不過，爭取成功之日仍在未定之天，Ge 人飽受成為仇人一份子之屈已然半個世紀了。

除了上述多名華大師生之外，有幾位與華大關係密切的學者如 Charles F. Mckhann 和 Norma Diamond，也表現出類似解構「民族」的研究興趣。Mckhann 係 1992 年芝加哥大學的人類學博士，主要研究的民族為納西族。在取得學位的前一年，他受華大 Harrell 教授之邀至該校兼任講師一年，教授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一課。畢業後，Mckhann 即到距華大不遠之 Whitman 學院任教，繼續與 Harrell 師生保持連繫。在密西根大學任教的 Diamond 早於 1989 年之時，即參與 Harrell 於美國亞洲學會年會（annual meeting,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所組織的少數民族族群關係討論會，並發表苗族研究的論文。該討論會的論文報告人還包括 Dru Gladney，筆者和 Harrell 本人。

Mckhann (1995:39-62) 所研究的民族是中國 55 個官定少數民族中相當特殊的一族。納西族分佈於雲南和四川交界之處，東面的一群主要居住在永寧、瀘沽

湖一帶，他們自稱 Mosuo（麼些），並不認為自己是納西族。西面的一群居處於麗江一帶，人口較多，是為納西族的主群。Mosuo 人有一種婚俗被中國民族學者稱為「走婚」，簡單的說，就是男女青年各住自己出生之家，而不同的男子可不定期造訪同一女子並在該處過夜，而女子懷孕生子之後，小孩由母親一家扶養。這種婚制成了中國社會歷史理論的活教材，亦即它被視作過去原始群婚或母系社會的殘留。另外，西面的納西人無此風俗，因此就被認為是進化的明證。同一民族的兩邊分別代表先進和落後，在社會主義國族 - 國家的宣傳上，有其功能上的意義。不過，Mckhann 指出，兩邊差異甚大，除了 Mosuo 反對自己為納西族的一份子之外，雙方語言也不相通，而 Mosuo 反與上述 Harrell 所討論的普米族文化較為接近。中國引以為理論依據的 Stalin 四大民族界定標準，幾乎全數無法運用於納西族的身上。因此，官方理論的教條化和民族構成上的學理語塞，又再一次顯現出來，而 Mckhann 的民族解構論述，與西雅圖學者們的結論亦很清楚地得以相互呼應。

Diamond 的文章是所有「泛西雅圖學派」成員中批判文字的使用最直接者之一。她大力訴求的對象，不僅是今天的社會主義政權，還包括漢人文化與過去的中國政權。她的「The Miao and Poison: Interactions on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一文，曾獲選為 *Ethnology* 期刊 1988 年度最佳論著。在文中，Diamond 指出，流傳久遠的「苗女放蠱」傳說，基本上是漢人男性在與非漢族接觸之後，因不滿於苗人文化中女性享有性開放、婚嫁自由之權利，所創造出來的反動論述。事實上，蠱是漢人中國神秘傳統的一部分，它與性淫亂的意象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苗女的自由戀愛行為，即被與淫蕩劃上等號。漢人男性因軍旅之需（如征戰或軍屯）而在西南省份定居下來。當他們面臨娶妻成家之需卻又不得不選擇苗族女子時，對於對方之兩性文化與中國儒教大不相同的特殊性極難接受，此時「苗女放蠱」的說法，正好上場充當漢人對自我文化嚮往維護的表述標的。今天，雖然政府早已宣傳苗族是漢族的兄弟民族，大家並共組中華民族大家庭，但 Diamond 文中卻顯示，到了今日，連中國的民族學家都還相信苗女放蠱的存在。換句話說，恐懼仍作用於漢苗兩族成員的互動關係之中，而國族 - 國家的各項正面宣傳顯然難以禁得起考驗。

Diamond 研究的群體是雲貴之交的花苗。除了前述蠱傳說的解構之外，她對當地苗人受到不公待遇的景況也有詳盡的描述（1993；1994:55-78）。花苗原為山田燒墾生業，後被迫實行定耕，但森林又為國有地，只好在平地改種玉米小麥，但總難達國家預期的量額。過去族人曾因信基督教而習得傳教士所發明的滇東北拼音苗文，但教會被中共封閉之後，加上中文教育速度又慢，多數族人反而變成了文盲。另外，文革時，不少原信教的族人也因「勾結外國人」、「不忠」而被無情地批鬥。現在信仰雖已開放，但中共幹部仍禁止信徒夜禱，因會妨害白天的生產活動。苗族的花山節在近年來已恢復，但活動內容全悉由政府主導，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宣揚「民族團結」和吸引觀光客。最讓 Diamond 在意的就是，國際支援中國少數民族發展生產的資源，到了花苗地區，全數為漢人瓜分了。她發現，有好幾個少數民族地區附近的新建工廠工人就全都是漢人。花苗的例子顯露了漢苗不平等社會階位關係的存在，而 Diamond 從田野中揭舉出真相，進一步確定社會主義中國國族 - 國家大穹蒼之下「民族」生活的不幸狀況。事實上，從上述筆者、Borchigud、Khan、Mckhann、及 Harrell 等人所陳述的傣、蒙古、納西、及彝各族情形，吾人也可想像到族人生活中各種可能的不利場景，只是如今 Diamond 在苗族的例子上寫得比較直接罷了。

對中國少數民族族群性/族群意識感興趣的研究者當然不止「泛西雅圖學派」的學者。不過，比較重要的如研究納西族的 Anthony Jackson (1979, 1989)、Erik Mueggler (1991) 和 Emily Chao (1996)；白族的 David Y. H. Wu (1990)；維吾爾族的 Stanley Toops (1993)；滿族的 Shelley Rigger (1995)，及回族的 Keng-Fong Pang (1996) 等人，都各有其另外關注的面向。例如 Mueggler 強調空間反映出的族群互動意義，Chao 對納西族研究的現況及其發展有興趣，Jackson 主要在分析納西宗教和象形文字傳統，Wu 多專注於族群性環境決定理論的檢驗，Toops 瞭解新疆各類工藝產品甚多，Rigger 則細心考證二十世紀之前滿族的歷史。由於「泛西雅圖學派」的探索焦點較為集中 - 解構「民族」或「民族共同體」，本文就以之為典型代表，而不再多論其它的論著。

國族完封

中國的民族學界和國際人類學者互動的情形與前述泰國官方學者並不相同。泰國研究者基本上已積極參與了國際研究的行列。過去 7 次「泰學研究國際會議」，不論在何處舉辦，泰國學者總佔了論文發表人的半數，而會議多半雖規定使用英文或泰文，但絕大多數泰國學者均以英文發表，主題方面也多可與外國學者相互呼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文論及泰國的部份，泰國官方專家之所以有辦法在各場合中，以英文書寫來防衛自我國族 - 國家的立場（見第二節〈國族反撲〉之部），就是因其有充分參與國際研究的經驗，同時也多已掌握國際學者研究的方向。反之，中國雖自第二屆泰學會議起，即有派人參加。但自第二至第五屆的四屆會議中，除了第四屆由中國自己主辦因此動員了數十篇文章之外，其餘三屆均只派一、二人出席，並都撰寫與「雲南歷史上南詔政權和泰族無關」之同一主題的論文。1990 年中國主辦的該次會議，幾十篇中方學者的論著幾乎也都在談南詔，而且結論也頗一致（即南詔非泰）。不過，問題是，國際學界二十年來，根本無人認為南詔是泰學研究的一項議題（更遑論是如中方學者所認為的「重大學術公案」），因此，中國的努力對象到底是何人，恐怕連他們自己也不甚明白（詳見謝世忠 1993b）。簡要言之，中國雖有多處東南亞研究機構，但國際

學界在作哪些研究，有何成績，他們所知仍相當有限。因為中國學者多僅以中國歷史文獻來研究東南亞（cf Wijeyewardene 1990a）。

泰學方面是如此，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的情況也頗類似。「泛西雅圖學派」的學者已在大陸從事少數民族族群性/族群意識研究近二十年了（即從 Gladney 1982 年前往田野調查開始算起），但迄今仍難得見到中國學者在研究之時參引國際學者的論著，亦未有如泰國官學力量有系統反撲的情形出現。不過，幾次偶發的零星反彈事件恰巧均與筆者有關。

前述 1989 年美國亞洲學會年會的會議上，幾位國際學者（Harrell, Gladney, Diamond, 及筆者）均不約而同地指出中國少數民族識別的矛盾與難解，因它既不合學理也不符政權教條理論。另外，中國政權對各少數民族的壓制，也是學者們報告的重點。當時，請來擔任評論人的是刻正於美國訪問研究的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教授陳永齡先生。他聞聽各文章內容之後，大為吃驚，並立即表示難以接受這些觀點。因為「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共為兄弟民族，並組成一友愛的中華民族大家庭」等，不僅絕對是事實，更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另一個例子是，1990 年第四屆泰學會議，筆者提繳一篇名為「On the Dynamic Ethnicity of Sipsong Panna Tai During the Republic Period」（Hsieh 1990:2-9）的文章。然而，到了他抵達會議地點雲南省昆明市之後，才發現大會禁止該文公開發表（cf. Wijeyewardene 1990a；謝世忠 1993a,1993b；Hsieh 1996）。理由是，謝文認定 Tai-Lue 人的 Sipsong Panna 原即如不少 19 世紀末期仍存於北東南亞各處之泰語系邦國一樣，是為一獨立或半獨立小王國。中方認為，此說極為荒謬，因為西雙版納「自古屬於中國」，傣族更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少數民族之一」。雖然，這兩次事件只是偶現的事件，但它們所反映出來之中國對國族共同體的堅定維護之心，卻令人印象深刻。

中國民族學官學專家自中共統治大陸以來，即從未間斷地大量出版民族理論的相關論述。這些論述多講及「各民族大團結」、「中國民族大家庭」、「偉大的祖國是各民族共同開創的」、「每個民族自治地方都是祖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祖國共同振興中華」、「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等等（見如徐杰舜與彭冀明 1987；嚴克雄編 1987；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 1984；陳永齡 1995a（1981）& 1995b（1985）；費孝通 1983）。然而，前面已說過，他們對國際研究的所知有限（see also Wijeyewardene 1990a）。零星出現的反論述或抵制（如筆者遭逢的兩次），也並未引發中國學者全盤掌握國際論述的動機。筆者認為，簡體中文出版的民族理論論著，多是寫給自己看的；亦即，百萬文字的現世，是要宣揚國族的一統價值，和民族政策的正確意義。它是國族 - 國家全民教育的一環，也是國族/家文化價值建構的主要內容。由於它們只在中國國內傳閱，而又與國際學界研究不甚相干，因此並無如泰國一般的「國族反撲」運動出

現。而中國特定的景況或可以「國族完封」一詞形容之，因為它是自我完全封鎖式地在維護國族，即使已有大量英文論著書寫關及解構民族或中華民族的議題，但中方學者對它們顯然是極為陌生的。

四、討論與結論

Anderson 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概念提出之後，引起了國際人類學界（或整個社會科學界）熱烈的討論，一直到今天，它仍是國家論述中不可缺少的關鍵參引資料。依他的說法，相對於以日常實體互動經驗所建構出來之部落或村社等有限想像或非想像性存在的群體，國族基本上是一種有中間媒介（如印刷品、傳媒技術、或官員的公務旅行等）在串連互不認識的個人或地域人群，所建造出來之想像性存在的共同體。Anderson 理論對人類學的啟示之一，很可能就是學者們開始討論國族/國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依想像基礎建構的）與最基本層級的部落文化（tribal culture）（依真實基礎建構的）間的關係。依一般的邏輯的推論，國族/國家要素在國族 - 國家建構的強烈需求情境之下，必會強力衝擊部落社群。換句話說，部落有其自我演變或被迫改變成國族 - 國家的壓力。相對地，部落自我認同的維繫或變遷，亦是決定社群能否永續存在的關鍵。Clifford Geertz 早於 Anderson 二十多年（Geertz 1973 (1963)）即提到亞非新興國家社會動蕩不安，就是肇因於人工化之國族 - 國家建構與自然部落或族群間激烈衝突的結果。Geertz 的發現與詮釋，促動了族群理論中根本賦與論派學者（如 Keyes 和他的學生們）的信心，於是他們分頭前往東南亞尤其是泰國和中國各地，尋找進一步的證據。

Keyes 在泰國三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分別從泰北非曼谷系泰人、泰東北 Isan 地區以寮國語為母語的住民、以及從雲南 Sipsong Panna 遷來之 Tai-Lue 人等對象出發，設法瞭解這些群體認同維繫機制的所在（如清邁人堅持 Yuan 佛教宗派的傳統，東北泰人認為 Isan 一稱代表區域住民標誌，Lue 人則發展觀光性的顯形文化），並直接指出泰國國族 - 國家「整合」各地文化或族群的強制性本質。雖然 Keyes 不只一次表示，各族群或地域人群係在接受泰國統轄的前提下，發展自我的認同，但國族 - 國家的強制特性及部落族群的反彈，即宣告了前者實踐想像性過程中的反人文（anti-humanity）色彩。而想像性即使遍存於曼谷泰人和其他國人身上，對 Keyes 而言，它的程度或也可能有極端的大小之別。畢竟，就是因為如此，國族想像的實踐才會永難達成完全目標。進一步言之，確定了各個小型且自然存在之共同體（或社區）的當下有效運作，一方面能解決人類學有限社區研究之傳統，可能因國族 - 國家要素的干擾而產生的學人焦慮問題（因小群體，小社區依然在國家或甚至跨國力量或論述之下穩健存在），另一方面，人類學的護

弱道德意識也得以在研究過程中被予以肯定。

Moerman、Wijeyewardene、筆者、Yoshikawa、及 Baba 等人對 Lue 人的研究中，分別強調了不同時空中該族社群在鮮明歷史王國記憶、受不公平或剝削待遇的處境、對今日多元主義取向之國族文化的有效適應、及在國際觀光潮流上的新生活模式。他們的討論讓讀者瞭解了族群性/族群意識動力性作用的景況，也明確地留下了 Lue 人群體永續不墜以及國族 - 國家被迫改變體質（即從單一同質架構轉為多元涵括模式）的事實。

山區部落的例子裏，有西面 Karen 人進入國族的順利情況，有西北面 Karen 人抗拒壓迫性國族政經軍警勢力的反例，有 Hmong 人大量入教期待苗王降世所反映的反泰反佛社會運動，有 Akha 人堅持祖裔系譜和進入國際觀光場域的主位性成功適應典範，也有 Mien 人以區辨我族祖先範圍與外來神祇世界（中國道教），來作為常續認同體系（persistent identity system）建構基礎的說明。人類學家在泰國全面解構國族 - 國家不具「真實內容」（即深度認同與內在文化價值）的本質，進而強調各個族群部落的反國族、非國族、或無國族意識，終而引來泰國本土學官專家的反擊。他們強調國族 - 國家永恆完整的真理性。這種「國族反撲」的行動，或即是國族建構必然會出現的。只是泰國一方面自豪於全東南亞最自由最國際化的國家，而另一方面又必須面對對人工性國族始終未具好感的人類學文字力量，其矛盾的處事位置不言可喻。

中國與人類學界互動的情形，與泰國相較，有異有同。不過，由於中國的社會主義立國基礎與西方相異甚遠，國際學者除了帶進過去解構第三世界國族 - 國家（如泰國）的經驗之外，更可能具有解構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理論（如 Morgan 的社會歷史階段）在實踐上難以進行的潛意識。「泛西雅圖學派」的學者就充分表現出上述的特性。Harrell 發現了彝族之內各式各樣的矛盾性認同，也提及普米族另一半同胞被劃為藏族的理論說明困境。Gladney 從回族、維吾爾族的例子上，看到了民族族源建構或民族源生（ethnogenesis）的操縱性過程。筆者則強調相對於中國國族 - 國家（nation-state）之傣泐王國「族裔性國家」（ethnic-state）的原貌。也陳述泰中國族主義競爭傣族歸屬的過程，並以此凸顯國族 - 國家政治文化僅有的表層意義。至於當今中國少數民族的族群位置，則係奠基於如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之形式資源的給與，以及對強勢國家長期的適應（如回族宗教領袖結合了可蘭經與馬列主義教條，以教育信眾）。

另外，Borchigud 和 Khan 敘述了蒙古族部落身處艱困歷史與當代環境之下（漢人人口輸入，國族 - 國家教育的灌輸、傳統文化與母語的失落），仍堅定自我認同的道理。蒙族運用了社會生活的要素（如蒙語學習班、「內蒙古人」意識與新移漢人的挑戰）、祖先受難或驕傲的想像（如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事件或成吉思汗祭祀的功能）、以及傳統生活圖像（草原放牧景緻）等，建立了永不失滅的

民族生命。至於 Litzinger、Cheung 與 Diamond 的瑤苗研究，以及 Mckhann 的納西族論著，則亦分別說明了民族歷史的製造、民族範圍的矛盾（如 Ge 與苗的難合）、民族圖像（如苗女放蠱、納西人原始走婚）的形塑、和進化指標的認定（如 Musuo 母系殘存落後，麗江納西父系進化）等。這些論述強化了對「民族」界定上的透視性觀察，也指出了社會主義中國民族存在的唯政治性意義。不過，雖然如此，由於中國學者對國際學界的陌生，雙方仍各自在教條信仰與解構旨趣中，分別成立互不往來的言說。

「國族 - 國家」建構了自我想像並予以真理性的共同體。這是公認的近現代世界政治發展主流，在本文中，泰國的例子告訴了吾人「國族」經人類學解構之後的虛構還真狀態，而中國的例子則提示了讀者「民族」被另批學者解構之後的混沌本質。不論是泰國或中國「國族」或中國的「民族」，都是建構者想像的人群「實體」，依國族或民族信奉者之說，該人群「實體」不僅一定具有文化歷史的客觀證據，也必有千萬人主觀主動效忠的實質意義。然而，在學者眼中，事實並非如此。解構之後的人類學者們，或方可再回到習慣處理的部落社群或族群社區之中，以傳統的方法論進行知識的建構。畢竟，虛構或不具深刻文化內涵的民族或國族，根本難以有效或全面撼搖基礎社群（部落、村寨、或有限人口的社區）自在生活的傳統，即使族人們可能必須常常面對正式或非正式詢問之時，承認自己在國族或民族範疇中的形式位置，或可能不時要在政治、經濟、教育、律法、及慶典或觀光活動上，表現出充分配合的樣態。不過，雖然如此，若解構成功所帶來的自信，反而養成學者蹲回眼望即滿之社區，卻無視於國家、跨國、乃至全球要素依然在旁，恐怕也非人類學發展前景之福。

參考書目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編

1984 《社會主義民族關係文獻論文集》，昆明：雲南民族。

徐杰舜與彭冀明

1987 《民族新論》，南寧：廣西人民。

陳永齡

1995a (1981) <十九世紀以來新疆動亂的啟示>，在《民族學淺論文集》，陳永齡著，頁 257-276，台北：弘毅。

1995b (1985) <論中國民族學在新時期面臨的新課題>，在《民族學淺論文集》，陳永齡著，頁 104-114，台北：弘毅。

費孝通

1983 《費孝通社會學文集 - 社會學的探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楊鈴慧

1996 《部落、族群、與行動：太魯閣地區原住民的階序性認同》，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翟振孝

1996 《經驗與認同：中和緬華移民的族群構成》，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世忠

1989 <中國族群政治現象研究策略試析：以‘傣泐’為例的探討>，《考古人類學刊》，46:42-66。

1991 <田野的學院衝擊 - ‘人類學文化’的變遷與台灣學者的難題>，《中國民族學通訊》，28:35-44。

1992a <形式資源的操控與競爭：非漢族群政治運動的生成條件>，《考古人類學刊》，48:99-112。

1992b <根本賦與認同與族群政治：中國「漢語穆斯林」的例子>，《陳奇祿院士七秩榮慶論文集》，陳奇祿院士七秩榮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頁 199-220，台北：陳奇祿院士七秩榮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1993a 《傣泐：西雙版納的族群現象》，台北：自立。

1993b <南詔、泰國、雲南故國 - 當代中泰國族主義的競爭過程>，《考古人類學刊》，49:50-69。

- 1994a <「內部殖民主義」與「對內自決」的對立：泰國國族 - 國家建構過程中的北部山地族群>，《山海文化》，2:17-27。
- 1994b <Hmong/苗族的生存機制 - 力量再生的傳統與傳統力量的再生>，《山海文化》，7:19-27。
- 1995 <神話解析與國家文化：中國少數民族神話詮釋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4月21日至23日於台北中央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 1996 <兩個「祖裔共同體」界定傳統的再思考：北東南亞與西南中國的跨國境新議題>，《考古人類學刊》，51:25-42。
- 1997a <Sipsong Panna 傣泐政體辨析：一個歷史民族誌的研究>，《文史哲學報》，46:199-241。
- 1997b <國族 - 國家的建構、範疇、與質變：中華民國陸軍第九十三師的雲南緬泰台灣半世紀>，《考古人類學刊》，52:43-68。
- 2000 <傳統與新傳統的現身：當代原住民的工藝體現>，《宜蘭文獻》，44:7-40。

蘇裕玲

- 1995 《族群社區與族群書寫：當代台灣客家意識展現的兩個面向》，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碩士論文

嚴克雄編

- 1987 《民族問題理論論文集》，西寧：青海人民。

Anderson, Benedict

- 1990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aba, Yuji

- 1999 "Making a Network of Community Groups and Cultural Reformation in Nan Province, Northern Thailand: The Case of Tai-Lue Villag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msterdam, July 4-8.

Banks, Marcus

- 1996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Routledge.

Barth, Fredrik

- 1969 "Pathan Identity and Its Maintenance."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Fredrik Barth ed., pp. 117-134.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entley, C. Carter

- 1986 “Indigenous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Annual Reviews of Anthropology 15:275-305.

Berreman, Gerald D.

- 1982 (1975) “Bazar Behavior: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Urban India”. In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George De Vos & Lola Romanucci-Ross eds., pp. 71-10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hruksasri, Wanat

- 1987 “Minorities and Politics: Hill-Trib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Strateg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ANU, Canberra, July 3-6.

Borchigud, Wurlig

- 1995 “The Impact of Urban Ethnic Education on Modern Mongolian Ethnicity, 1949-1966”.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 Stevan Harrell ed., pp. 278-30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1996 “Transgressing Ethnic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Contemporary ‘Inner Mongolian’ Identities in China”. In Negotiation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Melissa J. Brown ed., pp. 160-1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ao, Emily

- 1996 “Hegemony, Agency, and Re-presenting the Past: the Invention of Dongba Culture among the Naxi of Southwest China”.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Melissa J. Brown ed., pp. 208-2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eung, Siu-Woo

- 1995 “Millenarianism, Christian Movements, and Ethnic Change among the Miao in Southwest China”.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tevan Harrell ed., pp. 217-24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1996 “Represent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G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Guizhou”.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Melissa J.

Brown ed., pp. 240-273.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1997 “Miao Rebellion and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考古人類學刊》, 53:13-56.

Diamon, Norma

- 1988 “The Miao and Poison: Interactions on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 Ethnology 27 (1) :1-25.
- 1993 “Ethnicity and the State: the Hua Miao of Southwest China”. In Ethnicity and the State, Judith D. Toland ed., pp. 55-78.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1995 “Defining the Miao: Miag, Qing, and Contemporary Views”.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tevan Harrell ed., pp. 92-11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Doming, Michele D.

- 1990 “Maori Sovereignty: A Feminist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Jocelyn Linnekin and Lin Poyer eds., pp. 237-25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Eriksen, Thomas Hylland

- 1993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Pluto Press.

Flinn, Juliana

- 1990 “We Still Have Our Customs: Being Pulapese in Truk” In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Jocelyn Linnekin and Lin Poyer eds., pp. 103-12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Geertz, Clifford

- 1973 (1963)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omo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Clifford Geertz ed., pp. 255-310. New York: Basic Books.

Gellner, Ernest

- 1987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ladney, Dru C.

- 1989 “How Ethnic is Ethnic? The Problem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1st Annual meeting,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Washington Hilton & Towers Hotel, March 17-19.

- 1990 "The Ethnogenesis of the Uighur". Central Asian Survey 9 (1) :1-28
- 1991a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b "On Studying the Peopl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 Back Door into Chinese Society?". China Exchange News 19 (2) :13-17.
- 1994 "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 Refiguring Majority/ Minority Identit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1) :92-123.
- 1998 "Clashed Civilization?: Muslim and Chinese Identities in the PRC". In Making Majorities: Constituting the Nation in Japan, Korea, China, Malaysia, Fiji, Turkey, and the United States, Dru C. Gladney ed., pp. 106-13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uldin, Gregory Eliyu

- 1994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Harrell, Stevan

- 1988 "Joint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Southern Sichuan". China Exchange News 16 (3) :8-14.
- 1989 "Ethnicity and Kin Terms among Two Kinds of Yi". In Ethnicity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 Chien Chiao and Nicholas Tapp eds., pp. 179-197. Hong Kong: New Asian College.
- 1990 "Ethnicity, Local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Yi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2 (3) :515-548.
- 1993 "Geography, Demography, and Family Composition in Three Southwestern Villages". In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 Deborah Davis and Stevan Harrell eds., pp. 77-10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5 "The History of the Yi".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tevan Harrell ed., pp. 63-91.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1996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and the Prmi Problem".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Melissa J. Brown ed., pp. 274-29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eiberg, Marianne

- 1978 "External and Internal Nationalism: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Basques". In Ethno Autonomy-Comparative Dynamics: The Americas, Europe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Raymond L. Hall ed., pp. 180-200. N. Y.:

Pergamon Press.

Hobsbawn, E. J.

- 1991(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sieh, Shih-Chung

- 1989 Ethnic-Political Adaptation and Ethnic Change of the Sipsong Panna Tai: An Ethnohistorical Analysis. Ph.D. dissert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1990 “On the Dynamic Ethnicity of Sipsong Panna Tai during the Republic Period.” Thai-Yunnan Project News Letter 9:2-9.
- 1996 “Nanchao, Tai People, and Homeland Yunnan: A Competing Process of Modern Nationalism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Chiangmai, Thailand, 14-17, October.

Issacs, Harold R.

- 1974 “Basic Group Identity: The Idols of the Tribe”. Ethnicity 1:14-41.

Jackson, Anthony

- 1979 Na-Khi Religion. N.Y.: Monton.
- 1989 “Naxi Studies: Past, Present & Future”. In Ethnicity & Ethnic Groups in China, Chien Chiao & Nicholas Tapp eds., pp. 133-147. Hong Kong: CUHK.

Kammerer, Cornelia Ann

- 1988 “Territorial Imperatives: Akha Ethnic Identity and Thailand’s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Ethnicities and Nations: Processes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Latin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Remo Guidien, Francesco-Pellizzi & Stanley J. Tambiah eds., pp. 259-292.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Kandre, Peter K.

- 1967 “Autonomy and Integration of Social Systems: The Iu Mien (‘Yao’ or ‘Man’) Mountain Population and Their Neighbors”. In Southeast Asian Tribes, Minorities, and Nations, Peter Kunstadter ed., pp. 583-63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6 “Yao (Iu Mien) Supernaturalism,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Changing Identities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 David J. Banks ed., pp.

171-197. Paris: Mouton Publishers.

Kesmanese, Chupinit

- 1993 “Being Hmong and Being Thai: An Interplay of Ident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SOAS, London, July 5- 9.

Keyes, Charles F.

- 1971 “Buddh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ai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551-568.
- 1973 “Ethnic Identity and Loyalty of Villagers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In Southeast Asia: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John T. McAlister, Jr. ed., pp. 355-365. N.Y.: Ramdon House.
- 1976 “Toward a New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Ethnicity 3:202-213.
- 1987a “Mainland Culture”. In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Mircea Eliade ed., pp. 512-520.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 1987b Thailand: Buddhist Kingdom as Modern Nation-State. Boulder: Westvies Press.
- 1990 “A Southeast Asianist Perspective on Ethnicity The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the Social and Huwan Sciences”, Wingspread Conference Center, July 19-22.
- 1992 “Who Are the Lue? Revisited: Ethnic Identity within the Nations of Laos, Thailand, and China”. MIT working paper.
- 1993a “Who are the Tai? Reflections on the Invention of Local, Ethnic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The State of Knowledge and Directions of Research on Tai Culture”, Bangkok, Thailand, September 10- 13.
- 1993b “A Princess in a People’s Republic: A New Pha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o N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SOAS, London, July 5-9.
- 1995 (1977) The Golden Peninsula: Culture and Adapta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Khan, Almaz

- 1995 “Chingges Khan: From Imperial Ancestors to Ethnic Her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 Stevan Harrell ed., pp. 248-277.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1996 "Who are the Mongols? State, Ethn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PRC".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Melissa J. Brown ed., pp. 125-15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Kunstadter, Peter ed.

- 1967 Southeast Asian Tribes, Minorities, and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hmen, F. K.

- 1963 The Structure of Chin Socie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itzinger, Ralph A.

- 1994 "Making Histories: 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tevan Harrell ed., pp. 117-139.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ckhann, Charles F.

- 1995 "The Naxi and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tevan Harrell ed., pp: 39-62.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Mckinnon, John & Wanat Bhruksasri ed.

- 1983 Highlanders of Thailand.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chaud, Jean

- 1993 "The Social Anchoring of the Trekking Tourist Business in a Hmong Community of Northern Thaila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SOAS, London, July 5-9.

Moerman, Michael

- 1965 "Ethnic Identity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1215-1230.

Mueggler, Erik

- 1991 "Money, the Mountain, and State Power in a Naxi Village". Modern China 17 (2) :188-226.

Mulder, Niels

- 1997 Thai Images: the Culture of the Public World. Chiangmai: Silkworm Books.

Nagata, Judith A.

- 1974 “What is a Malay? Situational Sele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a Plural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ist 1 (2) :331-350.
- 1981 “In Defense of Ethnic Boundaries: The Changing Myths and Charters of Malay Identity”. In Ethnic Change, Charles F. Keyes ed., pp. 87-11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Obeyesekere, Gananath

- 1982 (1975) “Sinhalese-Buddhist Identity in Ceylon”. In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Continuities and Change, George De Vos & Lola Romanucci-Ross eds., pp. 231-25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ng, Keng-Fong

- 1996 “Being Hui, Huan-nang, and Utsat Simultaneously: Contextualizing History and Identities of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Hainan Muslims”.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Melissa J. Brown ed., pp. 183-20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asternak, Burton

- 1983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China: Revitalization and Its Constrai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Fieldwork in China: Views from the Field, Ann F. Thurston & Burton Pasternak, eds., pp. 37-62. Boulder: West Press Inc.
- 1988 “A Conversation with Fei Xiaotong”. Current Anthropology 29 (4) :637-662.

Pongsapich, Amara, Suriya Veeravongse, & Phinit Lapthananon

- 1993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Policy and Ethnic Minorities: Conflicts and Resolutions in the Huay Buffer Zon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SOAS, London, July 5-9.

Poyer, Lin

- 1990 “Being Sapwuahfik: Cultural and Ethnic Identity in a Micronesian Society”. In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Jocelyn Linnekin and Lin Poyer eds., pp. 237-25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Rambo, A. Terry. Karl L. Hutterer, & Kathleen Gillogly

- 1988 "Introduction". In Ethnic Diversity and the Control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Southeast Asia, A. Terry Rambo, Karl L. Hutterer, & Kathleen Gillogly, eds., pp. 1-17.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Renard, Ronald

- 1993 "The Differential Integration of Hill People into the Thai St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SOAS, London, July 5-9.

Rigger, Shelley

- 1995 "Voices of Manchu Identity, 1635-1935".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Encounters, Stevan Harrell ed., pp. 186-21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Tapp, Nicholas

- 1989 "The Impact of Missionary Christianity upon Marginalized Ethnic Minorities: The Case of the Hmong".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 (1) :70-95.
- 1993 "Ritual Relations and Identity: Hmong and Oth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SOAS, London, July 5-9.

Thurston, Ann F.

- 1983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Fieldwork in China: An Overview".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Fieldwork in China: Views from the Field, Ann F. Thurston & Burton Pasternak, eds., pp. 3-36.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Toops, Stanley

- 1993 "Xinjiang's Handicraft Industr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88-106.

Toyota, Mika

- 1999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Multiple Identity Choices: The Case of Urban Akha in Chiang Mai, Thailan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msterdam, July 4-8.

Trosper, Ronald L.

- 1981 "American Indian Nationalism and Frontier Expansion". In Ethnic Change, Charles F. Keyes ed., pp. 246-27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 1978 "Race and Ethnicity: A Sociobiological Perspectiv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401-411.

Whyte, Martin King

- 1983 "On Studying China at a Distan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Fieldwork in China: Views from the Field, Anne F. Thurston & Burton Pasternak, eds., pp. 63-80.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Wijeyewardene, Gehan

- 1990a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Kunming 1990". Thai-Yunnan Project Newsletter 9:1-2.
- 1990b "Thailand and the Tai: Versions of Ethnic Identity". In 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Gehan Wijeyewardene ed., pp. 48-73. Singapore: ISEAS.

Williams, Brackette F.

- 1989 "A Class Act: Anthropology and the Race to Nation across Ethnic Terrain". Annuals Reviews of Anthropology 18:401-444.

Winzeles, Robert L.

- 1976 "Ecology, Cultur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urrent Anthropology 17 (4) :623-640.

Wu, David Y. H.

- 1990 "Chinese Minority Policy and the Meaning of Minority Culture: The Example of Bai in Yunnan, China". Human Organization 49 (1) :1-13.

Yoshikawa, Hideki

- 1999 "A Lue Weaving Village: Identity and Economy of Weav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ai Studie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msterdam, July 4-8.

大馬檳城、台灣鹿港、越南會安 傳統店屋生活空間配置之比較

黃蘭翔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一、前言

大馬檳城喬治市的歷史雖然可以追溯得更早，但是一般都以萊特(Francis Light)在 1786 年 8 月 10 日，在檳城立起英國國旗為聚落都市發展歷史的起點。現在的喬治市約有 20 多萬的人口，每年亦有 2 百萬人次的觀光客到訪。台灣鹿港鎮的人口雖與檳城相當，但在歷史發展的時間上卻與越南會安相當，都是起源於十八世紀後半。會安的居住人口雖然僅有約 6 萬人口，但是其每年到訪的觀光客亦不在少數，鹿港的觀光客人次沒有正式的統計數目，卻只能有國內的觀光客到訪，並且似乎已經不是觀光客到訪的炙熱景點了。

越南會安已經被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UNESCO)指定為世界文化資產，檳城計畫在今年向 UNESCO 提出世界文化資產登記的申請，鹿港的發展就要坎坷許多，因為台灣的都市化與工業化，已讓其傳統的都市風貌破壞殆盡，如今不只是台灣政府與社會沒有此意志，就歷史文化保存之完整性而言，似乎已經被破壞至完全不可能提出世界文化資產登記申請的程度了。

在居民的種族多樣性上面，檳城最為豐富，包含有主要的馬來人、華人、印度人之外，包括其它來自歐洲、南北印度、南中國地區，以及日本、菲律賓等等的多民族。會安則以南中國的華人與越南人為主體，鹿港因為弱勢的原住民平埔族已被完全漢化，以華人為主要居住者的城市。

如上所述，檳城、會安、鹿港有這些不算小的差異性存在，但是都是以華人為主體的都市，則是其不變的事實。本文打算以這樣的相同與相異性為背景，比較這三地的店屋建築之異同。在進入本文論述之先，必須說明的是：雖然麻六甲、檳城以及新加坡的傳統店屋，可分為 shophouse 和 terraced house，因為前後的差別在於前者有店鋪功能，後者純為住宅，其在平面空間秩序與結構上有很密切的關係，本文並不特別區分其不同之處。

二、平面配置與建築結構之異同

（一）檳城

因為本文尚未對檳城的店屋住宅進行全面的調查，僅將於去（2001）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4 日在檳城所作的觀察，所得的初步心得提在這裡與鹿港、會安之店屋作大略的比較，以凸顯檳城傳統店屋之特色。

據 *The Straits Chinese; A Cultural History*¹ 所言，認為店屋的傳統可以追溯十八世紀中期荷蘭所統治的麻六甲，在十九世紀初期已經在麻六甲、檳城、新加坡發展成形，後來傳播至馬來半島其它市鎮。傳統店屋的配置都是細長條形的建築，面街的寬大概是 13-20 英尺（約 3.3-5.1 米），它的進深可以是寬的兩倍至三倍，麻六甲的古老店屋有長至 150 英尺（約 38 米）的店屋。通常相鄰兩家的店屋擁有共同牆壁。店屋前有騎樓（the five-foot way，五腳基。台灣稱為「亭子腳」，通常要寬得許多）。

最早的店屋建築是單層木造棕櫚葉屋頂之建築，這種房子仍然可以在今天檳城的鄉間看到。據說早期的店屋的前面是開放的，僅在夜晚時用木板圍上，私密的生活則置於後面或是在閣樓上。

檳城在 1794 年萊特去世之前，萊特將 Light Street、Beach Street、Chulia Street、Pitt Street 所圍的範圍，規劃成棋盤格子狀的市區，當發展超出這個範圍時，僅是無計畫性的蔓延成長，直至一世紀之後才由市政當局作了較強的都市規劃規範。每當檳城發展擴大市區範圍時，都要面臨改良沼澤濕地的問題。在十九世紀初期，城市已經發展至 Prangin Creek 與 Bound Ditch（現在的 Transfer Road），這些區域都蓋有密集的二樓店屋，這個範圍也大概是今天喬治市內之範圍。大部分的早期耐久性的傳統店屋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中葉，有一些店屋內部挖有水

¹ Khoo Joo Ee, *The Straits Chinese; A Cultural History*, Amsterdam Kuala Lumpur: The Pepin Press, 1996, p.136.

井，但絕大部分沒有後巷，直至 20 世紀前後才新設了店屋的後巷。² 如今大部分的檳城店屋都是磚造二樓承重牆的結構，如下就我們的觀察列在後面作為比較之基礎。



照片一、Cannon Street12 號第一進正廳。



照片二、Cannon Street12 號第一進神桌背後的過渡空間。

1. 一樓

除了做為店鋪的店屋之外，通常一般規模的傳統店屋住宅，進門就是放置神明桌，桌上通常主祀大伯公，旁側或有祀奉觀音、關公等其它神祉，在神桌右側（面對桌子的左側）則祀有祖先牌位（照片一）；若是規模較大的住宅則在第一進³ 房屋正廳祀奉神祉，第二進的大廳才祀奉祖先牌位。⁴ 神桌的背面立有隔板或是可拆除的透雕的隔扇門，隔扇後側為過渡空間，一般可作為起居空間，家人或客人可座，可以聊天的空間（照片二）。接著是第一個中庭天井，通常置有盆栽，或挖有水井於此（照片三、照片四），規模較大的房子則置放盆栽，採光通風，收集雨水的天井，亦扮演為第二進祖先廳前庭之功能（圖一、照片五）。

其次，一般規模的房子接下來是餐廳與廚房，後面是後院與廁所，接著是後門；但是規模較大的房子則是祖先廳，從過去的老照片可以確認這個空間與前面的第一中庭，構成整棟房子的重心，接待客人、宴客，拍紀念照等等活動都在此進行（照片六）。規模較大的房子還可以繼續往後延伸一進或是兩進（重複中庭的空間之空間結構）的房子。祖先廳後面可為起居空間，可坐可聊，又一中庭，其旁側為浴室與廁所，中庭之後為廚房與家人吃飯的餐廳（圖一）。

² Khoo Su Nin, *Streets of George Town Penang*, Penang: Janus Print & Resources, 1994(second edition), p.17.

³ 在台灣通常稱連續院落的群體複合之華人建築，其面臨正面第一列的房子稱為第一進，第二列的房子稱為第二進，亦即用「進」為單位稱呼之。

⁴ 這種先後次序正好與一般的公司祭祀秩序相同，如林公司前祀媽祖後祀林氏祖先牌位，陳公司前祀開漳聖王，後祀陳氏祖先牌位，邱公司主祀大使爺，於右側祀祖先牌位，於左側祀大伯公（福德正神），其它公司的祭祀的秩序也大略相同。



照片三、邱公司厝 33 號中庭天井與第二進建築所形成的一開放完整的空間。照片左上角為上二樓的樓梯。



照片四、邱公司厝 33 號中庭天井。是一室外的空間可直接收集屋頂的雨水流至外部。所見的樓梯亦即照片三中的樓梯。

2. 二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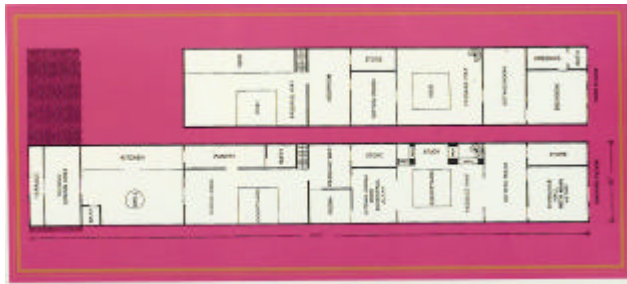
只有很少的例外或是近來的店屋，才在一樓隔設寢室空間，否則寢室房間一概都置於二樓。於面街二樓通常作為主臥室，至於一般規模的房子，除了主臥室之外還用木隔板隔出二至三間的房間，為通風與採光的理由，通常房間都配置在面臨中庭的旁側，二樓的後側則有戶外平台。如圖一所示，較大規模的住宅則在主臥室之外還有專屬主臥室的起居空間，過了第一中庭之後，到第二中庭之間，有一間寢室與屬於這間寢室的起居空間分置於前後中庭旁，其次是戶外平台。

(二)鹿港

有關台灣鹿港與越南會安的聚落發展的歷史，因為篇幅的問題，不想在此重複，希望讀者可以參考拙著的《越南會安與台灣鹿港傳統店屋建築之比較》。⁵ 若比較鹿港與檳城、會安之傳統店屋之都市空間，首先可以指出的是：鹿港的店屋空間的聯繫並非單獨的存在，鹿港店屋的屋頂之組構，形成屋頂步道，作為女人

⁵ 黃蘭翔，〈越南會安與台灣鹿港傳統店屋建築之比較〉，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 NO.24，1998 年 8 月。

串門子的通路。它的結構是這樣的：第一進的房屋為一層樓，第二進的房屋是兩層樓，兩層樓的正面開門，可走上第一進房屋的屋頂，第一進的屋頂通常為了曬東西，所以將屋頂鋪上尺二磚，若是相鄰兩家都如此作，那麼相連之後就自成屋頂步道了（照片七、圖二、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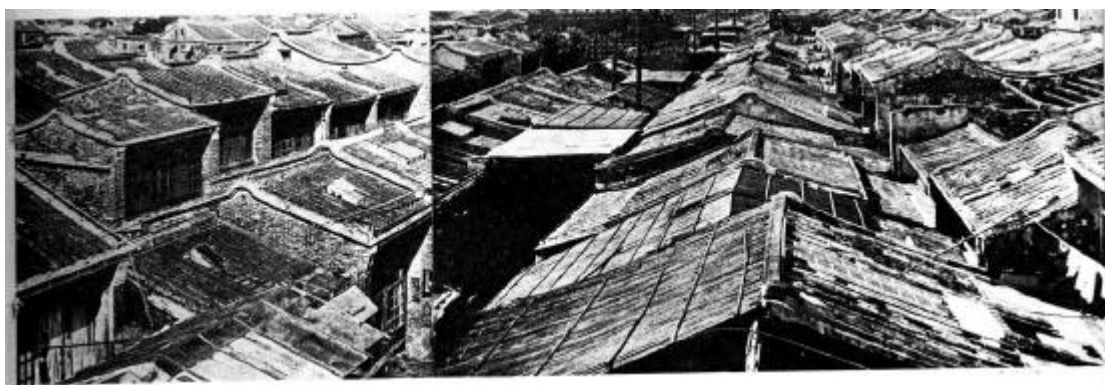
圖一、麻六甲陳禎祿宅平面圖。
雖然此為非檳城的案例，但是麻六甲的店屋與檳城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所以列於此處做為參考。資料來源：Rumah Baba; Life in a Peranakan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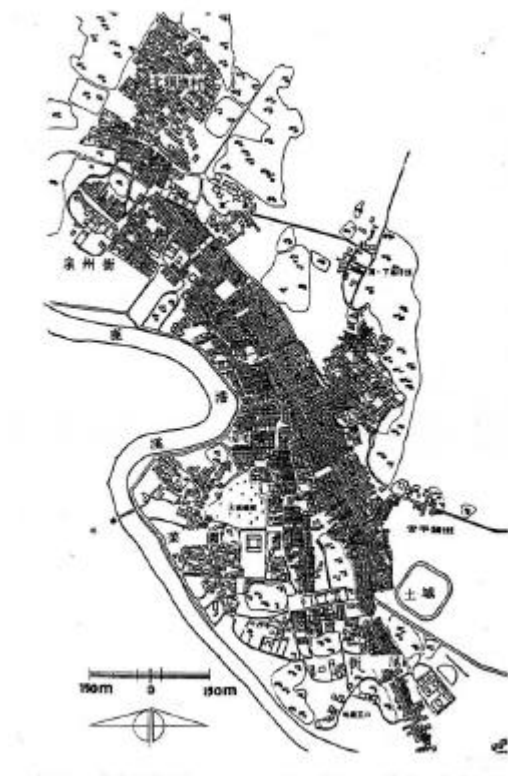
照片五、Armenian Street 120 號。第一進起居空間與中庭、第二進的空間形成一完體的空間。



照片六、麻六甲陳禎祿宅第二進祖先廳與中庭。通常是招待客人、照相留念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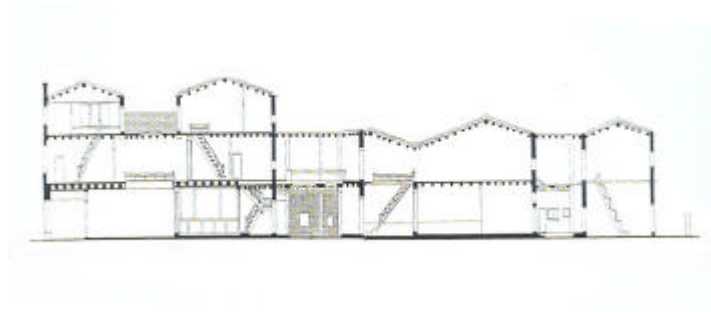


照片七、鹿港傳統店屋群屋頂照片。照片自左下腳向上為街道（部分有頂遮蓋），兩邊各為第一進一樓之建築，其後為二樓建築，但是二樓建築可出一樓屋頂，其接點鋪尺二磚，可作為曬場，或是人走的通道。



圖二、鹿港傳統店屋透視圖。樓井在室內，第二進二樓出口在第一進屋頂。資料來源：《台灣建築史》。

圖三、鹿港市街圖。資料來源：《清末鹿港街鎮結構研究》。



圖四、鹿港「元昌行」傳統店屋剖面圖。資料來源：《元昌行木雕彩繪藝術》。



圖五、鹿港「元昌行」傳統店屋平面圖。資料來源：《元昌行木雕彩繪藝術》。

1. 一樓

關於鹿港的傳統店屋，在此舉出元昌行為例說明（圖四、圖五）。元昌行建築是屬於四進房屋或是三進的建築，或有爭議。若以三樓的屋頂作為第一進與第二進的分算法，或可以同意其為前後四進的傳統店屋。就以一、二、三樓的順序，由前至後介紹其空間的使用機能。一樓的第一進有騎樓，⁶ 進入正門之後到第一個樓井，連同第二進的廳堂，聯繫了商業性店鋪與儀式性空間。在第二進的木格板外，原本或應祭祀有神明，但是目前已不復見。

元昌行的樓井欄杆用木作成，並雕有細緻的圖案，這一點與檳城、麻六甲的用磚砌成，並用石灰塑以裝飾不同。元昌行第一個樓井在三樓屋頂採封閉型式的天窗，除了擁有一般店屋所有的貨物上下升降的功能之外，亦有採光之功能，一樓的樓井與二樓的樓井錯開，形成空間與光影、空氣的動態流動之趣味是元昌行重要的建築特質之一。（照片八、照片九）

過了儀典式空間之後是上二樓的樓梯間，此空間兼有如同檳城店屋在此部分的起居空間(sitting room)。此起居空間與後面的第一中庭之間用直上三樓的隔間承重牆，元昌行前後有四道承重牆，檳城、會安的店屋不用橫向承重牆，只用樓板橫樑承受二樓以上結構重量。這是否因為台灣有地震，以及鹿港較能保留中國傳統建築之進落院式建築之痕跡，不如檳城與會安較完整地受西方文化之影響，



照片八、自一樓第一進建築樓井仰視二樓樓井照片。鹿港的樓井均施於室內，不同於檳城的天井可吸收自然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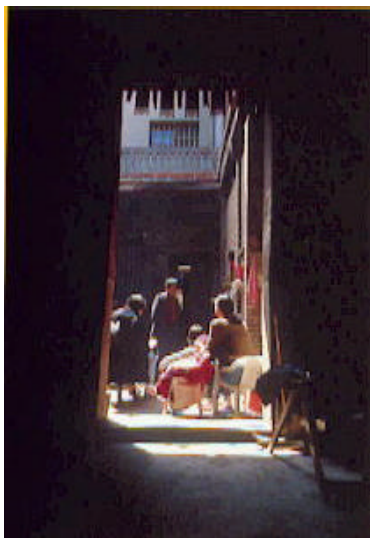
照片九、於第二進二樓的廳堂，可以看到通向一樓與三樓的樓井及其木作雕花裝飾。

⁶ 亦即檳城稱為「五腳基」的廊道空間，因為台灣在 1895 年至 1945 年為日本的殖民地，而在 1900 年公布「台灣家屋建築規則」、1908 年公布了「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中都具體規定了騎樓的設置與其寬幅，都比檳城的「five-foot-way」要寬了許多。

或是因會安的店屋原是通道式設施所演變而成，所以整棟建築為較有一整體之特徵有關，⁷ 這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課題。第一中庭處有水井，右側有日治時期(1895-1945)磚砌的廚房與盥洗空間。(照片十)水井或許是舊有，但是廚房與盥洗空間應為後建。第三進房屋與第一中庭亦是用磚砌承重牆為介面。

第三進的前半部是祭祀觀音與祖先牌位的廳堂，較為特別的是於二樓仍有裝飾精緻的樓井，這種空間的設計方式加上其前後承重牆的結構安排，還有前後各有一中庭與排列在其前後進的建築分開，這凸顯元昌行每一進建築之獨立性。樓井的旁側設有通向二樓的樓梯。廳堂的後側為主人燕息之空間，這種空間的安排與檳城不在一樓設置寢室空間之作法大不相同。(照片十一)

穿過第三進的後側磚砌的承重牆之後門，進入第二中庭，右側隔有廁所等的附屬空間。緊接在後的是第四進建築，室內的左側有樓梯通上二樓。第四進建築，據說是作為染房的工作空間。第四進房屋還有後門通向後院，但如今的元昌行結束在第四進建築。



照片十、自第三進往第二進看第一中庭。屋內的平常家居生活的情形。



照片十一、第三進廳堂空間。施以樓井之作法，顯現鹿港傳統店屋每一進建築都有上下的樓梯、樓井、前後承重牆的獨立特性。

⁷ 黃蘭翔，越南會安與台灣鹿港傳統店屋建築之比較，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因為會安的傳統店屋沿秋盆河發展，陸續發展出與河平行的三條街道，通常後門處即為河口岸的碼頭，所以貨物自後門上岸搬運至前門商店處販賣，會安的店屋結構留有相當強的通道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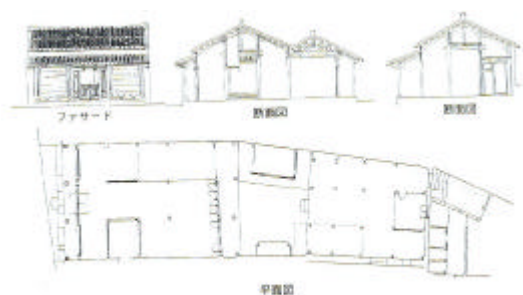
2. 二樓

因為元昌行之建築前後上下開了許多的樓井，與設置了許多樓梯，雖然形塑了每一進建築空間之獨立性，但是變成二、三樓的可用樓地板面積減少。所以二樓以上的空間顯得狹小侷促。雖然空間狹小但是仍然拘泥於「廳堂」與「寢室」空間配對的空間想法，所以第二進建築位置之二樓，或是第三進建築位置，都有「前堂後室」的空間概念之配置。基本上二樓臨街部分為前面店鋪之倉庫之外，其它的空間都作為寢室房間之用。

(三)會安

會安整體的市鎮比檳城與鹿港小得多（照片十二）。在建築結構上，只要一瞥越南會安與檳城、鹿港的傳統店屋建築，就能察覺其最不同的地方在於「木結構」的使用。檳城與鹿港都是以承重牆承重，但是會安的建築卻由木架構承重，所以有「牆倒屋不倒」的特性。沿兩邊側牆立有列柱，承受建築物之重量。因這種木結構的特性，亦如實地表現在建築平面上，如圖六所示，兩邊的共同壁之間有立柱，而且從前至後，整齊排列四列柱。從正面看是三開間的房子，中間的寬度卻比兩側都要窄；亦可從房子的正面中間一望穿整個房子到後門，中間有很強的通道性格，房間設於中央走廊的兩側。

雖然會安受中國福建文化的影響甚巨，其建築結構也如實表現（照片十三），如圖六陳富街 48 號第一進建築（越南稱為「前家」）後屋架所表現的結構，但是其前屋架與第二進建築（越南稱為「後家」）的屋架就要屬於越南順化本土的建築結構特徵，亦即叉手斜樑的作法。（參考圖六的剖面圖）



圖六、越南會安陳富街 48 號傳統店屋平面、立面、剖面圖。資料來源：《ベトナム ホイアン特集》。



照片十二、越南會安傳統店屋群。沒有如檳城與台灣鹿港的「五腳基」，或因為城鎮的規模比檳城與鹿港要小很多，所以較為親切。

日本昭和女子大學所作的研究之結果。⁸ 友田博通稱確切的傳統空間使用已不可考，但是整修陳富街 48 號之前，有 12 個人 6 個家庭住在裡面。3 個單身漢，另外有一家庭夫婦兩人加一個小孩（A）一為夫婦兩人加兩個小孩（B）還有一家庭為母親與單一子女的單親家庭（C）。A 家庭住在最裡面新蓋的建築部分。如圖七所示，每個家庭分據各個角落各自煮飯各自生活。



照片十三、越南傳統店屋屋架。其中有建築結構受到中國福建傳統建築通樑系統結構之影響。



照片十四、越南會安傳統店屋。室內二樓樓井看向一樓的照片。樓井欄杆雖然與台灣鹿港相同，使用木作欄杆，但是沒有鹿港的複雜與華麗。



圖七、陳富街家俱配置與居住空間分配圖。資料來源：《ベトナム ホイアン特集》。

⁸ 友田博通等編，《ベトナム ホイアン特集》（國際文化研究所紀要 Vol.1994），東京：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1995 年 3 月。

若稍作考據，可以推知原有的空間分配：前家為商店販賣處，後家為生活空間，其間的中庭過廊（越南稱為「橋家」）為帳目會計處理場所。面臨前街道路的前家，進深第一間為店鋪，第二間為木板牆所圍，是為商品的倉庫所在。於屋頂下有天花架板，可為貯藏之用。進深第三間處設有祭壇，緊接在後的後屋架處為接待客人的空間。後家的內側中央位置圍有房間之外，大致上為開敞的一整體之空間。在中庭一側應為家庭的起居空間。

在越南常有一坪（約 3.3 m²）可移動的平台，可作為睡床以及其它用途使用，一般放於入口處作為寢台使用，根據不同的自然天氣的變化，有時或許搬放於中庭通風處。白天的前家雖作為商店使用，入夜之後就作為就寢空間也不少。

若為二樓造的會安店屋，前家的二樓通常作為倉庫之用，一般也有貨物上下升降的樓井，在中央四根柱間所設的祭壇就擺到二樓上去。因為傳統店屋的二樓建築形式之興建，逐漸就讓傳統店屋的空間使用之秩序瓦解。

三、結論

馬來西亞檳城、台灣鹿港、越南會安雖然都是以華人為主體的城市，但是其發展的歷史與其移民所定居的原本土地上的原住民文化之不同，這種客觀的外在條件造成這三個城市的主要住宅，亦即傳統店屋住宅在形式、結構、配置與居民的生活方式上有所不同。

台灣在福建移民未進入之前，原住民並未形成足以與華人分庭抗禮的文化基礎，所以後來的原住民被徹底的漢化，鹿港變成幾乎全是華人的居住店屋文化。但是越南會安其地理位置接近越南順化的皇城故都，亦即越南本土文化之核心所在地，會安雖以閩南文化為主，但是從店屋的主體結構、空間組構也可以看出越南文化在店屋住宅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馬來西亞的檳城，則或因發展得晚，要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大量的華人才開始進住檳城，當時也正值英國式殖民統治的興盛期，西方城市計畫先早一步進入檳城，這是在鹿港與會安所看不到的歷史與文化之背景。另一方面，在所有文化發展之先，有馬來文化的基礎，甚至今天的馬來文化仍是檳城鄉村的主流文化，所以檳城的華人傳統店屋也呈現出與鹿港、會安不同的風格。

參考文獻

- 友田博通等編，《ベトナム ホイアン特集》（國際文化研究所紀要 Vol.1994），東京：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1995 年 3 月。
- 李乾朗，《台灣建築史》，台北：北屋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 年 7 月。
- 李亦興，《元昌行木雕彩繪藝術》，彰化鹿港：凌漢出版社，1999 年 5 月。
- 林會承，《清末鹿港街鎮結構研究》，台北：竟與象出版社，1980 年。
-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畫研究室，《台灣傳統長形連棟式店鋪住宅之研究》，1983 年 7 月。
- 鹿島出版會，《SD9603 ベトナム建築大博覽》，1996 年 3 月號。
- 漢寶德，《鹿港古風貌之研究》，鹿港：彰化鹿港文物維護及地方發展促進委員會，1978 年。
- 黃蘭翔，《越南會安與台灣鹿港傳統店屋建築之比較》，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 NO.24，1998 年 8 月。
- Khoo Su Nin, *Streets of George Town Penang*, Penang: Janus Print & Resources, 1994(second edition).
- Khoo Joo Ee, *The Straits Chinese; A Cultural History*, Amsterdam Kuala Lumpur: The Pepin Press, 1996.
- Peter Lee & Jennifer Chen, *Rumah Baba; Life in a Peranakan House*, Singapor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1998.

文獻中的砂勞越早期華人（客家）移民 與馬來統治者和 Brooke 的關係 以及他們跟 Bidayuh 文化社會互動的初探

林開忠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

一、前言

書寫石隆門華工事件的作者很多，但甚少談及在起義前石隆門的十二公司跟 Brooke 政權的關係。大部分的研究者都以 1857 年的華工起義事件為分析的重點（見 Baring-Gould & Bampfylde 1909; Chin, 1981; Chang, 1995; 劉伯奎 1989）；或者是探討華工起義事件的領袖人物：如劉善邦（劉伯奎 1989；Chang, 1995）；有的則探討起義事件的社會經濟意義（Lockard, 1987）。對於十二公司跟 Brooke 政權的關係大多一筆帶過甚或不談。其實他們的關係可以追溯到 James Brooke 成為砂勞越的拉者(Rajah)之前。這些關係可以從 James Brooke 本人的日記及私人信件裡一窺其貌。雖然他在字裡行間會有不可避免的個人偏見，但在描述當時的華人或客家人聚落時卻還是不可多得的歷史材料之一。本文的目的即再利用 Brooke 的私人信件以及日記，再現他跟早期華人移民的關係。這些原始資料加上其他早晚期歐洲人的記載，當可讓我們了解部分的歷史狀況以及早期客家人在西婆羅洲的情形。另外，本文使用「華人」一詞以配合早期歐洲人使用的“Chinese”一詞的翻譯。事實上，這些從西婆羅洲遷移至砂勞越河內陸的華人移民絕大多數是客家人，所以本文為敘述方便有時也會用「客家人」或「客人」一詞。

二、華人在馬來王朝的經濟與軍事角色

在 Brooke 第一次到達砂勞越時，欲藉 Rajah Muda Hashim 的影響力來圖其探訪 Marudu 灣的計劃。經過向 Hashim 申請，他被獲准到砂勞越以及 Samarahan 河上游作短程之探勘。他在 1839 年 9 月 2 日的日記裡有如下的記載：

這天我們溯河而上參觀近期建立的華人村落。村落位於上游約兩哩半的地方，跟 Tungong 同一邊，有 30 個華人（純種）以及 5 個（華人與達雅）混血的 Sambas 婦女。... 它於四五個月前成村。（村民表示）這裡的土壤肥沃，這可從很多地方都被開墾種植稻米、荖葉、蕃薯、玉米等作物；以及他們可以供應我們 7 擔或 933 磅的蕃薯而不會影響他們的作物看出來。他們也拿出從 Gading 山取得的燕窩、蜂蜜、garu 木和黑檀的樣本給我看。... 他們告訴我說，達雅人所採集的籐和其他竹類也很多。華人與馬來人或達雅人混血的（後代）都長得很好看而且是很勤勞的種族，他們擁有較多華人的特質。這可能是由於教育與早期形成的習性都是華人式的所造成；而在宗教與風俗上他們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跟隨父方的華人。這種族值得注意，因為他們將是婆羅洲未來的主人。他們（在婆羅洲確實）的人口數不得而知，但必在數千人之眾：據說有三千人正在抵達婆羅洲之途中。（Keppel, vol. I, 1847: 65-67）

這聚落的首領，按推測應該就是十二公司的領導人之一，告訴 Brooke 說他原籍廣東但已久居三發(Sambas)，他是率同一班同籍人士受僱於砂勞越內陸的金礦場，並說那裡的金礦蘊藏量豐富且質地良好(Keppel, vol. I, 1847: 67)。如果此首領的說法是可以採信的，則他們到來砂勞越上游乃是受僱於當時的砂勞越總督 Pengiran Indra Makota 或 Rajah Muda Hashim。誠如發生在十九世紀馬來半島錫礦區的華人礦工跟馬來統治者之關係一樣，金礦的稅收必為傳統婆羅洲馬來政治體系重要的財富來源之一，華人礦工成為馬來統治者爭相控制的對象。¹那些較大、歷史較悠久、組織較強大的華人礦工社群，通常都能自外於馬來統治者的直接控制；只是間接地賦稅於佔據河口便利的馬來統治者。但在一些比較小的，只有數百人的礦場裡，馬來統治者就得以直接而有效地控制礦工內部事務甚或成為礦產事業的名義夥伴之方式來處理，後一種情況的馬來統治僱用少量的華人礦工並直

¹ 在 19 世紀的馬來政治經濟體系裡，華人移民扮演重要的角色。馬來統治者發現比起境內自己的從屬人眾而言，華人在政治上對他們較少威脅。見 Anthony Reid, *Entrepreneurial minorities,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in Daniel Chirot and Anthony Reid (eds.), *Essential outsiders: Chinese and Jew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Europe*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 34.

接管理他們(Gullick 1958: 24)。² 雖然 Gullick 的描述指涉的是馬來半島的錫礦礦工與馬來統治者的關係，但筆者認為這應該是普遍存在於十九世紀或更早以前東南亞產礦區的現象。舉例來說，在汶萊王朝時期，華人已因為經濟的需要而被引進來，誠如 Donald Brown 寫道：「華人擁有一種文化，其價值、組織、技術與商業的特質讓他們適於經濟發展的職務。所以他們顯然是較適合生產國家歲收的人」。(1974: 73)

從 Brooke 描述此華人礦工社群有一領導人的情況看來，可見馬來統治者是透過這些領袖們來處理礦工的事務，即把華人礦工視為一個群體而非個體來處理(Brown, 1970: 72)。我們不了解這領袖是否具有甲必丹的頭銜，但很顯然他是受馬來統治者認可的礦場管理人。在馬來統治者的眼裡，華人是外來的。Barbara & Leonard Andaya 夫婦提到了一個重要的因素如下：

華人納入馬來政治與社會體系為所謂的「秘密會社」所阻礙.. 在馬來人的文化裡，根本沒有處理這種獨立組織的機制。傳統上馬來統治者都是透過華人甲必丹，他通常是在馬來人與華人之間有名望的人，而把華人當作一個整體來處理。華人社群在過去也承認在徵詢甲必丹的意見後，馬來蘇丹有權調解（華人之間的）紛爭。(2001: 145-146)

除了提供經濟上的必要剩餘以外，華人礦工也可以是馬來統治者重要的參戰人員之一。³ 底下是 Brooke 於 1840 年 9 月再訪砂勞越時的觀察紀錄：「8 月 21 日。（我們）舉行了一場大型的戰爭會議，出席者包括（砂勞越總督）Macota、Subtu、Abong Mia、Datu Naraja、兩名華人領袖以及我本人。這確是最不相稱的混合體了，是個人絕少遇到的。」(Keppel, vol. I, 1847: 150)。會後決議隔天（即 22 日）向敵方移近，但 Brooke 並不看好他們的行動力，他發現他們各懷鬼胎，其中他寫道：那個華人甲必丹顯得很懶散與沉默(Keppel, vol. I, 1847: 151)。這裡所指的華人應是十二公司的兩名代表，但到底是誰並不清楚。惟這樣的觀察與批評也正說明了 Brooke 的偏見，蓋他以為最佳的作戰策略就是速戰速決，而傳統的婆羅洲戰爭形式並非如此，它們鮮少正面的衝突，而是以步步進逼紮營以及將對方的邑從吸引到自己的麾下為主。再者 Brooke 也尚未了解十二公司的華人為何會參與這場戰爭。第二天他們佔據了敵人棄置的防衛據點，在此 Brooke 發現人們各自紮營：華人的守備隊駐防於防禦功事的中央，而達雅人則將其防禦設施

² 在傳統馬來政治體系裡，馬來統治者的政治權力來自於他對人員的控制上，所以維持一可觀數量的邑從（clientele）兼武裝人員是傳統馬來政治競技場上重要的戲目。為維持政治上的優勢，統治者就必須擁有足夠的財富以分配剩餘的財富給邑從們。金礦與錫礦的收入正好提供統治者這種必要的開銷。除了礦產外，馬來統治者也控制了酒與鴉片等的入口稅收。

³ 當馬來朝廷發生權力鬥爭時，經濟資源與人力的爭奪就變得無比重要，此時的華人礦工或公司就得選邊站，甚至參與自己支持的那一方之戰事，以維持或增強公司在境內的經濟效益。公司的主要目的並非要成為馬來統治者的政治或軍事的附庸，而是想藉由支持一方來達到擴大礦場事業的經濟野心。

設在華人的外面(Keppel, vol. I, 1847: 153)。大概是有人告訴他說這種軍事防禦設施乃是三發華人慣用的形式。在 Pengiran Indra Makota 的軍隊中共有華人 500 名, Brooke 形容他們為「優異的工人」, 但他不看好他們從軍的資格。

經過十天的觀察參與後, Brooke 對這種耗時日的婆羅洲式戰爭充滿不耐煩, 在 10 月 30 日時他建議 Makota 直搗反叛的馬來拿督 (datus) 在 Belidah 的砲台。十二公司的領袖贊同 Brooke 的計劃, 但其他的馬來人卻裹足不前。在此情況下, 「如果馬來人肯去, 則華人也會同意。」(Keppel, vol. I, 1847: 168) Brooke 認為華人這種想法是合理的, 他們並非因為害怕, 而是不願意冒這個險而已。故事的發展是 Brooke 後來決定離開砂勞越, 但 Hashim 為了利用他來平定內亂以作為自己在汶萊朝廷的後盾, 乃在口頭上允應將立他為砂勞越的總督(Tuan Besar)。在思量一陣後, Brooke 決定介入內戰。他跟另外十二名船上的英國夥伴, 開始訓練這一群散慢的部隊。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Brooke 覺得有大部分人都投向他這邊。再經過反覆的操練, 終於在一場遭遇戰中打敗了新蕘灣 (Siniawan) 的馬來「叛軍」(Templer, vol. I, 1853: 99)。於 12 月 20 日與反叛派達成協議, 後者要求獲得 Hashim 的赦免及 Brooke 的保護。反叛的馬來拿督也害怕 Makota 的汶萊馬來人與十二公司的華工會對他們不利, 尤其是後者可能會在他們棄械投降後攻擊他們, 可見兩者之間原已存有齟齬。⁴ Brooke 乃居間調解並取得 Makota 軍隊的保證絕不會侵犯反叛的馬來拿督及其邑從。在完成繳械和財產充公後, 這些馬來拿督的妻女被 Hashim 押為人質, 新蕘灣這個曾是叛軍基地也就人去樓空了。當 Brooke 率同 Makota 的軍隊到達新蕘灣時, 一些華人最後就留了下來, 在其緊鄰地方建起一個村落。(Keppel, vol. I, 1847: 185-186)

所以到了 1840 年, 在砂勞越上游地區, 客人已從石隆門 (Bau) 擴散到短廊 (Tundong) 與新蕘灣地區。Brooke 對這些客人有如下的描述：

華人所到之處必可聽到斧鋸之聲, 他們很勤勞。他們之中有木匠、鋸匠、鐵匠、和建築師, 他們從事錫礦的開採, 或忙著建溝渠來淘金。(Keppel,

⁴ 早在汶萊蘇丹王朝對砂勞越地區產生興趣之前, 華工已經從三發地區陸續到來探勘, 因為根據傳說在砂勞越內陸蘊藏了非常豐富的礦產。但是在年年內戰的砂勞越, 他們發現無法和平地開採金礦; 而且那些成功取得金礦之華工還必須冒被不滿汶萊王朝派人干涉本地政治經濟利益之馬來反抗集團攻擊的風險。一位受人尊敬的哈芝 (Haji) 就曾在 1820 年代犯下一起罪行。有一天他聽聞有一些華工採得 60 安士的金, 正往三發的回途中, 就率同其親戚在途中的森林裡埋伏, 將那些華工殺死, 把黃金歸為己有。三發華工公司 (相信是三條溝公司) 乃派了七百人到來砂勞越圖謀報復。他們到達當時還是馬來人聚居的新蕘灣, 但發現馬來人早已有所準備, 他們非但無法攻克馬來人的砲台, 而且馬來人及達雅人在 Datu Patinggi Ali 的率領下, 將華工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 (St. John, vol. II, 1974: 321-323)。這大概可以說明華工與新蕘灣馬來人之間結下樑子的淵源, 這大概也可以說明為甚麼華工在這場內戰中是站在汶萊統治者這邊的原因了。在 Brooke 靈敏的政治嗅覺下, 也了解到新蕘灣馬來人跟華人礦工公司的不和, 所以他在給他母親的一封信中提到:「目前華人對馬來人具有牽制的作用, 雙方都渴望有人可以居間協調」(Templer, vol. I, 1853: 95)。言下之意當然是此中間人非他莫屬了。

vol. I, 1847: 230)

大多數的華工都屬於公司的成員，公司在它所轄的地區都設有其管理人員，掌管公司在該地區的事務。1845 年 Hugh Low 拜訪了短廊地區，他有如下的描述：「這村落屬於公司的，或三發公司的華人所有，他們在這裡有一名秘書（Juro-tulis）掌理砂勞越的事務。部分的成員在 Bow（即石隆門）淘金，部分則開採錫礦。至於住在靠河岸地方的人們則從事蔬菜與其他食物的生產以供應給礦工們，全部人平均分享所有（礦產）的利潤」（[1990] 1848: 373-374）。

三、James Brooke 的砂勞越王朝與華人

Brooke 之所以接受 Hashim 的這項獻禮，部分原因乃是因為他已經考慮到華人對砂勞越所可能有的貢獻。所以他在寫給他母親的信中提到：「冒險與勤勞的華人是晚近才遷入者，他們的數量將有所增加。我從這些人中獲得最迫切的誘惑，使自己選擇在砂勞越落腳，因為他們熟知英國人的價值以及英國人的清廉正直。有華人的地方，就會繁榮，礦產就會被開採，就可以取得所有的物產。華人乃高度精打細算的（民族），（得以）改進達雅人；由於雙方沒有宗教的歧視，他們通婚，最後達雅人習得華人的習慣，並模仿他們的勤勞。他們的貿易量必然很大，不出三年就可以直接徵稅以為稅收，如此就可以彌補前一兩年（砂勞越）的辛苦與問題了」（Templer, vol. I, 1853: 101-102）。所以他期待華人的移入，以開發砂勞越的資源，特別是金礦與錫礦以及稻米的種植；而且華人的到來也可以增加他的稅收，同時影響內陸的土著族，改變他們的習性，讓他們也像華人一樣刻苦耐勞。他甚至還計劃先以華人及馬來人為其軍隊組成成員，因為他深知分而治之的道理。華人跟馬來人的不和正是可以被利用的關鍵（Templer, vol. I, 1853: 116）。

Brooke 的成為砂勞越總督並不順利，他受到來自 Makota 的阻擾。Hashim 答應提供錫礦給他以便運到新加坡去交易，這些錫礦都是華工在開採。由於政治的不穩，華人礦工也不太願意工作，他們都在觀望當中。但在強大的武力展示下，Brooke 最後順利成為砂勞越的總督。唯不久他就收到三發蘇丹的來信，信裡提到在砂勞越的客人礦工之十二公司尚積欠他一筆債，該公司曾答應要以錫礦來支付，所以蘇丹要求唯有他們把錫礦交出才可了斷。在覆信中，Brooke 指出事實上砂勞越的錫礦已經歸為他總督的財產，在沒有他的允准下華人是不可錫礦來償債的（Keppel, vol I, 1847: 253）。

處在敵人四伏，隨時都有可能遭遇到 Makota 伺機復辟的處境裡，具有敏銳政治嗅覺的 Brooke 馬上覺察出在這個婆羅洲小隅可資利用的種族間／內的矛

盾。他想到可以利用華人移民來產生政治上的平衡效果。他在 1842 年 1 月 20 日寫道：「目前我（的地位與權力）會因為華人的遷入而增強，而使得所有的團體得以達到平衡，每一團體都會視我為將他們連接在一起（的媒介）」(Keppel, vol. I, 1847: 273)。他所謂的「華人遷入者」係指從三發移入砂勞越的華工，因為在 1842 年三發地區的華工公司，特別是在 Montrado 的公司，已陷入內戰狀態中。他在 3 月 24 日收到一份報告，了解到三發公司跟當地蘇丹的關係已公然決裂，「我們的 Sipang 華工（移民）當然還是著魔於三發（那邊的事件），誠如 Rajah (Muda Hashim) 曾如此形容，『他們的置衣箱在這裡，但他們的寶物櫃卻還是留在三發』」(Keppel, vol. I, 1847: 284)。

當時在三發有兩家華工組成的礦場中心，即在 Montrado 的大港公司以及在 Sipang 的三條溝公司。⁵ 這裡所說的 Sipang 華工移民就是三條溝公司的部分工人，他們早在 1830 年就由劉善邦率領來到帽山(Bau)並成立十二公司(Chang Pat Foh, 1995: 45)。不過顯然的這些原三條溝的華工跟三發蘇丹的契約關係似乎尚未結束，在 Brooke 即位後，三發蘇丹才會捎來前述的那一封討債的信。三發蘇丹的這項要求後來就有比較好的發展。在拒絕三發蘇丹的要求後，很顯然的後者並不能做甚麼。Brooke 認為說這項要求的確造成一些焦慮，但是他的影響力卻也因為這事件而加強了 (Templer, vol. I, 1853: 169)。1846 年年初，三發蘇丹以及 Sipang 的三條溝公司又捎來一封信，要求十二公司償還他們所積欠的債務，六千盧比，另外的六千盧比將由三條溝公司負責。Brooke 赦免了砂勞越華工該年的稅收以便他們可以償還蘇丹。但 Brooke 也告訴他們必須按規定償付，並威脅他們說如果未按規定行事，則砂勞越政府將會盡一切的努力；抑或關閉通往三發的路，或以蘇丹認為最好的方式來處理 (Templer, vol. II, 1853: 125, 129)。最後雙方達成如下的協議：

第一、關於跟蘇丹的契約協定之三條溝公司，包括這裡（砂勞越）與三發，必須一起研商，並決定何時償還給蘇丹，以及雙邊所應擔負的（債務）比例。公司必須達成協議，並知會蘇丹，若他們沒有履行約定，則蘇丹可以採取必要的行動強制三發公司付錢，同時關閉通往砂勞越 - 三發的交通直到付清為此。

⁵ 早期三發的華工分歸八個不同大小的公司，大家互不干涉，但卻在語言與風俗上互通，因為他們都是由客家人組成的。這八個公司包括了：第一，在 Montrado 的大港公司；第二，在 Sipang 的三條溝公司；第三，Sinbok 或 Simbok 公司；第四，Hammu-I 公司；第五，十六分公司；第六，十五分公司；第七，Manfo 公司；以及第八，Lintian 公司。所有的這些公司原本都位於 Montrado 附近。當金礦蘊藏量豐富時，它們之間相安無事。但在 1830 年代時，由於金礦蘊藏量逐漸減少，它們之間就常發生爭奪戰。首先在 1828-1830 年間，荷蘭軍隊開始攻擊大港公司。不久，三條溝、十五分以及十六分公司也聯合起來攻打大港，但都被大港擊敗。十六分公司逃到 Landak 地區，十五分與三條溝公司被大港公司指定只能在 Sipang 落腳，Manfo 公司也在沒有騷亂的情形下遷往 Landak。大約在 1837 年，大港公司又捲入 Sinbok 與 Hammu-I 的紛爭中，後兩者無法抵擋大港的攻擊，紛紛棄土逃亡。Hammu-I 轉入坤甸內陸，Sinbok 則從此四分五裂。參見 Mundy (vol. I, 1848: 286-288)。

第二、公司（是指十二公司）在砂勞越多年，但都沒有履行當初跟 Rajah (Muda Hashim) 協議的繳稅義務，從此公告始，由於（公司的）不遵守而廢除該契約書。公司必須記得他們務必為取得工作特權而繳付適當的稅款。Tuan Muda 將在較後固定每年的稅款額度，並厲行之。

第三、公司可以繼續以錫礦償還欠 Tuan Muda 的債務，但是在付清之前，其他的華人不可以將錫礦帶出來。因此公司將阻止運載錫礦的船隻到下游做買賣。(Templer, vol. II, 1853: 130-131)

協議中的第二條是針對當初公司跟 Hashim 的協定，由於雙方對協議內容的不同詮釋而來的。Brooke 發現當初 Sipang 華工移民為取得採礦權而與 Rajah Muda Hashim 簽定之協議書有兩個版本。⁶ 正本的協議書是以馬來文書寫，附本則為中文翻譯。中文譯本賦予十二公司擁有絕對的權利來開採全砂勞越上游地區的金礦和錫礦，根據 Brooke 的說法，這顯然是有意擴大開採範圍的狡詐做法。為解決未來可能的爭端，Brooke 乃召見公司的代表，告訴他們這樣的說法與做法是一種欺騙 (Green, [1909]: 92)。⁷ 所以在前述條約裡的第二條，他廢除了這份協議書的有效性。

對於華人公司在婆羅洲的獨立性格以及它們在三發的風風雨雨也讓 Brooke 對境內的公司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他想從三發引進另外一家華工公司以跟十二公司相制衡，以同時達到統治和商業的效果 (Mundy, vol. I, 1848: 289)。他明白的指出，此舉完全是為了：

反制邪惡（意圖）的機會，我（向十二公司）暗示說 Simbock 公司將會在此立足；整體上來說，他們（Sipang 的華工移民）比我預期的還要安靜。他們（指兩個公司）之間並非處於戰爭狀態，如果可以的話，他們（即十二公司的人）當然會儘可能將競爭的對手排除在外，真的沒辦法而要把這地方裨益於對方時，他們卻有著模糊的觀點與意圖，（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他們希望能被（Brooke）允許武裝強化自己，而其他的團體（指 Simbock 公司）則保持不變。但是在我的例子裡，『分而治之』是很好的

⁶ 在一項跟 Rajah Muda Hashim 的會談中（1841 年），Brooke 提到這份協議書的部份內容。他寫道：「人們都說華人擁有金子，他們把金子帶回三發，但這不是真的。華人需要被撫養，否則他們就會統治這國家。....關於華人賒欠 Rajah 的金子，我會跟 Atien 談，以便能儘快還清；但是如果 Rajah 將它們轉付給我的話，這些礦石將毫無價值可言。當華人還 Rajah 700 或 800 擔的礦石時，我將把它們全部買下來。」(Templer, vol. I, 1853: 312-313)

⁷ 這極可能是 Brooke 強使華人負罪的一種藉口，可能的情况是當初 Hashim 跟 Sipang 華人移民之間的協議並沒有寫得很明確或清楚，尤其是在有關邊界、地域以及地理空間概念上華人移民與馬來統治者之間可能有著不小的差別。其實 Brooke 以其明確的地域觀來判定這是華人狡詐變更開採範圍的結果可能還有另一個更私人的原因：即他既已成為砂勞越的總督，轄有錫礦的所有權，錫礦是他的經濟命脈，Sipang 華人的如此宣稱固然造成兩者間經濟利益上的衝突；所以他當然極力干涉。

座右銘；這裡的華人忽略了這裡跟三發的差別。在那裡他們聚落的周圍有很多河流——這裡只有一條；而且週遭的達雅人都敵視他們，飢餓會使他們最後就範的。(Keppel, vol. I, 1847: 285)

十二公司的代表剛開始的時候持反對的立場，表示他們寧願開放門戶讓 Simbock 公司的人進來，也不願看到另外一家公司的成立，瓜分礦產利益。但是 Brooke 以他們的不誠實而拒絕之，並要他們回去重新考慮。第二天，十二公司的代表到來，表示願意接受 Simbock 公司如果它被改成 Sam Simbock。Sam 在客語裡有傭人、奴僕的意思。他們認為因為三條溝由三個字組成，故而 Simbock 也應該有三個字。Brooke 拒絕這樣的提議，反建議道除非三條溝公司也冠以 Sam 字否則免談。Brooke 並準備了他的大船艦，以達威嚇之效果。第三天晚上，十二公司代表答應接受新公司的到來 (Mundy, vol. I, 1848: 290-294; Green, [1909]: 92-93)。1842 年 4 月 Simbock 公司被安置於左砂勞越河。在 1880 年代，一名自然科學家 William T. Hornaday 曾到訪過兩家華工公司，寫道：「石隆門這裡有兩家華人金礦公司，我們分別參觀了它們。二者採用的都是不經濟的(採金)方法... 華婦們(應該是嫁給華人的達雅婦女)在水閘末端從事淘金的工作。這兩個公司各有自己不同的村落以及兩排的商店，它們都建築良好及整齊。」(1993 [1885]: 189)

為什麼三條溝公司與 Simbock 公司的部分客家礦工移民會遷徙到砂勞越呢？據 Brooke 的記述，在三發，大港公司的勢力最強大，它連鴉片的稅收都因為走私而令三發蘇丹損失慘重。⁸ 為了打擊大港公司，蘇丹與荷蘭人合作，出兵攻打大港，但為大港所敗；大港因而趁勝出擊，處罰所有支持荷軍的其他華人聚落，其中在 Sipang 的三條溝公司就是其中之一。1850 年大港公司攻陷 Sipang 城池以及三發河河口的邦戛 (Pemangkat)，引起後者的大逃亡，有的就逃到砂勞越河上游地區(Keppel, 1852: 352-353; St. John, vol. II, 1974 [1862]: 324-325)。⁹ Brooke 很看好這些華人移民，認為他們是砂勞越經濟發展很好及很有用的人口。以荷蘭人在三發的經驗為前車之鑑，他認為砂勞越的未來與繁榮必須仰賴對華人的管理。這些突然增加的華工的確為 Brooke 政府帶來一些問題。首先，Brooke 必需找適當的土地安置他們；再者他們都是逃難的人，身無分文，所以必須提供他們食物與金錢或農具 (St. John, vol. II, 1974 [1862]: 324-325)。土地的問題尤其棘手，因為那涉及越過 Bidayuh 聚落共有土地的問題。Brooke 乃親自到砂勞越內陸了解現況，由於只有部分的新來的華工加入石隆門的十二公司，大部分的新移民——比石隆門的礦工人口還要多——都還是習於務農，但光是人口一項就把石隆門的礦工比了下去 (St. John, vol. II, 1974 [1862]: 325, 328)，這就是為甚麼十二公司堅持除非這些移民都留在石隆門，否則將不提供他們膳宿的原因了。所以 Brooke

⁸ 鴉片是由蘇丹控制的，荷蘭人則控制鹽巴。見 Rodney Mundy (1848: 285)。

⁹ 但早在這之前，華工已陸續到達砂勞越的內陸，並組織了十二公司。

結論道：「由於三條溝（公司）目前正處於苦惱狀態，所以也就十分的低聲下氣，因此要使它服從以及建立一套固定的管理體系並非難事，如此就可以防止那逐步但要命的蠶食達雅土地（的現象），這在鄰邦可是司空見慣的事。」（Keppel, 1852: 353-354）

為了安置這些華人，Brooke 首先把他們送到 Muara Tabas 的 Si Jinkat（在另一信件裡，Brooke 稱之為 Sundu（見 Templer, vol. III, 1853: 24）。）及 Santubong 山下種稻，並提供他們必要的食物與農具，但這些華人最後還是放棄了該地點；有的轉向內陸的金礦公司；有的就移師 Lundu 耕作蔬菜。

8 月 26 日，有四百個貧窮的華工抵達砂勞越，據說還有三千個更窮的同胞還在（Tanjong）Dato 的岸上，他們將會儘快到來會合；不久之後，大部分的人都找到了往上游的路，雖然政府官員（此時 Brooke 還在倫敦）試圖說服他們在 Santubong（其中一個河口地方）建立家園。只有部分的人留在 Santubong，但是每一天船隻滿載著華人來到這裡。Rajah 提供他們稻米達數月之久，並給他們工具以清理森林及開墾。剛開始的時候，在他們建築房屋之前，整個地方都讓他們感到很沮喪。很多人都住在自己在河上的船裡；在鎮上的每一個倉庫與工作場都人滿為患。（Harriette, 1992 [1882]: 48）

有的人更是擠進古晉的教堂裡。有一天晚上，Francis McDougall 主教到教堂進行例常巡邏，以確保正在蓋建的教堂建築木板沒有被偷走。當他到達工地時，他被睡滿華工的工地嚇到（Harriette, 1992 [1882]: 49）。St. John 認為這個計劃的失敗乃是因為「有缺點的管理與不充分的監督有以致之」（vol. II, 1974 [1862]: 328）。St. John 眼中比較有組織的移墾計劃是在 1856 年，在邦戛華人移民的要求下，Brooke 將五百人安置在離古晉六里的 Sungai Tengah 上的計劃。因為他後來發現 Sungai Tengah 的華人在成功開墾後，他們開始把比較貧窮的礦工親戚從石隆門的公司接過來（1974 [1862]: 329-331）。

雖然政府在安置這些客家礦工上有成有敗，但對古晉的聖公教會而言，這些新移民正好提供它新受洗的教徒。在這些新到的邦戛華工中，有近二十個看起來比較聰明伶俐的小男孩小女孩最後被教會收養了。那是 1850 年 8 月的事情，底下是 McDougall 的太太，Harriette 的紀錄：

有些華工很樂意將他們的小孩交給我們，希望他們可以跟我們已有的七個小孤兒一起成長，所以他（指主教）就去找 Aboo，華人紳士，請求允應讓我們收下十名華工小孩以將他們撫養成基督徒、施行洗禮並讓他們受教育十年。華人很重視教育，所以很樂於把小孩付託給我們。我絕不會

忘記那天早上坐在（教堂）玄關前迎接我的新家庭成員的情形。這些父母與孩子都不會說馬來語。他們走上階梯，手裡牽了一個小男生或女生，向我點點頭及微笑，然後將孩子的手放在我的手裡，就好像是說：『就在這裡，你拿去吧。』我們的其中一個華人廚師告知他們我們將如何安置他們，而且他們必須留在教堂裡直到成年。就這樣，我們那天收了 Salion、Sunfoon、Chinzu、Queyfat、Assin、Umque 以及 Achin，（以上為）男生；Achong、Moukmoy 和 Poingzu，（以上為）女生。這十個小孩不久就開始學習馬來話。之後我們再收養五個，再之後就一兩個。（1992 [1882]: 50）

部分從 Sipang 逃到砂勞越的華工，在 Akin 與 Assan 的率領下，約 60 位男女成人和小孩，與盤據在倫樂（Lundu）的 Bidayuh 領袖商量他們進駐該地區的可能性。Brooke 很贊同他們到那裡發展，因為在倫樂的內陸沒有 Bidayuh 聚落，故不必擔心會有衝突發生；而且那裡有金礦，土地也很肥沃。他預測若能夠派一位歐洲人來治理倫樂的話，則假以時日那裡當可成為第二個砂勞越（Keppel, 1852: 361-2）。所以在 1852 年，Brooke 的姪兒，Charles Anthony Brooke，加入他的行政行列而被派往倫樂。Charles Brooke 在他到了砂勞越後第一次到上游地區處理華人與 Bidayuh 的紛爭，那次的導火線是由 Bidayuh 引起的：

前者（Bidayuh）砍斷了一座金礦用的水閘讓水流掉，讓欲利用它來沖排金礦溝的華人無水可用。當我們抵達時，我們驚訝地發現 Orang Kaya 夥同其上百位的武裝隨從，個個執一束長矛準備面對任何敵意的衝突。經過討論後確定是達雅人的錯；所以他們就得被罰及警告，同時也支付所有的損壞費用。（vol. I, 1866: 25-26）

從 1852 年起的四年期間，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對三發境內的華工課以遷徙稅。¹⁰ 1856 年荷蘭軍隊攻擊 Lumar 公司，有 300 個礦工逃到砂勞越（St. John, vol. II, 1974 [1862]: 330）。唯我們並未被告知他們最後的下落如何。1856 年，有另一群華工從三發移進來，選擇在魯巴河（Batang Lupar）落腳。當時 Charles Brooke 是駐紮在該地區的英國官員，他馬上到上游地方會見當地的伊班領袖討論土地的問題。他認為這些達雅領袖將能有效監控華人在這裡的一切行動（vol. I, 1866: 199）。¹¹

¹⁰ John Crawford 指出，在荷蘭統治底下的婆羅洲，華人被課以苛捐雜稅如下：they are subjected to a fine of two guilders for leave to settle, to an annual poll-tax of the same amount, and to a fine of thirty guilders for permission to return to China (1856: 97)。

¹¹ 這或可部份說明為甚麼當石隆門的十二公司在 1857 年起義時，在馬鹿（Marup），即魯巴河上的華工沒有一起響應的原因了。但有另一個問題是這一批華工事實上是來自三發的大港公司，此公司之前跟石隆門的十二公司前身之三條溝公司有宿怨，所以他們對於十二公司之遭遇不聞不問是可以理解的。參見劉伯奎（1990: 112）。

1850 年 11 月 9 日，Brooke 一行人拜訪石隆門或帽山(有時寫成 Bow)，受到十二公司華工半途迎接，「(他們)鳴槍並敲擊那最荒腔走調的大鑼與其他的樂器，其樂刺耳。他們把這音樂的造詣比為天朝之音，可見華人極樂天堂的合唱跟我們現在的觀點有所差別」(Keppel, 1852: 369)。十二公司的建築是用鹽鐵木蓋成的：

廟堂在中央，兩邊是礦工睡覺的房間... 外面是一間開敞的小屋，擺放了各式各樣的鑊，公司的勞工們就是在這裡圍坐吃飯喝茶。事實上那是修道院，沒有私人隱私的小室或禱告的禮拜堂。從 Sipang 與邦夏的逃難者則被安置在靠近公司建築的臨時小屋裡，他們在公司的舊金溝淘金。(Keppel, 1852: 369-370)

Brooke 這次的到來是為了宣揚他政府的威權，防止 Bidayuh 的土地受到華人的越界，以及盡可能把華人遷往靠海岸的地區以利於管理。他跟公司的負責人員開會，會中他們討論了許多的議題：

我提出所有的要求並得到他們的應允；但困難的地方是在執行的細節上，而非概括的文字上。我的要求包括 公司別指望行統治或收稅，而是要坦白地、直率地以及充分地承認砂勞越政府的權威。他們必須委派一位華人的甲必丹，而我委任一位英國人的甲必丹，由兩位甲必丹聯手監督公司在內陸的事務與運作。公司也不能判決任何紛爭或刑事案件，除了是發生在它們之間的；而且必須只是非常輕的罪行。(另外)公司不可以佔有達雅人的土地，也不能在未經(砂勞越政府的)允准下開闢新的金溝。(最後)所有(砂勞越政府)要求交出的壞份子(公司)都得引渡。(Keppel, 1852: 371)

Brooke 給公司十天的時間以選出一名華人甲必丹及繳付所拖欠的稅款，同時他也要求公司把新遷入的華工送到古晉，因為他不希望這些華工散佈在內陸各處以及因此跨越到 Bidayuh 聚落的土地，這會給他造成統治上的困難(Keppel, 1852: 371-373)。其實不是十天，而是二十一天後，由公司的代表到古晉拜見 Brooke。他們告訴 Brooke 公司決定委派 Atiow 為華人甲必丹，Brooke 也公佈說他的政府指派 Steele 為英國人的甲必丹。Brooke 寫道：「這兩個甲必丹將負責處理有關公司與政府，以及公司與達雅族人之間的所有事務。我們必須知道這些華人住哪裡、他們有多少人以及他們的感受等。如果我們的甲必丹是一個聰明的年輕人的話，他就可以在內陸的華人中取得信任，也因此可以使我們(的運作)更為順暢」(Keppel, 1852: 381)。Brooke 與十二公司之間的協議經過不斷的修訂與頒布，最後 Atiow 的任命才取得圓滿的共識。雖然 Atiow 不能在古晉逗留很多個月，但是他在 Brooke 筆下是一位「誠實及公正的人，他會說很流暢的馬來語，並且能夠在各個團體間取得信任。」(Keppel, vol. I, 1847: 382)但他也像其他華工

一樣，是一位鴉片癮君子。

但到底這一項甲必丹制度是否有達到 Brooke 所需要的效果，從下來發生的事情中就可以一窺究竟了。Charles Brooke 在 1852 年 11 月的日記裡有一項關於公司窩藏罪犯的事情，他被派到古晉城北邊監護。

華人金礦工反抗執行緝拿公司的一名罪犯的政府官員。該罪犯為累犯但受到此地（公司）華人領袖的藏匿與保護，砂勞越當局現在決定嚴懲他們，加強各地方以及公共建築的監視工作，直到一支武裝人員開始啟程到上游地方，但大部分的武裝人員都乘坐小獨木舟。第二天早上我們就到達了華人（公司）的碼頭，之前有些商人就已經到來這裡警告華人有關政府軍得到來，同時建議他們屈從政府把該罪犯交出來。剛接到有關政府軍正迅捷地朝他們攻來，這裡的華人領袖因害怕而降服。他們最後還是出現了，表現出謙卑的鞠躬的樣子。該罪犯也就被交出來，之後並在公司內跟所有重要的土酋（即參加政府軍的達雅及馬來領袖）開會，會中華人被多加責難，並被罰以建一防禦工事，由華人自己提供所有必須的武器、彈藥以及駐守兵員的開銷。第一個被選中的地點坐落在一山丘上，俯視公司的建築與礦區；但在慎重考慮後最後的地點變為在 Berlidah，控制河流，但卻離礦工有十里之遙。這些華人被重重地武裝起來並有充裕的軍需品，那是數年來持續累積的結果，他們藉口說需要這些武器保護自己免受達雅人之擾。(vol. I, 1866: 27-28)數天後，當 Charles 回到防禦工事的據點巡視時，他覺得很不悅，因為石隆門的華工要求他提供一百枝步槍，他懷疑這些華工心懷不悅，所以拒絕了他們的要求。(Brooke, vol. I, 1866: 30)

到了 1856 年，在砂勞越有很多謠言說石隆門的華工正準備起義，但顯然都是空穴來風，查無實情。但在 1857 年 2 月底，石隆門的華工在劉善邦的率領下，夜襲古晉。關於這段歷史大概是最多研究砂勞越華人歷史的學者及 Brooke 官員最感興趣的一段（見劉伯奎, 1990; Brooke, 1866; McDougall, 1882; St. John, 1862; Chin, 1981; Lockard, 1987; Chang, 1995），這裡不再贅述。¹² 戰爭發生後，Charles Brooke 率領他的伊班軍隊直搗帽山的華工公司大本營，屠殺大量的華工，俘虜了部分的小孩。1858 年，Charles Brooke 將部份被他的伊班軍隊擄獲的華人小孩送到古晉的教會學校 (vol. I, 1866: 267-268)。大概經過數年後，華工又從三發進入砂勞越內陸，所以在 1861 年當 Charles Brooke 對伊班頑抗份子 Rentap 進行圍剿時，有二十名華工被徵召為開路先鋒。就像他的舅舅 James Brooke 之前發現

¹² 1857 年華工起義事件後來還被用作政治恐嚇的工具。大約在 1890 年代，由於胡椒價格節節滑落，一些內陸的華人椒農對於古晉的華人收購商普遍不滿，有傳聞說他們將揭竿起義。當時的 Rajah Charles Brooke 得知後，便將運往內陸的五箱煙花炮竹充公，丟入河裡；並馬上召見他們，調來大批的達雅領袖壓陣，他告訴那些內陸華人椒農不要輕舉妄動，否則三十多年前的屠殺將會重演，因為所有的達雅族人都支持他的政府 (Sharp, [n.d.]: 122-123)。

的，這些華工事實上無法順利達成軍事的任務，有一半的華工半途而廢，這令他很失望 (vol. II, 1866: 135-137)。

四、華人與土著族的關係 初步的探討

誠如前述，在十二公司的華人礦工中，懂得馬來話的真是寥寥無幾。遲至 1880 年代，還有西方的旅遊家兼科學家發現這些內陸的華工居然是不通曉馬來土語的工人。Hornaday，比如說，就曾如此描述：「奇怪的很，我們的主人（指石隆門公司的華工領袖）沒有一個會說馬來話」（1993 [1885]: 189）。這種語言的現象似乎說明了內陸華工的經濟與政治都不必跟馬來人有直接關聯的結果，但這並不代表說華工就完全與外界隔離。事實上，內陸的華工聚落往往是被 Bidayuh 村落包圍的。所以之間的互動與接觸，除了前述的戰爭外，就要數屬婚配為大宗了。誠如一位觀察家在 50 年代指出：

華人是最能適應，但不容易被同化的（民族）。他們有的跟土著或馬來人通婚，這有助於整合砂勞越各民族為一同質化民族的過程；但整體來說他們還是保留了他們的祖先從中國帶來的特質、習俗以及觀念而很少有變化。(MacDonald, 1985 [1956]: 335)

可見這些內陸華人跟土著族的通婚是一普遍的現象，但我們也知道早期的華人移民都來自西婆羅洲。George Windsor Earl 在 1834 年受託到西婆羅洲的 Sinkawang 跟當地的華工公司建立貿易關係時，就已發現 Sinkawang 的華人商店有小部份是由下嫁給華人的達雅婦女所掌理 (1837: 210)。這些達雅人相信就是跟現在砂勞越的 Bidayuh 諸族關係密切的族群。¹³ 華人移民與達雅人之間的一向來都保持非常友好的社會關係，雖然他們之間的通婚都是單向的，即達雅婦女嫁給華人，但達雅人不曾視之為非相互或不公平的關係 (Alquadrie, 1990: 232)。也就是說從十九世紀 20 年代陸續從西婆羅洲移民到砂勞越內陸的華人極可能有大

¹³ 據晚近人類學者 Victor T. King 的研究，在砂勞越與西婆羅洲交界的地方是 Bidayuh 或 Land Dayak 分布的地區，馬來人、馬來化群體 (Malayic groups 如 Iban, Kantu' 與 Suruk/Mentebah)、Maloh 及 Ulu Ai 群體等，大多分布在 Kapuas 河的中上游地區 (參見 King, 1979: 圖三)。除了像 Iban 與 Maloh 這些比較具攻擊性的族群得以在某種程度上避開海岸或下游馬來穆斯林的統治外，大部份下游的達雅群體，尤其是 Bidayuh，變成是穆斯林統治者們的 orang budak，即指近期才改宗伊斯蘭但還必須提供貢品與勞役給馬來統治者的達雅人；其他未改宗但歸順於穆斯林統治者的達雅人 (Jackson, 1970: 17)。在歷史上因長期受到來自週遭強大族群的攻擊、掠奪的創傷，讓 Bidayuh 人自信心低落。誠如 William Robert Geddes 在 1950 年代於砂勞越研究 Bidayuh 所作的評語一樣，即 Bidayuh 人「相當確信他們並非他們世界的主人，因為他們知道有比他們更強的人會侵入及控制它——包括海達雅(指伊班人)和馬來人」(1961 [1957]: 4)。這大概是造成 Bidayuh 婦女與華人通婚頻繁的其中一個原因了。

部分都是達雅 - 華人混血後裔。

當 1851 年 Pfeiffer 女仕到來砂勞越時，當時 Brooke 的私人秘書 Spencer St. John 曾陪她到砂勞越河內陸參觀華工的工作狀況。St. John 發現在新嘉坡的華人婦女都是混血兒：

他們的婦女，混血的（後裔），比任何在這裡的人種都要好看；有的女孩很漂亮，她們有一點可以作為其鄰族的典範，即她們愛乾淨。馬來女孩每天至少要洗三次澡，但卻不致力於她們的衣衫，而達雅人呢則經常連她們的衣衫和皮膚都忽略了。看到華人少女一本正經的樣子、整齊的衣服是很愉悅的事情，她們的父母顯然對於她們的外表充滿自豪。(vol. I, 1974 [1862]: 153)

他在一篇描述砂勞越華人的文章裡，更推論說很多從三發逃到砂勞越的華工都是混血後裔。他寫道：

我必須指出這些華人都不是從中國來的純種移民，他們都是混血的，早期墾殖者的後裔，（這些早期墾殖者）娶納馬來跟達雅的妻子，所以他們比純種的華人更有好戰的習性，有很多也具備了土著族的活動力。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就已經在三發拓墾，他們逐漸在孱弱的馬來王國中建立起自治的社群，透過跟他們鄰近的達雅婦女通婚，他們與達雅社群形成政治與社會的結盟關係。(vol. II, 1974 [1862]: 323)

同樣的，早期的歐洲人對西婆羅洲華人的記載也都注意到這一點。據 Crawford 指出，在 Montrado 的華工人口中，絕大部分都是混血兒。他並提到這些華工後裔保留了他們母國的「習俗、宗教與服飾，同時他們也保存了其方言，只有少數人會說馬來語」(1856: 289)。雖然如此，有的論者認為，就是因為結合了土著族與華人優良特質之混血結果，使得西婆羅洲的華工後裔得以起而對抗三發蘇丹 (Helms, 1882: 156)。除了習俗、宗教、服飾與語言外，在這些十九世紀觀察者的記載中，這些華工後裔好像除了混血的事實以外，就沒有其他文化層面上的互動與交流了。難道那些土著族的母親在其他方面都沒有對這些混血後裔造成影響嗎？有一些蛛絲馬跡或許可以提供我們一點這方面的概念。

前述的 Ida Pfeiffer 女士在她的日記裡提到大部份婆羅洲的華人都娶達雅婦女為妻，因為，她認為，達雅婦女比馬來婦女來得勤勞，同時，華人與達雅人之間又沒有宗教上的隔閡，所以，「她們很容易就適應其丈夫的生活方式，甚或不必意識到任何需要適應的地方」(Pfeiffer, 1855: 61)。Helms 在他的觀察中發現要讓華工工作的最重要條件就是提供他們飲食，他指出華工每一天需要四到五餐，主食包括米飯、蔬菜與豬肉。同時他們還必須喝茶、抽煙、鴉片以及一種叫做 samshu 的米酒 (1882: 158)。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米酒的喜好很可能就是受到土

著族影響的力證。Frederick Boyle 這位探險家的描述就更有興趣了，他在 1860 年代走訪砂勞越並前往內陸的石隆門參觀礦區。底下就是他對華工的描述：

婦女們都是馬來人或達雅人，或混血後裔，由於她們本來就是被賣給她們的第一任丈夫，可能是這樣的緣故所以她們很少想說這買主會將她們再轉讓出去。但是如果說嫉妒在華人的家庭裡是如此有系統地被阻止，妻子的地位在其他方面卻是最輕鬆的。作丈夫的任務不只限於他在外頭的工作，若他能夠移除他太太的家務勞作——舉凡打掃房子、起火以及打穀——則是他的榮幸與快樂。華人的妻子的任務就只是靜靜地坐著及打扮得票漂亮亮。這就是四千年文明的經驗所孕育出來的女權。雖然婦女在馬來或達雅（社會裡）的待遇也不差，但她們在那的工作——在她們自己的眼裡——比起光坐著及打扮得漂漂亮亮——是艱辛了些，所以嫁給華人還是被（她們）高興地接受儘管它（指異族通婚）的特殊性質。（1984 [1865]: 71）

這種在男女分工上的現象也有可能是受到土著族影響下的產物，雖然作者強調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

五、小結

本文從討論砂勞越早期華人（客家）移民從西婆羅洲的三發地區，越過山地或沿著海岸，於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抵達砂勞越河，大多在河上游的金礦脈分布的地區做遷移式的流動最後才居住下來。這些移民在歐洲人的描述裡有些是早期華人與三發土著或馬來人通婚的混血後裔，他們在移入砂勞越後也與內陸的 Bidayuh 有所接觸與互動。十九世紀的歐洲旅遊家兼冒險家以及 Brooke 本人跟他的英國官員們，對於這方面的描述大多是以一筆帶過的方式處理。晚近的研究者大多對砂勞越的華人遷移歷史感興趣，尤其是發生在 1857 年的石隆門華工攻擊古晉的 Brooke 「官邸」事件更成為砂勞越治華人史的學者之最愛，這不無與砂勞越晚近的「民族主義」歷史書寫有密切的關係；卻忽略了其他的議題。本文以 Brooke 的日記以及書信為主，加上其他早期歐洲人的描述，意圖勾勒出 1857 年前砂勞越華人移民與當地的馬來統治者以及後來的 Brooke 王朝的互動關係。另外，本文也很關注早期華人移民與土著族的社會文化互動關係。從早期歐洲人的記載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結論：一，異族通婚存在於早期華人與 Bidayuh 之間；二，異族通婚的混血後代大多在習俗與語言上以「華人」父親為認同的對象；三，但是否 Bidayuh 的一些文化特質也同時對混血的後裔有所影響則文獻上沒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關於最後一點，筆者認為吾人應該從事田野的調查工作以釐清。

參考文獻

- 劉伯奎，*十九世紀砂勞越華工公司興亡史* ([n.p.], 1989)。
- Alqadrie, Syarif Ibrahim, Ethnic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Dyaknese society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Kentucky, 1990.
- Andaya, Barbara and Leonard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 Baring-Gould, Sabine and Charles Agar Bampfylde, *A history of Sarawak under its two White Rajahs, 1839-1908* (London: Henry Sothorn, 1909).
- Boyle, Frederick, *Adventures among the Dyaks of Borneo* (Kuala Lumpur: Antara Book Company, 1984 [1865]).
- Brooke, Charles Johnson, *Ten years in Sarawak*, 2 vols. (London: Tinsley Brothers, 1866).
- Brown, Donald E., *Brunei: the structure and history of a Bornean Malay sultanate* ([Brunei: Brunei Museum], 1970).
- Chang Pat Foh, *The land of freedom fighters* (Kuching: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Sarawak, 1995)
- Chin, John M., *The Sarawak Chines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Crawfurd, John, *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and adjacent countries* (London: Bradbury & Evans, 1856).
- Earl, George Windsor, *The eastern seas, or voyages and adventures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n 1832-33-34, comprising a tour to the island of Java—visits to Borneo, the Malay peninsula, Siam, &c.; also an account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Singapore,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commercial resources of the Archipelago* (London: William H. Allen and Co., 1837).
- Geddes, William Robert, *Nine Dayak Nigh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961).

Green, Eda, *Borneo: the land of river and palm* (London: Borneo Mission Association, [1909]).

Gullick, J. M., *Indigenous 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Malay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8).

Helms, Ludvig Verner, *Pioneering in the Far East, and the journeys to California in 1849 and to the White Sea in 1878* (London: W. H. Allen, 1882).

Hornaday, William T., *The experiences of a hunter and naturalist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Borneo*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85]).

Jackson, James C., *Chinese in the West Borneo goldfields: a study in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University of Hall, 1970).

Keppel, Henry, *The expedition to Borneo of H. M. S. Dido for the suppression of piracy: with 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 of James Brooke, Esq. of Sarawak*, 3^d edition, 2 vol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47).

Keppel, Henry, *A visit to the Indian Archipelago, in H. M. Ship Mæander with portions of the private journal of Sir James Brooke, K. C. B.*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52).

King, Victor T., *Ethnic classific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a Borneo case study* (London: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all, 1979).

Lockard, Craig Alan, *From kampung to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Kuching Malaysia, 1820-1970* (Athens: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7).

Low, Hugh, *Sarawak its inhabitants and productions being notes during a residence in that country with His Excellency Mr. Brooke* (Petaling Jaya: Delta, 1990 [1848]).

MacDonald, Malcolm, *Borneo peopl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56]).

McDougall, Harriette, *Sketches of our life at Sarawak*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882]).

Mundy, Rodney, *Narrative of events in Borneo and Celebes, down to the occupation of Labuan from the journals of James Brooke, ESQ, Rajah of Sarawak, and*

governor of Labuan together with a narrative of the operations of H. M. S. Iris, in 2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848).

Pfeiffer, Ida, *A lady's second journey round the world* (London: Longman, 1855).

Sharp, Arthur F., *The wings of the morning* (London: H. H. Greaves, [n. d.]).

St. John, Spencer, *Life in the forests of the Far East*, 2 vol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862]).

Templer, John C. (ed.), *The private letters of Sir James Brooke, K. C. B. Rajah of Sarawak, narrating the events of his life, from 1838 to the present time*, in 3 vol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53).

台灣和東南亞研究

田中則雄*著 陳碧純**譯

今年年初田中先生寄給我「台灣和東南亞研究」¹一文，我因而對關於二次大戰前台灣和東南亞研究有初步的認識，所以懇請田中先生讓我翻譯成中文，讓更多關心台灣及東南亞史的人可以閱讀到此篇文章。經過數日之後，收到田中先生的傳真，告訴我已經得到出版社岩波書店的許可，我便著手翻譯此文，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對二次大戰前的台灣和東南亞研究有瞭解。

一九四三年九月，我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現在的國立台灣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南洋史，因日本戰敗離台歸日後，我仍然希望可以持續研究南洋史（東南亞史）。

二次世界大戰前，台北帝大是日本的大學中，唯一有擁有南洋史和土俗人種學（文化人類學）的課程。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的特色是研究台灣及東南亞。因為

* 1919 年出生於日本。

1941 年 4 月 為了研讀南洋史（東南亞史）來台就讀台北帝國大學。

1943 年 9 月 台北帝國大學文政部史學科南洋史畢業。

1944 年 3 月 台北帝大史學科助教，兼任台灣總督府外事部查課特約人員。

1944 年 7 月 進入台灣軍步兵 304 連隊。

1946 年 2 月 退伍歸國。

1946 年 7 月 任教於千葉縣立野田高等女學校。

1948 年 4 月 任教東京都立等學校。

1979 年 3 月 退休。

1969 年—1971 年 亞細亞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在印尼的雅加達國立外國語大學，教授日語及日本文化。

1979 年—1982 年 任拓殖大學客座講師。有數篇關於東南亞文化的研究論文。

1999 年 出版《醬油から世界を見る》，崙書房。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¹ 「台灣和アジア研究」，岩波講座東南アジア史（月報）5，2001 年 11 月，頁 9-12。

當時台北帝大的圖書採購經費多過東京帝大，雖然東南亞相關的圖書侷限於某些地區和時代，但是就當時而言，圖書藏量已經非常豐富。因此，除了稀有書籍外，大部份都集中於史學科圖書室。史學科的學生僅有數名，卻擁有史學科圖書室，可謂每日浸淫在書本之中。因此，回日本後，非常在意這些圖書受到如何的處置？是否有持續研究呢？但是，就我所得到的訊息，台灣和東南亞疏離，對於台灣的研究也相當困難。而且，聚集在一處所的東南亞相關書籍，也因重新分類的緣故而分散於各處。我覺得非常的寂寞，也不能理解國民黨為何討厭台灣的研究？

但是，台灣在李登輝時代，獎勵台灣研究，隨著這個契機，得以認識到東南亞研究的重要性，又開始進行研究。因此，我也注意到台灣雖然擁有戰前日本研究東南亞的研究書，卻沒有戰後日本的東南亞研究書，於是我寄贈台灣大學約八百冊的戰後日本有關東南亞的研究書籍。台灣大學非常的高興，並且鄭重的送給我感謝狀。另外，我也很快的收到回響，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研究生，因為在台灣大學圖書館閱讀到我寄贈的書，非常高興的寄給我謝函，並且向我請教有關東南亞研究的相關事情。我非常高興的看到台灣也終於開始研究東南亞，同時我亦追加寄贈日本最新出版的相關研究書《岩波講座東南亞史》（共10卷）。

日本統治台灣長達五十年，自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止。佔領當時治安惡劣，流行瘧疾等疫病，如同瘴癘之地。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就說：「日本佔領台灣如同窮人擁有別墅一般」，感慨負擔之重。而且，因為負擔太過於沈重，曾建議把當時的台灣賣給試圖觸手伸向台灣的法國。

富庶台灣的基礎建立於兒玉源太郎總督時期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手。他建立了戶籍名簿和地籍資料簿、開道路、興建港灣、鐵路等，並且創辦了醫校（日後的台北帝大醫學部）。因為我略為研讀印尼的慣習法，所以非常驚訝於他的施政中關於台灣舊慣習的調查。在歐洲，慣習法學是二十世紀初荷蘭蘭登（Leiden）大學的范倫何瑞（C. Van Vollenhoven）教授所確立。所以台灣幾乎和歐洲同時進行，後藤新平在京都大學的岡松參太郎博士指導下，設置臨時台灣舊慣習調查會，出版調查報告書。岡松參太郎參考德國的《人種（民族）學的法學綱要》，作成舊慣習調查的項目，可說是調查體系的基礎，他自己也在大正十一年（1921年）出版了《台灣蕃族慣習研究》（共八冊）。

台灣總督府真正開始進行東南亞調查是大正七年（1918年），總督府官房設置調查科。目的是調查華南和東南亞，就當時而言，發行了很多獨特的南方調查報告。一九二三年到二四年，擁有包含總務科的三十名人員。其中，活躍於太平洋戰爭有能力的調查員輩出。大正到昭和年間，實際主導指揮調查課的是來台的早稻田大學原口竹次郎教授。

一九三九年在台灣設置南方資料館，蒐集整理南方相關的圖書、資料，謀求更有效的利用。大正時代開始為了調查所蒐集的這些許多的資料，但不知道日本戰敗後的今日，資料現在的狀況為何？

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有台灣研究先驅的三傑之稱。他們在治安不良時進入台灣，以學院派的立場或是民間的立場，進行台灣住民的調查研究。其中，伊能分析文獻史料，有計畫性的訪問相樣的場所，調查原住民的言語及生活習慣，和鳥居的強烈探險色彩，形成對比。伊能的著作有《台灣文化誌》，被評價為近代實證性的台灣史的嚆矢。台灣大學七一年周年慶祝大會上，在新建造的圖書館舉辦「伊能嘉矩及台灣文獻展」及「伊能嘉矩及台灣文獻研討會」。

一九二八年創立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及東南亞研究中心因而移往大學內。雖然總督府本來只打算設醫學部和農學部，但是第一任的校長幣原坦（幣原喜重郎之兄），以學問的基礎是文學部和理學部為由反對，所以首先設文政學部和理農學部，昭和十一年設醫學部、昭和十七年設工學部、理農學部分為理學部和農學部。

台北帝大是典型的研究大學，重視基礎研究的學風。學生人數極少，校園內充滿了研究所的氛圍。

文政學部分為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政學科，史學科內有國史、東洋史、南洋史，土俗人種學²是史學科的附屬科系。第一任的文政學部長是東京大學東洋史的藤田豐八教授，南洋史始於開學後第二年，授課教授有村上直次郎教授、岩生成一副教授，村上教授退休後則由岩生成一教授和箭內健次副教授負責。台北帝大在十七年間，南洋史的畢業生不過十幾名。土俗人種學的第一屆畢業生只有馬淵東一一人。

文政學部的特色是專門研究台灣及東南亞，並以當時越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為目標。因此，短期之內發表了很多優秀的研究成果。當時恩賜賞及學士院賞即是優秀的表徵。

昭和十一年，小川尚義的《原語による高砂族伝？集》得到恩賜賞，移川子之藏的《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得到學士院賞。

昭和十六年，岩生成一的《南洋日本町の研究》得到學士院賞。

除此之外，土俗人種學教室發行《南方土俗》³雜誌（後來改稱為《南方民

² 專攻土俗人種學的學生必須是置於東洋史或是南洋史之下，所以是史學科的附屬學科。

³ 土俗人種學講座於帝大頗富盛名，被視為台灣人類學進入純學術研究之重要階段。講座主持為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移川子之藏，專攻環太平洋文化交涉史，與來自慶應大學的宮本延人（助教，後升講師、助教授）昭和六年畢業的馬淵東一（副手，後升任助教授），三人合力調查完成

族》)、史學科出版《台北帝國大學史學科年報》、月刊《民俗台灣》雜誌自昭和十六年(1941年)七月開始出版持續到昭和二十年(1945年)一月。這是以台灣及廣泛的南方習俗研究和介紹為目的,所以有很多台灣人的研究者共同執筆。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台北帝大設立南方人文研究、熱帶醫學研究、熱帶農業研究所等,但由於戰爭的激烈化,所以尚未看到成果便無疾而終。

現在,台灣大學對帝大時代的研究給予極高的評價及敬意。最近得到的消息,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教授戴昌風在「珊瑚礁生態研究」,讚賞帝大時代動物學科的小口四郎博士是世界成功培養珊瑚組織的先驅,確立了珊瑚礁研究的基礎。

《台灣高砂族所屬系統の調査書》。講座下設有「南方土俗學會」,發行《南方土俗》雜誌(後更名為《南方民族》),會員來自各學科,每月舉行一次討論會,至為活躍,移川教授並於研究圖書室佈置一處沙龍,作為自由討論的地方。

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應該合二為一？ 以東南亞研究為例*

廖建裕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教授

—

據我所知，各大學都設有人文學院與社會科學院。有些大學把人文與社會科學湊合在一起，然後才分成人文組與社會科學組兩組。一般說來，人文組是以語言文學、哲學與歷史為中心，而社會科學組則包括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學科。這樣的分法當然也有點主觀，似乎人文與社會科學可以清楚地分開；實際上，這樣的分法有點牽強。有一些學科，比如歷史與社會學往往有異常密切的關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國，開始了區域研究的出現。這些區域研究的重點，往往是亞非拉這發展中的區域。同時，絕大部份是研究生的課程 (Graduate Program)。主要是培養區域的專才。在美國各大學，有拉丁美洲、非洲、中東、東亞及東南亞各區域研究中心，專門栽培這類人才。課程的重點是在語言文學。所研究的範圍則包羅萬象，政治是其中之一。

東南亞各大學，在二三十年前也開始設立區域研究中心。除了東南亞研究外，也有歐洲研究課程，南亞研究課程，甚至美國研究課程。最後的美國研究課

* 本文發表於 2002 年 4 月 30 日、5 月 1 日，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美國杜克大學亞太研究所合辦之「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的對話：對亞太研究未來方向的啟示」國際研討會。

程，嚴格說來不是區域研究而是國別研究。這些區域研究中心或課程，一般說來都不以學科(discipline)為基礎。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都有參與，變成了涉及多門學科的研究(multidisciplinary)。與美國大學有別，東南亞大學的區域研究有些是本科生的課程(Undergraduate program)。此外，一些東南亞及澳洲大學，都設有有關語言文學的學系。語言變成了區域研究課程的必修科目。

東南亞研究課程就是一個例子。就以新加坡為例，起初，新加坡國大東南亞研究課程是多學科的課程：有政治、藝術、經濟、人類學、歷史等，但缺少語文的訓練。結果引起了一場熱烈的討論。許多以學科為背景的學者，認為這樣的課程會使本科生無法很好地掌握任何一門學科。因為，他們沒有選修專門的學科；國大各學系都有東南亞科目，如果要訓練某學科的東南亞專才，那麼就得送學生到現有的學系就讀。不然，這位本科生必然是學無所長。

的確，要培養東南亞區域社會學家，那麼本科生就得修讀社會學系；要培養東南亞區域政治學家，本科生就得修讀政治系。但是，東南亞區域研究課程，如果要與？不同，就必須有語言文化的成份。因為國大的社會科學組各系的本科學生都不需要懂東南亞任何一國的語言。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本科生在語文與文化方面，就勝其他學系一籌。這可以彌補在學科方面的不足。

於是，國大東南亞課程規定學生修讀至少一種東南亞語文。目前可以修讀的有印尼語、泰語或越南語。可是，與語言文學系有別，這個課程由不同學科的學術人員所組成。然而，他們被認為是多學科的專才。據我所知，在區域研究中心的學者多數以自己的學科為基礎，所以在方法上常有自己學科的影子。尤其是單人的研究成果，很少能突破自己的學科。

沒有以學科為基礎的區域研究會有前途？

二

研究社會科學的人，都認為社會科學要比區域研究強。只有走社會科學這一條道路，區域研究才能健全發展。

其實，所有的社會科學家，通常都始於研究某一個區域，並且以一個區域，甚至是一個國家作基礎，發展自己的理論。與區域專家所不同的是，社會科學家在未研究某個地區時，往往已掌握了一套社會科學的方法與理論，然後以某一個地區為其研究物件，仔細觀察現有理論與方法的優缺點。此外，他們對於當地語文的掌握，有時不會像區域研究學者到家。

研究東南亞的社會科學家，比較有成就的，或者影響力較大的有政治學家 Fred Riggs，政治人類學家 Ben Anderson，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等。我就以這幾位社會科學家作為例子來說明“社會科學”與“區域研究”的關係，“社會科學”家成果的長短處，從而得出一些初步的結論。

Fred Riggs 是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以研究泰國聞名。他的著作“官僚政體”是一部研究泰國政治的書，出版於 1966 年。¹這部書提出了有關官僚政體的理論，指出泰國政治制度以“官僚”作為基礎；這些官僚：即公務人員以及軍人是國家政策的決策者，“官僚”以外的力量如政黨、工會、商會以及有“魅力”的領袖，都不是決策者。在這制度下，政府可能更換，但是制度一成不變。

Riggs 這一套模式，有許多人加以應用於其他國家，包括印尼與緬甸。John Girling 及 Karl Jackson 將這個模式用於印尼。² Girling 用它分析蘇哈托時代的政治，而 Jackson 則以蘇卡諾與蘇哈托時代為例子。至於緬甸，直到最近才由緬甸學者 Kyaw Yin Hlaing 應用。³這種官僚政體，一般說來都比較穩定，因為精英份子都相當團結，並且都遵照遊戲的規則，非官僚及非軍人的力量薄弱。可是，當中？階開始出現，精英份子四分五裂，這種模式就不適用。泰國學者劉達馬打士（Anek Laothamatas）就寫了一部專書，說明 Riggs 的模式只適用於 1973 年學生及中產階級“起義”之前；1973 年後的泰國屬於另一種政體。⁴

實際上，泰國與印尼的“官僚政體”即使在 1973 年也不相同。泰國文官的歷史久遠，力量較軍人大；而印尼蘇哈多時代的官僚制度，軍人操縱一切，文官無用武之地。同時，在深入地分析整個社會時，這種模式顯得有些粗淺和淡薄。

另外一位名叫 Anderson 的教授，提出了“國族是想像中的社區”這套理論。⁵他以東南亞為主要例子，闡述國族(nation)的形成。雖然，Anderson 認為“國族”是想像出來的，但是其產生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特別是印刷業在東南亞發展之後。他所說的“印刷資本主義”使不同族群的人通過出版物發現了他們的共同點，進而出現了“國族認同”。Anderson 的這個理論，引起了學術界

¹ Fred W. Riggs, *Thail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a Bureaucratic Polity*.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ress, 1966.

² J.S. Girling, *The Bureaucratic Polity in Modernizing Societies: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and Prospects in the ASEAN Reg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1; Karl Jackson, "Bureaucratic Polit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 Analysis of Power and Communications in Indonesia," in *Political Power and Communications in Indonesia*, edited by Karl Jackson and Lucien Py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3-22.

³ Yin Hlang Kyaw, "The Politics of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in Post-Colonial Burma." Ph.D. thesis presented to Graduate School of Cornel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May 2001.

⁴ Anek Laothamata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Thailand: From Bureaucratic Polity to Liberal Corporatis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⁵ Benedict R. O'G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1991.

的重視。凡是搞民族運動或者“國族打造”(nation building)的學者，都會提到這本書，所以其影響是超越東南亞與東亞的區域。可是，有些專家不同意 Anderson 的看法。他們認為，國族與民族的出現是在資本主義崛起之前。

人類學家 Geertz 本來是以研究爪哇人的宗教成名。⁶ 他後來變成了一位傑出的文化論的專家。他早期的著作《爪哇的宗教》探討爪哇的回教。他認為爪哇的回教徒可分為三類：一為自由主義回教徒(abangan)，二為保守主義回教徒(santri)，三為印度化回教徒(priyayi)。後來許多學者指出 priyayi 其實是爪哇人社會的一個階層，不是宗教的派別。不過，Geertz 利用回教徒的分歧，說明了爪哇人的政黨。他認為，印尼當時（即 50 年代）的政黨，實際上是以這些回教流派為基礎，印尼政黨的鬥爭，是這種“政治文化”的衝突。

在我的一些作品裏，我也採用了 Geertz 的一些理論，並加以增減，套在印尼國內政治的研究。⁷ 它的確能夠闡明印尼雖然是回教徒眾多（約占人口的 87%），卻不是回教國這個事實，但是卻不能說明印尼民主政治的變遷，也忽略了軍人權力及政治經濟學對瞭解印尼蘇哈托時代政治的重要性。話雖然這麼說，Geertz 的學說為印尼政治文化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

我後來也運用印尼政治文化的概念，研究印尼的外交政策，說明為何蘇哈托時代的外交，完全沒有回教的色彩。⁸ 在我最近完成的《印尼大選與政治》(英文)一書中，我也應用“政治文化”，說明了這兩種文化在 1999 年大選及總統選舉中的鬥爭。⁹ 雖然印尼回教在蘇哈托晚期已抬頭，卻未能起主導的作用；回教黨的得票率，只在 17—37% 之間，而自由主義回教徒與非回教的聯合得票率，遠遠超出此數。在 1955 年的大選裏，回教黨的聯合票數約 43%，反而超過蘇哈托倒臺後的票數！這可能與印尼社會變遷有關。

最近一些學者批評 Geertz 的宗教專著，說他太過強調印度教及佛教對於爪哇回教的影響，忽略了回教歷史中的主要點：即使在中東，回教也大受傳統的、非回教信仰的影響，因而出現了“正統”與“非正統”回教的衝突，但是，它們仍屬於回教的範疇。¹⁰ 有關印尼回教的爭論，我看還會持續下去。可是，我認為，Geertz 的學說，對於研究印尼宗教文化與政治影響深遠。在學術界裏，他是頭一個從政治文化而不從回教組織的角度分析印尼回教不是單元體的學者，而且

⁶ Clifford Geertz, *Religion of Java*. Glencoe: Free Press, 1960.

⁷ Leo Suryadinata, *Military Ascendancy and Political Culture: A Study of Indonesia's Golkar*.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9.

⁸ Leo Suryadinata,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under Suharto: Aspiring to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6.

⁹ Leo Suryadinata, *Elections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¹⁰ Mark Woodward, *Islam in Java: Normative Piety and Mysticism in the Sultanate of Yogyakarta*.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9.

把政治文化與政黨聯繫起來分析，耐人尋味。

三

應該指出的是，以一國為主的社會科學的研究，並不一定會有人欣賞。比如說，Donald Willmott 於 1960 年出版了一部很出色的《三寶壟華人》，洋洋數萬言，將印尼爪哇華人的社會及其變遷詳細分析。¹¹ 書後提出了有關華人社會變遷的理論模式，可是無人問津。所以，把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相結合，並不很容易，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接受。

Arend Lijphart 因為發表“分享權力的民主”的專文而聞名於政治學。¹² 他以西歐四個小國為背景（即荷蘭、奧地利、比利士與瑞士），提出在多元民族及多元宗教的國家，依舊能夠落實民主制度。可是這種“民主制度”不是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而是一種特殊的“族群分享權力的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這種制度有以下的四個特徵：一、成立代表各族群的聯合政府；二、各族群都享有與人數比例相等的權益；三、各族群都有否決權，以保障少數民族的利益；四、各族群有自治權。Lijphart 將這套理論，運用在其他國家，包括 1969 年前的馬來西亞以及 1975 年前的黎巴嫩。¹³ 可是，他的模式後來被人遺棄。連他研究的那四國，也不再運用他提出的“民主制度”的模式。其實，他的模式，如果嚴格地套在馬來西亞，那麼我們可以這麼說，馬來西亞從沒有落實“族群分享權力的民主制度”。因為，其中一個主要的成份，即“族群否決權”根本不曾存在。巫統在聯合政府中是老大，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他的族群政黨聯合政府的形式在 1969 年後仍繼續存在，雖然其內容已有點不同，卻不能說完全不一樣。

從 Lijphart 的例子，我們可以這麼說，打造政治模式並不容易；同時，這例子也說明，政治模式往往有文化及區域的局限性(culture and area-bound)，也有時間性。Lijphart 沒有在馬來西亞做過田野調查，而單靠他人的著作，所以很容易犯錯誤。言外之意，Lijphart 沒有東南亞區域研究的經驗。

話雖這麼說，Lijphart 的嘗試是可嘉的；他的模式使學者更深一層地思考，給我們很好的啟發。然而，他並沒有取得真正的突破。這無形中告訴我們，社會科學模式的困難性及局限性。

¹¹ Donald E. Willmott, *The Chinese of Semara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0.

¹² Arend Lijphart,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¹³ Lijphart, pp. 147-153.

社會科學裏的一種“比較研究”，對於區域研究的影響不大。就以有關東南亞華人的研究來說，一般上學者們多數是以一個國家為主。國家之間的比較或區域之間的比較很少見。¹⁴ 即使是英國研究華族的先驅 Victor Purcell，本來是搞馬來亞華人史，幾年後才完成了一部有關《東南亞華人》史的巨著，¹⁵ 但仍以馬來亞華人為藍本。Purcell 的《東南亞華人史》並沒有將各國華人加以比較。他把華人當成是一個單元體而不是多元體。所以，誤以為各地華人都是一樣的。後來 William Skinner 在研究東南亞華人時，由於他是搞人類學的，所以，很早的時候就已經發現到東南亞華人的多元性。他於 1950 年寫的報告書裏，就已經指出這一點。在研究印尼華社時，他也分析印尼土生華人與新客華人的分歧。¹⁶ 可惜 Skinner 沒有將印尼華人社會發展史的巨著加以出版。

雖然如此，Skinner 的文章給了許多印尼華族研究者不少啟發。美國學者 Mary Somers，澳洲學者 Charles Coppel 以及我本人也受到了他的影響。¹⁷ 可是與 Skinner 有別，我在探討印尼華族社會時從多方面著手，較深入地分析印尼華人的文化、政治、文學、政治文化，以及政府政策。¹⁸ 此外，我也企圖將東南亞華人社會作比較。通過各國政府對華族的政策以及國族的概念與打造，使我們能夠更深入地瞭解華人在各國的不同處境。

四

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在許多方面是休戚相關的。可是，在社會科學至上的現階段，純粹的區域研究並沒有崇高的地位。許多搞區域研究的學者，往往是搞語

¹⁴ 比較研究的作品還很有限，例如：廖建裕 (Leo Suryadinata)，〈爪哇與加州華族的比較〉，見《亞洲文化》，14 期 (1990)，頁 100-116；Leo Suryadinata, *Chines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7; Amy L. Freedm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 Chinese Overseas in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1.

¹⁵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¹⁶ G. William Skinner, *Report on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51; G. William Skinner, “The Chinese of Java”, in *Colloquium on Overseas Chinese*, edited by Morton H. Fried,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8, pp.1-10; G. William Skinner,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edited by Ruth T. McVe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63, pp.97-117.

¹⁷ Mary F. Somers,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64; Leo Suryadinata, *Peranakan Chinese politics in Java, 1917-42*.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6, revised edition 1980; Charles Coppel, “Patterns of Chinese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Indonesia”, In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Five Essays*. Edited by J.A.C. Mackie, Melbourne: Thomas Nelson, 1976, pp. 59-76.

¹⁸ Leo Suryadinata, *Pribumi Indonesians, the Chinese Minority and China: Perceptions and Policies*. Kuala Lumpur and London: Heinemann Asia, 1978; Leo Suryadinata,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1997, reprinted 1999; *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Minority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7.

言或者是傳統的歷史學者。搞社科的學者，覺得區域研究沒有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因此只能訓練“低層次”的學者。這當然是一個偏見。正如我在論文的開頭時所說，除了社會科學外，也有人文學科。在語言、文學及歷史學方面，在東南亞方面確有不少出色的語言文學或國別史專家，例如 D.G.E.Hall 的《東南亞史》、Sartono Kartodirdjo 的《爪哇人民反抗運動》，以及 R.O. Winstedt 著的《馬來古典文學史》，都有很高的價值。不過，我們所應該肯定的是，搞社會史的史家，必須掌握好社會科學，其作品方能引起社會學學者的共鳴。

雖然，人文學科與區域研究有所不同。我們常常把人文學科當成是區域研究的組成部份。這是因為人文學科往往以語言作為基礎，就像區域研究一樣。同時，有些搞區域研究的人，乃是搞語言和國別史出生的。他們在區域研究中也搞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但是他們在這個方面並沒有獲得特別的訓練，因此引起一些搞社會科學學者的不滿。然而，有些區域研究的學者的確也受過社會科學的訓練。所以不能同日而語。

我認為，區域研究可以與社會科學相輔相成。區域研究的專家往往對某個區域或者國家的文化與社會有非常詳細與深刻的瞭解，這種詳細的知識，可能是社會科學家所沒有的。這是因為社會科學家以學科為基礎，只找與理論有關的部份，可能對詳情或細節不很注意。同時，區域研究往往強調區域或國家的獨特性；而社會科學則注重區域的共同性。這兩者都有長處與短處。希望兩類學者可以向對方學習，使東南亞的研究更上一層樓。

全球化對社會科學和區域（亞洲）研究的挑戰*

蘇耀昌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

我們在一個學科內受訓，花上多年時間來熟習各種技能，及在本學科的期刊中發表研究結果。不待言，我們都認定自己是這個學科的從業者。由於我們都只專注於自己的學科，因此我們很少與其它學科的同事合作，出席其它學科的週年會議，或者在其它學科的期刊中發表文章。由於我們都是從事於自己學科內的工作，因此我們經常把自己的學科視為自然之物。

區域研究亦要求從業者效忠於該學科。區域研究通常需要花很多年時間來學習該區域的語言、文化和歷史。通常從業者都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該區域做實地考查工作、檔案研究和調查。因此，從業者都驕傲地認定自己是區域研究專家，高度意識自己的學術疆界，及盡力捍衛自己的研究領域。

然而，本文認為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和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不是與生俱來，因為它們祇是在過去兩個世紀內產生的社會產物。本文將首先討論產生社會科學和區域研究的歷史背景。本文認為雖然社會科學和區域研究都讓我們理解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發展，然而，它們也遭受到以西方為中心的分析和學科分割化的約束。然後，本文將會論證全球化和全球主義對社會科學和區域（亞洲）研究的挑戰。最後，本文會提出一個新視野，要求以超越社會科學和區域（亞洲）研究的疆域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

* 本文發表於 2002 年 4 月 30 日、5 月 1 日，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美國杜克大學亞太研究所合辦之「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的對話：對亞太研究未來方向的啟示」國際研討會。

一、產生社會科學和區域研究的歷史背景

“社會科學”是一門近代的學科。這個名稱是在十九世紀時，為因應西歐當時那些劃時代性的活動諸如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十九世紀的階級鬥爭、城市化、民族的建構和國家的成立等等而創做出來的。在這個革命年代，許多現代結構，諸如民族國家、市場和社會從舊有的封建結構中變化出來。因此，大學內的四個舊有學術單元（神學、哲學、法律、和醫學）再不足以充份理解這些現代結構。隨著時代的變遷，新的學科，諸如科學（或物理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逐漸替代了那四個舊有的學科。

在這一端，出現了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這個以客觀的科學方法和普遍定律來研究物質世界的新學科，在另一端，出現了人文學（Humanities）這個強調人的主觀性和歷史事件獨有性的新學科。在這兩者之間，出現了以科學方法來研究人類和制度的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在十九世紀末，社會科學再進一步細分成三個主要學科。政治學研究民族國家並專注於政治結構、民主、革命和國際關係等現象；經濟學研究新近出現的市場並專注於市場的供求關係、金錢、貨幣等的活動；社會學則研究一樣稱為社會的東西，它涵蓋了任何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以外的類別。

在第二十世紀初，社會科學內增加了一種地域上的分類。由於大部份社會科學家都專注於歐洲文明的深刻轉變，它們未有為研究那些在殖民主義高峰期時被征服的所謂“非文明”的其它國家作準備。因此，一個專門研究非洲原始小部落的被稱為人類學的新學科因而興起；同時也發展出另一個稱為東方研究的新學科來檢視東方那些已有高度文明的國家（如伊朗、印度和中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歐洲為中心的東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改變成以美國為中心的東方研究。歐洲的勢力在戰後被大大削弱，非殖民主義浪潮在發展中國家中伸延。另一方面，美國已發展成為世界的霸權並意欲在這些新近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內發揮其影響力。在所謂的冷戰時期，美國的首要任務是遏止共產主義在發展中國家中漫延。為此，美國展開了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用以理解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

因於亞洲各地都受到共產主義的威脅，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國開展了各種各樣的亞洲研究（Asian Studies）；鼓勵美國學者和學生學習亞洲的語言和文化，在亞洲進行實地研究，及為美國政府機構和公司在亞洲工作。因而，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促成了中國研究；韓戰促進了韓國研究；越戰擴展了越南和東南亞研究等等。

二、社會科學和亞洲研究的局限

雖然社會科學增進了我們對於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現代結構的理解，而亞洲研究也加深了我們對亞洲各國的認識，但是它們遭受到下列三種的限制：西方中心主義，分割化，和相互隔離。

西方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社會科學和亞洲研究都是在歐洲和美國產生的。社會科學不僅以歐洲和美國作為研究重點，更以歐洲和美國的觀點來檢視世界其它地區。雖然亞洲研究傾向於專注亞洲國家，但它們也是從英美的觀點來檢視亞洲。

通常它們的基本假定是普遍主義，即假定在英美找到的，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適用。例如，如果英美市場有一種供求定律，這種市場供求定律會同樣適用於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旦這些區域開始發展。

它們進一步的基本假定是現代化，即假定西歐和美國是很先進的，並且已完成了現代化，而其它地區仍然是落後的。然而，由於其它地區仍是處於漫長的現代化過程中的初級階段，如果它們向西方學習並追隨英美的發展路徑，最終亦可達至現代化。

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分析沒以亞洲的觀點來檢視亞洲，也沒以世界歷史的整體觀點來檢視亞洲。例如，一個典型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假定是：中國沒有跟隨歐洲的現代化路徑，一定是中國出了差錯或有缺失。而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方法是找出缺失的東西。文獻極少接納亞洲沒出現差錯的看法或探討亞洲國家可以開拓自己的發展路徑和一條更優於歐洲的發展路徑的可能性。

分割化（Fragmentation）。在二十世紀的後五十年，社會科學和亞洲研究的發展十分迅速，而學術界也變得制度化。大學成立了社會科學和亞洲研究的學系、課程和中心，提供博士、碩士、學士和副修學位。各個社會科學學科和各種亞洲研究都紛紛設立自己的學會和學術期刊，而圖書館也開始開發這方面的分類方法。同時，也出現了專業化的傾向；社會科學學科再進一步被分割成更細小的專業，亞洲研究也進一步被劃分為對區域、省和地區的微觀研究。

不斷地追求制度化和專業化產生了知識分割化的問題。很多社會科學的學科和各種的亞洲研究都有很強的疆界意識並決心要捍衛自己的領域。它們不鼓勵社會科學各學科或各種亞洲研究之間進行互動交流。通常兩方面的人都看不起那些試圖越界的研究者。例如，經濟學家通常會覺得社會學家的著作太抽象，而日本問題專家也很少成為中國問題專家。

社會科學與亞洲研究的隔離（Mutual Isolation）。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研究剛剛開展的時候，它聲稱是跨學科的，因為它涵蓋了各個學科（如歷史、語言文學、社會學、政治科學、人類學等等）的領域。然而，由於社會科學和人文學各學科都有嚴謹的學科疆界，這個跨學科的目標極少被實現。在大學內，由於教授們都是受聘於自己的學科而不是受聘於亞洲研究，最經常的情況是亞洲研究被邊緣化。社會科學的資助大部份是來自大學的，但亞洲研究需要依靠國家或私人基金的資助。結果是，某一個區域的研究（如越南）會因為突然有資金投入而蓬勃起來，但當資金花光之後就迅速萎縮（如越戰結束時）。

社會科學和亞洲研究並沒有向著跨學科的方向整合，而是趨向各自分工。社會科學學科被說成精於理論建構，而亞洲研究則精於尋找事實和收集數據。意圖超越社會科學與亞洲研究的分隔（如這個會議一般）的嘗試，僅是近來的事。雖然這種連繫兩方的努力祇是剛剛開展，但社會科學和亞洲研究很快就受到全球化這個新挑戰。

全球化及其對亞洲研究和社會科學的挑戰

全球化（Globalization）。由八十年代起，世界已進入了一個稱為全球化的新紀元。在這期間，高科技（如生物技術）和電訊（如互聯網和電子郵件）有突破性的發展，靈活生產系統的興起使到工廠得以南移，及出現所謂的時間/空間壓縮。

自此，全球性的貨物、金融、民眾、信息和生產網絡的流動大量增加。雖然許多研究者聲稱全球性的流動自十六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world-economy）誕生以來已經出現，但全球化過程自從八十年代起，幅度增加得相當大；流動量之大和流動速度之快，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例如，你可以從地球這一邊將銀行帳戶轉到地球的另一邊；你也可以在不足一秒之間，即時與身處另一個大洲的朋友用互聯網通訊。

如果十九世紀的革命年代的劃時代事件導致舊學科（神學、哲學、醫學和法律）的沒落和社會科學及東方研究的興起，則二十世紀末期的全球化挑戰亦將同樣會導致一些超越現存學術疆界的新學科乘時而興。

對亞洲研究的挑戰。首先，全球化挑戰了亞洲研究的基本單元：國家是不是亞洲研究的一個適當單元？極端的例子是六十年代末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那時候，中國與其它國家完全隔絕並被迫退出資本主義世界 - 經濟。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是可以清楚地認定毛氏時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疆界。然而，同一研究者在 2002 年就不能如此確定地劃出中國研究的範圍。全球化的力量使到中國大陸在國際政治、世界-經濟和全球文化中擔當了一個更活躍的角色。同樣地，全球化的力量使到全球性結構（諸如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等

等）、世界經濟、地區組織（諸如歐盟，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其它民族國家、全球性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海外華僑等等都可以影響到中國大陸的管制政策。因此，全球化使到研究者必須超越中國大陸的領土範圍來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

第二，由於全球化的主要特性是國與國之間的流動加劇，相應地，國界的作用因而淡化，並出現了新的跨境/跨國（transborder/transnational）關係。例如，在 2002 年的華僑商業網絡研究不單要研究中國大陸的商業活動，亦要檢視香港、台灣、美國華人、東南亞華人的商業活動中那些複雜的聯繫。同時，隨著國與國之間的民眾和理念的流動的增加，現時也需要研究全球性公民和政治身份認同的可變性這些問題。這些跨境/跨國連繫和網絡等的新現象肯定會對傳統亞洲研究那種把調查局限於國境內的活動作出挑戰。

第三，全球化要求研究者以一種更精細的觀點來重新檢視國家、地區和本土研究。隨著民眾、貨物、金融、資訊和生產網絡的流動的增加，國家、地區和本土研究的差別已變得日益模糊。例如，珠江三角洲工業的生產的現象應同時以不同的規模（scale）來檢視：它似乎是珠江三角洲的一種本地現象，但它也一種跨境現象（香港製造業北移往中國大陸），一種地區現象（大量臨時工人從南方省份遷移至廣東省），一種國家現象（廣東作為中國現代化力量的先驅），和一種跨國現象（在全球化生產網絡中，廣東是跨國公司的分包商）。全球化的研究者需要以不同的規模來檢視一個地區的領域的建構，而不是專注於一個領域清晰的地區。

對社會科學的挑戰。如果傳統的亞洲研究在理解全球化時就有困難，則社會科學亦有同樣的情況。由於分割化和強調學科的獨有領域，社會科學在掌握新的跨境/跨國活動的複雜性時有困難。很多時候，一種全球現象不僅是一種政治活動，它同時也是一種經濟活動，一種社會活動，或者一種文化活動。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那些經常性的交互作用使到跨境/跨國現象很難辨別。例如，香港與深圳之間的關口應否二十四小時開放，不僅是一種經濟現象（香港人往北消費，削弱了香港的消費市場），同時也是一種政治現象（香港政府有沒有保持“一國兩制”的權力），一種社會現象（香港居民在深圳購買房產及將年老的雙親送往到該處過退休生活），和一種文化現象（在兩地的大量的交流中，如何保持一種明顯的香港人身份和生活風格）。

全球化過程的複雜性因而要求要撤消學術疆界，使到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地理學家者可以一起工作；而中國問題專家、日本問題專家、朝鮮問題專家等等亦可以一起工作。因應全球化的挑戰，許多新的學術範疇，諸如文化研究、華僑研究、移民研究和全球化研究已經誕生，用以理解與跨境/跨國活動相關的問題。例如，在九十年代之前，研究中國的學者很少與研

究美國華人的學者交流，因為前者研究中國而後者研究美國華人。這兩類學者通常被安排在不同的單元中（中國研究中心和少數族裔研究中心）。然而，全球化已淡化了兩個中心之間的疆界，因為有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台灣人和大陸人移民美國，而也有越來越多的華裔美國公民到華人社會從事商業活動、結婚和讀書，亦有越來越多的已移民者經常在美國與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之間來來回回。一個名為散居世界研究（Diaspora Studies）的新學術範疇已經形成，用以研究這種跨境/跨國連繫。

在上述的新學術範疇誕生的同時，也出現了一個稱為全球主義的政治計劃。在本篇文章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指貨物、民眾、金融和資訊流量增加這個客觀過程，而全球主義（Globalism）則是指被視為自從八十年代以來，由英美國家和跨國公司提出來的一套政策和意識形態。

三、全球主義和亞洲主義

全球主義的興起。在七十年代末期，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計劃備受質疑。由於美國本身亦受到債務、經濟倒退、政治不穩、環境破壞和飢荒的困擾，許多南方國家發覺到英美的現代化模式越來越不值得欣賞。由於美國已不再富有至可提供援助，它對南方國家發展路向的影響正在減弱。

然而，在九十年代，西方嘗試翻身。利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機會，英美國家和跨國公司提出一套全球主義（Globalism），以求重新獲得在南方的影響力。雖然這套全球主義有不同的變種，它通常包涵下列的特性：

- 私營化，市場化，和去規管化：在南方，國家經營部份被過度擴充，而國家在經濟上作出太多規管。為了提高生產力，喚起私營部分的積極性和吸引外國投資，全球主義要求國家讓市場作主導，減少國家干預，國家經營部份私營化，及增加跨國公司在本土經濟中的技術和資金轉移部份的參與。

- 民主化：南方被批評為有很多權威主義或獨裁國家，而它們的官員則太腐敗無能。為了避免違反人權和帶回公民社會的積極性，全球主義要求國家要民主化，以使國家要對公民社會要更有交代。

- 全球性監察：另一個避免南方國家那些弊端的方法是全球性監察。南方國家需要加入諸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聯合國等的全球性組織，遵循它們的規則並成為全球社區中一個負責的公民。

亞洲主義和反全球主義。在東亞，上述那套全球主義受到嚴重質疑。許多亞洲國家認為全球主義是一種西方產物。為了克服以西方為中心的偏見，需要出一套以亞洲為中心的亞洲主義（Asianization）。雖然這套亞洲主義有不同的變種，它通常包涵下列的特性：

- 由國家主導發展，而非私營化和去規管化：由於亞洲國家是遲來者，它們需要一個強勢政府來積極地干預經濟事務以促進發展。國家應該發展出長遠經濟的政策，提供稅務優惠和低息貸款來提升某些選定行業，並投資興建完善的基礎建設。亞洲國家也應該訂立規則來保護國民經濟以免受跨國公司控制。
- 是亞洲價值觀，不是民主化。亞洲國家認為人權和民主不是普遍價值。這些價值可能適合英美世界，但並不適用於亞洲的環境。因此，許多亞洲國家提倡儒家思想，強調和諧、家長制、誠信，及通過妥協而非對立來解決紛爭。
- 亞洲地區的整合，而非全球性監察。亞洲國家強調它們需要有經濟和社會自主權來對抗全球性監察。為了反擊全球性監察，亞洲各國計劃設立亞洲自由貿易區、亞洲貨幣、亞洲銀行和亞洲監察組織（如東南亞國家聯盟一樣的組織來解決地區紛爭）。

解析亞洲主義的迷思。必須指出，上述那種意圖提出另一套亞洲主義的作法不是沒有問題的。這套亞洲主義將亞洲人的價值觀（如儒家思想）單一化和美化，以展示一種對立於全球主義的民主化的價值觀。這套亞洲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亞洲各國的文化和社會差異，忽略了亞洲國家歷史發展路徑的多元性，和忽略了亞洲各個社會的草根階層的生活習慣的差別。此外，亞洲主義是亞洲國家為它們的精英而特制的，用以証明權威統治和國家壟斷某些行業是正確的。

亞洲地區的整合建議也可視為較強大的亞洲國家用來控制較弱的亞洲對手的一種手段。例如，日本政府提出了一個飛雁模式，指出如果其它亞洲國家跟隨日本的路徑，他們的經濟就可有大發展。這個飛雁模式類同於西方現代化模式中的階段理論，惟一不同的是以日本來取代美國或歐洲作為現代化的領導者。從這方面來看，亞洲主義可視為亞洲國家用以挑戰西方全球主義的一種手段，使到較強大的亞洲國家可以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升級。

作為一個政治計劃，亞洲主義可能足以令東亞在二十一世紀成為全球資本積累的中心。然而，作為一種學術視野，亞洲主義對理解新出現的跨境/跨國和多種規模的全球化過程沒有甚麼作用。

四、結論：趨向跨學科的全球研究

本文指出社會科學各學科產生自十九世紀的革命年代，它們對我們理解諸如國家、經濟和社會等新出現的結構極有貢獻。同樣地，區域（亞洲）研究是二十世紀後五十年冷戰時期的一種歷史產物，它們增強了我們對中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理解。

然而，本文認為社會科學和區域（亞洲）研究兩者都有局限。由於它們都是從英美的觀點來檢視世界，所以都傾向以西方為中心；分割化使社會科學各學科有很強的疆界意識，並阻礙它們與其它學科溝通；而社會科學和區域（亞洲）研究是相互隔離的。

在二十世紀末，全球化（globalization）過程挑戰了區域（亞洲）研究，質疑應否以國家作為分析的基本單元。全球化也挑戰了社會科學，因為分割化阻礙了社會科學對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力量那些複雜的交互作用的理解。

與全球化過程並行的是全球主義（globalism）政治計劃，它提倡私營化、市場化，去規管化、民主化和全球性監察。而亞洲國家的回應是提出亞洲主義，強調國家主導發展、亞洲價值觀和亞洲地區整合。然而，本文認為亞洲主義（Asianization）不是沒問題的，並且，作為一個學術論題，它不能幫助我們理解全球化所帶出的新問題。

隨著的問題就是：是否需要超越那一些現存學術疆界和亞洲主義計劃？在本文完結之前，似乎有必要扼要地介紹一個名為“跨學科全球研究”（Transdisciplinary Global Studies）的新視野。這種視野有下列的特性：

- 以跨境/跨國（Transborder/Transnational）為專注點。研究專注點在於全球化紀元中新近出現的跨境/跨國活動、過程和結構。這個專注點有助於超越現存的亞洲研究的疆界（如中國問題專家，日本問題專家，朝鮮問題專家等等）。
- 多種規模的分析（Multi-Scalar Analysis）。這視野將會以不同的規模（本土、地區、國家和全球）來檢視跨境/跨國活動和結構，這些不同規模如何連接在一起，以及它們如何與其它跨境/跨國現象互動。
- 時期較長（Long Time Span）。要追蹤跨境/跨國現象，必須要以時期較長的視野來檢視，研究者才可以理解它們如何歷史性地出現、轉變、和互換。
- 跨學科（Transdisciplinary）。由於跨境/跨國現象非常複雜，涉及多重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力量，所以需要以超過一個的社會科學學科來檢視。

研究者可能需要是跨學科的，以便研究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力量的恒常互動和形相變化。

如果十九世紀的革命年代導引出一樣稱為社會科學的東西來超越舊有的神學、哲學法律和醫學的局限，則二十世紀的全球化年代可能需要以一種新的跨學科全球研究來超越舊有的社會科學和區域（亞洲）研究的局限。由於全球化過程僅僅是最近的事，因此可能要一段長時間來發揮它的潛力。因此，如果社會科學和區域（亞洲）研究花了數十年來制度化（例如頒受學位，成立專業學會，出版專業期刊，和獲得圖書館分類），則我們可能需要等到二十一世紀晚期，才可看到全球化的新學科在大學內出現和整固。

「亞太研究」觸動的回憶*

張存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中研院有亞太研究計畫了。儘管這不過是東南亞與東北亞兩個區域研究計畫合併而改成的名稱，再有若干時間方可能成為一正式研究單位，「亞太研究」四個字仍使我回想起十幾年前院士會議討論議決關於成立亞太研究所議案的一段往事。¹

很早便認知到國內教學與研究都注重歐美而不管中國四周的地區，到美國、歐洲走了一趟後發現，那裡有東亞、東南亞、南亞、中東、蘇聯集團（Soviet Bloc，蒙古、北韓在內）等研究單位，於是常常與同仁友好談論亞太研究的事，得到不少同調回應，更難得的是陳奇祿、高去尋、李亦園、許倬雲四位院士答應將此事作成一個議案列入院士會議議程。《中央日報》報導了這一議案，語調非常令人高興。

會議決議是：先由院中有興趣之同仁研究，俟有成就，再謀發展。楊聯陞院士對我說：「你要先到大學中去開此種課程，培養學生。有了人再謀設所。」對楊先生的話我百分之百的不以為然，心想：「找人才要在全國找，何患無才！一個大院士看事怎麼眼光這麼短！」是多麼義正辭嚴！

* 原文刊登於中央研究院週報第 861 期，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¹ 張存武教授大文中提到的院士會議決議可見於七十五年七月廿九日本院第十七次院士會議紀錄：

提案：亞洲太平洋地區之國際地位及其對我國之利害關係，日趨重要。各國對此地區均正加意研究，為利學術研究發展，並顧及國家貿易經濟等利益，我國應急起直追。茲請本院設立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簡稱亞太研究所，英文稱作 Institute of Asian-Pacific Studies，簡稱 IAPS。

提案人：陳奇祿 許倬雲 張光直 蔣復璁 李亦園

決議：先由各研究所之有關研究人員會同組成小組，就專題研究計畫，用學術研討會方式進行。俟有成效，再逐漸求其發展。

其後我幫台大教授陳捷先將一位留韓新科博士聘到成功大學，在南台灣佔一立根之地，陳教授並在成大出版了「東北亞譯叢」，而我在台北聯絡同好成立了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雖然學會近二十年中出版《韓國學報》年刊，出版著作叢書、翻譯叢書各數冊，開國際學術研討會，但距區域研究的應有建樹相差甚為遙遠。還是楊聯陞先生的話正確，有人才方有學術。不過除極少數獨鍾興趣者之外，人才的培育匯聚逃不出市場機制。

現在包括華人在內的東亞經濟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而十加三的 ASEAN 區域合作組織行動較以前積極，台灣當局無論如何算是注意到了，所以未來的研究應該無太多困難。不過本院的高層管制不可太緊，太緊則第一線戰鬥人員發揮空間小，興趣或減低，而應聘人員除必須能掌握所研究地區之語文外，時空知識，即歷史、地理也是必備條件。用這些要求影響大學研究所之教學。

現在自以為充分瞭解「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意義了，就是不在其位沒有執行推動的力量，故不要謀其政。但以上的話恐怕又出格了。

「呂宋島北岸考古調查、發掘資料 的整理和分析計畫」計畫簡介

臧振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台灣與其鄰近地區古代文化的關係，是研究華南、東南亞與太平洋等地考古學和文化史的學者所長期關切的問題。這個問題固然關係到台灣本地史前文化和原住民族來源地的探索；但更重要的是，它在整個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問題的研究上，具有極為關鍵性的意義。不過，過去數十年來的台灣考古學研究，大都是偏重在台灣與大陸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一帶古代文化之間的可能連繫，而對於其南邊和東邊鄰近地區古代文化之間的關係，則少有較深入的探究。

其實，以往的研究顯示，台灣史前文化中的若干問題，也有必要從中國大陸之外的其他鄰近地區來加以理解。例如，早在 1943 年，日本考古家鹿野忠雄便已推測台灣的史前文化中有「原東山」、「巨石」和「菲律賓鐵器」等三個文化層可能是源於或傳自於鄰近的東南亞地區。但是此後五十多年，對於這個假說，雖間有學者論及，但是由於缺乏足夠的東南亞考古資料來加以比較研究，始終未見具體的驗證。

因此，雖然經過了半個多世紀，我們目前還是不十分清楚台灣的鐵器時代文化是否源自菲律賓？東部的巨石文化與東南亞大陸和海島所發現的史前巨石遺物究竟有無關連？而出現於台灣若干史前遺址的一些青銅遺物又是從那裡來的？其他像台灣在東南亞和太平洋南島語族和文化來源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更是時下學者們甚為關心，而急待釐清的問題。

在東南亞地區中，與台灣一海之隔的菲律賓，是學者們所認為與台灣在史前文化關係上最可能有關連的地區之一。早年的學者如鹿野忠雄即已擬定台灣的鐵

器時代文化是來自菲律賓。時至今日，許多研究南島語族或南島語言的學者，像 Peter Bellwood，Robert Blust，Babara Thiel 等學者，也都推論菲律賓是南島語族或文化從台灣向太平洋移動和擴散的主要路途，因而兩地間史前文化的關係甚為密切。

不過，所有這些推論，事實上都還有待從兩地的考古資料中作更詳細的驗證。我們需要確實了解兩地在考古資料中所呈現的文化內涵，包括年代、器物風格特徵、生活方式和適應形態等方面，到底可不可以找到一些具體的關連？因此，從 1996 年開始，筆者在本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之支持下，與菲律賓國立博物館考古組副研究員 Rey A. Santiago 先生合作進行「菲律賓呂宋島北岸考古調查計畫」。¹ 本計畫擬以菲律賓作為研究台灣與東南亞古代文化關係的第一個目標。而以與台灣最接近的呂宋島北海岸的 Cagayan 河谷的下游一帶作為田野工作的出發點。

有關 Cagayan 河谷的考古工作是始自 1970 年代初。曾有菲律賓當地和美國籍之學者在此進行了一些考古工作，發現或發掘了從舊石器以至金屬器時代的少數遺址。到了 1986 年，日本上智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開始與菲律賓國立博物館合作進行「La-Ilo 考古計畫」，由小川英文、青柳洋治、田中和彥和 Melchor L. Aguilera 等在 Cagayan 河谷下游 Aprri, Camalaniugan 和 La-Ilo 一帶進行長期地考古調查和發掘，已建立該地區的考古文化年代。雖然如此，該地區的考古文化年代學，在筆者展開「菲律賓呂宋島北岸考古調查計畫」之時，仍然是相當混亂，還缺乏一個較為清楚的面貌；而有關史前文化的類緣、變遷和生活方式等課題，更是有待研究。

因此本計畫在呂宋島北岸的考古工作，便需要從建立文化年代學的基礎做起。只有在一個堅強的史前文化的時間和空間架構上，才有可能就其他課題作進一步的探討。這無疑是一個亟需要有耐心和毅力的長期考古田野工作。而我們從數年來在呂宋島北岸之調查和研究經驗得知，該地區最早陶器文化之出現年代和其文化內涵，對於我們所要探討的菲律賓和台灣在史前時代的文化關係，以及南島語族的起源和擴散問題實具有關鍵性的意義。所以這幾年的考古田野工作，便是集中在這一問題之攻堅上。

本計畫所設的理論架構是：人類文化是持續變遷的，但是在文化系統穩定的狀態之下，其變遷基本上是緩慢而平緩的，只有在文化系統失衡的情況之下，會呈現較為明顯的變遷，甚而產生斷裂。而造成文化系統失衡的因素，則可以有各

¹ 參加此一計畫工作者除主持人臧振華，協同主持人 Rey A. Santiago 之外，還先後有研究助理張光仁（1995-96）、劉克紘（1996-97）和洪曉純（1997-2002），以及菲律賓博物館之技術人員 Jose Santiago, Sheldon Clyde B. Jago-On, Adam V. Soriano, Jimmy B. Fabela, 和 Augusto Borlasa 等。

種不同的可能性，包含內在的、外在的，社會經濟的、或自然生態的；而受外來文化影響，或外來人群的侵入，自然也是其中的可能性之一。因此，對於古代文化變遷的研究，必須從長程的考古記錄中，找尋其中異常或斷裂之處。而對異常或斷裂的解釋，就必須對其物質遺存作仔細地分析和研究，找出可作為解釋的證據。

在這個理論架構的思維下，本計畫所擬定的工作方法，首先就是要透過密集而廣泛的考古調查，建立堅實的文化年代學和類型學的基礎。因為只有在對菲律賓呂宋島當地史前文化的發展序列和過程有清楚的認識之後，才能從其發展序列中，找尋中間的變異，看看某種文化是本地持續發展的？還是外來的。如果是本地發展的，在其發展過程中，有否受到外地的影響？受到誰的影響？如果是外來的，又是從那裡來的？是文化的傳佈？還是人群的移動？而這些後續的研究，就必須要慎選考古遺址，透過仔細而有系統的發掘，從地層堆積中，找尋各種可用的資料和證據，來加以分析研究。

所以，我們的考古工作必須從調查遺址，以及建立遺址的分佈模式和年代學的架構等基本資料開始，才能循序漸進，達到研究之目標。研究的策略是：先選擇抽樣地區作全面性的考古調查，以期發現各個時代和各種類型的古代文化遺址；然後再從其中，選擇具有代表性和關鍵性的遺址進行問題取向和系統性的考古發掘。

迄今，我們這個研究計畫在菲律賓所已經進行的工作和主要成果包含：

1996 年 Cagayan 河谷下游地區的考古調查。

1997 年 Abulug 河谷下游和呂宋島北海岸考古調查。

這兩年度之考古調查，共發現了將近 100 處考古遺址，依據所採集的資料，包括碳十四測定年代和器物，我們得以將這一地區從七千年以至一千年前間之古代文化區份分出四個主要文化階段。

1998 年 Cagayan 河谷下游 Muguel Supnet 和 Leodivico Capina 兩處遺址的發掘。

這兩處遺址的發掘，目的是要從考古發掘中，獲得出土自地層中的年代學和文化內涵資料，以驗證上述考古調查所作文化年代學的劃分，並瞭解各階段文化的內涵。結果是證實該地有兩層史前文化，較早的先陶文化的年代大約是在六千多年前，而新石器時代具有陶器的文化大約從五千年前開始，但是由於測定年代標本的問題，我們對於後者的年代還有所保留。

2000 年 Cagayan 河谷下游 Nagsabaran 遺址第一次發掘。

這個遺址的發掘主要目的是要驗證該地區陶器文化的發展脈絡和其內涵。發掘的結果，進一步澄清了陶器文化在該地發展的年代和脈絡，但是也產生了新的問題。這個問題即是「帶紅色色衣陶器 (red slip pottery)」的來源和年代問題。這種陶器在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問題的探討上被認為極具重要性和象徵性。而由於這種陶器主要是出土自 Nagsabaran 遺址的最下層，其確切年代和含意如何，亟需要進一步探討。

2001 年 Cagayan 河谷下游 Nagsabaran 遺址第二次發掘。

基於去年在 Nagsabaran 遺址發掘中所產生的重要問題，本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驗證「帶紅色色衣陶器」在該遺址中的空間和地層分佈狀況，並獲得進一步之年代學資料。結果是獲得了非常好的資料，目前分別在進行分析當中。此外，由於出土更多的資料，菲律賓早期陶器文化與台灣東海岸史前文化之間之可能關係，從「帶紅色色衣陶器」的資料中，開始透露出若干值得注意的線索，這是極為關鍵性的發現，關係到整個南島語族的源流問題。

以上這些考古工作所獲得的資訊，愈來愈呈現出在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問題研究上的重要性，並且在世界上已經受到一些重要學者的重視和關心。例如以研究南島語族和東南亞考古聞名的 Peter Bellwood, Wilhelm Solheim, Charles Higham 和 Richard Shutler 等重要學者都極為關心我們這個計畫的發現和成果，以及其對此一問題探討的影響。

所以，這個計畫進行到此一階段，無疑不能就此打住，必須要繼續進行。預期其累積的資料和研究結果，除了可能為呂宋島的考古增添大量前所未有的資料外，也必有助於對台灣與菲律賓史前文化的關係的了解；此外，對整個太平洋地區古代文化和南島語族源流，以及歷史文化和族群發展的了解，也可提供重要而且必需的背景資料。

因此，為了將迄今所發現的重要資料和研究成果能儘早和完整地向學界公佈，本計畫 91 年度之工作重點，是要將近幾年之工作成果作階段性地彙整、分析和補充，並出版出來。

「越南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過程 的考古學調查」計畫簡介

陳維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越南北部地區，在地理分布位置上，緊鄰南中國的雲南與廣西。在這個佔地面積廣大的地區內，史前時期的不同發展階段中，各自呈現不同的文化面貌。考古資料顯示各文化間的互動頻繁，各文化的發展過程也極其複雜。雖然，越南考古學的研究發展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史前文化的發展脈絡，經過長期資料的累積與研究，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但是從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架構來看，在時間斷代的準確性，與空間分布的規律上，並不能提供相對有效的資料來證實。也就是說同一時期文化橫向的互動關係，以及不同時期縱向的文化傳承關係等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有鑑於越南北部地區考古學資料在時間延續與空間分佈所呈現的複雜性，其間的相關研究課題很多，因為時間，以及個人學養、訓練都有限，並無法全部掌握。因此，只能先從個別的區域性考古學文化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以逐年、分區、斷代的方式，進行研究。期能瞭解這個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發展的過程。所以說，基本上這是個人一個較為長期的研究規劃。本人已經先後主持完成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分支計畫「亞洲東南沿海地區考古調查」(1999年7月到2000年12月)，以及「越南北部沿海地區考古調查」(2001年1月到12月)。這兩個計畫先後對清化省 Da But 文化的 Lang Cong 遺址、以及廣寧省 Ha Long 文化的 Ba Vung 遺址，進行田野發掘。分別瞭解各自的文化內涵，探討這兩個地區的文化傳承關係，和文化互動關係，以及各自文化所表現的聚落分佈型態、生業適應方式等。所得的考古資料極為豐富，對 Da But 文化和 Ha Long 文化等屬於「後和平文化」(post-Hoabinhian) 的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過程，得到較為深入的瞭解。

本年度個人所提的「越南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過程的考古學調查（第一年）」是一個兩年期的研究計畫，主要延續上述的研究工作，繼續針對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作深入的探討，除了沿海地區外，也將視情況進行較不為外人所瞭解的越南北部山區的考古學調查。

由於語言的隔閡，政治疆界的限制，以及戰亂的破壞等因素，越南考古學的資料很少為外人所瞭解。而廣為流傳有關越南考古資料的西方文獻所記載的，又多數不詳盡，與事實頗有出入。因此，本研究計畫的提出，希望能藉由與越南國家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心考古學研究所的跨國合作研究，實際進行整合性的泛地區考古學田野工作。在這個基礎上，重新檢視越南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過程，探討各個文化的生業適應與聚落型態，瞭解在時空架構下，各個文化的相互關係，進而瞭解這個地區內文化發展或文化變遷的原動力。

「『大東亞共榮圈』前後：日治時期 台灣人在東亞地區的投資型移民」計畫簡介

林滿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相對於大陸來臺移民由清朝時期包括有勢力的投資型移民轉為日領時期之以勞動者移民為主，日治時期台灣的對外移民頗多係屬投資型移民。但相對於日治時期對當時大陸來臺移民已完成的較完整研究，有關此時期台灣對外投資型移民的整體性特質仍待更細密探討。計畫申請人近十年來一直從事日治時期台商島外經貿活動的研究。島外的範圍包括華南、滿洲國、東南亞、日本、香港等地，經貿活動包括貿易、投資與移民三方面。以往的研究，較側重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以前的發展。此計畫希望進一步瞭解，在日本政府於 1940 年 7 月提出「大東亞共榮圈」口號前後，台灣人在東亞地區的投資型移民可曾發生結構性的變化？探討此一課題，大抵分以下項目進行：一．移出時間，二．移出者在台灣所屬縣市，三．移出者性別，四．移入地區，五．行業內容，六．營業規模，七．城鄉分布，八．政府政策。在以往的研究基礎上，此計畫希望利用新近可參用的四大資料群及另外在台灣及日本蒐集到的資料深入探討以上課題。

四大資料群為：1. 現藏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九卷第四門外事（通商及海外渡航）；2. 日本外交史料館新近開放的護照檔案；3. 1945 年台灣各銀行所存留檔案或文獻；4. 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新近借中央研究院收藏該館原窖藏的日治時期文獻。另外在台灣及日本蒐集到的資料包括在國史館所收集的外交部相關檔案及 2000 年 8 月 31 日至 2001 年 3 月 31 日期間前往日本蒐集較完整的外務省調查部之《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人口表》。另外，在神戶發現戰前工商方面報紙剪報資料，在東京發現其公文書館有重要檔案的網路檔，日本各商工會議所有相關檔案，也有待徵集。

本計畫實際執行預算期間，至今已有十個月，除在台灣及日本已蒐集到的前述資料之外，也已完成四大資料群中第3及第4項資料的蒐集工作。這些資料的蒐集過程，有似海底撈針，需在大量資料群中爬梳相關史料，頗多資料因紙質脆弱，不能影印，只能手抄，較為費時。又因全係日文資料，改以中文建檔，還需一段時間。整個課題，牽涉台灣史、中國史、日本史乃至世界史的更深遠背景，又需將研究心得以不同文字發表在各方面，以求以更深廣的背景來解讀這些資料。故論文撰寫尚須時日。但資料初步閱讀後，大抵可獲致以下心得：

1. 日本政府1940年7月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之後，台灣作為「大東亞共榮圈」中心，日本南進據點的地位更加確立。日本政府一方面更加鼓勵台灣人的對外投資，一方面對這些台灣人的忠誠度與品質也有了更多的要求。
2. 在整個大東亞地區之中，在「大東亞共榮圈」口號提出之前，台灣人的對外投資原以華南及東南亞較為重要。在東南亞各國之中，因為日本與美國、英國與荷蘭的交惡，在「大東亞共榮圈」口號提出之後，原來台灣人投資最多的荷屬印尼投資轉少，台人原本投資較少的英屬新加坡、婆羅洲及美屬菲律賓，更為減少。與日本方改善外交關係的法屬越南，台人投資增加。台人在東南亞投資僅次於印尼的泰國，在「大東亞共榮圈」口號提出之後，因日泰關係良好，台人前往投資者更多。但「大東亞共榮圈」口號提出之後，台人對外投資最顯著增加者仍為華南。日本內地、滿州國、華中華北的日本佔領區，台人投資，固然有所增加，但隨著日本的相繼佔領廈門、汕頭、廣州，台人在華南的投資地位更加舉足輕重。其所從事的大規模現代企業，如現代銀行，自來水事業等等，也更為增加。
3. 日本政府對台商的背後操控也更為深刻。這段期間台灣人的對外投資基本上仍為自發性行為。此時台灣兵的對外移動係日本軍方以軍船對外載運。台灣人的對外投資則是自己購買船票前往。往日本內地者固然與之前一樣仍無須辦理任何手續，往中華民國的日本佔領區或滿州國，則由之前的護照轉為申請渡航證明書，往東南亞各國與之前一樣須辦理護照，在申請這些文件時，要出外台灣人所住地的街庄長、警政課、派出所、州郡及總督府外事課都要進行更多的盤查，也要擔當更多的保證。台商對外投資的外匯往來，更加由傳統的華商錢莊轉由日本正金銀行或台灣銀行來經手。特別在廈門地區原本活躍的台商金融資本，除更由日本政府動員來從事當地建設以安定民心之外，也承受台灣銀行大量資金，購買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以擾亂其幣值。深刻影響戰後台灣族群關係及國家認同的大東亞戰爭期間台灣人與中華民國政府交戰情勢於此歷歷可見。

4. 有如台灣歷史上多次的對外經濟擴張，除了經濟方面的尖端領袖積極參與這個擴張之外，經濟方面的邊陲人物，如鄉間的村農或是婦女，也可看到加入這樣一個行列。此時參與對外投資的台灣人來自台灣各個城鄉。台灣人對外投資的行業除了致力日本政府鼓勵的公共建設之外，經銷日本腳踏車、五金、西藥、棉布等等東洋貨的商家更多由小規模的商家轉為公司，其中除有若干係由老闆娘主持之外，所雇用的女性店員也顯著增加。戰爭期間，原本在大正時期及昭和初期台灣勃興的話劇團及歌舞團，因島內精神動員，導致大量女性演藝人員外移，也是一個特殊現象。

以上初步研究心得將以已搜資料及之後兩年擬再增添的資料，逐步撰寫成學術論文發表。這些論文將與前此發表相關論文，中文 10 篇，英文 6 篇，日文 5 篇逐步整合成《經貿與台商（1860-1961）- 十九、二十世紀的東亞與東南亞世界》一書的不同語文版本，除希望對台灣資本主義史的長程發展多一些瞭解之外，也希望對十九、二十世紀的亞洲內部及亞洲與世界關係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近世環中國海域的海難救助制度研究 以中國、日本、朝鮮、琉球為中心」計畫簡介

劉序楓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計畫概要

本計畫為一多年計畫，主要探討目前現存記錄較多的十六、七世紀以後，環中國海地域諸國，特別是東北亞的中國、日本、朝鮮、琉球間相互救助海難難民的實際情況及難民遣返制度的形成問題，試究明在當時中國朝貢體制下，對非朝貢行為之海難事件處理方式，及各國間送還難民體制的形成背景，期能重建近世東亞海域間國際體制運作之實態。

在過去數年中，本人主要針對清朝中國對漂到外國船的救助及遣返制度的形成等問題加以探討。一般來說，清朝對遭風漂到的外國船處置相當寬大，在朝貢體制下，以中華帝國的皇帝自居，宣揚其德澤；對外國難民不論朝貢或非朝貢國均一視同仁（即使是對非朝貢國之日本等國，清朝仍是以懷柔遠人之天朝思想處理），善加撫卹，並透過朝貢貿易體系送還本國。而介於中國與日本間的朝鮮、琉球，亦透過朝貢使節經由中國相互遣返彼此之海難難民。

本年度之研究重點則以日本、朝鮮、琉球之立場來探討諸國對漂到之中國船之處理態度及送還方式，並比較其異同和當時諸國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

清朝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放海禁後，隨著各省人民出海之增加，且為宣示海外諸國，發佈旨諭，令禮部移咨海外國王，對漂到之中國船隻收養解送，

同時對該國解還之官員賞賜。但日本因實施「鎖國」政策，在中國朝貢體系外，僅透過中國民間貿易船的長崎貿易，雙方維持著通商關係，而雙方難民之遣返亦透過中國貿易船為之。與中國不同者，日本對漂到外國難民之處理方式相當嚴格，必嚴加警戒並加以隔離，禁止與一般人民接觸，如無特別問題，對與日本有外交關係之朝鮮及琉球難民，則透過對馬及薩摩二藩遣返；對中國、東南亞、西洋船，則藉由中國及荷蘭貿易船送還本國，但其處理方式因時因地而有不同，對非邦交國之清朝貿易船，部分救助經費亦需由該船負擔；另清朝的朝貢國，但事實上在日本薩摩藩控制下的琉球，和與日本有邦交往來的朝鮮，又是以何種態度對待漂到的中國船及其他外國難民，並以何種方式將其遣返本國的？而送還中國難民時除人道主義外，是否亦利用此機會達到某種政治或經濟目的？清朝與日本間又如何藉相互遣返難民，產生「官方」接觸，試圖改善彼此關係？以東亞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觀點來說，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研究目標及重點

海難事件因牽涉範圍廣泛，如違禁走私或外交交涉等，故往往留有較詳細的調查記錄，對船隻大小、船員姓名、人數、船貨、航路、遭難經緯、地點、救助、撫卹過程及漂流地的見聞等均有詳細記載，可彌補正史記載之不足，對環中國海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交流、航運、氣象及各國風俗習慣等相關之研究大有助益。

而對外國難民之處置與遣返，往往牽涉到外交問題。在一般情況下，與漂到國有邦交或貿易關係，或漂到國政府公權力能到達之地，才能確保難民安全返國，時至今日亦同。諸國對難民之救助及利用東亞既有國際體制相互遣返，亦顯示出當時除以中國為中心之朝貢體制外，尚有一種成形及穩定的國際體制。考證此國際體制形成之背景，當有助於促進東亞諸民族、地域間之相互理解。

如前所述，海難史研究牽涉範圍廣泛，很難一一兼顧，在研究主題方面，以往研究偏重政治外交觀點之遣返制度，和經濟觀點之撫卹費用面等。此外，對漂到地之社會風俗見聞研究亦不少。但對漂到地語言、文化交流和疾病傳染、醫療，以及科學技術史方面如船舶構造、航運、洋流、氣象等研究尚少見。另外或許是現存史料較少之故，對中國船漂到朝鮮和琉球，琉球船漂到日本後的處置及遣返問題亦少見研究，以上均是有待探討的課題。

目前有關東亞諸國間海難事件研究，主要以日本學者之研究為主，但日本學者研究範圍仍以本國（包括琉球）為中心；而國內有關清代中國與東亞之日本、

朝鮮、琉球間交流關係、海難、貿易史之研究極少，且以往研究之缺點則為偏重部分地區或個別事件，少見綜合研究。因此，本計畫擬以既有成果為基礎，再配合中、日、韓、琉各地新史料，更深入探討環中國海諸國相互間對外國海難難民救助制度的形成及演變問題，並製作海難年表及史料目錄以利檢索。

本計畫研究年代下限大約止於十九世紀中之 1860 年左右，主要是因為鴉片戰爭後，西洋諸國船自由往來中國各開埠口岸，加上其後日本安政開港，朝鮮、琉球亦處於相同情況，傳統東亞國際秩序已逐漸崩潰瓦解，各國對漂到難民之處置及送還方式均有變化。有關此一時期之海難交涉問題留待後日再繼續探討。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擬以環中國海地域之視點，先分析各國對海難難民救助制度之形成和其具體內容，再綜合比較諸國間之差異，及遣返體制之形成。而此難民遣返制度又與當時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息息相關。另脫離中國朝貢體制之日本，亦以自身「華夷意識」，設定獨自「華夷秩序」，與中國、朝鮮、琉球、荷蘭等國往來，海難難民之救助及遣返制度亦在此體制下施行。因此，單以中國或日本一國為中心之觀點，實無法概括整個東亞的國際關係。

研究方法主要採最基本之文獻史學分析方法，在既有成果下，蒐集各國海難史料，加以分析，先由小處個案研究，詳究其遭難、救助、遣返之經過，再擴大至探索此處理模之形成過程，最後再比較各國對海難漂到難民處置方式異同，及其成立之背景。可能的話，並配合田野調查，實地考察各國重要港市及海洋關係博物館、和海難經常發生之地，以理解海難發生之自然及地理因素和某些人為因素。如清代有許多漂到九州南岸之中國船，主要是為與當地居民進行走私貿易，如被官方發現，就假借遭風漂流之名。此即為因政治、經濟等人為因素而產生的「海難」，也就是所謂的「偽裝漂流」。有關此問題因留存史料不多，是未來值得探討的問題之一。

四、預期成果

海難史研究工作在台灣及中國大陸可說尚在起步階段，有待努力之處不少。本研究計畫經數年之進行，目前已有初步成果。去年度本研究計畫「近世環中國海域的海難救助制度研究」之第一年，主要針對清朝對日本、朝鮮、琉球等漂到

之外國海難難民的救助和遣返制度問題做探討，完成了「清代中國對外國海難難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以朝鮮、琉球、日本難民的事例為中心」一文，及其他中日兩國間互相救助難民制度的形成等文。本年度則計畫以朝鮮、琉球諸國對漂到之中國難船的處理方式加以探討，依其篇幅或分為琉球、朝鮮等地域分別探討，最後再綜合比較。

另擬繼續收集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台北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內閣大庫、近代史研究所之總理衙門檔案編纂《清代檔案中與外國有關之海難史料目錄》；若可能的話，另再編纂《中國大陸、台灣、日本、琉球、韓國現存海難關係史料目錄》，並按地區間及國別編輯製作「近世環中國海域海難事件年表」等基礎研究資料，以利後人參考研究。當然，在短短二年內，以一己之力，欲完成上述目錄、年表等之編纂可能有其困難，本計畫為一長期研究，未來預定將研究時代上溯至宋元明代，並將地區擴及東南亞諸國，期能重建近世東亞海域海上交流活動之實態。相信此一研究計畫之完成，可彌補以往研究之空白，對東亞諸國間相互之理解，當有一定之貢獻。

Forging a Colonial Bureaucracy: Examining Japan's Colonial Legacy in Taiwan

蔡慧玉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1)

I propose to examin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in Japan's empire-building. Essentially I argue that the key to the mechanism of Japanes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lay not in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the bureaucracy but in the extra-bureaucratic set-up.

The administration of colonial Taiwan paralleled much of modern Japan—with major and minor revisions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from time to time. Taiwan was a laboratory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so to speak. Much, however, remains to be explored as to how the bureaucrats who ran the colony of Taiwan were recruited from Japan and circulated within the empire. It has become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 bureaucrats who were recruited into Taiwan followed an established order of official ranking, which determined salary-rank as well as the package of career benefits and outlook.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much of the experimentation was taken to Korea after 1910; that after 1932 it found its way into Manchukuo; and that it then drifted even further in the “Co-Prosperity Sphere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or “the South”) during the Pacific War. In practice, however, this argument is easy to make but difficult to prove. Thus, I turn to an alternative hypothesis that it was the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that tapped into the same bureaucratic sources as the rest of Japanese empire.

As a result of the war, Taiwan'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titution of postwar society was drastically reshuffled.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created by the Japanese in the early years of colonial rule not only functioned to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rule, but has survived with slight modification in today's Taiwan. I, however, argue that whil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ucceeded in taking over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Taiwan Sotokufu*) from the Japanese, much of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was lost in the transition. By focusing on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of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from *baojia* to *linli* (the postwar successor of *baojia*), I underscore the continuity with—rather than the changes from—the colonial legacy.

(2)

Japanese rule in Taiwan was characterized by a large police role in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While this is widely acknowledged, it leaves out one crucial aspect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the role of the bureaucracy. The number of the bureaucrats in colonial Taiwan at any time during the fifty years of Japanese rule was small. How did the Japanese make their administration work? Essentially, I posit that the extra-bureaucracy in colonial Taiwan allowed *Taiwan Sotokufu* to respond promptly to Japan's wartime demands with minimum bureaucratic red tape. This was an advantage exclusive to Japan's colonies (mainly, Korea and Taiwan). It helps explain, at least partially, why wartime mobilization was carried out earlier and more effectively in Japan's colonies than in Japan proper.

After all, Japanese interregnums in Asia were also an integral part of long-term change and development. While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otal war were critical in term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lso evolved out of the past, and thus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ity. Their apparent paradox invites further examin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legacy in Taiwan, specifically on the issues of modernity. Moreover, as has been observed, Japan's empire-building served as colonial legacy to nation-building in many parts of postwar Asia. On the one hand, the Japanese colonial legacy shaped the politics, memory and history of postwar Asia. On the other, Japan's total war brought about rapid but durable structural change in Asia, which was revolutionary in nature.

On the whole, I hope to demonstrate that bureaucratic exchange and policy movements not only flowed from the core to the margins—they were sometimes reciprocal. In terms of bureaucratic rule, I aim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ertain policies in colonial Taiwan, such as the police system and

the bureaucracy, indeed helped shape policy formation in Japanese imperial empire.

(3)

In an attempt to define the role of the bureaucracy in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I essentially adopt a legal perspective and rely heavily on legal sources. My major source material includes various compilations of laws, ordinances, and archives concerning imperial Japan (Taiwan in particular), in addition to newsletters and rosters of various levels of local government. My preliminary study so far has proved remarkably rewarding, endorsing the general observation that the Japanese ran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for half a century with remarkable stability and efficiency. My research, however, also points to the need to go outside of the bureaucracy. That is, the Japanese innovation lay in the extra-bureaucratic set-up, an issue to be further pursued in this research.

In my another work on “mapping neighborhood” and “the legal basis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I have contended that the mechanical implication of state control in the metaphor of a war machine needs qualification. The modern Japanese state tapped into the communal idea of an extended family system, as exemplified in the wartime slogan, “universal harmony” (*hakko ichiu*), in which the idea of “neighborly mutual aid” (*rinpo sojo*) was framed along a hierarchical order of household, neighborhood, society, nation, and empire. However, local people, whether in Japan proper or its colonies, responded to the Japanese state's war mobilization because they saw their home, their neighborhood, and their lives at stake—and this invites a new look at the role of local identity in war mobilization.

Policy movements, moreover, did not only flow from the colonizer to the colonized—they were somewhat reciprocal. That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t least a few policies in colonial Taiwan indeed helped shape policy-decisions in Japan proper. Andre Schmid's critique of Carol Gluck's notion of “Japan without empire” suggests more interaction between Japan and its colonies than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¹ There were over 300,000 Japanese on the island in August 1945. This number was roughly one-twentieth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Taiwan at that time,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holding key positions in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Much remains to be explored as to how the bureaucrats who ran the colony of Taiwan were recruited from Japan and circulated within the empire. What has

¹ Andre Schmid, “Colonialism and the ‘Korea Problem’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Japan: A Review Articl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9.4 (November 2000), pp. 953-956.

become known is that the bureaucrats who were recruited into Taiwan followed an established order of official ranking, which determined salary-rank as well as the package of career benefits and outlook. And yet,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 Japanese in Taiwan, let alone their postings in the empire. This was the same source of bureaucracy that the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tapped into and run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for half a century—with remarkable stability and efficiency.

It would be helpful to know via what channels were officials recruited or circulated within the Japanese empire, for instance, and how Japanese businesses posted their employees. It remains to be seen to what extent institutions and methods developed in Taiwan shaped policy formation in Japan.

(4)

This study, moreover, examin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rule by the bureaucracy” (*kanji gyosei*) in both Japan proper and colonial Taiwan. While in Japan the bureaucracy constantly had to grapple with the issue of self-rule as reflected in the control of “village communities” (*sonraku kyodotai*), in colonial Taiwan the struggle of the bureaucracy vs. the village community was seldom an issue. Rather, I argue that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was well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rule by the bureaucracy”—Taiwanese-style—which tapped into the instrumental utility of the *hoko* (*baojia* in Chinese) system for social control and mobilization.

I will begin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with specific emphas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the bureaucracy in local administration. As mentioned above, the key to the mechanism of Japanes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lay not in its formal structure but in the extra-bureaucratic set-up. The Japanese bureaucratic system was rigid in structure and its law-making process could be painfully sl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ors-general of Taiwan. A formal structure like this one invited interventio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making little room for local improvisation. Thus, the Government-General of Taiwan almo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Japanese period had worked out an extra-bureaucratic system to help recruit personnel outside the formal bureaucratic structure. Initially, this practice was basically an improvisation devised to attract the Japanese to serve on the island.

The extra-bureaucrats and functionaries thus recruited were responding to the practical calls of the early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nd naturally fell in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technical support,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and the police force. This

extra-bureaucratic system continued to grow and was to be institutionalized after 1920, as witnessed in the system of the so-called “temporary staff” of Taiwan Government-General. Meanwhile, the extra-bureaucracy was extended to local administration, as seen in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so-called “local official-treatment staff,” which became a permanent feature internalized into, and yet remaining outside of, the formal bureaucracy. Equally important, the extra-bureaucracy was later converted to Japan's war efforts with remarkable efficiency.

I will then turn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way the “local” was created. By making a point that “neighborhood” was “created” in colonial Taiwan, I aim to test the idea of the “local” as an invented identity. Essentially, I argue that the Japanese attempted to build a modern system out of a traditional one by “collapsing the temporal with the spatial.” In this way, I argue that the geo-administrative system to create a sub-village unit for administrative purposes wa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f not invention, in modern Japan. The “ward” system is a good example of this process.

Just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aza* (sub-village zones) in Japan was antedated by a “big ward” system prior to the 1889 loc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the ward system in Taiwan too was preceded by a “big ward” system effective from 1909 to 1920. The 1920 local administrative reform witnessed the creation of a “small ward” system.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creation of the ward system in modern Japan was administrative and thus oriented toward state-making, it also provided links of social instrumentality for regional identity and local reformation built along geo-spatial boundaries. As such, I propose that the ward system was less normative in Taiwan than in Japan proper, and that the *hoko* system in Taiwan worked both to regulate and to complement the ward system in a way unique in the Japanese empire. Essentially, I posit that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such as the ward, worked not only because it was a fully integrated state mechanism, but also because the mechanism tapped into local sources which offered a vital means for organization. That is, historical roots, social needs and status, as well as the romanticization of a “natural community,” or what Lin Nan would call “social capital” today. In this way, “local” identities were bridged, and Taiwan identity began to take shape, a problematique to be followed up in this research.

In the end, I argue that the period surrounding the close of the war was “uneventful” in Taiwan. By addressing to the theme of a peaceful transition, I stress the structur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Japanese wartime government on local administration, changes which were largely inherit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fter the war. As John Dower argues, the war was a “profound catalyst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² However,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wartime Taiwan evolved from the long-term organizational build-up of imperial Japan.

(5)

Thus put, Taiwan was secured in a position to complement and also to compete with other sub-imperial spheres, such as Manchukuo and Korea, so far as Japan proper was concerned. To what extent did the annexation of Korea in 1910 influence the pattern of the bureaucratic formation within empire of Japan? Did Taiwan ever function, as Louise Young argued for the case of Manchukuo, as a mobilization machine, forcing Japan to respond to problems in terms of policy making? And, what i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ub-imperial sphere in terms of Taiwan’s postwar legacy? These remain problem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given the high-handed control of colonial Taiwan, how did this affect policy formation in Japan proper? It remains to be seen to what extent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developed in Taiwan shaped policy formation in Japan.

Essentially, my study re-examines the way Japanese colonial rule restructured Taiwan’s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well as contributions to our knowledge of Japanese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By bringing total war back into this study of Japan’s oldest colony, I hope also to highlight the problem of Japan’s colonial modernity in Taiwan.

To the extent that Taiwan serves as a case study of Japan’s colonial empire, I offer some comparisons of Taiwan with Japan proper—along with Java and Korea—in an effort to illuminate the concept of “rule by the bureaucracy” in Japan’s empire-building. It also points to the relevance of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s other colonies and her Southeast Asian empire.

² John W. 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878-195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p. 280.

「民國初年上海的美術與文化 - 以展覽會藝評為中心的研究」計畫簡介

顏娟英* 吳方正** 周芳美***

從上海《申報》中篩檢出來的美術資訊顯示，中日美術的互動在 1920 年代之前十分頻繁，《申報》中談西洋畫時有「西洋畫即日本畫」之語，論及教育時也有「先學日本、再接歐美」之議。1910 年前後開始出現許多第一代的中國西畫家，例如李叔同（弘一法師）便利用日本東京美術學校對中國學生優待錄取的制度，學習西畫技巧，並傳入中國。其次，由於日本在明治後期，岡倉天心等人提倡「興亞脫歐」，積極吸收中國乃至於印度古代文明，爭取領導東亞現代文明的地位，以與歐洲列強競爭，因此也興起收藏中國古代藝術品的風氣。上海一地也曾出現中日繪畫交流展覽團體活動，到日本展覽賣畫的北京與上海畫家漸漸多起來。

然而，日本在關東大地震（1923）之後，右派軍人與財閥勢力興起，吞食中國經濟地盤的野心日起，與中國的政治關係惡化。1920 年代中期起，學習日本不再全然具有正面價值，至 1937 年抗戰爆發，終於達到臨界點。兩國政治局勢的變化對藝術發展的影響在西化的層面上十分錯綜複雜。同時，留學歐洲歸來的藝術家，如徐悲鴻、林風眠等也在 1926 年左右開始發揮影響力，並排擠日本的西畫影響。故而，我們須要考量的有近代中國與日本各自對西畫接受學習的態度、中國對日本式西畫態度的轉變。

本計畫探討的範圍包括傳統書畫、西畫、中西畫的混融和通俗美術(月份牌、廣告畫等)等展覽的藝評。延續過去東北亞計畫累積的《申報》龐大電腦資料成果與藝術文獻。以發表文章的方式對美術展覽進行公開的評論，在法國和日本皆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教授。

***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教授。

早已有之，台灣也早在 1910 年代已開始，1927 年台展開辦以後更進入藝評的全盛期。近年外國學者開始利用現代的藝評來研究畫家與觀者之間的互動，藝術作品在公眾領域中所產生的影響等問題。日本及法國對二十世紀初中國畫壇有重大的影響，中國的評論者在評價的標準上是否也受到影響，將是另一個研究的重點，而日本和法國的情形也可作為一個對照組。

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東北亞國家的主要課題是：如何因應西方列強的叩關，完成啟蒙與現代化。為了達成與西方列強抗衡的目標，西化是無法規避的途徑。我們可以將西化的內容大致分為三個部分：政經體制、科學實業與文化藝術；這三個部分的性質互異，因此吸收方式也有相當大的不同。其中科學實業一向被為具有普遍價值，沒有任何由西方移植東方的適應問題，故而是啟蒙的主要內容，也是西化最早實踐的範圍；政經體制是使科學實業能產生效用的有效手段，因此也屬於不得不西化的範圍，但它也包含了文化傳統差異的因素，因此在這個範圍內西化的底線是現代化的效率、維持社會秩序與國家主體性。至於第三個部分，文化藝術，並不直接回應任何啟蒙與現代化的要求，所以在輸入西方文化藝術時，常依附於前兩個範圍。然而如果西化的觀點在求同時，文化藝術被視為具有文明的普遍價值，亦即藝術和科學實業皆為文明的同性質表現，因此構成輸入理由；當民族主義抬頭，主流觀點意識在尋求相異性時，文化藝術被視為國家主體性的表徵，則外來文化的輸入便會遭到抗拒。簡單說來，這種求同與求異的張力在科學實業的西化中最小，在文化藝術的西化中最強。

近代東北亞的主角是中國與日本兩個主權國家，面對西方列強各自求自保圖強。但自保圖強本身便帶有仿效與競爭的性質，很快衍生為同一陣營內的仿效與競爭。我們只要比較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時間與規模，便必須承認中國在西化的進程中，遠落在日本之後，因此對於中國而言，日本便是一個無可比擬的參考對象。台灣便在此競爭過程中，由中國割讓給日本。仿效日本意味著跳過過繁冗的盲目試驗階段，直接採取已證明有效的方法，基本理由在於相對於西方時中日文化傳統的相似性及相關性。在文化藝術層面，當藝術被視為具有普遍價值時，學習日本意味著學習西化的成果，在日本行得通的，在中國大概也行。另方面，當藝術被視為國家主體性的表徵時，日本在西化中過濾掉的異質性，對中國而言，可能也不值得再去撿回來。清末民初由於上海與日本神戶之間航運便利，流亡者以及遊學的文學、藝術家出國留學大部分選擇日本，故而西方藝文資訊與觀念來常自日本轉手輸入，直接向歐洲學習的現象要到一次歐戰前後才開始明顯。

本計畫的前身「台北、東京、上海三地現代美術發展比較研究」的實際工作成果之一，是將 1872 年至 1948 年的上海《申報》（共 400 冊複刊本）美術相關報導、廣告、文章與圖版摘錄成簡目，已完成文字檔，並經三位主持人校讀過一次，陸續轉成 excel 檔，共有一萬五千條目。此龐大工程不但是研究上海近代（清末至民國初期）美術發展、美術市場的珍貴資料庫，更是研究現代新聞媒體作為

公共意見（輿論）的形塑場域最佳資料。然而，在這批資料出版或上網提供學界利用之前，尚需經過詳細二校乃至於三校過程，才能確認其精準度與詮解度。本年度所提研究計畫便是在此校讀《申報》美術資料庫的過程中，擬定研究探索的新方向，共同閱讀藝評相關文獻，更將原始文獻擴及至《東方雜誌》《良友畫報》《上海漫畫》《中央日報》《藝術界》《阿波羅》《藝風》《藝術旬刊》與《婦女雜誌》等雜誌和其他散落於各種複印重刊的藝評文章。藝評和報導須作區分，而藝評者的身分和學養也須釐清，佐以讀者投書更能探知美術展覽與當時社會文化的關連，以便結合三位共同主持人以往對於台灣、日本乃至於法國現代美術研究的經驗與成果，開闢創新的共同研究領域。

中國現代畫壇的特色，除了大量引進西方藝術並企圖中西藝術的混融外，另一個重要的變化即是各式展覽會的盛行。從 1870 年代起即有傳統書畫家以賑災為名，公開展示書畫求售，其性質早已脫離將作品掛於傳統裝裱店內待價而沽的情況。到了二十世紀初，展覽更成為推廣不同藝術理念和西畫的方法，甚至也是振興女學和激起愛國情操的手段之一。至此，公開展覽的性質可以略分為教育的、商業求售的、互相觀摩與公益性質等琳瑯滿目。公開展覽的另一個重要影響面是展覽者不再預設觀眾，上自高官士人下自販夫走卒，只要有興趣、有閒有錢者即可參與。透過報章雜誌的報導和藝評的引導，觀眾與畫家、畫家與畫家之間的互動更為複雜，而二十世紀初在中國報刊雜誌經常出現的藝評的專業性、可靠性、影響面、與當時社會文化的對照等問題是至今無人探討的一個重要課題。

本計畫的目標希冀利用民國初年出現在已上海地區為主的報章雜誌上有關展覽會的藝評來探討(1)藝評的標準，這中間除了牽涉到藝評者的出身和學養外，還包括評論者受當時何種藝術風潮之影響等評論者本身的因素。(2)大眾參與的結果，比對當時有關展覽會的報導，推知一般大眾的參與度與反應，配合 20 年代後開始漸漸流行的讀者投書(如《申報》1911 年開始出現的副刊《自由談》《藝術界》專欄)，多少可以探知一般大眾的看法。(3)藝評與觀眾間、藝評與畫家間的互動情況。這項工作即是上二項目標的結合，將藝評和觀眾參與度及讀者投書作一平行對照時，我們將能夠重現一較清楚的原貌來檢視藝評作為畫家與大眾之間的橋樑者，它所能達成的效果有多大。

中日兩強之間的西化競賽史是百年來東北亞現代史中重要的議題，台灣與朝鮮夾在兩大勢力間，各自也曾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發展出特有的文化。東北亞地區的學習西方繪畫，或歐洲油畫輸入東北亞地區之過程，實際上是配合著更廣泛的西化政策，換句話說，對於中日兩強而言，繪畫亦附屬於科學與法政，都是西方強盛文明的要素之一，因此也是優先輸入的對象。

更進一步分析，則在中國、日本與西洋三個文化主體中，各自包含了對藝術態度的兩個變項：一藝術具有普遍性，所以為藝術而藝術；二藝術為國家主體性

的表徵，所以藝術為社會而服務。當國家主體性問題變得尖銳或關注重點時，美術與藝術的論述最後將被導向政治正確性。然而我們需要探索的不是這個簡單的結果，而是要知道達到此結果的過程，因為對後代產生影響的不是結果，而是達到這個結果的發展。中國繪畫現代化的過程中，所受到的日本影響遠高過目前研究的認知，原因是當前的政治導引了歷史研究的方向，其次恐怕是當代中國現代繪畫史的研究理論基礎仍然相當的薄弱。

本計畫即將完成之《申報》400冊美術資料索引，已受到關心上海近代美術學者的矚目。但是多達一萬五千條索引目錄中，其實包括了許多久已被遺忘的美術文獻，其中又以展覽會相關文獻最具一手資料的珍貴性。本計畫三位主持人將本著上年度定期共同閱讀、討論的方式，探討中日台美術發展之互動與牽制以及其背後的商業、政治變遷。此類美術文獻資料的新出土，將可以預期新研究成果的出現。

本計畫在研討藝評的過程中，不僅可以探討西方藝術觀念如何被引介、再詮釋，並分析藝評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造成的功用外，將可引導我們探討背後所隱含的文化問題。當我們更進一步觀察民初時期的國難當前和黨派互爭情況時，政治力介入藝術將是另一個課題，而藝評和大眾的參與則成為我們探討這些問題的另項資料庫，不再只是純粹依賴畫家的個人感受來重建當時事件的情境和影響。

已有的成果如下：

（一）編輯資料：《申報》1872-1949年美術相關報導、文章索引二校完成。目前正繼續進行閱讀時事新報，已完成時事新報1911~13、1928~29、學燈1922~27，按時事新報微捲年代為1911~1949，收藏於本院近史所與文哲所。未來擬以《申報》資料為主軸，《時事新報》與《時報》為輔助資料，合併為一資料庫，提供研究需要。此外，圖象方面收集《良友》畫刊與《上海漫畫報》等，作成數位檔。

（二）研究討論：三位主持人每隔一或兩個月聚會一次，就《申報》相關議題，或自己的研究論文發表討論，從本年度三月起邀請近史所王正華博士加入。

（三）發表論文：

顏娟英，〈美術文化空間的比較 - 1927年台北台展與1929年上海國展〉發表於中研院史語所主辦〈物質文化國際討論會〉2001.11，將送交《史語所集刊》審查發表。

顏娟英，〈近代台灣風景觀的建構〉2000.9發表於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吳方正，〈西洋畫的中國再詮釋〉，《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審查中。

吳方正，〈裸的理由 - 從二十世紀初上海美術的角度觀看〉，國科會西洋美術史推動中心主辦，〈身體變化：西方藝術中身體的概念和意象國際研討會〉2002.3.30-31。

周芳美，〈二十世紀中國繪畫中男性裸露形象的改變〉，國科會西洋美術史推動中心主辦，〈身體變化：西方藝術中身體的概念和意象國際研討會〉2002.3.30-31。

「巫者的面貌：以韓國、臺灣與中國之巫者為主的比較研究」計畫簡介

林富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一、計畫緣起

「薩滿」(saman; shaman) 是通古斯 (Tungus) 語，意指一種和中文所說的「巫」相當類似的宗教人物。這種人活躍於中亞、北亞和歐亞草原地帶的部族社會中，因此，早期的人類學家便將這些地區的宗教信仰稱之為「巫俗」或「薩滿文化」(shamanism)。其後，有一些學者逐漸認為，「巫俗」是世界各地的人類社會所共有的宗教現象，並非上述地區所獨有。

然而，學者在強調「巫俗」的普通性和共同特質之時，往往忽略了其區域特色和多樣性。例如，中亞、北亞、非洲和美洲的氏族或部落社會，其社會規模往往較小而單純，而且欠缺文字記錄的傳統，相反的，東亞社會（如中國、韓國、日本），不僅社會規模較大而複雜，而且擁有非常悠久的文書傳統和豐富的文獻記錄。此外，就宗教的情勢而言，各地也有很大的差異，東亞的巫者在近代以前，主要的競爭對手是佛教、道教和國家宗教（儒教），近代則是基督教。而美洲印第安人的巫者所面對的是和歐洲殖民政府共生共榮的基督教，非洲土著的巫者則必須迎戰來自中東的伊斯蘭教和歐洲殖民者帶入的基督教。基於其信仰，這些宗教對待「異教」的態度和做法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和政治權力的結合程度也鬆緊不一。因此，巫者在世界各地的生存環境和活動空間想必會有很大的差別。

其次，研究「巫俗」的學者之中，以人類學家佔最大多數。然而，純粹的人

類學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以田野工作為主，做「同時性」的（synchronic）非文獻的、小規模的精細研究，不易兼顧「貫時性」的（diachronic）研究，尤其很難全面性的處理像東亞地區這些具有「國家」規模的社會，以及有豐富的歷史記錄和變遷過程的文明。

另外，人類學式的「巫俗」研究，往往過於側重巫者儀式的描述、分析和解讀，或是偏重於探討其信仰，尤其是其宇宙觀和神靈世界。對於巫者本身的研究，往往只能利用少數個案，敘述其生命史或探討其社會地位。

二、研究課題

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利用東亞社會豐富而複雜的文獻記錄和歷史經驗，探討「巫俗」研究中較被忽略的課題。至於具體的研究課題則包括下列四項：

1. 巫者與政治的關係。一方面分析傳統的韓國和中國王朝政府對待巫者的方式和法律規範，另一方面則探討日本殖民政府對待韓國和臺灣巫者（巫堂；童乩）的方式和相關措施。
2. 巫者與其他宗教的關係。主要是探討巫者和佛教、道教、基督教相互之間的競爭策略和融混的現象。
3. 巫者的「成巫」因緣和途徑。主要是分析個人成為巫者的原因、動機、背景和管道。
4. 巫者的「通神」模式和方法。主要是探討巫者和鬼神交通的各種型式，以及所採用的方法。。

三、研究方法

而要探討這個地區的巫者，在方法和概念上勢必要在傳統的人類學和宗教學方法之外有所增益。其中，所謂的「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的方法和研究角度，似乎可以解決只重田野工作不重文獻解析，只重當下不顧變遷，只看局部不看整體的缺憾。

其次，以「巫者」為核心的人物研究，似乎可以援用「人群學」（prosopography）

的方法，將巫者視為一種特殊的「社群」，分析其性別、年齡、婚姻、階層、地域、教育、體質特徵、經濟狀況、人生經驗等。

第三，為了同時呈現「巫俗」的普遍性和區域性，進行各地區的比較研究，並且透過比較以建立各種巫者的「類型」，似乎無法避免。

四、研究對象

在研究對象的選擇方面，在東亞地區，中國、韓國、日本和臺灣，不僅共同性多，而且往來的關係密切，似乎可以同時做為研究對象以進行比較。但是，限於人力和計畫的時程及規模，很難同時進行這項大工程。因此，本計畫擬以韓國的巫者做為研究的主體，在傳統的王朝政府統治時期，比較的對象將以傳統中國為主，因為，二者都在以儒家為主體的政治控制之下，巫者都遭遇來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戰。至於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則將進行韓、臺兩地的比較研究，因為，二者同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而巫者在宗教方面的挑戰則主要是來自西方的基督教。

五、基本架構

在結構方面，本計畫將依序進行巫者的政治、宗教關係，巫者的「成巫」緣由和途徑，巫者的「通神」模式和方法這四大課題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種由外而內、由大而小、由粗而細的探索架構，即先從存活的大環境（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入手，次及巫者的社群，再及於巫者的儀式、技術、身體和內在世界。

六、特色與價值

本計畫的重要性在於透過比較研究，一方面呈現韓、臺、中三地巫者各自的特色和彼此之間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可以藉此凸顯東亞巫者的區域性及其與世界各地「巫俗」之間的一致性。同時，也可以提醒學界在思考人文、社會現象時，必須兼顧「整體」與「局部」，「全球性」與「區域性」、「普通性」與「特殊性」。

在原創性方面，本計畫所處理的課題，如巫者的社群，巫者與政治的關係，巫者與其他宗教的關係，都是以往的學者較少著眼或深入研究的。其次，在研究途徑和方法上，本計畫試圖以「歷史人類學」、「人群學」的方法來處理複雜的、長時期的、大空間的東亞世界中的巫者，應該是「巫俗」研究領域中較少有人嘗試的。

七、預期成果

本計畫是以三年為期，具體的研究成果將包括下列五項：

1. 建構一個專門的網站(網址：<http://ultra.ihp.sinica.edu.tw/~linfs/saman/>)，將收集所得的資料和研究報告置於電腦網站，提供學界使用。
2. 將有關的韓國「巫俗」研究的書目置於電腦網站。
3. 將有關韓國「巫俗」的史料及重要文獻資料置於電腦網站。
4. 將田野工作所獲得的圖像資料、影音資料置於電腦網站。
5. 針對本計畫所提出的各項課題，撰寫研究成果報告，並編輯成書。

這些成果，可以使學界對於東亞世界，尤其是韓國、臺灣和中國的巫者有更深入的了解，對於「巫俗」的普世性和區域性也可以有更清楚的認識。其次，有意踏入此一領域的研究者，也可以透過網際網路，藉助本計畫所編成的研究書目、史料匯編、田野報告和研究論著，快速掌握相關的材料和議題，做更深入的研究。

總之，本計畫可以說是東亞、東北亞研究的一項重要的基礎「建設」。

「戰後海峽兩岸的名分秩序交涉 - 1959 年至 1981 年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籍之爭」 計畫簡介

張啟雄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1948 年後的海峽兩岸關係為何？對此，學界有許多討論與詮釋。本研究計畫則擬從嶄新的理論觀點，來架構並進一步解釋主導海峽兩岸衝突中，雙方背後所隱藏的文化意涵。並從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學術論爭中，提出足資解釋兩岸交涉的理論，以釐清決策過程中文化價值所扮演的背景角色，這是本計畫最重要的意義與目標。

1948 年國共內戰之後，中國由「一個政府」分裂成「兩個政權」，於是造成雙方在所有的國際組織與國際活動中，都卯足全力，務必爭取「唯一合法」=「正統」之中國國家代表權，而唯一合法的正統之爭，就涵蓋在「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下的「名分秩序」論爭之中。

本研究計畫《戰後海峽兩岸的名分秩序交涉 - 1959 年至 1981 年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會籍之爭》的提出，乃基於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並非純西方式國際法所能解釋的認識。一般而言，兩岸的「名分」與政權「位階」的問題，在國際場合中均有激烈交鋒，雙方可謂不到「名分已正，秩序已定」，決不善罷甘休。即使連在標榜「體育不牽涉政治，政治不干涉體育」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和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 Games）上，亦無例外。何以如此？「名分秩序論」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本計畫嘗試另闢蹊徑，從理論的觀點來加以分析。

1959 年 5 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第 55 屆年會決議，取消中華民國沿用大陸

播遷來台前之「中國奧委會」的名稱，中華民國雖未被取消會員資格，但被迫改名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Olympic Committe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台北則拒絕使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籍名稱。不過，由於台北方面不願放棄會員資格，因此造成自 1960 年始、1964 年、1968 年等歷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均在「抗議下」參加，並強調中華民國是以「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對海峽兩岸而言，「名稱」等同於「秩序的安排」（不一定就是實質性的秩序），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政權雖被迫遷往台灣，但是同時也認為這種迫遷台灣的情勢僅是「臨時性」而非「常態性」的。因此，宣稱仍擁有大陸主權。然而，就正統延續的觀點來看，會籍的退出卻隱含代表改朝換代，無異於亡國。若重新登記會籍即可能代表中華民國之正統國祚已告斷絕。換句話說，這又何異於亡國宣告。根據研究資料顯示，我們認為這很可能就是中華民國政府所以無法接受「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名稱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華民國政府在全力動員「正名」之下，在 1968 年 10 月於墨西哥城所舉辦之第 67 屆奧林匹克委員會年會中，中華民國又在同年 11 月開始正式恢復使用「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不過，此舉也引起中共方面對「奧委會名稱」的爭奪。因為中國在傳統「漢賊不兩立」的價值觀念下，台灣一恢復會籍名稱，勢必造成台北為「漢」、北京為「賊」的價值判斷，反之亦然，這易引起名分論上雙方不共戴天的對抗，當然這也是因為雙方同具「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的傳統文化觀所致。

1971 年中共加入聯合國，1972 年中共與美國簽訂「上海公報」，1973 年中共取代台灣在「亞洲運動協會」的會籍，1975 年中共以排除中華民國會籍為條件申請進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1976 年的加拿大的蒙特婁（Montreal）奧運，加國在中共的壓力下，拒絕台北方面使用「C」（China 的字首），即拒絕台灣使用「國旗、國歌、國名」名義出賽。台灣乃斷然退出比賽。再次突顯了雙方對「一個中國」的深刻認識。

1977 年至 1980 年海峽兩岸對於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籍名稱展開激烈的爭奪，中共方面堅持「一個中國」，要求國際奧委會承認「中共為唯一代表中國的奧會」，認為「台灣僅可用 Chinese Taiwan Olympic Committee 的名義暫留於國際奧委會，作為一個地區性的體育團體可以繼續存在，但是，不可以使用任何代表中華民國的旗、歌、名」。因此，國際奧委會通過決議，要求中華民國奧會另行提出不同於現在的名稱、章程、標誌、會歌，送 IOC 審查。1979 年 10 月 15 日及 12 月 7 日，徐亨乃代表台灣方面向國際奧會總部所在地的洛桑（Lausanne）法院提出訴訟。由此可知，兩岸爭奪會籍名稱與正名工作的激烈。直到 1981 年台北參與奧運的「奧會模式」正式拍板定案，雙方達成妥協，台灣方面始撤回對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改名控訴。

這種參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獨特「奧會模式」，使海峽兩岸在國際場合上的名分之爭暫時休兵，但卻在會籍名稱翻譯上，形成各說各話，造成頗堪令人玩味的奇怪現象。台北方面將參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籍名稱「Chinese, Taipei」翻譯成「中華台北」，中共卻將之翻譯成「中國台北」。海峽兩岸對同一名詞，在翻譯上故意顯現差異，亦彰顯出對「名分」的敏銳與堅持。「中華」一詞與「中國」一詞的差別，又在那裡？

海峽兩岸必須先共有傳統的「名分秩序觀」，方有 1959 年至 1981 年間對於國際奧林匹克會籍的正名之爭和衍生出台灣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獨特的「奧運模式」。由於「因名定分」、「依分定序」的東方傳統文化價值觀所衍生出來的「名分秩序論」，足以解釋西方國際法所無法詮釋的東方型國際政治外交行為，或許這將是本研究計畫最大的研究突破與學術創造。

「中國大陸憲法學的發展的理論評析」計畫簡介

陳新民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一、計畫摘要

本計畫主題為「中國大陸憲法學的發展的理論評析」，顧名思義當以中國大陸的憲法發展作為研究主題。綜觀中國大陸自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及一九八二年都曾修改過憲法，但真正影響較大的應該是在一九八二的「八二憲法」及往後在一九九九年修憲時，在憲法前言所揭示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本文主要是以八二憲法的內容作為討論的重點，同時以比較法學的角度，輔以台灣現有相關的歐、美憲法學理為基礎，針對中國大陸目前的憲法學進行全面性的研究。

基於大陸憲法學在近二十年來有極速的發展。縱不論其理論層次是否深入，但各種問題的討論，也已經以各種形式的專書出版，有關的期刊數量甚多。因此，大陸的憲法學已成為一個成熟、且可供進行比較法研究的領域。由於中國大陸是一個強權國家，中國大陸在一九九九年修憲，確定中國大陸為一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國方略，因此，該一方略也成為研究大陸憲法學中新興的法學研究新領域。

大陸近十年來雖然加強與台灣法學界的交流，但所有法學中迄今只剩下憲法一門尚未開放。基於憲法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與敏感度，而採行此政策當可理解。但同時也凸顯我國對於大陸憲法學的資訊顯得十分的陌生。我國近二十年來，雖然對於中國大陸的民商法、行政法的研究甚多，但迄今尚未出現一本詳細討論大陸憲法學的專門著作，即可知台灣憲法學界對大陸憲法研究的陌生，更提不上研究水準高下或優劣了。

二、預計計畫內容說明

本計畫係以台灣及歐美的憲法學為基礎，對中國大陸憲法的體系做一個全盤性的研究。由於憲法乃研究對人民基本人權保障、國家機關權力劃分、國家體制建構的法律，故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也加深了其研究的難度。每因一國政治體制之不同而有不同之憲法內容。中國大陸乃一共產集權國家，一方面為鞏固政權，另一方面又需建立合理及穩健的法律體系，以吸引外資，以發展其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此，近幾年來於憲法學的理論發展方面，伴隨著行政法學的發展及改革開放政策，亦有變動。與之前繼受俄國的社會主義憲政體制已有顯著不同。各校紛紛成立憲法講座，而各種憲法學文獻出版之多，亦為空前。本計畫的實施與完成，將可提供我國學界及政府機關對中國大陸憲法及其體系一個最根本的「透視」，尤其目前我國目前與大陸的政治、經貿往來頻繁，與中國大陸政府機關為各種公法行為，可說是無日不有，因此，對中國大陸憲法的瞭解，已有時代的迫切性。

目前歐美各國法學院已紛紛開設研究中國大陸憲法的課程，中國大陸憲法課已成為國際法學界一個新的熱門課題。但卻困於大陸法律文件的不具體及抽象性，故所為之討論亦多流於空泛，多為「政治性評論」而欠缺「學術性評論」，本研究正可補此遺珠之憾。

有鑑於早期中國大陸法學界的學者多不諳西文，且中國大陸國內政治環境的敏感，無對於大陸法系（德、法等國）的憲法文獻做充分的解讀及吸收，更遑論引進新的憲法理論思潮。但在中共宣布改革開放後，則多利用台灣憲法學者的著作，來構思其憲法體系與法典的立法內容，但我國憲法學界迄今未有任何一本著作，來全面的就中國大陸「繼受」台灣憲法學理論加以探討者。本計畫希望能就此部分做研究。

我國目前憲法學界對於中國大陸憲法的研究，仍然處於觀望期，僅有零星的論文介紹中國大陸憲政法制的變革，全面且深入探討中國大陸憲法的書籍，為數仍甚稀少。且由於早年政治環境的影響，對於大陸憲法多以政治觀點而加以具有主觀傾向的批評。本研究將一改該立場而以學術研究的客觀面討論之。

本計畫之報告將以我國及歐美法學界標準的論文撰寫方式，來分析相關的問題與制度，若發現具有學理價值的個案，亦將採用「案例研究」(case study)的方式，加以探討。由於本文計畫將會採行「案例 原則 法律依據」的討論模式，將可印證在我國法學界所熟習的原則與大陸的異同。

本計畫將參酌德國憲法學的重要論文與教科書，以作為分析大陸與我國憲法

理論的架構，故亦符合大陸法系對憲法學論文所要求的文獻基礎。

三、相關研究之回顧與評估

我國憲法學的發展與其他傳統法律學門，如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商事法相較，確屬遲緩，直至近十年才有較具體的成果出現，但仍以歐、美、日 - 特別是大陸法系行政法的創始國德國 - 之憲法學為討論對象，對於中國大陸憲法學甚為忽視，截至目前為止，多僅在比較憲法學著作中加以討論，且篇幅甚小，僅有少數如劉清波教授針對中國大陸的憲法撰寫中共憲法論之專書。

而該書的寫就年代為一九七二年，資料方面亦稍舊。蓋中國大陸自一九五四年頒布第一部憲法以來分別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及一九八二年作了大幅度的修正，其中一九八二年的憲法可說為目前大陸憲法的最新版本，僅以此為本而於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加以小幅修訂，但大多係政策宣示性的意味，故實應以此「八二憲法」作為現行的大陸憲法的討論基礎。可知我國法學界對於大陸行政法的研究，稍嫌落後。

至於中國大陸法學界有關憲法的著作，近幾年雖數量極多，但因憲法之討論多干及政情，在大陸的言論管制下少有發揮空間，多流於政策宣傳及背書性質，學理基礎普遍不足，尚不足以做為嚴肅法理的理論依據，尚未有極深入研究的跡象，本研究亦將對此進行討論。

四、研究架構說明

本計畫將以比較憲法學的方式，學術性的系統研究台灣與大陸憲法制度之實證法與學理。主要將以比較法學研究法來對中國大陸憲法學加以研究。茲將研究方法及其研究的問題析述為：

1. 現階段中國大陸憲法學發展的歷史與憲法的比較

按憲法乃「政治實力」的產物，與一般法律的產生乃基於憲法的「法律力」有不同。是以在研究一憲法時首先便需要對該憲法所制定的時代背景及其歷史演進加以研究，以明瞭其制憲者(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maker)之本意。中國大陸

憲法所繼承的來源主要有清朝末年的憲律，民國初年的諸般憲法性法律，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憲法等，而其中以後者的影響最深。但在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及一九八二年作了大幅度的修正後已有了獨立發展的趨勢，與一九五四年深受蘇聯影響的版本已大有不同。其間的演變值得深究。但本研究尤將重心放在中共一九九九年小幅度修正憲法，確立了中共是「社會主義法治國」的屬性。本研究也將針對此概念以及中共憲法日後應再如何發展進行研討。

2. 憲法學教科書內容與我國之比較

本計畫將對目前大陸所有的重要憲法教科書進行整理分析，並對於早期的憲法學者，如：錢端生、李光燦及近年來的許崇德等人的憲法著作，都全面的予以檢驗，目前大陸憲法學的著作發展蓬勃，其情況與我國頗類似。按我國憲法學教科書在民國七十年代前後，因戒嚴時期的終止而有井然不同的分別。此種分別在於言論、講學、著作、出版等自由的開放及歸國學人的增加，使我國的憲法學研究正式於法學界生根，而非宥於其高度政治性而率以政治學的角度研究之。以此對照大陸法學界亦有此種傾向，在一九八〇年代前後因「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大陸對言論管制亦漸放鬆，在憲法學研究方面，多種學術性論文及期刊、專書，亦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版。但觀其憲法學教科書仍多循於舊規，尚無體系化的以法學角度撰寫者，一如我國七十年代以前。本人以為如能以台灣「法學化」憲法學研究的經驗為基，應可順利為大陸憲法學教科書的內容作出一番建議。

3. 憲法解釋之問題

憲法具有的法位階之最高性，而此種「最高性」之顯現，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乃多以「違憲審查」之形式表現。而大陸憲法中亦於第五條中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顯示此最高性。其效力的表現為其憲法第 67 條的「憲法解釋」。但大陸地區的法位階雖已於諸多立法中確立之介紹及評析外，大陸在其新頒布的立法法中對於法位階亦有相關的規定。首先是對於憲法效力的規定，「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其次是明文「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規章」，確定法律的位階。

但在憲法解釋的實例上卻仍付之闕如，其程序在新的立法法中方以法律加以規定，此問題之研究，在大陸乃屬方興未艾，深值研究。大陸最近也有不少公法學界提出建立違憲審查的制度，也是本研究所要瞭解之處。

4. 比較大陸憲法學

如以台灣的憲法學研究之理論體系對大陸的憲法學理論加以研究，可以下列三者為析論：

（1）基本人權體例分析

憲法作為人民權利的保障者，首應加以研究的就是憲法中內蘊的其本人權內涵，而以該內涵作為憲法解釋上的準繩。這是中國大陸憲法最弱之處，也是違憲審查制度未能建立所導致的弊病之一。本計畫也將針對大陸學界流行的人權觀，逐一加以檢討批評。

（2）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的問題，在地廣人眾的大陸向為重要問題，以其領土之大民族之複雜，在此問題上應有不同於其他國的處理。將可參考其他外國立法及理論予以研究，一如德國聯邦憲法第二十條所採的聯邦國原則(Bundesstaat Prinzip)等。

（3）政府結構分析討論

現代國家多依循十九世紀以降的法治國概念，而秉權力分立原則，建立三權或五權分治的政府。而大陸卻將民主原則推至極至，以一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大陸的最高權力機關，以下的所有機關皆在全國人大之下。此種特殊結構對大陸政府結構的影響亦甚有研究的空間。

5. 以比較憲法學的眼光著眼，分析中國大陸憲法學教材應如何撰寫？有如何之內容？

在完成以上討論後，最後可將討論的結果總結成大陸教科書的撰寫新模式，同時也可依此種模式下所撰寫而成的科書，俾對大陸的憲法學研究有進一步的貢獻，並增進對大陸法制的了解。

五、預期成果及學術貢獻

本計畫可對目前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大陸憲法學所構成所有的基礎原則，例如基本人權的保障、地方自治權限劃分、政府結構分析等，以台灣目前已建構的

憲法學理及實證法律為著眼點，加以深入且具體地作比較法性質的研究，當可為我國學界今後研究中國大陸憲法制度，建立一個較為嚴謹的理論基礎。

透過對中國大陸國家權力運作模式及其權限的瞭解，可進一步探知其最近的國策 - 依法行政 - 的可能發展，亦可瞭解今後中國大陸法政發展的走向。並藉憲法學的研究，一併研究中國大陸行政法理念的改變。

本計畫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國國家機關行政及法律實務界，進一步瞭解中國大陸國機關運行的法制實況，以作為我國機關及人民於中國大陸活動時的權益保障，且可做為日後在中國大陸發生公法訴訟時，提供理論依據。特別是我國憲法學界亦可瞭解我國憲法學理如何受到中國大陸採納、吸收，以及所做的改變。

中國大陸憲法學的發展不僅牽涉到其人民的權益保障，也可左右其國家權力的「節制」問題，我國法學界今後應將中國大陸法制列入研究方向，中國大陸亦為本院「東北亞區域研究」一個重要地區，今後研究中國大陸只要一涉及中共公權力就會面臨該種權力是否有「法上界限」，從而可以推測其可能採行的手段，本計畫當有助於此種「研判」的精確性。本論文也是一個宏觀性質的研究，將不斤斤於行政法制的枝末細節，亦可分析中國大陸在經歷所謂的「改革開放」滿二十年後的今日，在法政體制上所顯示出來的「法政文明」的程度，且此程度係以台灣公法學標準而作的評判。

「人力短缺與外籍勞工： 台灣、日本及南韓之比較分析」計畫簡介

蔡青龍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日本、南韓與台灣均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成就了快速經濟發展，但也在同一期間面臨了人力短缺現象以及國際勞工之處理問題。日本與南韓採取「拒絕政策」，而台灣則為有限度的開放政策。本題研究擬就此一現象深入探討下列相關課題：(一)日本與南韓堅持不合法接受（非技術性）外籍勞工的背景與理由，及其與我國開放引進外勞所考量因素之差異。(二)日本與南韓所採「拒絕外勞」策略的詳細內容，及其變相使用外勞之「訓練生」方案之具體辦法。(三)日、韓「拒絕外勞」策略對解決其國內人力短缺問題之功能，及其與我國「合法引進」效力之比較。(四)展望日本、南韓及台灣未來「外籍勞工」策略之可能發展，並探討其在產業外移、資本深化、與開拓新勞動力等方面之配合措施。

本子研究計劃包括三個階段，為期兩年半（民國 90 年 7 月至 92 年 12 月），其內容包括資料與文獻之收集與建檔、基本狀況分析以及專題研究三大項目。預期將完成下列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1. 收集及彙整日、韓之外勞相關政策、法規及研究文獻等，編成「日、韓外籍勞工研究書目及摘要彙編」。
2. 收集及整理經濟發展、勞動供需及外籍勞工等基本資料，建立日、韓兩國過去 15-20 年之統計資料電腦檔。
3. 完成日本與南韓「人力短缺與外籍勞工」基本分析各乙篇。

4. 完成「日本、南韓與台灣外籍勞工策略與經濟發展之比較分析」專題研究報告乙篇。

本子計畫已於第一階段（民國 90 年 7 月至 12 月半年）之前四個月完成上述第 1 項成果，並積極籌備著手第 2 項工作（詳見第一階段成果報告）。在第二階段（民國 91 年）當中，研究重點則在於完成第 2 及第 3 項成果。最後，第三階段（民國 92 年）則將總結本研究計劃之成果與發現，撰成「日本、南韓與台灣外籍勞工策略與經濟發展之比較分析」專題研究報告乙篇。

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都難免遭遇國際勞工移入的問題，但是外籍勞工之進口與使用卻是一個極富爭議性的題題。因此，各國所採取的相關政策也極為不同。日本、南韓與台灣的發展經驗正是此方面的最佳研究題材。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同樣是面對人力短缺的窘境，日本與南韓採取保守的拒絕外勞方案，而台灣則是調整為有限度、有條件的進口外勞政策。本計劃將深究日、韓「拒絕外勞」策略之內容與意義，及其對解決國內人力短缺問題之功能，並與我國「合法引進外勞」之效力相互比較。此一成果將有助於釐清外籍勞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之角色及其受政策因素的可能影響，相關研究結論，將撰成英文著作，透過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或專書出版方式，應可對「國際勞工移動」之學術理論提供東亞經驗的堅實基礎。

「經濟衰退與社會變遷對女性職業流動的影響： 以日本為例」計畫簡介

喻維欣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本計畫擬探討日本近年來經濟社會的變遷對於女性的職業流動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女性因轉換職業或是退出勞動市場而離開職場的影響。經濟成長的停滯與人口結構的變遷對於日本的勞動市場、家庭與兩性平等之相關政策和女性的參與勞動市場都造成了顯著的影響。先前的研究對於日本的勞動市場與性別階層化的討論都是集中於經濟成長的高峰期，對於經濟衰退期間的性別與工作的議題實有必要再作檢視。如此可更增進我們對於當代日本社會的了解。

此計畫延續了本人先前對於東亞各國的性別、勞動市場與職業歷程之議題的研究，該研究主要是強調女性在嚴重的經濟衰退與劇烈的勞動市場變遷期間的職業流動的狀況。之所以進一步選擇日本作為觀察的對象，乃是企圖了解日本從九零年代中期到現在，這方面的變遷情況。雖然早從九零年代開始，日本的經濟成長就已呈現停滯的狀態，但在 1997 年的東亞經濟危機與 1999 年開始的全球經濟衰退之後，日本的情況變得更為嚴重，本研究即企圖探討在日本的勞動市場劇烈轉變的過程中的諸多變化。之前許多社會學著作對「日本就業體系」（包括長期僱用制度、隨年資增加的工資制度和內部勞動力需求的在職訓練制度）的討論，均是在日本經濟成長時期所著，而從九零年代開始持續改變的日本就業體系對於女性在勞動市場內的機會存在是有益的或是有害的影響，並未被清楚的檢證。迄今雖有一些非正式的觀察資料指出日本的兩性平等的情況有些許的改善，但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遷對於性別不平等的影響仍未被充分討論。因此，本研究企圖利用自九零年代開始的統計調查資料與田野訪談觀察來檢證經濟與勞動市場的變遷對於女性勞動者就業的影響。

日本就業體系的轉變並非是影響婦女的職業流動與事業發展的唯一因素，至少有其他三種新的因素同時構成影響。首先，經濟的不景氣會降低地租及企業的營運成本，而因此吸引了更多外資進入日本，以致在九零年代後期外商公司在日本的數量有顯著成長。這些外商公司對於日本勞動市場的僱用制度所產生的衝擊，不僅是在於他們較不可能採取與本地企業相同的招募方式和僱用體系，並且與本地企業相較起來，他們傾向於僱用較多從名校畢業的女性。因為日本的男性菁英在考量薪水、工作福利與升遷機會等因素後，因其在本地企業內優勢而較常尋找本地大企業的工作。因此，外商公司因招募到男性菁英的機會比招募到女性菁英來得小，而可能比本地企業提供了較多的女性工作機會。

第二，近年來，在一些社會問題的壓力下，日本政府不斷試著改善職場上的性別平等與托兒照顧的問題。其中一個壓力來源即是生育率的急速下降，這會導致在這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的社會，可預見的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出現。日本每一位婦女在 1999 年的平均生育率為 1.38。這個比率低於 OECD 各國的平均生育率，也代表了日本在人口成長與未來勞動力供給上的一個危機。近年來日本婦女為了持續參與勞動市場而選擇放棄婚姻，間接促成生育率急速下降之現象日漸受到矚目，這顯示了職場上性別歧視對人口結構及社會已形成顯著影響。因此，日本政府在 1999 年修訂了平等就業機會法（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Law）來增加它的效力，並且勞動省也企圖以獎勵對家庭與工作並容有貢獻的公司（family-friendly firms）來解決低生育率和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上述這些政策與計畫理應對女性就業機會及性別歧視問題有所影響，本研究即企圖藉由探討這些年來日本女性的職業流動和職業歷程（career patterns），來評估以上政策變革的影響。

第三，九零年代日本社會裡最重要的轉變之一是女性的「人力資本」快速地增加。如同在其他國家所觀察到的一樣，如此改變將影響到女性的職業歷程。在日本，女性學生在四年制的大學中的比例已從 1990 年的 27 % 增加到 1999 年的 36 %。在九零年代的中後期，這一群接受高教育的女性學生，因其本身教育程度的提昇與同期相關政策與制度的改變，而將對於就業機會的期待有所提升，這樣的期待在她們進入勞動市場後將對女性在職場地位造成如何影響，且又如何形塑女性職業流動，是一項尚未被詳細討論的重要議題。

此研究中，職業流動的定義是指在一個組織內或組織間自願或非自願的移動。本人期待能檢證這些改變的因素與離開工作的頻率。並且也企圖探索九零年代和先前幾十年比較起來，女性對於工作發展和退出勞動市場的預期之改變。更進一步說，本研究的主要問題為：1. 是否日本的社會變遷會導致當女性選擇離開職場時，對於考量家庭與生育的因素是否有任何差異？2. 女性是否會因著就業結構的改變、外商公司的增加或性別相關法令的制定完備而有了較佳的升遷管道或跳槽機會？3. 是否經濟衰退會降低工作的穩定性，同時也增加了男性作為家庭主

要經濟來源的不確定性？因此也減少了女性自願選擇離開職場的比例；4.若上述的答案是肯定的，則是否職業婦女的比例增加會提昇職場中的兩性平等之意識？5.若並非是職場環境的改變，則女性對於自我事業發展認知的提昇是否來自於法令的制定和教育程度的提昇？若是如此，在長期的社會變遷中，是何種因素在衝擊著兩性平等的觀念？

本研究即是企圖解釋上述這些問題。藉此，來解釋性別在經濟、社會和制度變遷下的交相作用如何地來塑造日本女性的生活機會，以增進日本研究、社會不平等以及性別階層化等研究領域之知識累積。

東南亞政經大事記（1900-2000）

「東南亞政經大事記（1900-2000）」系列專欄，旨在擇要記錄東南亞所有國家（及相關地區、組織）在 20 世紀裡的政治、經濟大事。因為，要積極推動東南亞區域研究，則必須建立豐富的參考書目和資料庫等，以厚實研究的基礎。有鑑於此，本計畫（前身之一為「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於幾年前即著手進行東南亞政經大事紀要之編輯工作。其主要目的，在為東南亞區域研究提供簡明有用、易於查詢的基礎資料，以作為相關研究人員、各界人士、學子的參考資料，並作為進一步找尋相關資料時的線索。歡迎大家多加使用。

這是本計畫繼十一種研究書目彙編之後，再推出的基礎參考資料之一。過去所推出的包括《東南亞研究書目彙編》《中國南海地區考古學研究相關書目》《東南亞之國際勞工移動：書目及摘要彙編》、《臺灣時報東南亞資料目錄（一九五〇—一九四五）》、《韓國研究書目彙編》、《日本研究書目彙編 I、II》、《東南亞、日本、韓國研究博碩士論文彙編》、《中韓關係中文論著目錄增訂本》、《大南實錄清越關係史料彙編》、《當代中國大陸研究書目彙編》、*A Bibliography for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ailand* - 漢譯為《泰國的歷史與文化英文書目彙編》等。至於東南亞政經大事記一系列，將自本期《亞太研究通訊》起開始分次刊登。刊登完畢後將再做修訂，並可望集結出版。

「東南亞政經大事記」系列將有十三個單元。這些單元涵蓋東南亞現有的十個國家（菲律賓、汶萊、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即將宣布獨立的東帝汶，以及東南亞國協、台灣與東南亞關係等。

本大事記系列將以編年為體。內文中以年份為縱軸，以該年所發生的政治、經濟大事為橫軸。原則上以 1900 年為各國政經大事紀要的起點，依序遞增，終於 2000 年。如果該國於 1900 年時尚未獨立，則內文中仍儘量追溯其獨立前之政經大事。其次，內文每頁左側（縱軸）先標出年份，其右側「政經大事紀要欄」中將依照月、日的前後順序，簡要列舉發生於該相應年份的政經大事。第三，在某年份之後、「政經大事紀要欄」條目之前標出 * 號者，指發生於該年份，但月份不詳（例如，1903 * 指發生於 1903 年但月份不詳）在「政經大事紀要欄」條目之前僅標出一個阿拉伯數字者，指發生於該月，但確切日期不詳（例如，3.

指發生於三月份）。在「政經大事紀要欄」條目之前標出兩個阿拉伯數字者，指發生於該月該日（例如，9.10 指發生於九月十日）。

由於本系列所涵蓋的空間很廣，時間也很長，因此錯漏之處在所難免。雖然編者們一再增刪、數易其稿，並且再三校對、反覆查證，但是必然還有不足的地方。因此，敬請讀者閱後惠予提供寶貴意見，指出應該增補、刪減、改正之處，（編者們當也持續進行編校工作）以便日後集結出版時再做修訂，推出一本方便有用的工具書。

最後必須說明，本系列主要編輯者為李明峻博士，參與校訂者有嚴智宏博士、王宏仁博士、張翰璧博士、溫瑞芯小姐等原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的工作同仁。

菲律賓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00年	1.2	八萬美軍開抵菲律賓，使1898.6.12成立的菲律賓共和國瓦解。
	2.2	教廷大使查培勒(M. P. Chapelle)抵達馬尼拉，與美國討論修道土地位與財產事宜。
	2.23	菲軍總司令布拉岡薩(Francisco Braganza)處死一百零三名西班牙戰犯，其後因此被處吊刑。
	5.7	美國總統下令成立由塔虎脫(William Taft)領導的第二次菲律賓委員會(或稱塔虎脫委員會Taft Commission)。
	5.20	塔虎脫向西班牙政府表示將釋放該國戰犯。
	6.3	塔虎脫委員會成員抵達菲律賓，取代先前原擬前往設置自治政府的雪曼委員會(Shurman Commission)。
	9.1	塔虎脫委員會開始行使立法權，並撥款建設交通。
	9.6	塔虎脫委員會設置菲律賓委員會，做為最高統治當局，其下管轄四個部會。
	12	菲人激烈抵抗，亞瑟(Arthur)將軍頒佈戒嚴令。
	12.23	菲律賓聯邦黨(Partido Federalista或Federal Party)成立，以加入美國聯邦為主要目標。
1901年	1.21	塔虎脫委員會通過公共教育設置法，決定成立公立小學與師範學校。
	1.31	塔虎脫委員會制訂村自治法。
	2.6	塔虎脫委員會制訂省自治法。
	3.23	革命政府總統阿基納多(Emilio Aguinaldo)遭拘捕，後轉與美國合作，菲島動亂大致平定。
	4.1	塔虎脫任命菲軍司令德加多(Martin Delgado)為班奈(Panay)島民政長官(Civil Governor)。
	7.3	美國會通過史普納(Spruner Act)法案，將菲島政治、軍事、法律權限暫時交付美國總統。
	7.4	美國任命塔虎脫為首任總督，成立殖民政府。
	8.	六百位美籍教師抵達馬尼拉，其後分配至各地學校任職。
	8.	近兩千名美國部隊抵達宿務(Cebu)。
	9.1	三位菲律賓人被任命為菲律賓委員會委員。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9.6 菲律賓委員會正式成立內政警察、商務財政、司法、公共教育四個部，其長官均由美籍委員擔任。
	9.28 巴蘭吉加 (Balangiga)美軍基地遭三描(Samar)島菲律賓住民攻擊。
	10.2 內政部採宗教隔離政策，設立非基督徒部族局(non-Christian Tribes Bureau)。
	11. 菲律賓委員會制訂暴動教唆法，規定主張獨立或脫離美國統治者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11.15 華勒(Littleton Waller)上校率領美軍進攻三描島菲律賓人。
	12. 保和(Bojol)島的菲律賓反抗軍向美軍投降。
1902年	* 四千名陸戰隊進攻八打加(Batangas)省。
	* 菲律賓發生嚴重霍亂，疫情持續至1904年。
	2.2 菲律賓成立民主工會(UOD)。
	2.3 通過中等學校設置法。
	4.5 駐紮民答那峨(Mindanao)島的美軍進攻拉瑙湖(Lake Lanao)摩洛回教徒。
	4.27 最後一位反抗軍領袖魯克班(Vicente Lucban)被捕。
	7.1 美國會通過「菲律賓組織法」(the Philippine Organic Act)，規定教會與國家分離，至1916年為止是統治菲律賓殖民地的基本法。
	7.4 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發表平定菲律賓宣言，聲明準備設置菲律賓議會，但革命軍事實上仍繼續抵抗。
	8.3 艾格里沛神父(Father Aglipay)創立菲律賓獨立教會，稱艾格里沛教派(Aglipayans)。
	11. 菲律賓委員會制訂山賊行為法，規定革命軍一切活動均為非法。
	11.6 制訂土地登記法。
	11.18 教廷大使蓋迪(M. Guidi)抵達馬尼拉，接替查培勒的工作。
1903年	* 美在菲創設金本位基金(Gold Standard Fund)，採一美元兌換二披索的固定匯率。
	2. 流亡海外的前共和國首相馬濱尼(Apdinarro Mabini)被允許返回馬尼拉。
	3.2 菲律賓實施第一次國勢調查。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4.5 波興(J. Pershing)率美軍第二次進攻拉瑙湖。
	6.1 美設立摩洛省，管轄民答那峨、蘇祿和塔威塔威(Tawi Tawi)等地區，意圖以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原理，使回教政治社會制度解體。
	8.26 設立公費留美制度。
	10.7 制訂公有地法，將少數民族土地全劃歸公有，並實施公地放領。
	10.15 蘇祿回教領袖哈珊(Panglima Hassan)起事攻擊和樂(Jolo)島，翌年十一月被平定。
1904年	* 塔虎脫總督實施身分證制度，以便孤立反抗「匪徒」。
	1. 萊特(Luke Wright)接替塔虎脫，成為第二任菲律賓總督。
	3. 梅里薩(Raymando Melliza)繼承德加多成為班奈島的民政長官。
	4.26 制定修道會所領地法。
	7.11 暴風雨侵襲黎剎(Rizal)省，造成空前大洪水。
	10.10 美國政府廢棄1899年與蘇祿蘇丹簽訂的貝茲(Bates)協定，直接統治政治與軍事，引發和樂島回教徒起兵抗爭，但其後為美軍平定。
1905年	1. 萊特總督宣布全面緊急狀態，並在黎剎省與拉古那(Laguna)實施集中營制度。
	1.9 和樂島民宇薩普率眾起事失敗。
	4.10 蘇祿回教領袖巴拉(Datto Pala)率眾攻擊和樂島美軍。
	9.4 制定特別行省法，以處理非基督徒地區。
1906年	* 桑多斯(Lope Santos)著作 <i>Rays and Sunrise</i> 一書出版，為首部泰加洛(Tagalog)語小說。
	1.1 英語成為官方用語。
	3.10 和樂島民與美軍在達荷山(Mt. Dajo)發生大戰。
	5.5 廢除不得以獨立為綱領的政黨禁令。
1907年	* 菲律賓委員會制訂國旗法，禁止公然高揭象徵菲律賓的章紋圖樣。
	1.9 菲律賓委員會通過 No.1532 法案，成為菲律賓第一個普選法，但限制頗多，僅 1.29% 國民有投票權。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p>3.12 奎松(Manuel Quezon)和歐斯敏納(S. Osmena)成立「菲律賓國民黨」(Partido Nacionalista, National Party)，主張以和平方式爭取獨立。</p> <p>7.30 第一次菲律賓議會(Philippines Assembly)選舉，為東南亞地區首次自由選舉。</p> <p>8. 選舉結果國民黨獲得全部八十席中的五十八席，由聯邦黨改名的國家進步黨(National Progress Party)獲得十六席，其他無黨籍人士六席。</p> <p>10.16 第一屆菲律賓議會開議，與菲律賓委員會協調順暢，法案大致獲得通過。</p>
1908年	<p>* 菲律賓委員會增加一名菲律賓人委員，使美菲各有四名委員。</p> <p>6.18 菲律賓議會通過「國立菲律賓大學設置法」，完成公立學校制度。</p> <p>8.18 呂宋北部山地少數民族地區設置山嶽省。</p>
1909年	<p>* 新任美國總督霍布斯(W.Cameron Forbes)到任</p> <p>* 奎松擔任菲國駐美代表，建立廣大人脈。</p> <p>8.5 制訂「關稅法」(Payne-Aldrich Tariff Act)，規定美國產品銷售至菲律賓免稅。</p> <p>11.20 菲律賓首任總督塔虎脫當選為美國總統。</p>
1910年	<p>* 呂宋島、米賽揚(Vissyan)島反美戰鬥結束。</p> <p>* 中呂宋反抗軍領袖薩爾瓦多(Felipe Salvador)為美軍擒獲，其後判處死刑。</p>
1911年	<p>* 菲人被允許出任殖民政府部長職位（教育部長除外）。</p> <p>1.30 呂宋島塔爾(Taal)火山爆發，一千三百人喪生。</p>
1912年	<p>* 菲律賓議會不通過菲律賓委員會預算。</p> <p>9.14 和樂島民普德巴薩克起事，翌年六月敕平。</p>
1913年	<p>* 美國通過安德伍關稅法案(Underwood Tarriff Bill)，取消菲律賓輸美配額，美菲貿易自由化。</p> <p>10.6 新任總督哈里森(Francis Burton Harrison)抵達馬尼拉。</p> <p>11.16 哈里森總督推動行政部門的菲律賓人化，並再增加一名菲律賓委員會菲籍委員，使菲律賓人委員超過半數。</p> <p>12.20 美殖民當局取消摩洛省，改設民答那峨、蘇祿軍管區，並撤廢非基督徒部族局。</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14年	* 著名短篇小說家布拉斯(Carlos Bulasan)出生於比納羅南(Binalonan)。
	1.25 菲律賓人組成勞動評議會(VOF)。
1915年	* 對美貿易占菲律賓外貿總額的半數。
	3.22 美菲締結卡本特 基拉姆協定，蘇祿王國承認美國主權，美國的菲律賓統治於焉確定。
1916年	* 回教地區問題依自治法移交菲律賓議會管轄。
	* 哈里森總督創設菲律賓國家銀行(PNB)。
	8.29 美國通過菲律賓自治法(Philippine Autonomy Act; Johns Act)，成立兩院制議會及國家評議會，並約定將來讓菲律賓獨立。
	10.16 新制兩院制議會開議，奎松擔任首任參議院院長。
1917年	* 再度恢復設置「非基督徒部族局」。
	* 總督收購馬尼拉鐵路公司(Manila Railroad Co.)，造成殖民政府財政負擔。
1918年	* 公立學校在學生總數達六十八萬人。
	* 菲律賓議會通過成立「獨立委員會」。
	3. 日本橫濱正金銀行於馬尼拉開設分行。
	10.16 設立「國家評議會」作為總督諮詢機構。
1919年	* 制定新公有地法，禁止將公有地讓渡、借貸給外國人或外國法人。
	* 進步黨改稱民主黨(Democrata Partido)，但眾院大選仍由國民黨居多數(71%)，惟兩黨均主張立即、無條件、完全的獨立。
	* 總督創設國家開發公司(National Development Company)。
	* 菲律賓佃農組合(UAF)成立。
	3.17 菲律賓議會通過獨立決議。
	4.4 獨立委員會第一次赴美請求獨立。
1920年	* 美國開始農業不景氣，免關稅的菲律賓農產品開始大量輸入。
	* 反菁英的民眾組織「柯洛姆(Colorum)運動」開始展開。
	2.5 廢除民答那峨、蘇祿軍管區，改為民政管區。
	12.2 美總統威爾遜發表退職演說，其中表達希望讓菲律賓獨立。
1921年	5.4 因PNB和NDC大幅虧損，美國派伍德 霍布斯使節團(Wood-Forbes Mission)抵菲，伍德(Leonard Wood)其後接任菲律賓總督。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7. 殖民政府公佈菲律賓政府職員中已有96%為菲律賓人。
1922年	* 美國通過關稅法以保護本國產業，但對菲國仍以例外方式維持免關稅。
	4. 制定新通貨法(RA3058號)，以金本位基金和財政部證券基金為準備金。
	7. 教育經費占政府支出50%。
	10. 奎松擊敗歐斯敏納當選眾議院院長，其搭檔羅薩斯(Manuel Roxas)擔任主席。
	11.29 菲律賓議會向美國國會要求制憲。
1923年	3. 卡波拉(Pedro Kabola)在呂宋中部成立菲律賓反美地下組織，以佃農、農工為主要成員。
	7.17 因對伍德總督的高壓統治和民營化政策不滿，菲律賓內閣和國家評議會的非籍人士集體辭職。
1924年	* 美國移民法通過，亞洲移民沒有歸化權，但菲律賓人為殖民地人民，可自由渡美。
	1.10 柯洛姆運動以民答那峨的蘇利卡歐、薩瑪爾(Samales Group)和雷伊泰(Leyte)島起事。
1925年	3.4 卡波拉在呂宋中部起事失敗。
1926年	2.26 菲律賓議會通過此日為全國獨立祈願日。
	7.26 議會通過以公投表決獨立，但為總督否決。
1927年	* 卡羅薩(Pedro Calosa)繼承卡波拉，投身柯洛姆運動。
	* 因伍德病故，美國總統任命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為新總督。
	1. 布尼法索(Andres Bonifacio)成立「卡第布蘭(Katipunan，最驕傲、最受尊敬團體之意)」組織，以獨立為目標。
	2.6 米塞揚群島六個省份展開「佛羅連秀運動」。
	10. 美國勞工總同盟(AFL)通過決議，排斥菲律賓移民。
1928年	* 因奎松和史汀生的努力，美菲關係修復。
	* 因菲律賓輸美砂糖達五十萬噸，使美國眾院開始討論對菲免關稅問題。
	12. 菲律賓全國農民聯盟(KPMP)成立。
1929年	* 桑多斯(Pedro A. Santos)以潘班嘉(Pampanga)省佃農組織為基礎，成立菲律賓社會黨。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5. 菲律賓勞工聯盟(KAP)成立。
	9. 因經濟大恐慌，使得美國勞資雙方均要求讓菲律賓獨立，目的在排除菲律賓產品及廉價勞動力競爭。
1930年	* 菲律賓農工同盟(AMT)成立。
	* 「新卡第布蘭陣線」成立，其後改名為「旦格蘭」。
	1. 美國加州瓦森維爾(Watsonville)發生種族暴動，多名菲律賓人遇害。
	1. 在共和黨賓漢(Hiram Bingham)參議員主導下，召開菲律賓獨立問題公聽會。
	5. 菲律賓政府改組，除總督、副總督外均為菲律賓人。
	6. 《真理報》(Sakdal)創刊。
	6.17 美國關稅法修正案通過，在激烈討論後，仍維持菲律賓免稅特權。
	11.7 馬納漢(Jacinto Manahan)以菲律賓全國佃農協會(KPMP)為基礎成立菲律賓共產黨。
1931年	* 菲南達沃(Davao)農民攻擊日資麻園。
	1.10 卡維薩在塔尤格(Tayug)率領農民暴動。
	10.28 美國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宣稱菲律賓政治獨立條件尚未成熟，須待其經濟獨立為止。
	12. 「旦格蘭」組織遭擊潰。
	12 菲律賓使節團前往美國商討獨立法案。
1932年	1.8 美國黑爾(Butler B. Hare)參議員提出菲律賓獨立法案，其後修正為主張以公民投票決定獨立的荷斯卡汀法案(Hawes-Cutting Bill)。
	10.26 菲律賓共產黨被視為非法組織。
	12.17 美國會通過荷斯卡汀法案，規定菲律賓在獨立前應有十到十二年的過渡期。
1933年	* 新任總督默菲(Frank Murphy)上任，1935年以後改為駐菲高等事務官。
	1.17 荷斯卡汀法案遭美國胡佛總統否決，但其後國會再予通過。
	10.12 菲參議院因各黨要求即時獨立而否決荷斯卡汀法案，10.17眾院亦為相同決議。
	10.29 羅慕斯(Benigno Ramos)成立真理黨(Partido Sakdalista)。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34年	<p>3.19 美國眾院通過「泰丁斯 - 麥克杜菲法案」(Tydings-McDuffie Act, 此即菲律賓獨立法), 3.23 參院亦予通過, 3.24 總統簽署生效。</p> <p>5.1 菲律賓接受「泰丁斯 - 麥克杜菲法案」, 先於十年過渡期中成立權力有限的自治政府, 待期滿後即獨立。</p> <p>6. 舉行眾議院大選, 真理黨首次取得議席。</p> <p>7.30 菲國召開制憲會議。</p> <p>11.1 「民族經濟保護運動」(NEPA) 成立。</p>
1935年	<p>2.8 菲律賓通過憲法草案。</p> <p>3.31 真理黨呼籲國民於憲法批准投票時棄權。</p> <p>5.2 真理黨在卡布亞歐(Cabuyao)起事反抗美國殖民政府。</p> <p>5.14 菲國進行批准憲法的國民投票, 該憲法於獨立後將繼續適用。</p> <p>9.17 菲律賓依憲法選舉首屆自治議會和總統。</p> <p>11.15 菲律賓國協 (Philippines Commonwealth) 政府成立, 奎松與奧斯敏納(Sergio Osmena)當選為正副總統, 但美國總統仍可任命高等事務官, 以管理國防、外交、通商和財政。</p> <p>12. 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擔任奎松政府的軍事顧問。</p> <p>12. 美國以菲國輸出稅為減債基金, 試圖償還殖民政府所舉債務, 但未成功。</p>
1936年	<p>* 自治議會通過「國語研究所設立法案」。</p> <p>* 菲政府廢除宗教隔離政策。</p> <p>* 奎松總統以自治政府法第一號, 實施國民皆兵制。</p> <p>* 對美貿易占菲律賓外貿總額的四分之三。</p> <p>3.31 美國獨立法調查團提出「秘密報告」, 指出修改獨立法的必要性, 否則菲國獨立後將陷入經濟混亂。</p> <p>12. 經美國共產黨阿倫(James S. Allen)斡旋, 奎松總統特赦所有共產黨員。</p>
1937年	<p>* 美國任命麥克阿瑟為駐菲美國軍事顧問團代表, 協助創設菲律賓國軍。</p> <p>* 奎松修改「稻作佃農法」, 希望實現「社會正義」計劃, 但遭地主強烈反對而未果。</p> <p>4.30 菲國進行有關女性參政權的國民投票。</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38年	7.1 美國財政部將椰油基金交菲國做為國稅收入，以平衡自治政府財政。
	12.30 奎松總統宣布泰加洛語為國語。
	* 奎松總統設立國營開發公社（NDC），建設本國企業工廠。
	* 菲律賓人民戰線成立。
	2.7 奎松總統因美國駐軍不滿一萬，且有放棄菲律賓的傾向，乃與日本交涉安保問題，宣布菲律賓中立化。
	4.5 國會大選，國民黨取得全部九十八席中的九十二席。
	6.26 「統合勞工運動」（CLM）成立。
	8. 羅慕斯率領部分真理黨員成立「完全黨」（Partido Ganap），但在翌年被捕入獄，直至1942.4才為日軍釋放。
	10. 奎松承認所有政黨可合法集會，十二月並恢復共產黨員的公民權。
	11.7 社會黨與共產黨合作，重建菲國共產黨。
1939年	12.7 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在菲律賓大學被捕。
	* 菲系產業資本額首次超越美系產業。
	* 公立學校在學生總數達一百九十四萬人。
	* 奎松試圖通過「零售業菲化法案」但失敗。
	* 設立支援墾殖民答那峨的國家墾殖事業局（National Land 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 Co. ）。)
1940年	7. 自治議會通過設置上下兩院，總統任期四年，得連任的修憲案。
	8.7 美國議會通過經濟調整法，主張讓菲律賓於1941年獨立，1951年達成100%完全課稅。
	* 菲律賓人民戰線分裂。
	* 因償還債務，自治政府支出劇增，約為1935年成立時之九到十三倍。
	* 設立收買大型農園轉售佃農的農村振興公司(Rural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Co.)。
	4. 菲國師範學校開始教授國語(泰加洛語)。
	5.2 自治議會投票通過移民法案。
	6.7 自治議會通過國語(泰加洛語)為官用語。
	6.18 國民投票通過改革總統與國會制度的修憲案。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8.19 自治議會通過非常大權法，賦與總統處理國家緊急事態的權限。
1941年	7.26 美國於馬尼拉設置遠東陸軍司令部。 8.7 美國總統簽署獨立法修正案，延後對菲律賓賦課輸出稅。 10.5 美英於馬尼拉召開東亞軍事首腦會談。 11.11 奎松再次當選為自治政府總統。 11.22 日本駐台第十四軍編成菲島派遣軍，準備出動攻擊菲律賓。 12.8 日軍開始攻擊菲律賓。12.10登陸呂宋。12.20登陸民答那峨。 12.26 奎松總統宣布馬尼拉為無防備都市，美菲軍撤至巴丹半島及科雷吉多(Corregidor)島。
1942年	1.2 日軍佔領馬尼拉，並於次日實施軍政統治。 1.23 日軍設立行政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作為統治機構，以伐嘉斯(Jorge B. Vargas)為委員長。 2.20 奎松總統撤往澳洲，3.27抵達雪梨，5.13於美國華盛頓特區成立流亡政府。 3.29 拉瓦(Vicente Lava)率呂宋農民成立抗日義勇軍（即「虎克團」，Huk Balahap），開始抗日武力鬥爭。 4.3 日軍攻擊巴丹半島，並於4.11加以佔領。 5.6 美國遠東部隊全面投降。其後，日軍強迫三萬六千俘虜不吃不喝從馬里韋萊斯(Mariveles)步行到聖費南多(San Fernando)，途中餓死、渴死、累死不計其數，史稱「死亡行軍」。 12. 日本解散菲國所有政治組織，由軍政監部直接統治，另成立「新菲島奉仕團」以為擁戴。
1943年	1.28 日本帝國議會確認讓菲律賓獨立之方針。 6.16 日本帝國議會通過於6.20成立「獨立準備委員會」，起草「菲律賓共和國憲法」。 9.30 日本政府宣布預備承認菲律賓共和國。 10.14 「菲律賓共和國」發表獨立宣言，勞瑞爾(Jose Laurel)擔任總統，日本公告撤廢軍政統治，兩國結為同盟。
1944年	3. 日本大本營陸軍部發表「最近菲島情事」，批評菲國親美歪風。 8.1 奎松總統於紐約逝世，奧斯敏納繼任總統。 9.23 美軍空襲馬尼拉，日本強制勞瑞爾發佈戒嚴及宣告對美戰爭狀態。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0.23 菲國流亡政府隨美軍反攻菲律賓。
	12.8 「完全黨」成立軍事組織「菲律賓愛國聯盟」(Makapili)。
1945年	1.9 美軍登陸呂宋島，2.3進入馬尼拉市區。
	2.5 美軍命抗日義勇軍虎克團解除武裝，於3.8逮捕其總司令阿奎那多(Emjitr Agutnaldo)。
	2.27 自治政府返回馬尼拉，重行施政。
	3.28 勞瑞爾經臺灣逃往日本，8.17於奈良宣布共和國正式消滅。
	5. 虎克團組織全國農民同盟(PKM)。
	6.8 奧斯敏納召集1941年當選者召開國會。
	7. 菲律賓工會聯盟(PCLO)成立。
	7.15 PKM結合PCLO與其他進步自由主義者組成民主同盟(DM)，並於翌年四月在呂宋中部提名候選人參加大選。
	7.28 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聯合決議案，授權總統就租用菲律賓基地問題與菲律賓進行談判。
	9.3 菲島日軍司令山下奉文呈遞降書。
	9.23 五萬人於馬尼拉遊行，抗議逮捕和殺害虎克(Huks)游擊隊，要求獨立和民主。
	10.20 美國在東京逮捕日本擁立的傀儡總統勞瑞爾。
	11. 奧斯敏納下令成立調查委員會，準備逮捕協助日軍者。
	11. 美國國會通過緊急立法，以撥款支付自治政府的支出。
	12.13 六萬五千人再度進行示威，要求獨立和民主。
1946年	1.19 自由黨(Liberals Party)成立，提名羅哈斯競選總統。
	4.23 菲國大選，最後一任自治政府產生，羅哈斯擊敗國民黨奧斯敏納當選為總統，季里諾(Elpidio Quirino)為副總統。
	5.28 羅哈斯政權成立，但為確保國會三分之二席位，藉口民主同盟以暴力脅迫選民，剝奪其六名眾議員和三名參議員的資格。
	6.25 菲律賓政府宣布「虎克團」為非法組織。
	7.4 菲律賓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脫離美國獨立，羅哈斯擔任第一任總統，季里諾為副總統。
	7.5 美菲雙方共同簽訂「美菲一般關係條約」，規定在菲律賓未出席的國際場合，美國有權代表菲律賓。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7.5 菲國會通過「菲律賓通商法」(又稱貝爾法案, Bell Trade Act), 承認美國人享有如同菲律賓公民的權利, 可開發菲律賓的自然資源, 並享有八年免關稅及二十年特惠關稅。
	8.29 羅哈斯與虎克團的和談破裂, 虎克游擊隊重新建立人民武裝力量司令部, 正式改名為人民軍 (HMB), 轉為地下武裝活動。
1947年	3.11 菲律賓舉行修憲案公民投票。
	3.14 美菲簽署「軍事基地協定」(Military Bases Agreement)生效, 3.26 起美國無償租用菲律賓二十三處基地與部分馬尼拉港區九十九年。
	3.21 美菲締結軍事援助協定, 美國協助菲國進行軍事教育訓練。
1948年	1.2 羅哈斯宣布特赦協助日軍者。
	3.6 政府宣布虎克團和全國農民同盟為非法組織。
	4.15 羅哈斯總統猝死, 季里諾繼任總統。
	5.10 季里諾和虎克團再度展開和解交涉, 但於 8.15 談判破裂。
	6.17 季里諾宣布將首都由馬尼拉遷往奎松市。
	10.17 政府宣布菲律賓共產黨 (PKP) 為違法組織。
1949年	* 虎克團得菲共支援, 再加上美國對菲採消極政策, 人民軍勢力增強。
	11.8 菲律賓舉行總統大選, 季里諾在美國支援下, 以暴力與作假等手段當選第二任總統。
	12.27 印尼獨立, 菲律賓立即予以承認。
1950年	* 菲國對美輸出占其外貿總額70%。
	1. 菲律賓共產黨政治局通過「1950 年決議」, 決定展開武力鬥爭。
	3.29 虎克團對政府展開強烈攻勢, 並於 11.10 編為人民解放軍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4.1 菲律賓全國實行軍事管制。
	8.7 菲律賓派遣戰鬥部隊參與韓戰。
	9.1 麥格塞塞(Ramon Magsaysay)出任國防部長, 在美國協助下, 展開撲滅虎克團作戰。
	12. 菲國正式對日請求賠償, 金額為八十億美元。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51年	<p>* 因實施農村開發，再加上領導人塔魯克（L. Taruc）與共產黨對立，虎克團勢力受挫消退。</p> <p>5.11 二十九名菲共高幹的審判結束，全員判處重刑。</p> <p>8.30 美菲雙方簽署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使菲國捲入韓戰及其後的越戰，但美國不保證防衛菲國。</p> <p>9.8 菲律賓在美國勸說下派代表團出席舊金山和會，但對戰爭賠償部分加以保留。</p>
1952年	<p>3.31 菲國通過農業共同組合法，設立佃農融資制度。</p> <p>4.15 美籍虎克團頭目波默羅伊(William Pomeroy)被捕。6.18 判處終身監禁。</p> <p>8.27 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生效。</p> <p>10.22 強烈颱風侵襲，造成四百四十人死亡。</p>
1953年	<p>* 和樂島回教徒反政府鬥爭激化。</p> <p>* 自由農民聯盟（FFF）成立。</p> <p>3.9 麥格塞塞退出自由黨，加入國民黨。</p> <p>5.26 隆布(Carlos Rombu)成立自由民主黨（LiberalDemocratic Party）以便競選總統，但其後與國民黨合併。</p> <p>11.10 國會通過工業和平法案(The Industrial Peace Act)，菲律賓勞工依此可組織工會團體。</p> <p>12.30 麥格塞塞當選第三任總統，賈西亞（Carlos Garcia）任副總統，為首屆國民黨政權。</p>
1954年	<p>2.23 菲律賓政府對虎克團展開總攻擊，5.17 領導人塔魯克投降。</p> <p>6.18 菲國政府成立「菲律賓救濟及貿易復興局」(Philippines Relief and Trade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PRATRA)。</p> <p>6.19 國會通過「零售業菲化法案」(Retail Trade Nationalization Law)，結束華人的商業獨佔。</p> <p>9.8 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成立，菲律賓為創始會員國之一，採取強硬反共政策。</p> <p>9. 菲國國會通過佃農法，進行農地改革。</p> <p>12.15 菲眾議院創設摩洛問題調查委員會。</p>
1955年	<p>9.9 菲國國會通過農地改革法，設定地主保有土地面積之上限，但因漏洞頗多而告失敗。</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9.15 美菲修改菲律賓通商法，菲國收回披索兌換美元的匯率調整控制權。
	11.9 對九個上議院席位進行補選，國民黨贏得其中八席。
1956年	* 菲國國會通過黎？法，強制各級學校教授民族英雄黎？(Jose Rizal)的著作。
	5.9 菲日兩國簽署賠償協定（ Philippine-Japanese Reparations Agreement ），日本賠償五億五千萬美元及提供開發借款二億五千萬美元。
	7.11 美國宣布承認菲律賓對美軍基地的主權。
	7.16 參院批准菲日賠償協定及舊金山對日和約。
	12.5 在馬尼拉舉行的美菲基地問題談判破裂。
1957年	3.17 菲律賓總統麥格塞塞墜機喪生，賈西亞繼任總統，馬嘉柏？（ Diosdado Macapayal，自由黨 ）任副總統，是第一次兩黨聯合執政。
	5.22 國會通過破壞活動防止法，共產黨和人民軍被視為非法組織。
	6.22 菲國成立「國民統合委員會」(CNI)，檢討文化性少數民族問題。
	11.12 國民黨賈西亞擊敗自由黨的尤洛(Jose Yulo)被選為總統，自由黨馬嘉柏？則擊敗國民黨的勞瑞爾(Jose Laurel)當選副總統。
1958年	* 賈西亞組織「民族進步運動」，主張廢除貝爾法案、解除外匯與進口管制。
	3.11 參議院進行改選，賈西亞之國民黨獲勝。
	6.11 菲政府判處虎克團領袖塔魯克終身監禁。
1959年	4.26 菲與南越簽訂友好協定。
	8.13 菲國教育部以行政命令規定改泰加洛語（國語）為菲律賓語，並力行其普及化。
	9. 賈西亞提出「菲律賓國民優先(Philippine First)政策」，強調經濟民族主義。
	10.12 美菲簽訂保連 - 瑟拉諾協定(Bohlen-Serrano Agreement)，成立共同防衛委員會(Mutual Defense Board)，加強美菲間之軍事合作。
1960年	* 政府國勢調查顯示佃農占農民40%，呂宋中部稻作農家的佃農比例更高達66%。
	* 政府解除非常事態，緩和對華人居住之「新村」的規制。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2.9 菲日簽定友好合作協定。
1961年	1.18 台、菲、韓與南越四國外長於菲國集會。
	3.14 菲律賓大學展開「學術自由」運動。
	8.3 馬、菲與泰三國宣布於曼谷組成東南亞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SA)。
	11.17 馬嘉柏? 連任總統，斐雷茲(E.Palaez)為副總統，宣布取消外匯管制、停止進口配額制、全面開放外資及廢除菲美一般關係條約。
1962年	4.30 菲國眾議院決議沙巴為菲國領土，因其在租界英國之前隸屬於蘇祿王國。
	6.22 馬嘉柏? 總統正式宣布反對北婆羅洲(沙巴)併入馬來西亞。
1963年	* 馬可仕(Ferdinand E. Marcos)出任參議院議長
	1.22 斐雷茲副總統抵英，與英官員舉行會談。
	7.30 印菲馬三國召開高峰會議討論沙巴問題。
	8.3 印菲馬三國發表「馬尼拉宣言」與締結「馬尼拉協定」，同意聯合國調查沙巴住民意願。
	8.8 通過農地改革法 (Agriculture Land Reform Act)，先實行佃租縮減，再使其轉為自耕農。
	9.16 馬來西亞聯邦成立 (仍屬大英國協)，菲馬斷交。
1964年	7.15 國會通過法案，對南越實施包括經濟、醫療與技術援助等，總金額約一百萬披索。
	11.25 美軍基地發生槍殺菲人事件，迫使美菲兩國重新檢討有關美軍人員的訴訟管轄權問題。
	11.30 因越戰激化，使學生運動加劇，民族主義青年同盟 (KM) 成立，進行大規模反美示威。
1965年	* 人民軍 (虎克團) 再度展開活動。
	11.9 菲國舉行參議院、地方首長及地方議會選舉，執政的國民黨大勝。
	12.30 馬可仕加入國民黨，並獲提名競選總統成功，副總統為羅培茲(Fernando Lopez)。
1966年	* KM以「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為口號進行文化運動。
	1.25 台菲友好協會於馬尼拉成立。
	5.10 菲國允許日本人於境內從事貿易活動。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66年	<p>6.3 馬可仕主張擱置沙巴問題，菲馬重新建交。</p> <p>7.14 國會通過越南援助法，菲律賓政府決定派遣兩千名非戰鬥人員投入越戰。</p> <p>9.1 菲律賓宣布新經濟開發四年計畫。</p> <p>9.16 美菲締結協定，將基地租借期間縮減為二十五年。</p>
1967年	<p>2.7 前進派成立民族主義運動（MAN）。</p> <p>8.1 參與創設「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ASEAN）。</p> <p>9.1 通過「獎勵投資法」。</p>
1968年	<p>* 天主教社會運動(CSM)成立。</p> <p>3. 馬可仕開放與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的貿易。</p> <p>5. 馬塔蘭(Udtog Matalam)宣布組織「回教獨立運動」(The Muslim Independence Movement)，主張菲南建立一回教國家。</p> <p>5. 民答那峨獨立運動（MIM）正式展開。</p> <p>7.16 菲與馬談判沙巴歸屬問題宣告破裂。</p> <p>8.27 眾議院通過法案，宣布沙巴為菲律賓領土，9.18馬可仕簽署沙巴合併法案，9.20馬來西亞宣布與菲律賓斷交。</p> <p>12.26 菲律賓大學教授西松（Jose Sison)重整菲律賓共產黨(PCP)，制訂人民民主革命綱領，並於翌年進行武裝抗爭。</p>
1969年	<p>2.11 簽署「日菲友好道路協定」。</p> <p>3.29 PCP成立「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但立即遭政府軍強力鎮壓，而改於各地進行游擊戰。</p> <p>4.18 數萬農民包圍國會和總統官邸要求土地改革</p> <p>7.26 美國總統訪問菲律賓。</p> <p>11.11 舉行總統大選，12.30馬可仕藉由賄選和暴力連任第七任總統，引起全國譁然。。</p>
1969年	<p>11.14 馬可仕宣布撤出所有駐越之菲國軍隊。</p> <p>12.16 馬來西亞與菲律賓恢復正常邦交。</p>
1970年	<p>* 穆蘇瓦里(Nur Misuari)成立「摩洛民族解放陣線」(The 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爭取建立「摩洛民族共和國」，表明將以選舉產生制憲會議。</p> <p>1.26 學生展開反馬可仕示威，與勞農運動結合。</p> <p>1.30 發生軍警向示威群眾開槍的Mendtola慘案。</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2.21 菲政府將對外匯兌改行浮動匯率制。
	4.5 馬尼拉發生反美暴動，4.7全國總罷工。
	7. 民答那峨回教徒與治安軍警衝突頻仍。
	7.24 美國宣布自菲律賓撤出六千名部隊。
	11.10 馬可仕為延續政權，舉行制憲會議選舉。
1971年	1.14 副總統羅培茲辭職。
	6.1 馬可仕召開制憲會議，並收買多數議員，試圖解決無法第三次出任總統的憲法障礙。
	6.19 菲國展開對民答那峨回教徒的大屠殺。
	6. 自由農民聯盟(FFF)在國會前展開長達八十三日的靜坐，迫使國會於九月修改農地改革法。
	8.21 反馬可仕的自由黨於集會時發生爆炸案，兩名領導人和七名自由黨候選人受傷，艾奎諾（ Benigno S. Aquino ）因遲到逃過一劫。
	8.23 馬可仕下令暫時中止「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授權警察自由逮捕叛亂分子。
	11.8 菲國舉行期中選舉，執政的國民黨大敗。
1972年	1.11 菲國全面恢復「人身保護令」。
	2.12 與蘇聯、中國建立貿易關係。
	7.8 制憲會議通過改總統制為內閣制的憲法草案，馬可仕準備自任總理，以延續政權。
	9.22 馬可仕藉口有人謀刺國防部長實施戒嚴，逮捕數千名反對黨人士、新聞從業人員和學生。
	9.23 馬可仕宣布實施軍管，終止憲法，解散國會，禁止政黨活動。
	9.29 馬可仕下令所有公務員辭職，以符合戒嚴令下的徹底改革計劃。
	10.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NCF)於和樂島起事。
	10.13 制憲會議通過臨時政府組織條例，以便逐漸將現行體制由總統制過渡至內閣制。
	11.30 制憲會議公佈新憲法，規定由臨時國民議會選舉總統和總理，但其召集時間則由現任總統決定。
	12.7 伊美黛(Imelda Marcos)總統夫人在參加儀式中被刺殺負傷。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73年	<p>* 共產黨都市工農組織成立民族民主陣線（NDF），進行反馬可仕的地下活動。</p> <p>* 馬可仕推動農地改革和促進經濟開發，以「新社會」為號召，維持政權的正當性。</p> <p>1.16 新憲法經全民複決批准後，於翌日生效。</p> <p>1.17 馬可仕總統宣布新憲法，並持續戒嚴狀態。</p> <p>1.31 馬可仕總統宣布關閉國會，主張須如此方能打破特權壟斷。</p> <p>7.27 菲國舉行全民複決，通過馬可仕無須透過選舉即可無限期擔任總統。</p> <p>9.9 推行糧食自給計畫，提供農民信用貸款和充實灌溉設備。</p> <p>9.11 內閣新設工業部，加工出口區首次外銷成功。</p> <p>12.27 為促進日資的導入，解消對日警戒，批准擱置十三年的「菲日通商航海條約」。</p>
1974年	<p>2.7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NLF）展開大規模攻勢，動亂擴及民答那峨全域。</p> <p>2. 日本軍人小野田(Hiroo Onoda)潛藏叢林三十年後向菲政府投降。</p> <p>6.20 教育部制訂原住民語言與英語並用方針。</p> <p>7.3 保護美國人特權的蘭格雷協定期滿失效。</p> <p>9.1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於民答那峨島、蘇祿群島發動「九月攻勢」。</p> <p>9.17 最高法院承認實施戒嚴令的合法性。</p> <p>9.20 伊美黨以總統特使身分訪問中國，簽署中菲擴大貿易協定。</p> <p>10. 馬可仕總統宣布拉瓦蒂特(Lavatite)派的菲共（Partido Kommunistang Pilipinas, PKP）為合法組織。</p>
1975年	<p>1.18 菲政府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於沙烏地阿拉伯的吉達進行和談。</p> <p>2.27 菲國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進行是否繼續實施戒嚴令。</p> <p>4.17 馬可仕政府與二十七個回教團體的一百四十位領導人進行和談。</p> <p>5.10 准許地主保有土地，實施定額出租制。</p> <p>6.7 馬可仕總統訪問中國，並於6.9與其建交。</p> <p>6.30 菲政府與回教勢力進行第二次和談，拒絕其分離獨立。</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0.27 馬可仕得力支柱瓦嘉(Guiermode Vega)遇刺。
	11.1 實行馬尼拉首都圈整合計畫，11.6馬可仕任命其夫人伊美黛出任大馬尼拉市(Metro Manila)市長。
	11.7 回教武裝游擊隊於民答那峨島海面襲擊日菲合資漁船蘇祿四號，並劫持六名日本船員，11.14向菲律賓政府要求贖金，12.6全員獲釋。
	12.7 美國福特 (G. Ford)總統訪問菲律賓，討論美軍基地問題。
1976年	* 稻米首次達成安定自給。
	3.29 美菲進行通商協定交涉，並於 4.12 展開修訂軍事協定交涉。
	4.18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再度展開攻擊。
	5.31 馬可仕總統訪問蘇聯，6.2與蘇聯建交。
	7.12 與越南建交。
	9. 菲政府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戰鬥加劇。
	9.10 菲律賓以公民投票通過修憲案，決定設立臨時國會(Batasang Pambansa, Interim National Assembly)，議員包括民選與總統委任兩類。
	10.3 不滿美軍演習誤殺菲人事件的判決結果，菲律賓爆發反政府示威。
	12.15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同意在利比亞的黎波里與菲政府進行和談，12.23 雙方簽署和平協定，決定菲南回教地域十三省自治。
	12.23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與馬可仕總統簽訂協定，正式設置菲南摩洛自治區。
	12.30 菲政府釋放一千六百四十六名政治犯。
	12. 新人民軍司令官丹迪(Dante)和共產黨主席西松相繼被捕，組織迅即衰弱。
1977年	1.16 新加坡李光耀總理訪問菲律賓。
	1.21 菲律賓與印尼簽署「肥料交換協定」。
	1.22 菲律賓與新加坡簽訂「優惠關稅協定」。
	2.6 馬可仕總統簽署「回教徒身分法」。
	2.14 馬可仕總統宣布國會選舉無限期延後。
	3.26 為解決菲南回教地區的分離獨立運動，馬可仕總統宣布於4.17舉行住民投票，但摩洛民族解放陣線加以抵制，雙方再度展開戰鬥。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p>3.31 簽訂第一次「日圓借款協定」，金額共一百八十三億日圓。</p> <p>6.3 公佈「獎勵農業投資法」。</p> <p>7.1 菲律賓開始實行「卡車國產化政策」。</p> <p>8.4 馬可仕總統宣布放棄爭奪沙巴主權，以交換馬來西亞不支援摩洛民族解放陣線。</p> <p>9. 中長期經濟發展計畫（1978—1982年）獲國會通過；新設能源部。</p> <p>10. 宣布增加巴丹（Batan）加工出口區的外商優惠措施。</p> <p>11. 正式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p> <p>12.17 舉行國民對馬可仕政權的信任投票，獲得89%高度支持。</p>
1978年	<p>1.3 菲律賓國會批准「菲英租稅協定」。</p> <p>1.14 簽訂第二次「日圓借款協定」，金額共兩百二十五億日圓。</p> <p>2.7 馬可仕總統簽署「1978年選舉法」。</p> <p>3.12 中國李先念副總理訪問菲律賓。</p> <p>4.17 菲律賓舉行臨時國民議會（IBP）選舉，共有卅個政黨參加，馬可仕主導的「新社會運動黨（KBL）」大勝。</p> <p>4.19 人民力量黨主席塔納達（Lorenzo Tanada）率眾進行和平示威，抗議政府在選舉中的舞弊行為，結果遭軍警逮捕。</p> <p>6.2 馬可仕宣布將政體改為議會內閣制，6.12馬可仕召開臨時國民議會，並自兼總理。</p> <p>9.8 簽訂第三次「日圓借款協定」，總金額三百二十五億日圓。</p> <p>10.31 亞洲開發銀行（ADB）決定貸予菲律賓一千四百萬美元作為建築灌溉系統之用，並於11.17再融資兩千四百萬美元，以改善菲律賓道路系統。</p>
1979年	<p>* 因第二次石油危機導致通貨膨脹，國民對政府的不滿升高。</p> <p>1.7 美菲簽定新基地協定。</p> <p>2.16 美軍事基地正式轉由菲國管理。</p> <p>5.11 菲日簽訂經濟貿易協定。</p> <p>9.3 總統與民間代表協議促進外銷緊急措施。</p>
1980年	<p>1.30 實施自1971年以來首次地方選舉。</p> <p>5.1 碧瑤（Baguio）、宿務加工出口區開始外銷。</p> <p>5.8 於戒嚴令公佈後即遭捕的前參議員艾奎諾，以心臟病手術為由流亡美國。</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81年	11.3 曼拉普斯(Raul Manglapus) 等反馬可仕派在軍事法庭受審。
	1.17 馬可仕總統宣布解除戒嚴。
	2.17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抵馬尼拉訪問。
	4.7 憲法修正案經公民投票通過，採取一院制國會，總統任期六年，連任不受限制。
	6. 樞機主教辛海梅(Cardinal Jaime Sin)公開指控政府壓制教會。
	6.16 因反對黨抵制投票，馬可仕以88%得票率當選總統。
	7.3 馬可仕任命維拉塔(Cesar Virata)擔任總理。
	8.10 臨時議會通過法案取消地方法院。
1982年	* 馬可仕訪問沙烏地阿拉伯，希望其協助說服穆蘇瓦里放棄獨立建國。
	3.12 馬可仕開辦「菲律賓夏里亞機構(Philippines Sharia Institute)」，以訓練伊斯蘭法之律師和法官。
	4.23 勞瑞爾(Salvador Laurel)主導成立「國民民主聯盟」(UNIDO)。
	7.6 馬可仕總統訪問蘇聯。
	8.7 馬可仕總統任命其妻伊美黛擔任行政長官。
	9.17 馬可仕總統訪問華盛頓，並於9.19表示對美國要求日本增強防衛武力感到憂慮。
	2. 菲國天主教主教會議發表昭告批評馬可仕。
	8.21 艾奎諾返國，但於抵達馬尼拉時被刺殺。官方宣稱係共產黨所為，但不為群眾接受，因而爆發嚴重反政府示威。
1983年	8.31 超過一百萬菲律賓民眾參加艾奎諾葬禮，在野之國民民主聯盟發表共同聲明，要求馬可仕辭職，各地反政府行動持續擴大。
	9.20 馬可仕總統宣布絕不辭職，翌日菲律賓發生大暴動，五十萬人在總統府前示威，造成十人死亡，九十二人受傷。
	9.30 發表經濟更生十一項措施。
	10.3 美國雷根(R. Reagan)總統宣布，無限期延後原訂的訪菲之行。
	10.10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決議，譴責艾奎諾暗殺事件。
	11.1 菲國宣布外匯全部集中於中央銀行。
	11.2 伊美黛宣布辭去行政長官職務。
	* 不滿軍中腐敗的青年軍官以國防部長安利爾(Juan Ponce Enrile)為首腦，組成「國軍改革運動」(RAM)。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p>1.27 針對設置副總統一職的憲法修正案舉行公民投票，並於2.1另通過四項修憲案。</p> <p>4.27 日本閣議決定對菲貸款五百五十五億日圓。 菲律賓國會大選，在野黨席次增加至32%，4.26馬可仕針對此點召開語氣強硬的記者會</p> <p>7.3 反馬可仕的高爾神父(Father Brian Gore)與歐布連神父(Father Niall O' Brien)被釋放。</p> <p>7.6 最高法院要求政府釋放西松。</p> <p>7.30 國會投票重新推選維拉塔為總理。</p> <p>8.21 馬尼拉舉行艾奎諾暗殺事件周年紀念，共四十五萬人參加。</p> <p>9.21 菲律賓發生反政府示威暴動。</p> <p>10. 政府宣布實施合乎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融資條件的各項經濟措施，包括採行浮動匯率、解除外匯 融資管制與廢止經濟安定稅。</p> <p>10.13 日本銀行、美財政部與韓國銀行協商，宣布將給予菲政府一千萬美元特別融資。</p> <p>10.23 調查艾奎諾遇刺案委員會(主席阿嘉瓦Agrava)指軍方謀害艾奎諾，參謀總長維爾（Ver）請假候審。</p> <p>12.26 馬可仕總統與反對派領袖簽署「統合宣言」(Declaration of Unity)，保證給予共黨合法地位。</p>
1985年	<p>1.21 前自由黨領導人沙隆嘉（Jovito Salonga）返回馬尼拉。</p> <p>1.23 艾奎諾暗殺事件起訴包括參謀總長在內的二十五名軍人和一名平民，2.1舉行首次公開審判。</p> <p>3. RAM第一次公開活動，要求整頓軍隊操守。</p> <p>3.4 馬可仕總統解除外交部長多倫迪諾（Arturo Tolentino）職務。</p> <p>7. 頒佈經濟重建五大專案。</p> <p>10.16 馬可仕總統與美國總統特使拉賽爾(Laxail)會談，討論關於菲律賓政情不穩事宜。</p> <p>10.23 上蘇利高省(Surigao del Sar Province)省長馬力歐（Gregorio Marillo）遇刺。</p> <p>11.3 馬可仕為證明民意支援，宣布提早一年舉行總統選舉。</p> <p>11. 反馬可仕勢力宣布成立「新連線人民力量」(New Allied of People Power)，以進行各派整合。</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2.2 涉嫌艾奎諾暗殺之參謀總長維爾等人全部宣判無罪。
	12.3 菲律賓訂於1986.2.7大選，艾奎諾遺孀柯拉蓉（Corazon Aquino）宣布參選，以最大在野黨國民民主聯盟主席勞瑞爾為搭檔。
1986年	2.7 得天主教會及民眾支持的柯拉蓉與現任總統馬可仕均宣稱獲得當選。
	2.15 繼選舉管理委員會宣布不實結果之後，國會亦宣布馬可仕當選，引發支援柯拉蓉群眾不滿，群集街頭。
	2.16 柯拉蓉在群眾集會上宣布「六點非暴力抗爭計劃」，旨在迫使馬可仕辭職。
	2.20 美眾院外交委員會無異議通過停止對菲律賓的軍事援助及切斷對馬可仕的任何經濟援助。
	2.22 國防部長安利爾（Juan Enrile）及副參謀總長羅慕斯（Fidel Ramos）進行兵諫，與柯拉蓉聯合引發「二月革命」。
	2.24 美國要求馬可仕下臺，馬可仕雖強行宣誓就任總統，但翌日即自美國駐菲海軍基地搭機逃往夏威夷。
	2.25 柯拉蓉宣誓就任總統，翌日組織新內閣。
	2.27 柯拉蓉下令釋放所有政治犯，並於3.2宣布恢復實行「人身保護令」。
	3.25 柯拉蓉總統解散國會，取消1973年以來的戒嚴令，並廢除總理職位。
	4.10 菲律賓共產黨宣布放棄武力抗爭。
	5.25 柯拉蓉任命組織憲法委員會，開始草擬新憲。
	7.6 菲律賓前執政黨「新社會運動黨」多倫迪諾率領軍隊及支持者佔領馬尼拉賓館，翌日與政府達成協議投降。
	7.7 柯拉蓉宣布禁止馬可仕的支持者舉行各種集會，但軍隊內部的馬可仕派仍先後發動達七次軍事政變，幸賴「國軍改革運動」的安利爾加以救平。
	8.8 多倫迪諾承認柯拉蓉總統的合法地位。
	9.5 柯拉蓉總統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領導穆蘇瓦里會談。
	9.15 柯拉蓉總統訪問美國，就菲國經濟情勢、美國對菲援助與軍事基地等問題進行會談。
	9.18 美眾議院通過修正案，再提供菲律賓兩億美金的援助，但卻於9.30遭參議院否決。
	9.29 新人民軍總司令薩拉斯(Rodolfo Salas)被捕。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0.12 菲國成立亞洲第一個女性政黨。
	10.15 菲律賓憲法委員會三讀通過新憲條文。
	11.10 柯拉蓉就菲律賓經濟情勢與日本舉行會談，但因11.20發生三井物產馬尼拉支店店長遭綁架事件，日菲關係陷入低潮。
	11.23 柯拉蓉總統下令撤換對新政府不滿的國防部長安利爾，美國重申支援柯拉蓉政府。
	11.27 菲國政府與共產游擊隊新人民軍達成停火協定，終止十七年來的內戰狀態。
	12.1 公營企業開始民營化。
1987年	1.2 前國防部長安利爾宣布進行反新憲法運動。
	1.4 摩洛民族解放陣線主席密蘇瓦里宣布與馬國政府簽訂協定。
	1.17 穆蘇瓦里同意將追求獨立修改為充分自治。
	1.27 一千名支持馬可仕之政府軍叛變，佔領馬尼拉軍事設施與廣播電臺等，1.29全部投降。
	2.2 菲律賓舉行國民投票，批准新憲法，准許柯拉蓉續任至1992.6.30，但不得連任。
	2. 柯拉蓉宣布「綜合農地改革計畫」。
	2.9 政府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話。4.9和談破裂。
	5.11 舉行國會大選，親柯拉蓉派「新連線人民力量」獲大多數席位；柯拉蓉宣布新憲法生效。
	7.10 公佈「1987年新綜合投資法」。
	8.26 菲律賓爆發大規模全國總罷工。
	8.28 擁護馬可仕的將領發動武裝兵變，襲擊基地、廣播電臺；前國防部長安利爾亦率眾佔領國防部，但稍後均遭平定。
	9.9 柯拉蓉總統要求所有閣員提出辭呈，內閣進行全面改組。
	9.19 左翼「新國民聯盟(Buyan)」領導人阿里賈多羅(Leandro Alejandro)被暗殺。
	12. 開始執行「國產車開發計畫」。
1988年	1.21 柯拉蓉總統任命羅慕斯(Fidel V. Ramos)為國防部長。
	4.5 菲律賓和美國代表在馬尼拉舉行有關駐菲美軍基地的會談。
	4.14 柯拉蓉總統首次訪問中國。
	6.13 柯拉蓉總統訪問瑞士、義大利和梵蒂岡。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8.27 菲律賓反對黨領導人共同宣布成立「全國行動聯盟」，成員包括國民黨、統一民族民主組織、新社會運動、民主聯盟、民丹老聯盟、穆斯林聯邦黨和基督教社會民主黨。
	10.17 美菲基地協定完成簽署，菲國同意美國繼續使用兩個軍事基地，美國同意在1991年原協定期滿前，將補償費從每年一點八億美元提高至四點八一億美元，另提供五億美元經濟援助。
	11.27 菲外交部長訪問越南。
1989年	4.21 美軍上校羅威（James Rowe）被新人民軍擊斃，為遇害者中最高軍階。
	5.21 勞瑞爾被選為「新連線人民力量」主席。
	9.28 前菲律賓總統馬可仕病逝。
	11.19 回教地區舉行對自治基本法的住民投票，只有4個省獲得通過。
	12.1 親馬可仕的菲律賓海軍發動軍事政變，菲政府於12.6發佈緊急非常事態宣言，並在美軍支援下迫使叛軍投降。
	12.20 實行國家緊急安全法(National Emergency Act)。
1990年	* 菲政府設置民答那峨回教自治區，並由自治區主席穆蘇瓦里擔任委員長，組織「和平開發評議會」。
	2. 美國國防部長發表削減駐亞洲美軍計畫。
	5.14 美國與菲律賓就軍事基地問題展開協商。
	8.28 卡斯托迪歐(Luther Custodio)以及其他十五名叛軍幹部被判處終身監禁。
	10 軍方反對派於民答那峨叛變失敗，為新政府成立後最終的軍事行動。
	10.24 菲國工會發動全國罷工，要求增加基本工資。
	11.5 新人民軍領袖伯納多(Reynaldo Bernado)被捕。
1991年	1.2 眾議院通過法案，賦予總統於戰爭期間擁有緊急權限。
	1.3 柯拉蓉總統簽署削減政府支出法案。
	1.8 美菲基地交涉，菲國反對美國所提「以五年為期，分階段撤軍」的提議，但最後雙方仍於1.11達成交還兩軍事基地協議。
	1.19 美國駐菲律賓新聞文化中心發生爆炸案。
	1.29 農民團體上街頭要求禁止農地轉作他用。
	2.6 政府逮捕因意圖政變逮捕巴塔克(Victor Batac)和普魯加南(Abraham Purugganan)。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3.26 簽訂第四次「日圓借款協定」，總金額一千兩百億日圓，為有史以來最高金額。
	5.21 菲律賓與臺灣就海域重疊問題進行協議，並於7.7簽署船隻無害通行協定。
	6.4 皮納圖博火山(Mt.Pinatubo)爆發，使菲律賓經濟復興受挫，但亦迫使美國放棄受災慘重的克拉克空軍基地(Clark Field)。
	6.13 柯拉蓉總統簽署「1991年外國投資法」。
	8.27 美菲正式簽訂新軍用基地使用協定。
	9.16 參議院否決美國延長租借蘇比克基地協定，美國於11.26正式歸還克拉克空軍基地。
	10.8 馬尼拉地方法院判決應發給伊美黛返國所需證明文件，使她得於11.4返回菲律賓。
	12.18 菲律賓政府控告伊美黛貪污。
1992年	5.11 菲國舉行總統大選，因政黨林立而有七人競選。國防部長羅慕斯以24%的得票率當選。
	6.30 羅慕斯宣誓就任總統。
	8.25 五位菲共（CPP）高幹被釋放。
	9.1 參眾兩院同時決議菲共合法化。
	9.22 菲律賓政府宣布廢除「反顛覆法」，共產黨取得合法地位。
	11.24 美國將租借之蘇比克灣(Subic Bay)海軍基地交還菲律賓政府。
1993年	1. 羅慕斯總統訪問馬來西亞。
	3.9 羅慕斯總統為吸引更多外國投資，啟程前往日本進行訪問。
	4.5 羅慕斯總統簽署「電力危機法」。
	6. 羅慕斯指令羅薩尼歐(Ramondel Rosanio)為財政部長，但遭國會否決。
	8. 菲律賓與臺灣簽訂共同開發蘇比克灣美軍基地原址的計畫。
	9.7 前總統馬可仕遺體被運回菲律賓。
	11.1 菲政府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締結臨時休戰協定，雙方並於12月進行和平對話。
1994年	1.11 羅慕斯宣布成立取締貪污委員會(PCAGC)。
	2.9 臺灣李登輝總統訪問菲律賓，翌日中國就羅慕斯總統與李登輝總統會談一事表示抗議。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3.24 菲律賓解除對越南的貿易限制措施，3.28羅慕斯總統前往越南訪問。
	5.5 羅慕斯總統簽署公佈「附加價值稅(VAT)擴大適用範圍法」、「證券交易法」與「BOT修正法」。
	6.3 菲律賓政府對和樂島和巴錫蘭 (Basilan) 的回教分裂主義者進行反擊。
	6.25 IMF通過六億八千四百萬美元對菲擴大信用貸款。
	7.25 國會通過共和國第7941號法案(Republic Act No. 7941)，決定採行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
	8.27 政府軍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NLF)的衝突情勢升高，9.5雙方就自治與停戰監督達成協議。
	9.22 政府宣布自1995.1起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由總統府直轄改為由財政部管轄。
	9.26 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簽署共同防衛協定。
	10.28 菲國對馬來西亞逮捕菲國工人一事表示抗議。
	11.13 美國柯林頓 (B. Clinton) 總統訪問菲國。
	12.14 參議院批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1995年	1.13 羅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訪問菲律賓。
	1.29 政府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達成停火協議。
	2.8 羅慕斯總統向中國政府抗議中國船隻入侵領海的舉動。
	2.13 菲律賓政府宣布金融自由化措施，允許十家外國銀行開辦國內銀行業務。
	2.23 羅慕斯總統簽署「國軍現代化法」。
	3.3 羅慕斯總統簽署「比例代表制選舉法」。
	3.20 羅慕斯召回駐新加坡大使，以抗議新加坡判決菲律賓女傭死刑，同時宣布雙方斷交。
	3.24 菲國左翼團體針對新加坡處死菲律賓女傭事件，發起大規模示威活動。
	3.29 菲律賓海軍扣押六十二艘中國漁船。
	4.4 摩洛回教解放陣線 (MILF) 在南部發起暴動，菲國政府下令掃蕩。
	5.8 舉行參眾兩院及地方層級之統一選舉，執政黨獲得勝利。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p>6.7 羅慕斯總統簽署「國家水資源危機對策法」及「移民勞動者暨境外菲律賓人法」。</p> <p>7.22 羅慕斯總統宣布調降關稅，修正1978年有關工業部門的關稅法規。</p> <p>9.8 IMF宣布菲律賓適用IMF第八條規則。</p> <p>9.18 菲政府同意由馬可仕家族撥出五千萬美金，以撤回在美國及其它國家對馬可仕的訴訟。</p> <p>10.13 RAM與菲律賓政府簽訂和平協定。</p> <p>10.26 菲律賓當選WTO常任理事國。</p> <p>11.27 菲律賓政府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於印尼雅加達舉行第三次和平會談。</p> <p>12.12 羅慕斯總統發佈行政命令修正1978年關稅法，調降農產品關稅。</p> <p>12.16 羅慕斯總統宣布恢復與新加坡間的正常外交關係，並於翌日啟程前往新加坡訪問。</p>
1996年	<p>1.16 新加坡與菲律賓互派大使。</p> <p>1.25 菲律賓政府擱置「恐怖活動防止法」。</p> <p>2.29 羅慕斯前往曼谷參加亞歐會議（Asia-Eupuro Meeting，ASEM）。</p> <p>3.28 羅慕斯總統簽署「石油下游產業管制緩和法」、修改「外國投資法」、「農業關稅法」與「糧食保險公司法」。</p> <p>4.2 菲律賓政府與MILF交戰，政府軍四人、游擊隊五人死亡。</p> <p>4.12 菲政府與MILF展開對話，雙方同意暫時停火。4.28政府軍奪回MILF所佔領的地區。</p> <p>5.27 參議院以17比0否決修憲決議，眾院修憲委員會於6.6決定無限期停止討論十五項修憲法案。</p> <p>7.6 羅慕斯總統發佈命令，解除禁止菲傭前往新加坡工作的措施。</p> <p>8.14 日本開始發放菲律賓慰安婦補償金。</p> <p>8.29 菲政府在雅加達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舉行第四次和平談判，雙方於9.2簽署和平協定，且由摩洛民族解放陣線成員出任國軍副司令官。</p> <p>10.3 羅慕斯總統再度否認將延長自己任期，此為其就任以來第九次宣布。</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2.10 各國在東京召開援助菲律賓會議，十三個國家表示將提供二十九億美元的新貸款。
1997年	1.7 菲律賓政府與MILF進行停戰交涉。
	6.10 菲律賓最高法院決定維持原判，禁止透過公民投票修改憲法「總統一任六年，不得連任」的規定，阻斷現任總統羅慕斯的連任計畫。
	7.11 菲律賓披索(Peso)狂貶，金融危機開始。
	8.6 羅慕斯總統先宣布參加下屆總統大選，但其後於9.20表示無意連任而退出選舉。
1998年	1.11 菲政府與民族民主陣線(NDF)就人權問題達成協定，並於3.18簽署停戰協定。
	2.10 菲律賓與美國簽訂美軍地位協定(VFA)。
	4.6 羅慕斯總統簽署投資優惠法案(IPP)。
	5.11 總統大選投票結果揭曉，艾斯特拉達(Joseph Estrada)當選總統，並於6.30就任。
	6.12 菲國慶祝脫離西班牙獨立一百周年。
	8.5 美菲於南沙群島附近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10.6 最高法院判決伊美黨無罪。
1999年	1.13 證券交易委員會再由財政部移交總統府管轄。
	2.3 為解決憲法爭議，艾斯特拉達總統成立修憲準備委員會。
	2.4 因加入國際人權公約而廢除死刑的菲律賓，宣布再度恢復執行死刑。
	3.22 中菲於馬尼拉開會討論南沙群島領有權問題。
	7.21 菲國民航委員會(CAB)要求自10.1起斷絕台菲航線。
	8.29 艾斯特拉達總統組織菲律賓民眾黨(LAMP)。
	9.18 菲律賓派兵參加東帝汶的聯合國多國籍部隊。
	12.6 美國宣布延長對菲律賓的特惠關稅(GSP)至2001年。
	12.20 修憲準備委員會正式向艾斯特拉達總統提出修憲案，但總統於2000.1.8宣布予以擱置。
2000年	1.8 艾斯特拉達總統設置經濟調整評議會，並自任主席。
	1.10 MILF佔領馬金達那峨(Maquindanao)省首府。4.29政府軍攻擊MILF基地，戰事造成三十餘萬難民。
	1.14 菲國向中國抗議其漁船在南沙群島捕漁。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28	與臺灣締結臨時航空協定，2.3起台菲直航，但3.15再度斷航，至9.26再恢復通航。
2.26	歐薩密（Ozamiz）市發生爆炸案，四十四人死亡，此後民答那峨即不斷發生恐怖活動。
3.7	總統簽署零售業自由化法(RA. No.8762)。
3.24	因石油漲價與增加過路費，菲國全國交通大罷工。
4.12	蘇祿海岸客輪翻覆，五十人死亡。
4.22	政府軍開始攻擊沙雅夫(Abu Sayaph)基地。4.23沙雅夫綁架二十一名外國觀光客，至8.27於利比亞協調下全體釋放。
5.16	艾斯特拉達總統訪問中國。
6.1	臺灣宣布停止雇用菲傭三個月。
6.18	總統簽署電子商務交易法(RA. No.8792)。
6.28	回教國家組織(OIC)決議要求菲國停止攻擊MILF。
7.5	總統設置民答那峨調整評議會。
7.17	菲國與北韓建交。
9.1	依法(EO No.268)設置國家貪污取締委員會。
9.16	菲國展開大規模攻勢，沙雅夫敗逃。
11.13	眾議院通過對艾斯特拉達總統之彈劾案。
11.21	退役將領集體要求總統辭職。12.7參議院開始審理總統彈劾訴訟。
12.30	馬尼拉五處發生爆炸案，共二十二人死亡，一百二十人以上負傷。

菲國參議院於2001年1月通過對艾斯特拉達總統之彈劾案，同年1月16日起民眾上街頭要求總統下台，1月20日菲國最高法院宣告總統缺位，同日由副總統阿羅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繼任。

東帝汶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512年	*	葡萄牙人塔貝拉(Alfonso Tabella)來到帝汶。
1520年	*	葡萄牙殖民統治帝汶，勢力範圍在東部。
1613年	*	荷蘭人航抵西帝汶。
1651年	*	荷蘭人入侵西帝汶的古邦(Kupang)。
1701年	*	帝汶編入葡萄牙版圖。
1749年	*	荷蘭人將古邦編入領土。
1797年	*	英國歐仁吉(Sir M. Orange)公爵意圖奪取帝汶。
1859年	*	荷蘭簽訂里斯本條約，帝汶島西半部割讓荷蘭。
1861年	*	博物學者華勒斯(A. R. Wallace)抵達帝汶，描寫帝力較任何荷蘭最貧窮的都市更悲哀。
1896年	*	東帝汶脫離澳門管轄，成為自治殖民地（至1926年正式落實）。
1898年	*	德國與英國簽訂秘密條約，協議在葡國放棄東帝汶時共用經濟利益。
1904年	10.	荷蘭簽定條約，以直線作為雙方在帝汶的勢力範圍之界線。
1908年	10.	荷蘭在海牙換約，正式畫定帝汶國界。
1910年	*	東帝汶發生馬努發(Manufai)之亂。
1911年	*	東帝汶發生抗葡起義，導致上千人死亡。
1912年	*	日本因認定葡國疲於鎮壓，而對購買葡屬東帝汶產生興趣。
1913年	4.	葡、荷雙方接受海牙國際仲裁，分別統治東、西帝汶，分治的理由是族群、語言與宗教的差異（西帝汶是喀爾文教派，東帝汶是天主教）。
1914年	6.25	荷蘭國境的最終確定，使東帝汶販賣說不再成為熱門話題。
1918年	3.	澳洲政府公開表示警戒日本企圖領有東帝汶。
	10.	日軍參加一次大戰，佔領赤道以北的德屬密克羅尼西亞群島。
1921年	11.	松江春次設立「南洋興發株式會社」，請求海軍支援其向帝汶發展。
1922年	2.5	日本聲明承認葡萄牙統治東帝汶的正當性，表示對其沒有領土野心。
	4.	日本設置南洋廳，開始準備將南洋群島移為民政管轄。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2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葡國第一共和時代政局不穩，荷蘭計劃購買葡屬帝汶。 9. 日本召開南洋貿易會議，但排除葡屬東帝汶參加。
193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開始思考南進，而再對帝汶表示關心。
193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葡萄牙廢止東帝汶的軍政，改為文人總督。 * 日本表明帝汶島居於亞洲與澳洲間的重要位置。
1935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7. 日本海軍成立「南洋政策研究委員會」，提及帝汶的石油資源。
193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日本退出海軍裁軍條約，開始重視帝汶島的戰備重要性。 * 日本南洋興發株式會社與帝汶合作貿易，開闢帛琉至帝力船運。 * 日本外務省內部資料表示，葡萄牙不僅未開發東帝汶，且其遠離本國，極不合理。 5. 松江春次拜訪日本軍令部次長？田繁太郎，向其說明帝汶發展計劃。 7.20 日本海軍「南洋政策研究委員會」作成「進出東帝汶基本方針」。 8. 南洋興發株式會社先後三次派員至帝汶調查。
1937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6. 南洋興發株式會社開始在東帝汶收購企業。 8. 新東帝汶總督封朵拉（M. A. N. da Fontoura）到任。 8.30 駐印尼巴達維亞英國總領事費茲摩里斯(Henry Fitzmaurice)警告封朵拉總督，要他注意日本野心。 9.8 日本和葡萄牙合資成立的「祖國勤勞農事公司」(SAPT)在里斯本完成註冊。 10. 封朵拉總督和葡國政府均反對「祖國勤勞農事公司(SAPT)」總裁路易士(J. S. Louis)將土地讓渡南洋興發株式會社。
1938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英國警戒日本進出東帝汶，提出日本意圖形成「澳亞地中海」的野心。 7.9 日本派野野村領事赴東帝汶與葡國總督折衝。 12.8 日本發佈南沙群島領有宣言。
1939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6 南洋興發株式會社松江春次社長要求外務省協助解決SAPT合資契約遭否決一事。 3. 日本將南沙群島編入高雄州，決心南進。 10. 日葡達成協定，以日本40%，葡國60%的比例，共同經營東帝汶的大農園。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1.22 葡澳兩國協議以東帝汶石油供給澳洲，日本駐里斯本米澤菊二公使為此向葡國抗議。
1940年	1.4 因日蘇簽訂中立條約，使葡國當局緩和對日本在東帝汶事業的規制。
	4. 大日本航空申請開設帛琉到帝力航線，1941.10正式開通。
1941年	* 澳洲於東帝汶開設公使館。
	12.5 葡國自知無力對付日本的攻擊，乃與英國協議保護東帝汶安全。
	12.8 太平洋戰爭爆發，駐帝力日本總領事澁川正樹通告葡督嚴守中立。
	12.17 澳、荷聯軍一千五百人進駐帝汶。
1942年	1.13 葡國抗議日本侵犯其中立，派為數一千人的部隊進駐東帝汶，與荷、澳軍聯合防衛。
	2.7 日本陸海軍向南方軍下令展開東帝汶作戰。
	2.20 日軍第三十八師團東方支隊登陸帝汶島。
	8. 因統治中斷，東帝汶住民紛紛攻擊葡國人。
	9.5 帝汶島日本駐軍變更為第四十八師團。
	10.24 大規模反葡暴動發生，迫使總數約六百名的葡人逃往阿道洛(Adauro)島，向日軍要求保護。
	8.18 日軍完成掃蕩帝汶島全境。
	8.21 日本陸海軍達成協定，由陸軍防守東帝汶。
1943年	6. 因預計盟軍戰勝，英葡簽定阿佐雷斯(Azores)協定，同意盟軍使用東帝汶為軍事基地。
	7. 日本森島公使抗議葡國違反中立。
	10.26 阿佐雷斯協定簽署後，美國聲明尊重葡國對其殖民地之主權。
	11.26 葡國國會決議抗議日本侵犯主權，聲明要解決東帝汶問題。
1944年	2.5 日本大本營通過「視察要領」，同意葡國政府代表視察東帝汶。
	6.26 葡國撒拉薩爾(A. de Oliver Salazar)首相首次正式要求日軍撤出東帝汶。
1945年	4.7 日本東鄉外相向駐里斯本公使提出撤兵東帝汶的具體協議，但要求以暫緩六個月為條件。
	8.14 日本將西帝汶歸還荷蘭。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8.15 日本無條件投降，森島公使建議外務省立即歸還主權、行政權，日軍自行解除武裝。
	9.27 葡國拒絕盟軍進入東帝汶，自莫三比克派兵進駐，於帝力舉行終戰儀式。
1949年	* 荷蘭將西帝汶讓給印尼管轄，成為印尼的一省。
1950年	1.1 印尼獨立，西帝汶為印尼領有。
1951年	* 葡萄牙將東帝汶改為海外省。
1959年	4.20 荷蘭與葡萄牙訂約將帝汶島北半部讓與葡萄牙，包括阿道羅島及歐庫西(Okusi)，合稱「葡屬帝汶」，荷蘭人則控制西帝汶。
	* 東帝汶維科科(Wykeke)地方發生動亂。
1961年	8 京都大學探險隊戰後首次進入東帝汶。
1973年	* 日本帝汶協會成立。
1974年	4.25 葡國發生「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獨裁政權倒臺。
	5.11 葡屬帝汶總督奧德拉(Fernando Alves Aldela)宣布允許人民組織政黨，同日帝汶民主聯盟(簡稱UDT)成立。
	5.12 帝汶社會民主協會(ASDT)成立。
	5.27 帝汶人民民主協會(簡稱APODETI)成立。
	6.17 ASDT致函印尼外長要求尊重其自決權。
	9.5 澳洲總理威拉姆會見印尼總統蘇哈托，表示贊成東帝汶併入印尼。
	9.12 ASDT改稱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FRETILIN)。
	11. 新東帝汶總督派瑞斯(Mario Lemos Pires)履新。
	12.3 葡萄牙反殖民部長在聯合國大會表示，無法讓東帝汶立即獨立。
1975年	1.22 獨立革命陣線、民主聯盟組成聯合陣線支援獨立，排拒人民民主協會與印尼合併的主張，尋求與里斯本談判，以建立過渡政府。
	3.9 在里斯本要求下，葡萄牙與印尼情報局副局長穆多波(Ali Murtopo)在倫敦舉行秘密會談。
	3.20 東帝汶全境舉行村長選舉。
	5.7 於帝力舉行第一次非殖民地化會議。
	5.26 民主聯盟宣布不再與獨立革命陣線合作。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6. 蘇哈托宣布東帝汶不可能獨立。
	6.26 各派在澳門舉行第二次非殖民地化會議。
	7.8 蘇哈托於訪美歸國後發表聲明，表示排除東帝汶獨立的可能。
1975年	7.17 葡萄牙公佈新憲法，規定東帝汶在1976.10舉行人民議會選舉，以決定東帝汶之未來，此舉引起印尼不快。
	8.11 民主聯盟發動政變與獨立革命陣線交戰，8.21進入內戰狀態。
	8.15 獨立革命陣線軍隊佔領山城艾琉（Aileu）的軍事訓練中心。
	8.28 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佔領帝力。
	11.28 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宣布脫離葡萄牙而獨立，成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East Timor)。
	9.7 民主聯盟(UDT)向印尼請求合併，以交換在國境地帶受其保護。
	9.24 民主聯盟(UDT)軍逃入印尼境內。
	10.8 巴都嘉德(Batugade)陷落。
	10.16 澳洲電視臺採訪記者五人在瓦里基(Varigi)遇害。
	11.1 印尼與葡萄牙在羅馬舉行會談。
	11.29 東帝汶親印尼派(包括民主聯盟、人民民主協會、勞工黨)宣布葡屬帝汶併入印尼。
	12.7 印尼軍全面入侵，東帝汶親印尼派獲印尼軍支援佔領首都帝力，成立「東帝汶臨時政府」。
	12.7 葡萄牙宣布與印尼斷交。
	12.22 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要求印尼軍隊撤出東帝汶。
	12.24 印尼政府拒絕聯合國決議，並對反抗勢力進行壓制。
1976年	* 領導革命的「武裝部隊運動」(Movimento das Forças Armadas)溫和左派贏得葡萄牙國會選舉，希望解決東帝汶問題。
	1.20 聯合國代表前往東帝汶調查，因印尼阻撓，未能與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會面。
	2.3 東帝汶臨時政府禁止一切政黨活動。
	4.22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印尼立即撤軍。
	5.31 東帝汶臨時政府「住民代表會議」宣布併入印尼。
	6.29 印尼政府宣布接受東帝汶的合併申請。
	7.15 葡萄牙同意印尼合併東帝汶。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7.17 蘇哈托宣布東帝汶與印尼正式合併，東帝汶成為印尼第二十七省。
	8.19 不結盟國家高峰會確認東帝汶人民自決獨立的權利。
	11.19 聯合國大會駁斥印尼合併東帝汶的主張，通過要求安理會採取行動的決議。
1977年	9. 印尼軍展開「包圍殲滅作戰」，開始大屠殺。
	11.28 聯合國大會確認東帝汶住民自決與獨立權利，決議要求秘書長派遣代表前往調查。
1978年	* 印尼政府頒佈法令，授權中央政府接管東帝汶省政府。
	9.7 各報記者訪問東帝汶，對飢餓狀況大感驚訝。
	11.12 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最後據點遭印尼軍攻陷。
	11.20 聯合國大會決議由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派遣調查團前往東帝汶，並要求安理會採取行動。
	12.31 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首腦羅伯特(Nicola Robert)戰死。
1979年	10. 國際紅十字會開始在東帝汶展開活動。
	12.13 聯合國大會再次確認東帝汶應在聯合國監視下行使自決權的權利。
	12.15 聯合國難民總署開始援助活動。
	12.22 澳洲正式承認印尼合併東帝汶。
1980年	6.10 獨立革命陣線攻擊帝力電視臺，印尼軍隨即展開報復行動。
	11.11 聯合國大會決議要求相關各國履行「賦與殖民地獨立宣言」。
1981年	* 聯合國大會對於將東帝汶案納入議程進行投票，五十四票贊成，四十二票反對，四十六票棄權。
	2.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開始審議印尼人權狀況（直至1984年為止每年均予譴責）。
	3.1 民族抵抗革命評議會(CRRN)成立。
	4.15 因遭受印尼軍攻擊，國際紅十字會退出東帝汶。
	5. 印尼軍開始展開治安作戰。
	6.3 東帝汶省議會向蘇哈托提出緊急請願，批評「開發」的現狀。
	9. 印尼軍在拉古陸達(Lakuroda)展開大屠殺，一日之間殺害九百人。
	12.24 聯合國大會決議要求葡、印尼、東帝汶代表協助住民行使自決權。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82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印尼同意開放外國人訪問東帝汶。 4.12 國際紅十字會獲准重新展開活動。 5.16 羅馬教皇聲明不承認印尼兼併東帝汶。 10.13 蘇哈托訪美，受美國媒體攻擊。一百名國會議員聯名要求政府對東帝汶採取行動。 11.23 聯合國大會決議要求秘書長與所有關係者開始協議解決東帝汶問題。
1983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聯合國開始介入協調東帝汶問題之解決。 3.23 印尼軍與獨立革命陣線成立停戰協定。 4.7 印尼政府同意讓八十名東帝汶人民移居澳州，與其家屬團聚。 5.10 帝力的教皇行政官羅培斯(M. Ropes)辭職，由貝羅(Bishop Carlos Felipe Belo)接任。 7. 國際紅十字會被迫停止活動。 8. 印尼軍展開「一掃作戰」。
1984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印尼和葡萄牙就東帝汶問題進行談判。 1. 東帝汶嚴重糧食不足。 3.16 國際紅十字會在阿道洛島活動。 5. 印尼政府拒絕澳洲駐印尼大使前往東帝汶訪問(直至七月才給予許可)。 10.23 葡萄牙總統於聯合國大會表明東帝汶住民行使自決權的重要性。
1985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4. 世界銀行融資帝力成立家族開發中心。 4.29 德國議員團訪問東帝汶，表示「整個島有如被逮捕一般」。 5.8 美國一百三十一名眾議員聯名致函雷根，要求對東帝汶展開行動。 8.18 澳洲總理霍克承認印尼擁有東帝汶及西新幾內亞(伊里安查亞)的主權。 9.19 不結盟國家會議討論東帝汶議題。
1986年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7.11 歐洲議會譴責印尼兼併行動，支援東帝汶自決。 8.15 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舉行東帝汶公聽會。 10.20 四名東帝汶學生向雅加達荷蘭大使館申請庇護，但被拒絕。 11. 日本國會議員組成超黨派的「東帝汶問題議員懇談會」。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87年	<p>* 「西美拉尼西亞同盟」成立。</p> <p>6.5 美國四十名參議員聯名譴責印尼的佔領行動。</p> <p>7.14 東帝汶學生於帝力省政府前抗議差別待遇。</p> <p>11. 印尼報紙指東帝汶南部有三萬八千人因饑餓處於營養失調狀態。</p>
1988年	<p>* 莫比爾民族評議會（National Council of Maubere Resistance, CNRM）成立，羅慕斯·霍塔（Jose Ramos Horta）為議長。</p> <p>6.28 「東帝汶問題國際議員團」（PET）成立。</p> <p>7. 東帝汶學生再於帝力示威，抗議教育上的差別待遇。</p> <p>9.5 印尼與澳洲同意共同開發帝汶海油田。</p> <p>9.15 歐洲議會要求印尼軍撤退。</p> <p>9.16 印尼士兵姦殺五名納達吉拉農業學校女學生。</p> <p>11.2 蘇哈托訪問東帝汶，前後共逮捕三千人。</p> <p>12.29 印尼政府宣布廢除1978年法令，成立東帝汶省政府，並給予特殊地位。</p>
1989年	<p>* 澳洲與印尼簽署同意書，共同開發東帝汶附近大陸棚的資源。</p> <p>1.1 蘇哈托總統撤銷東帝汶的特殊地位。</p> <p>2.6 貝羅主教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要求實施住民投票。</p> <p>3.7 英國議員訪問東帝汶。</p> <p>4.26 美國奎爾副總統會見蘇哈托時提起東帝汶問題。</p> <p>6.22 兩名東帝汶學生至日本大使館請求庇護，另四名前往梵蒂岡大使館請求庇護，但均被斥退。</p> <p>10.12 羅馬教皇訪問東帝汶。</p> <p>12.11 印澳簽署帝汶海油田共同開發條約。</p>
1990年	<p>1.17 因美國大使來訪，帝力發生群眾示威。</p> <p>7.17 印尼合併紀念日慶典中，高中生高舉獨立革命聯盟旗幟。</p> <p>9.4 帝力教區成立五十周年彌撒中，兩萬人集合要求獨立。</p> <p>10. 帝力中學學生與軍人激烈衝突。</p>
1991年	<p>* 聯合國秘書長開始促成印尼和葡萄牙就東帝汶問題進行外長級會談。</p> <p>2.22 葡萄牙向國際法院控告印澳帝汶海共同開發條約無效。</p> <p>10.26 葡萄牙國會議員聲明中止訪問東帝汶。</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991年	<p>10.28 印尼軍攻擊摩達耶教會，殺害高默斯(Gomes)神父。</p> <p>10.28 帝力街頭出現暴動，有數百人在街頭示威，警方開槍擊斃兩人。</p> <p>11.12 三千名民眾為10.28暴動犧牲者送葬，引發反政府示威，軍隊開槍射擊，因而發生聖塔克魯斯(Santa Claus)墓地屠殺事件，引起國際關切。</p> <p>11.12 聯合國秘書長對墓地屠殺事件表示遺憾。</p> <p>11.19 東帝汶學生在雅加達示威抗議屠殺事件。</p> <p>11.21 荷蘭、加拿大、丹麥等國相繼凍結對印尼經濟援助。</p>
1992年	<p>3. 印尼援助國會議(IGGI)解散。</p> <p>3.11 印尼軍在東帝汶海域追回露西塔尼亞(Lucitania)號和平船。</p> <p>11. 墓地屠殺事件一周年，印尼更強化鎮壓手段。</p> <p>11.20 東帝汶獨立游擊隊領袖古斯茂(Xanana Gusmao)被印尼軍隊逮捕。</p>
1993年	<p>4.5 古斯茂繼承者茂福努亦被逮捕。</p> <p>5. 古斯茂被判終身監禁，後減刑為廿年。</p> <p>7. 獨立革命聯盟海外代表阿勞喬(Abirio Alaucho)與印尼政府進行和解會談。</p> <p>12. 十五名東帝汶人組成代表團前往倫敦，和反對與印尼合併的流亡東帝汶人進行會談。</p>
1994年	<p>6. 印尼軍方干擾東帝汶的一項天主教聖餐儀式，引起天主教徒不滿。</p> <p>7.11 約一百五十名天主教徒在帝力舉行示威。</p> <p>7.14 帝力三名回教徒學生侮辱及攻擊兩名天主教修女，導致五百名東帝汶大學生與軍警發生衝突，有二十名學生受傷，三人死亡。</p> <p>9.29 印尼軍隊和東帝汶游擊隊在帝力以東發生衝突，印尼軍和游擊隊各死亡四人。</p> <p>9. 澳洲國會代表團就東帝汶問題訪問印尼，會見蘇哈托總統。</p> <p>10.7 在聯合國之安排下，印尼外長阿拉塔斯和東帝汶流亡領袖霍塔在紐約舉行首次會談。</p> <p>11.12 二十九名東帝汶獨立運動份子佔據雅加達美國大使館，要求印尼政府釋放古斯毛及政治庇護。</p> <p>11.13 三百名青年在帝力大學校園及街頭進行反政府示威。</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p>11.17 美國總統柯林頓在亞太經合會高峰會上呼籲印尼改善人權，放寬對東帝汶管制。</p> <p>11.18 五百餘名民眾在帝力示威，高呼要求獨立，結果與警察發生衝突。</p> <p>11.22 闖入美國大使館的東帝汶青年，決定以葡萄牙公民身分前往葡萄牙。</p> <p>11.24 學生不滿便衣保安人員進入帝力大學校園內，有四百名學生與保安人員發生衝突，一名保安人員受傷。</p> <p>11.25 澳洲外長埃文斯呼籲印尼政府給予東帝汶進一步的自主權，包括尊重東帝汶人權。</p> <p>11. 兩名聯合國特使前往探視古斯茂。</p>
1995年	<p>1.1 東帝汶發生種族暴動，印尼移民和當地人發生衝突，四人死亡。</p> <p>1.9 在聯合國秘書長蓋里安排下，印尼外長阿拉塔斯和葡萄牙外長巴羅素於日內瓦舉行會談，會中確定將召集衝突各方代表舉行「全體帝汶人對話」。</p> <p>2.3 葡萄牙在國際法庭主張印尼和澳洲所簽訂的共同開發協定，侵犯東帝汶和葡萄牙人的利益。</p> <p>2.6 澳洲國會代表團於訪問印尼後，針對印尼軍隊在東帝汶的表現提出批評。</p> <p>2.7 澳洲在國際法庭承認印尼對東帝汶擁有合法主權。</p> <p>6.3 在聯合國安排下，三十名各派系的東帝汶人民首次舉行會議。</p> <p>6.30 國際法庭駁回葡萄牙控訴澳洲的案件。</p> <p>6. 印尼駐澳大使曼蒂里對媒體表示，1991年墓地屠殺事件是適當的，此舉招致澳洲外長不滿，結果曼蒂里遭調回，但印尼並未派出新大使。</p> <p>7.9 印葡兩國外長在日內瓦召開第六次部長級會談，會中印尼反對讓東帝汶人民舉行公民投票。</p> <p>9. 帝力發生反政府示威，警察出動後控制情勢。</p> <p>10. 帝力再度爆發動亂，兩人死亡，十三人受傷，警方逮捕一百二十人。</p> <p>12.7 五十八名東帝汶青年闖入荷蘭駐雅加達大使館，另有四十七人闖入俄羅斯大使館，抗議印尼入侵東帝汶屆滿廿周年。</p>
1996年	<p>* 聯合國秘書長特別顧問專責處理東帝汶問題。</p>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7.18 東帝汶民族領導者主張獨立後以葡語為公用語，並加入「葡語國家共同體」(CPLP)。
	10 領導東帝汶獨立運動的大主教貝羅和流亡海外的CNRM議長拉莫斯·霍塔(Jose Ramos-Horta)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0.19 印尼負責東帝汶事務的特使達克魯斯表示，印尼考慮給予東帝汶自治。
	11.9 原訂於雅加達召開亞太東帝汶問題會議，但因外國參加者被扣留而被迫中止。
1997年	5. 東帝汶軍對平民和印尼軍隊發動攻擊，導致三十七人死亡。
	6.8 六名分離主義者放火燒毀一座市場，來自印尼的移民損失慘重。
	6.26 印尼軍隊擊斃獨立東帝汶革命陣線第二號領袖人物亞力克斯(P. Alex)，另有五人被捕。
	7.4 東帝汶軍和印尼軍在基利凱(Kirikay)發生衝突。
	7.15 南非總統曼德拉訪問印尼，會見正在監獄服刑的古斯茂。曼德拉呼籲印尼政府釋放古斯茂。
1998年	3.11 獨立革命戰線司令聖塔納(K. Santana)意外死亡。
	4. CNRM更名為帝汶民族抵抗評議會(CNRT)。
	6.9 印尼哈比比總統表示將賦予東帝汶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6.10 哈比比簽署釋放十五名東帝汶政治犯的命令，但東帝汶學生對此表示不滿。
	6.12 約一千五百名東帝汶人在雅加達外交部進行示威，要求公投。
	6.13 約一千名東帝汶學生再於帝力進行抗議活動，要求獨立。
	6.18 印尼外長阿拉塔斯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印尼準備給予東帝汶特區地位，但國防、外交及財政則不包括在內。
	6.20 哈比比表示，印尼願以釋放古斯茂，換取國際社會承認印尼對東帝汶擁有主權。
	6.23 一千名學生和青年前往帝力的東帝汶省長辦公室，要求改革及與政府對話。
	6.24 東帝汶貝羅主教與印尼總統哈比比舉行會談，要求印尼從東帝汶撤軍，並給予人民言論自由及保護人權。
	6.27 英國大使克里斯多福、奧地利大使塞加拉與荷蘭大使布勞沃代表歐盟前往東帝汶訪問。
	7.17 聯合國特使馬爾克前往印尼監獄探視古斯茂。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7.28 印尼從東帝汶撤離為數三百九十八人的名軍隊。
	8.5 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協調下，印尼外長阿拉塔斯和葡萄牙外長賈馬(Jamie Gama)舉行會談，雙方同意就東帝汶自治問題進行談判。
	11.4 東帝汶住民擊斃四名印尼軍人。11.9又有三名印尼軍人死亡。
	12.19 聯合國秘書長特使麥卡訪問東帝汶。
1999年	1.27 印尼政府開始檢討承認東帝汶獨立的可能性。
	1.30 印尼內閣會議通過承認東帝汶獨立決議。
	3.11 印尼與葡萄牙協議讓東帝汶舉行公民投票。
	5.15 支援公民投票的日本政府調查團進入東帝汶。
	8.30 在聯合國監視下，東帝汶舉行公民投票。
	9.4 公佈投票結果，近八成住民希望獨立，否決自治案。合併派民兵展開報復，聯合國東帝汶和平維持團（UNAMET）職員遭攻擊。
	9.5 東帝汶首都帝力發生民兵暴動，二十五人死亡。
	9.7 哈比比總統發佈軍事非常事態令，東帝汶陷入無政黨狀態。
	9.14 印尼承諾接受聯合國部隊進入東帝汶。
	9.20 以澳洲主導的多國部隊（INTERFET）進駐東帝汶，印尼主張其為內政干涉，情勢惡化。
	10.19 印尼國民協商會議（MPR）全票通過廢除1978年決定統合東帝汶的決議。
	10.30 印尼軍完全撤出東帝汶。
	12.6 聯合國東帝汶人權侵害調查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出公民投票後印尼軍參與暴動的狀況。
	12.22 瓦希德總統反對設置國際法廷審判印尼軍在東帝汶侵害人權的事件。
2000年	1.30 聯合國東帝汶人權侵害事件國際調查委員會提出報告書，指明維尼德司令官等五人嫌疑重大。
	2.29 印尼總統於獨立後首次訪問東帝汶。
	6.8 東帝汶獨立後印尼總統首次與澳洲總理會談。
	9.1 印尼最高法院審判東帝汶人權侵害事件的十九名被告。
	9.17 美國柯恩國防部長訪印尼，要求西帝汶民兵解除武裝。

年份	政經大事紀要
11.14	聯合國安理會使節團視察東帝汶難民營，並確認統一合併派解除武裝情形。
12.11	聯合國東帝汶臨時統治機構(UNTAET)起訴印尼軍官等十一名違反人道行為。

東帝汶制憲會議於 2001 年 10 月通過國名為「東帝汶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East Timor)」，並以 1975 年 11 月 28 日為「獨立宣言日」，2002 年 5 月 20 日為「獨立日」，至於舉行公民投票的 1999 年 8 月 30 日原定為「民族解放日」，但遭否決（贊成 14、反對 59、棄權 15）。

亞太研究機構簡介

泰國 · 總理府漢文泰史研究委員會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cords Relating to Thai Histor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Prime Minister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CSCR)

一、沿革與宗旨

漢文泰史研究委員會成立於 1972 年，當時隸屬於泰國國務院總理辦公廳泰史編撰委員會。1976 年漢文泰史研究委員會升格為獨立建制。該委員會歷屆委員均由國務院總理任命。

委員會的宗旨：大力推動泰國歷史研究工作，特別是從散見於中國及其他國家珍貴罕見的漢文文獻中發掘泰國史料，譯成泰文，編印出版，供進一步探討研究。

委員會多年來在研究泰國各個時期的歷史和泰中關係史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二、工作與成果

委員會完成了以下幾項工作：

1. 出版漢文泰史泰文譯本如下：

(1) 有關 1282-1752 年間泰中關係史

(2) 《南詔野史》

(3) 《十二版納志》

(4) 《傣族》

(5) 《傣族史》1-2 卷

(6) 《八百媳婦八百大甸》

2. 同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教育、研究機構與學者建立聯繫，在學術上加強交流與合作。

3. 通過傳播媒介和專題學術講座，討論會等方式，向公眾提供學術性的服務。

三、聯絡對象與方式

聯絡人：Prof. Pornpan Juntaronanont (曾劉麗芳教授)

地址：Department of Thai and Oriental Languages

Ramkhamhaeng University

Hua Mark, Bangkapi, Bangkok 10160, Thailand

電子郵件：sawary7@hotmail.com

國內亞太研究機構動態報導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91 年 1-4 月舉辦學術活動及邀請國際重要學者訪問情形

來訪學者姓名	原屬機構與背景	來訪期間	學術活動內容與成果
楊聰榮研究員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4 月 24 日	舉辦演講座談會，題目「從越境之旅到三方會談—從幾個研究傳統談東南亞研究」，共有 30 餘人熱烈參加。
莊子秀助理教授	暨南國際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4 月 18 日	舉辦演講座談會，題目「人口移動、認同」，共有 30 餘人熱烈參加。
張守慧主任	文藻外語學院德文系系主任	4 月 11 日	舉辦演講座談會，題目「稀有語言、研究、與人生」，共有 30 餘人熱烈參加。
主持人： 呂勝瑛博士 （暨南國際大學國企系教授） 引言人： 黃兆仁博士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李揚博士 （暨南國際大學國企系副教授） 與談人： 陳厚銘博士 （中興大學企管系教授） 羅世和總經理 （大陸三威力行銷公司總經理） 林金榮副總經理 （越南豐立橡膠公司副總經理） 黃世光董事 （泰國慧盛印刷公司董事）		4 月 23 日	舉辦演講座談會，題目「東南亞暨大陸台商之海外投資與管理經驗座談會」，共有 40 餘人熱烈參加。

來訪學者姓名	原屬機構與背景	來訪期間	學術活動內容與成果
鄭永常教授	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3月21日	舉辦演講座談會，題目「二千年來東南亞國際貿易港的轉移（以中國史料為素材）」，共有30餘人熱烈參加。
<p>本所與中文系、公行系、社工系及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於91年3月7日至9日共同舉辦「台灣婦女人權發展與弱勢婦女關懷」國際會議。研討會重點所定二大主題：邊緣婦女在/再邊緣以及婦女人權之發展，特別彰顯對弱勢婦女的關懷。共邀請到國內外學者專家、婦女團體工作者、震災重建區婦女代表及政府主管官員三百餘人齊聚一堂，分別針對原住民婦女、外籍新娘與九二一重建區婦女的人權、工作權以及身體自主權等議題進行討論，參與及發言情況極為熱烈。呂秀蓮副總統於開幕時親臨會場發表專題演講「新女性新天空」。更邀請到加拿大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 Ms. Michelle Falardeau-Ramsay，以及日本淑德大學婦女研究主任兼教授 Junko Kuninobu，在國際婦女節當天分別發表「國際社會中的婦女人權發展」與「女性工作權」專題演講，並呼籲國內各界重視兩性平等及女人權保障問題。</p>			
蔡東杰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	1月10日	舉辦演講座談會，題目「近代中國對外關係史——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共有30餘人熱烈參加。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提供）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在新世紀之初，我們看到全球政經體系結構的重整，後冷戰的全球安全態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尤其在亞太地區，我們更在政治、軍事安全的敏感之中，看到經濟乃至社會安全焦點的突起。這個地區因歷史、地緣等特性，一直無法形成像北美或歐洲那樣較為緊密與和諧的合作體系，也就使得區域的緊張，成為其他地區所嚴重關注，深恐受到波及。有鑑於此，本所擬於今年（2002 年）六月中旬召開一個關於亞太區域之政治、經濟、社會安全的國際研討會，邀集各國及國內專家學者，共聚於淡水，深入探討相關議題。

我們初步擬定以下幾個議題方向：

- 全球化對區域國際關係的影響
- 區域內安全值得顧慮的焦點
- 區域發展對經濟安全的衝擊
- 區域合作與環境品質的保護與提昇
- 區域社會體系的安全顧慮
- 區域政經危機對社會安全網的影響

亞太研究計畫辦公室報導

壹、計畫簡介

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本院為進一步整合和推展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乃將原有的「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1994 年 9 月~2001 年 12 月)和「東北亞區域研究計畫」(1998 年 5 月~2001 年 12 月)合併為一，成立「亞太研究計畫」(Asia-Pacific Research Program, APARP)。亞太研究之範圍亦即包括上述之東南亞和東北亞兩個主要次區域。奉院長指示，請本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教授擔任本計畫主持人，楊國樞院士為諮詢委員會召集人。本計畫被賦予的組織目標是在近期內提升成為本院的研究中心之一。

一、研究方向

- (一) 亞太區域之歷史與考古
- (二) 亞太區域之語言、宗教、族群及本土文化
- (三) 戰後亞太區域各國之政治、經濟、社會轉型與發展
- (四) 亞太區域的華人與當地各族群及社會的互動關係

二、組織目標

- (一) 奠定本院各人文暨社會科學所(處)對「亞太區域研究」之基礎，並規劃「亞太研究中心」。

- (二) 加強本院與東南亞、東北亞及歐美各國研究本區域有成之學術機構及學者之合作關係，並推動更具互惠效益之交流。
- (三) 推動與亞太區域有關之實用性及政策性研究。
- (四) 培養國內亞太研究之新進人才。

三、組織

- 1. 計畫主持人：蕭新煌 教授
- 2. 諮詢委員會
召集人：
楊國樞 教授(本院院士，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委員：
王賡武 教授(本院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李亦園 教授(本院院士，蔣經國基金會董事長)
林 南 教授(本院院士，美國杜克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
翁松燃 教授(暨南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徐正光 教授(本院民族所研究員)
黃寬重 教授(本院史語所研究員兼所長)
章英華 教授(本院社會學研究員兼所長)
陳國棟 教授(本院史語所研究員)

- 方萬全 教授(本院歐美所研究員)
3. 行政助理：林淑慧 小姐
陳明秀 小姐
 4. 編輯助理：簡心怡 小姐
鄭家慶 先生
 5. 圖書室助理：羅惠馨 小姐
 6. 資訊管理助理：楊曉玲 小姐

四、研究計畫(2002.1-2002.12)

本年度列為亞太研究計畫內之研究項目是經由學諮會審查程序評定後而獲得經費支助的各分支計畫所組成，這些分支計畫分屬上述各研究方向，並個別執行。

(一) 亞太區域之歷史與考古

1. 臧振華(史語所)
呂宋島北岸考古調查發掘資料的整理和分析
2. 陳維鈞(史語所)
越南北部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過程的考古學調查(一)
3. 林滿紅(近史所)
「大東亞共榮圈」前後：日治時期台灣人在東亞地區的投資型移民(二)
4. 劉序楓(社科所)
近世環中國海域的海難救助制度研究 - 以中國、日本、朝鮮、琉球為中心
5. 蔡慧玉(台史所)
一個殖民官僚體制的創造：檢視日本在台的殖民遺緒

(二) 亞太區域之語言、宗教、族群及本土文化

1. 顏娟英(史語所)
民國初年上海的美術與文化 - 以

展覽會藝評為中心的研究

2. 林富士(史語所)
巫者的面貌：以韓國、臺灣與中國之巫者為主的比較研究

(三) 戰後亞太區域各國之政治、經濟、社會轉型與發展

1. 張啟雄(近史所)
戰後海峽兩岸的名分秩序交涉 - 1959年至1981年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籍之爭
2. 陳新民(社科所)
中國大陸憲法學發展的理論評析
3. 蔡青龍(經濟所)
人力短缺與外籍勞工：日本、南韓及台灣之比較分析
4. 喻唯欣(社會所)
經濟衰退與社會變遷對女性職業流動的影響：以日本為例

伍、設備

本計畫目前設於本院民族所舊館二樓，有五間研究/行政室。陳列國內外亞太研究機構之簡介及交換刊物。本計畫所購置之圖書則集中置於民族社會所圖書館，本計畫共有西文圖書 5500 冊，中文圖書 1800 冊和 85 種期刊。

貳、九十一年度博士後研究及博(碩)士論文獎助辦法

依據本院「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計畫項下之「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及「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受理本年度博士後研究及博士論文研究獎助如下：一、博士

後研究人員受理申請日期為：(一) 每年二月一日至二月二十九日 (二) 每年八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二、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受理申請日期為：每年三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相關訊息查詢網址：<http://www.sinica.edu.tw/as/intro/advisory.html> 或電洽(02) 2789-9377。

碩士論文獎助，請將所需資料寄至本計畫，彙整後交由本院學術諮詢總會審查通過後執行。

獎助辦法如下

一、凡是有志從事與亞太研究方向有關研究之本國籍人文及社會科學碩士班研究生。

二、研究方向

- (一) 亞太區域的歷史與考古
- (二) 亞太區域的語言、宗教、族群及本土文化
- (三) 戰後亞太區域各國之政治、經濟、社會轉型與發展
- (四) 亞太區域的華人與當地各族群及社會的互動關係

(以上四大方向僅供參考，申請者之研究領域不受此限，凡與亞太研究有關者，均可申請)

三、申請資格

- (一) 碩士課程已修畢
- (二) 碩士論文及研究計畫已獲得教授及審查委員會通過者

四、所需資料

- (一) 論文研究計畫三份
- (二) 指導教授推薦信一封

五、獎助待遇

每月 1 萬元，為期三個月至一年，不等，並可另外申請田野調查費，以五萬元為上限

六、申請時間

- (一) 即日起至本(91)年6月30日止
- (二) 將所需資料寄至亞太研究計畫主持人蕭新煌教授收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115)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中央研究院 亞太研究計畫

聯絡人：林淑慧小姐

電話：(02)2782-2191、2782-2195

傳真：2782-2199, (02)651-6863

Email: aparp@gate.sinica.edu.tw

其他資訊請上網查詢：

<http://www.sinica.edu.tw/~aparp>

參、最新出版品

一、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

No.56 Ron Van Oers: Dutch Colonial Town Planning between 1600 and 1800: Planning Principles & Settlement Typologies

二、東北亞研究論文系列

No.13 H. H. Michael Hsiao & Chin-Hsu Chang: The Chinese Managers in the Taiwanese Business in China: The Case of Xiamen

肆、專題演講

2002 年 4 月 8 日 (星期一)
15:10-16:20。Prof. Jon Sigurdson (The Swedish School of Advanced Asia Pacific Studies, SSAAPS 執行長): 全球化與亞太高科技革命(Globalization and High-tech Revolution in Asia Pacific)

伍、活動預告

6 月 21、22 日將與美國波士頓大學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Culture 合辦“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GOs and the Na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sia-Pacific Views”。



亞太研究計畫最新出版品展示區 (位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入口處)



4 月 8 日 ` 專題演講
Prof. Jon Sigurdson (The Swedish School of Advanced Asia Pacific Studies, SSAAPS 執行長): 全球化與亞太高科技革命 (Globalization and High-tech Revolution in Asia Pacific)

九十年度東南亞暨東北亞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

研討會日期：2002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

研討會地點：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第三會議室（2319 室）

議 程

9:00-9:20	開幕 蕭新煌主持人
9:20-11:00	主持人：徐正光 教授 張啟雄（近史所）：戰後海峽兩岸的名分秩序交涉 -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籍之爭 黃登興（經濟所）：日本、台韓與東南亞的產業發展與 貿易依存關係的比較研究 張靜貞（經濟所）：國際貿易秩序下台灣與東南亞的農產經貿關係 蔡青龍（經濟所）：人力短缺與外籍勞工 - 日本、南韓與台灣之比較分析 林滿紅（近史所）：「大東亞共榮圈」前後 - 日治時期台灣人在東亞地區的投資型移民
11:10-12:10	主持人：劉翠溶 教授 顏娟英（史語所）、吳方正（中央藝術所）、周芳美（中央藝術所）： 1927-1937 年間上海、東京、台北歐洲油畫的傳入與回應 黃蘭翔（台史所）：麻六甲都市的文化多重性與其歷史的形成過程 嚴智宏（本計畫）：素可泰時期的佛教美術
13:30-15:10	主持人：黃寬重 教授 臧振華（史語所）：菲律賓呂宋島北海岸考古調查計畫 陳仲玉（史語所）：泰南四府華人的神廟與善堂 陳維鈞（史語所）：越南北部沿海地區考古調查 湯熙勇（社科所）：清代中國救助東南亞國家難船的方法 劉序楓（社科所）：近世環中國海域的海難救助制度研究 - 以中國、日本、朝鮮、琉球為中心

15:20-16:40	<p>主持人：陳國棟 教授</p> <p>許文堂（近史所）：法國殖民時期的中越關係</p> <p>蔡慧玉（台史所）：爪哇軍政、行政網絡與戰爭動員：從比較研究的視角分析爪哇奉公會(1944-1945)</p> <p>陳新民（社科所）：中國大陸行政法學的基礎理論 - 與台灣行政法理的比較研究</p> <p>戚常卉（本計畫）：國家、宗族和新加坡金門人的國家認同</p>
16:50-18:10	<p>主持人：章英華 教授</p> <p>朱浚源（近史所）：馬來西亞華人穆斯林近代發展初探</p> <p>鄭月裡（玄奘大學宗教系）：馬天英與馬來西亞研究</p> <p>游謙（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印尼「教士復興會」發展史</p> <p>林富士（史語所）、張寅成（韓國忠南大學歷史系）、廖炳惠（清大外文系）、楊儒賓（清大中文系）、葉泉宏（真理大學觀光系）： 巫者的面貌 - 以韓國、臺灣與中國之巫者為主的比較研究</p>
18:10-18:30	閉幕 蕭新煌主持人



3月13日

九十年度東南亞暨東北亞區域研究成果發表會

「近二十年來的海外華人」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協辦單位：僑務委員會、世華銀行文化慈善基金會、華僑協會總會

研討會日期：2002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

研討會地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議 程

09:30-09:40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理事長張啟雄先生致詞 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主持人蕭新煌先生致詞
09:40-10:10	專題演講
	張存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中國海外移民研究的新發展
10:30-11:50	第一場 僑務政策 主持人：蕭新煌（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主持人）
	報告人：廖書賢（民主進步黨國際事務部副研究員） 「陳水扁政府的僑務政策(2000~2002)」 評論人：明居正（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所長）
	報告人：夏誠華（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副教授） 「海外台北學校之回顧與展望」 評論人：王新華（僑生大學先修班校長）
11:50-13:00	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改選
13:00-13:30	主題演講
	陳三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回顧與展望：談近二十年來的台灣的華僑華人研究

13:30-14:50	第二場 東南亞僑教的變遷與發展 主持人：呂芳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報告人：古鴻廷（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馬來西亞寬柔中學之研究」 評論人：楊建成（僑務委員會僑務專員回會辦事）
	報告人：邱炫煜（國立僑生大學講師） 「近 20 年來的印尼華人的教育困境與來台升學輔導措施」 評論人：唐潤洲（大同商業專科學校就業輔導室主任）
15:10-17:10	第三場 日本僑社的變遷與發展 主持人：張啟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報告人：陳福坡（日本中華學會會長） 「近 20 年來日本華僑社會的變遷與發展」 評論人：何瑞藤（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報告人：鍾清漢（川村學園女子大學教授兼所長） 「日本華僑子弟教育研究」 評論人：黃福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報告人：張亨道（日本中華學會副會長） 「旅日傑出華人曾進勇對僑居地國家發展高等教育的貢獻一個醫生在日興辦高等教育成功的事例(1904/11/11-1988/2/21)」 評論人：陳鵬仁（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17:10-17:40	綜合討論 主持人：陳鴻瑜（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2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研討會日期：2002 年 4 月 26、27 日（星期五、六）

研討會地點：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

研討會主題：新世紀的東南亞：政治、經濟與社會

議 程

2002 年 4 月 26 日（週五）

第一場 10:20 ~ 12:00	地點	(1) 東南亞經濟
		主持兼評論人：蔡蕙安教授
	社 1013	1. 王國樑（政治大學教授） 東南亞國際旅遊競爭力之探討 2. 陳世倫（成功大學研究生） 柬埔寨：邁向市場經濟的政治與經濟 3. 王宏仁、龔宜君（淡江大學教授） Socially Constructed Labor Regime Controlled Ethnic Division of Labor in Transnationals: Malaysian and Vietnamese Taiwanese-invested Firms Compared
	地點	(2) 台商及跨國婚姻
		主持兼評論人：唐文慧教授
	社 2011	1. 柳時和（暨南大學研究生） 試談「世界華商大會」 2. 林飛龍（暨南大學研究生） 越南台商之供應鏈經營模式研究—以紡織業為例 3. 陳佩瑜（暨南大學研究生） 越南新娘的台灣想像與現實差異：以埔里鎮為例

	地點	(3) 東南亞國協專題
		主持兼評論人：陳佩修教授
	社 3010-2	1. 梁銘華 (中山大學博士生) 「中國 - 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前瞻與未來 2. 林若雱 (淡大東南亞研究所所長)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安全關係 3. 吳宗憲 (中山大學博士生) 論「中共 - 東協自由貿易區」的發展與挑戰： 國際典則 (International regimes) 理論的研究觀點 4. 劉駿成 (暨南大學研究生) 建構主義下的東南亞國家協會安全問題
專題演講	地點	西 4001
	時間	13:00~14:00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主持人)
第二場 14:20 ~ 16:00	地點	(1) 印馬宗教、種族與政治
		主持兼評論人：古鴻廷教授
	社 1013	1. 鄭文泉 (中央大學博士生) 論十世紀馬來世界的佛教 - 印度教之爭： 以 金剛針論 和 金剛針奧義書 為例 2. 李美賢 (暨大教授) 「九一一」事件對馬來西亞和印尼在政治上的效應 3. 楊聰榮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4. 從華裔在政治權力結構中的角色看印度尼西亞的反華暴動
	地點	(2) 歷史與文化
		主持兼評論人：林若雱教授
	社 2011	1. 潘婉明 (暨南大學研究生) 新馬華人社會的歷史意識與關懷— 以中文專著研究議題為例 (1970-2001 年) 2. 蔣為文 (美國德州大學博士生) 語言、階級、與民族主義：越南語言文字演變之探討 3. 黃厚滋 (淡大研究生) 殖民前馬來半島法律體系初探
	地點	(3) 馬來西亞政治
		主持兼評論人：龔宜君教授
	社 3010-2	1. 林開忠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 從叛徒到英雄：砂勞越官方的國族論述 2. 陳中和 (淡江大學研究生) 馬來西亞巫統和伊斯蘭黨對伊斯蘭政體議題的爭論之探討 3. 葉明德 (暨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馬來華人政治參與困境概述

第三場 16:30 ~ 18:10	地點	(1) 泰國專題
		主持兼評論人：宋鎮照教授
	社 1013	1. 陳佩修（暨南大學教授） 泰國「新政治」的發展與危機 2. 黃世光（暨南大學研究生） 泰國「泰愛泰黨」崛起的社會經濟因素分析（1992-2001） 3. 曹淑瑤（中興大學博士生） 戰後臺灣地區與泰國的經貿發展
	地點	(2) 星馬華文教育
		主持兼評論人：蔡清華教授
	社 2011	1. 林姮好（文化大學研究生） 新加坡語言教育政策對其精英市教育影想之探討 2. 古鴻廷（東海大學教授） 馬來西亞吉隆坡坤成女子中學之研究 3. 蔡麗娟、陳丁輝（東海大學助理） 馬來亞獨立初期之華文教育初探
	地點	(3) 亞太區域整合
		主持兼評論人：顧長永教授
	社 3010-2	1. 巫進益、楊昊（中正大學研究生） 東南亞區域整合之限制：一個分析架構上的初探 2. 蔡增家（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 多邊主義、區域主義與 ASEAN 體制：從跨層次分析金融風暴後日本、東協與中國大陸互動關係的轉變 3. 李文志（暨南大學教授） 從「人權外交」、「文明衝突」與「亞洲價值」間的爭議看亞太價值版圖的爭奪：知識與權力的觀點

2002 年 4 月 27 日 (週六)

第一場 8:20 ~ 10:00	地點	(1) 日本與東南亞 主持兼評論人：李美賢教授
	社 1005	1. 陳碧純 (暨南大學研究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控制越南米糧的背景 2. 蘇俊斌 (致遠教授) 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政府開發援助 3. 黃琛瑞 (成功大學研究生) 印尼日據時期之政經分析 4. 蕭夙婷 (暨南大學研究生) 日本與越南政經關係之探討：1954-1975
	地點	(2) 新加坡對外關係 主持兼評論人：楊聰榮教授
	社 1006	1. 鍾延麟 (政大研究生) 一九九〇年代中共與新加坡發展關係之政治經濟因素 2. 蔡裕明 (中山大學博士生) 新加坡與美國的軍事合作關係 3. 董娟娟 (暨大教授) 全球化下的監視社會—以新加坡為例
休息	10:00~10:20	
第二場 10:20 ~ 12:00	地點	(1) 民生與經濟 主持兼評論人：李文志教授
	社 1005	1. 康端嚴 (成大研究生) 新馬水供爭議的政經分析 2. 林洋銘 (暨大研究生) 馬來西亞多媒體超級走廊計劃之初探：國民經濟觀點 3. 蔡幸雯 (成大研究生) 寮國邁向市場經濟的政治與經濟 4. 洪名慶、王偉芳 (成大研究生) 吸引外人直接投資之政策成效比較：以緬甸與越南為例
	地點	(2) 新加坡政治 主持兼評論人：葉明德教授
	社 1006	1. 葉長城 (中研院助理) 軟性威權主義與東亞奇蹟的省思：新加坡經驗及其困境 2. 呂炳寬 (中山大學博士生) 新加坡總統直選對其憲政體制之影響 3. 翁俊桔 (中山大學博士生) 2001 年新加坡大選評析

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的對話： 對亞太研究未來方向的啟示 國際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美國杜克大學亞太研究所

研討會日期：2002 年 4 月 30 日、5 月 1 日（星期二、三）

研討會地點：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三、四會議室（2319、2420 室）



4 月 30 日 - 5 月 1 日

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的對話：對亞太研究未來方向的啟示國際研討會

議 程

2002 年 4 月 30 日 (週二)

9:00-9:20 開幕致詞 林南 蕭新煌	
9:30-12:30 全體討論會(I)【2319 室】	
主持人：蕭新煌（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主持人） 1. Sucheta Mazumdar（杜克大學歷史系）/ Tracing Genealogies: Asian Studies in the U.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 Alvin So（蘇耀昌）（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Globalization and the Rise of East Asia and their Challenges to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3. Leo Suryadinata（廖建裕）（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 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應該合二為一嗎？以東南亞為例 4. 麥留芳（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The Role of Area Studies in Theory Construction: A Personal Adventure 5. 林南（杜克大學亞太研究所）/ Infusion of Indigenous Elements in Sociological Theories: Illustration from Social Capital 回應人：林南（杜克大學亞太研究所）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亞太研究計畫）	
1:30-3:00 分組討論會	
政治組【2420 室】 主持人：牛銘實（杜克大學政治系） 1. 張啟雄（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亞太研究計畫）/ 1956 年墨爾本奧運會中國代表權之爭：東方型國際秩序原理模式的建構與分析 2. 蔡慧玉（中央研究院台史所/亞太研究計畫）/ 官僚制度、現代性與主體性：以日治臺灣的殖民行政為例 3. 蔡源林（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 當代西方東南亞區域研究的伊斯蘭再現	經濟組【2319 室】 主持人：蘇耀昌（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1. 蔡青龍（中央研究院經濟所/亞太研究計畫）/ 國際勞工移動與直接對外投資：以東亞經驗檢視「飛雁發展型態」 2. 黃登興、張靜貞（中央研究院經濟所）/ 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檢視
3:30-5:30 分組討論會	
歷史組【2420 室】 主持人：章英華（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1. 李宇平（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日本與中國經濟蕭條(1930-1935) 2. 林滿紅（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亞太研究計畫）/ Shift of Entrepots in Asia-Pacific Area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aiwan (7 th -20 th century) 3. 朱浚源（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文明衝突與亞太研究新方向	文化宗教組【2319 室】 主持人：麥留芳（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1. 黃智慧（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東南亞與東北亞的接合處：環「東台灣海域」蘊藏的學術生機 2. 黃蘭翔（中央研究院台史所）/ 檳城邱公司宗族聚落實質空間的特質分析 3. 游謙（慈濟大學宗教與族群研究所）/ 伊斯蘭對同性戀的態度：以馬來西亞安華事件為例

2002 年 5 月 1 日 (週三)	
9:30-12:30 全體討論會(II)【2319 室】	
主持人：楊國樞 (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諮詢委員會召集人)	
1. 周雪光 (杜克大學社會系) / 地域研究和學科研究之間的中國研究：一個研究者的角度	
2. 邊燕杰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 問題導向與知識導向：中國研究的兩大流派	
3. 高柏 (杜克大學社會系) / 個案的普遍性意義與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的一致：論日本經濟的繁榮與停滯	
4. 牛銘實 (杜克大學政治系) /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China/Taiwan Studies	
回應人：蘇耀昌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張茂桂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	
12:30-12:40 閉幕	

2002 年 5 8 月

亞太研究相關會議時間表

五 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4	「大學日文教學與社會結合度」國際研討會	地 點：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主辦單位：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台灣日本語文學會 政治大學教研中心 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聯絡地址：116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電 話：(02)2938-7685 傳 真：(02)2938-7686 電子郵件：japanese@nccu.edu.tw 相關網址：http://japanese.nccu.edu.tw/
30-31	8th International Euro-Asia Research Conference	地 點：Aix-en-Provence, France 聯 絡 人：Barbara Merigeault 聯絡地址：IAE de Poitiers, 20 rue Guillaume VII Le Troubadour, BP 639, 86022 Poitiers Cedex, France 電 話：+33-5-4945-4489 傳 真：+33-5-4945-4490 電子郵件：euroasie@iae.univ-poitiers.fr
六 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13-15	First Inter-Dialogue Conference on Southern Thailand Experiencing Southern Thailand: Current Social Transformations from Peoples Perspectives	地 點：Pattani, Thailand 主辦單位：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Pattani, Thailand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聯 絡 人：Ms. Diyaporn Wisatamanan 聯絡地址：First Inter-Dialogue Conference on Southern Thailand (FIDCOST)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Pattani 94000 Thailand 電子郵件：fidcost@bunga.pn.psu.a.c.th 相關網址：http://intranet.pn.psu.ac.th/fidcost/main.asp

22-23	Sixth 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Japan (ASCJ)	<p>地點：Tokyo, Japan 主辦單位：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ASCJ) 聯絡地址：Asian Studies Conference (ASCJ) c/o Institute of Asian Cultu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University 3-10-2 Osawa, Mitaka-shi, Tokyo 181, Japan 傳真：+81-422-33-3633 電子郵件：ascj@max.icu.ac.jp 相關網址：http://www.meijigakuin.ac.jp/~kokusai/ascj/2002/2002.htm</p>
28-30	Revisiting the Asian State	<p>地點：Leid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聯絡人：(1) Dr. Richard Boyd (2) Dr. Tak-Wing Ngo 聯絡地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P.O. Box 9515, 2300 R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電話：(1) +31-71-527-2550 (2) +31-71-527-2528 傳真：(1) +31-71-527-2215 (2) +31-71-527-2526 電子郵件：(1) R.A.Boyd@let.leidenuniv.nl (2) T.W.Ngo@let.leidenuniv.nl</p>
七 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6/30-7/3	14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fter Sovereignty: Nation and Place	<p>地點：Hobart, Tasmania, Australia 主辦單位：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聯絡人：Lee Slaidins 聯絡地址：Conference Design Pty Ltd, PO Box 342 Sandy Bay Tasmania 7006, Australia 電話：+61-3-6224-3773 傳真：+61-3-6224-3774 電子郵件：lee@cdesign.com.au 相關網址：http://www.cdesign.com.au/asaa2002/</p>
18-20	The 1st World Congress of Korean Studies 2002 Embracing the Other: The Interaction of Korean and Foreign Cultures	<p>地點：Seongnam, Korea 主辦單位：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AKS) 聯絡人：Gilsang Lee, Ph.D. 聯絡地址：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50 Unjung-dong, Bundang-gu, Seongnam-si, Gyeonggi-do Korea, 463-791 電話：+82-31-709-9843 傳真：+82-31-709-9945 電子郵件：congress@aks.ac.kr 相關網址：http://www.aks.ac.kr/EngHome/</p>

26-2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Long-Term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Vietnam War	地 點：Stockholm, Sweden 電子郵件：editor@nnn.se 相關網址：http://www.nnn.se/vietnam/envIRON.htm
八 月		
日期	會議名稱	相關訊息
15-18	Tradi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Asia	地 點：Sydney, Australia 主辦單位：Harvard Project for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PAIR) Harvard University Macquarie University 聯 絡 人：Yiting Liu 聯絡地址：HPAIR, P.O. Box 380032 Cambridge, MA 02238, USA 電 話：+1-617-384-1158 傳 真：+1-617-384-1158 電子郵件：hpair@hcs.harvard.edu 相關網址：http://www.hpair.org/